

热河抗日斗争回忆录
 目录

前言	(1)
一、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部蒙旗社会	(1)
二、热河胡匪与我当胡匪的经历	(16)
三、有关“蒙匪”和巴布扎布的见闻	(53)
四、日寇侵占前的热河地方部队	(63)
五、奉军与国民军战争中我随奉军进攻察北的回忆	(86)
六、我镇压嘎达梅林起义部队的经过	(94)
七、我是怎样从“马贼”到汉奸的	(99)
八、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126)
九、日寇统治伪蒙的策略	(155)
十、伪蒙政权内幕	(173)
十一、“蒙古军”成立初期的情况	(200)
十二、“蒙古军”的发展变迁	(237)
十三、“蒙古军”的战斗表现	(249)
十四、“蒙古军”腐化堕落的情况	(259)
十五、我是怎样掌握“蒙古军”的	(270)
十六、德王如何操纵“蒙古军”	(281)
十七、日寇控制“蒙古军”的方法	(290)
十八、随德王访问日本和伪满情况	(299)
十九、我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会议”经过	(320)
二十、冈村宁次召开的一次华北伪军首脑会议	(324)
二十一、白凤翔投敌经过	(327)
二十二、德王处死吴相文的侧闻	(331)

- 二十三、我和吴佩孚有关联的几件事.....(333)
二十四、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336)

附 录

- 李守信的晚年.....刘映元(349)

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部蒙旗社会

在内蒙古近代史上,我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面人物。从我初给土默特右旗的喇嘛旗官充当“炮手”(卫士),继给热河游击马队的统领、管带担任差官,于一九二一年升为奉军的营长,一九二六年编为热河军的团长,一九三三年跟随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投降日本,进犯察北六县,其后又利用“七七”事变前后华北的政治形势,一跃而为伪“蒙古军”总司令达十年之久,抗战胜利以后又投靠蒋介石,参加反革命内战,全国解放前夕,又由台湾返回内蒙西部继续与人民为敌,最后成为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这近四十年的复杂经历,真是臭名昭著。我的反动本质真是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形成的。说来话长,下面先从我的家乡情况,阶级出身谈起。

我于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光绪十八年壬辰前六月十七日),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的一个蒙古小地主家庭。我家居住的村子叫古力古畜(音台)大庙,归热河承德府朝阳县第七区管辖。它位于牝牛河东岸,南距朝阳县城一百八十里,北距土默特右旗黑城子王府九十里,从那里往东再走三十里,便是以后划为阜新县的土默特左旗。热河蒙古有好几个部落,分别在两个地方会盟,南为卓索图盟,北为昭乌达盟。清朝光绪初年,这两个盟以辽河上流的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为界。老哈河南岸是农业区,西拉木伦河北岸是牧业区;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的中间地带,大多是半农半牧区。到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因为各旗相继放垦,在设治开鲁、林西、林东、围场、经棚之后,又设治了鲁北(即今扎鲁特旗所在地)和天山两县,因而老哈河北岸基本上也成了农业区,西拉木伦河的北岸也

变成了半农半牧区。

卓索图盟由两部和两旗组成。两部是西南的喀喇沁部与东北的土默特部，两旗是土默特部东北的唐古特喀尔喀旗与锡埒图库伦旗。喀喇沁部分为左右中三旗，和古北口北面的长城接壤。土默特部分为左右两旗，和山海关外的柳条边墙毗连。这两部的蒙古人，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影响。土默特部来源于现在的呼和浩特附近，故又称为东土默特部。据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两家贵族领着一帮奴隶从俺答的统治下逃出，跑到这个临近海滨的高山深沟地带游牧，过起“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掉进饭锅里”的狩猎生活。土默特部于满清入关以前，就投降了满清，被编为左右两翼。

土默特右旗在康熙年间，便有口里的汉人移入。少数是跟着公主、郡主下嫁而来的，称为“八大匠”的北京工匠，多数是贪图高额利润和种地不纳粮而来的山西商贩与山东农民，其中不少人跟蒙古妇女结婚而入了蒙古籍。土默特左右两旗，右旗在左旗西南，紧靠山海关外的锦州、义县和开化更早的喀喇沁部。这个旗在乾隆初年为塔子沟的东境，以后又在该旗的三座塔地方设治了三座塔厅，即后来的朝阳县。朝阳县城里，有一座康熙年间建造的喇嘛庙——朝阳县佑顺寺。在建庙之前，那里就有了直到“九·一八”事变时仍然存在的山西人所开设的“三泰号”商店，故朝阳有“先有三泰号，后有喇嘛庙”的乡谚。可见土默特右旗在距今二百多年前，蒙汉民族就开始杂居了。蒙民里有姓鲍和姓乌两家贵族和姓白、姓高、姓戴等家奴隶。由于他们的祖先来自呼和浩特一带，被当地人称为“真蒙古”；其他姓李、姓王、姓张和姓周等家奴，因为他们的祖先系娶蒙古妇女而入蒙古籍，均被称为“随蒙古”。土默特左旗在右旗东北，和汉族居住的地区，不像右旗那样临近，要晚开化好几十年，所以又称为“蒙古真旗”。

我们古力古畜大庙的李家是“随蒙古”。我的祖先是山东济

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来土默特右旗给蒙古人种地。后来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我父亲曾和朝阳寺村的汉户李家联过宗）。不过，以后我们好几辈子再没有和汉族通过婚，我的祖母、嫂嫂和我的元配女人，都是天足，会说蒙语。

最初移居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正如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样。游牧地区的汉族人民，也遭受地方民族主义的欺侮。据说，初到牧区的汉人如果不入蒙古籍，可以说动辄获咎，除了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的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所以在土默特右旗不只有单身汉人赘蒙家的汉人，也有全家入了蒙古籍的汉户。这是清朝康、雍、乾三朝时的情况。以后由于蒙民掌握了农耕方面的生产技术，奴才不堪贵族压榨，亦有“出旗”逃跑到汉族的村庄，入了汉籍的蒙人和蒙户。在我能记事的时候，热河南部只有蒙汉上层人士在制造民族分裂，一般蒙汉劳动人民，都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

土默特右旗设治三座塔厅即后来的朝阳区之后，口里的汉人大量涌入。这些汉人的阶级成份非常复杂，不仅有劳动者和商贩，也有匪盗与封建会道门分子，以及逋逃的罪犯与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就是在劳动人民里后来也分成两极：有的成了地主和开设“烧、当两行”的财东；有的成了贫雇中农和手工业者。农民非常封建保守，不像牧民那样轻易流动，在一个地方住久，便产生了“热土难离”的感情。牧民定居下来变成农民以后，也是如此。

民国初年我刚当兵时，开到西喇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和开鲁驻防，那里把种籽扔到犁过的地里，不用锄耩就可以生产出“成亩打石”的粮食，可是人烟非常稀少。而我的家乡土默特右旗，早把高山变成了梯田，用毛驴驮粪在好多炕大的小面积土地上施肥。据一九二七年调查，朝阳全县的人口已达到六十五万四千余

口，绝大部分是汉族农民，不论是“真蒙古”和“随蒙古”，合计起来也不足一万人。此外还有极少数回民。在朝阳县城以南，蒙古人多系土默特左右两旗和喀喇沁部不堪王公贵族压迫的“逃户”。他们改名换姓潜居到汉族的村庄，给汉族地主佣工受苦或饲养牲畜。县城以北凡是川口地方，多系以蒙古人为主的村庄，称为某某营子，山沟里完全是称为孤家子、两家子以及三十家子与五十家子的汉族村庄，表现出一种人稠地窄的状态。

朝阳是热河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县，以来自山东的移民占全县人口的多数。这些山东移民把山东的各种风俗，完全搬到土默特左右两旗及敖汉部与奈曼等旗。在热河，朝阳人多好斗勇，特别是朝阳城南羊山、铎子沟、二十家子和松树嘴子一带的农民，表现更加突出。有些人因不满王公、地主的压迫，愤而起事；也有的因贫困无着，散而为匪。尤其朝阳境内尽是大山深沟，牝牛河日夜吼叫，所谓“山高水暴出刁民”和“险固足以自守”，越发成了生长胡匪的窝穴。朝阳县城不只一次被“暴民”和胡匪攻破，故有“久反朝阳”之称。朝阳最初的上匪，是朝阳寺附近头道营子根顿召的几个喇嘛。他们在道光年间便跑到柳条边墙东边的奉天境内抢掠，人称为“马鞑子”。以后回子沟的回民韩三、韩四弟兄，也跟着蒙古喇嘛效尤。到了咸丰初年，就有称为“教人好”的胡匪在朝阳境内出现，开始了绑票。接着关东奉天、吉林的胡匪（内中有科尔沁部白凌阿率领的蒙匪），不断闯入朝阳。朝阳的地主阶级组织起民团，城里的商户设立了铺勇。同时因为土默特右旗和敖汉部均发现了金矿，朝阳本地也出现了私开金矿的“金匪”。在英法联军把咸丰皇帝从北京撵到热河的那年，有冀东昌黎县秀才柴宝善，鼓动朝阳金场沟的“金匪”李凤奎称帝，于阴历二月初二日攻入县城，其母穿戴着戏班的凤冠霞帔招摇过市。与此同时，土默特左旗蒙民因王公差丁过重，由恩合巴图等组织“老头会”进行反抗，将阶级斗争转化成民族仇杀，也进入朝阳县境焚掠。

上述这些都是小的骚动，大的变乱是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金丹道的起义，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二十家子和铍子沟“联庄”打松树嘴子天主教堂的反帝斗争这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金丹道起义，发生于敖汉旗，后来波及到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旗。朝阳的蒙汉人民称金丹道徒为“学好”，可能是这些道徒仿效胡匪的行径所致。因为关东和热河的胡匪首领多以“好”字为号。如前述咸丰年间在朝阳扰乱的“教人好”，以及后来张海鹏部下的王永清叫“天下好”等等。金丹道起义时的政治口号是“灭清扫胡”四个大字。这是由于蒙古王公、旗官压迫汉人，金丹道徒利用这种情况而挑起了事端，聚众攻打敖汉旗贝子府。

大汉族主义固然能给少数民族带来灾难，一些地方民族上层也极力压榨各族劳动人民。“九·一八”事变以前我在开鲁和林西驻防时，还听说迁入科尔沁草原种地的汉人，一旦发家致富之后，即有被当地的牧主和大喇嘛派人把全家屠杀的危险。巴林左、右旗中间有个蒙古豪强×××，他住在大草原中间一个单独的大院，到那里投宿的汉族商旅，只要行囊沉重，也有永远失踪的危险。

敖汉贝子兼昭乌达盟盟长府邸被金丹道徒包围烧杀时，唯一逃脱的是他的一个孙子德松坪，人们称为“老德王”（热河人称西苏尼特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小德王”）。此人于我当了军官之后，和我变成称兄道弟的朋友。据他亲自和我说：他家居住的上府街北面十五里，有一座东西二百里、南北五十里的大黑山，埋有康熙皇帝嫁给翁牛特部和喀喇沁部的两个公主，所以称为东陵和西陵，蒙古王爷就借此严禁汉人入山砍柴。有一次一个砍柴人被敖汉贝子府的兵丁衙役逮捕，用树杈插入肛门扔到空中处死。金丹道首领、建昌县医生杨彦春和齐老道等，便以此挑动起民变。他们除烧杀了敖汉贝子府和附近所有的蒙古村庄和人民，并于是年阴历十月十二日，攻入朝阳县城。后经佑顺寺喇嘛潘成

连夜骑马跑到锦州告变，由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死于朝鲜平壤的那个左宝贵，率领马步三营军队开到热河始将战乱平定。

到锦州搬兵的潘成，就是我曾给充当过“炮手”的罗旺喇嘛的师父，即在热河很出名的周仓喇嘛，拉扯起来还是我的师祖。因为金丹道徒看见蒙古人“格杀勿论”，敖汉部白塔庙出了一个三喇嘛，也因替父报仇，聚众惨杀起汉人来。这样民族间互相仇杀的结果，把敖汉、喀喇沁和土默特的好多蒙古人，都逼得跑到科尔沁部，谓之“跑学好”和“躲学好”。汉人被杀据说有三四万人，双方的财产损失更无法估计。战乱过去以后，朝阳、建昌北部出现了好多无人的村庄。清廷曾发给每人三串朝阳“塔帖”，对蒙古人进行过赈济。我父亲那时扔不开家业，把妇孺们寄藏在山上，他一个人留在村子里看门，钻到灶火的炉坑里面，用头顶起铁锅瞭望外边的动静，他曾看见从敖汉部退往阜新县的“学好”，从我们村边整整过了一天一夜。官兵追了上来，他们发出“逮逮逮”和“杀杀杀”的喊声上去包围。因为“学好”们尽拿着土枪刀矛而缺少快枪，最后剩下一万七千多人，都被左宝贵的军队兜围到我们村东一条名叫“寻死沟”的深沟中完全歼灭。

我是“跑学好”的第二年所生，当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掀起反帝斗争时已经九岁。朝阳义和团攻打的是天主教东蒙古教区主教所在地的松树嘴子，那里在朝阳县城东南。朝阳县南北长达七百余里，松树嘴子和二十家子、铧子沟一带，距我家有三百多里，故未被战争波及。朝阳县东南事态闹得很大。铧子沟和二十家子的地主，早已建立起联庄的组织，而松树嘴子的地主武装，有比国神甫给弄来的洋枪，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结合在一起，这两方面经常发生摩擦。当时，铧子沟和二十家子的“联庄”，由朝阳庠生邓云成（字莱峰）领导，在义和团攻打松树嘴子教堂时，“联庄”没有派人直接参加，只供给食宿和借给火枪等武器。就是这样，当天主堂从奉天把俄国军队调来，将义和团击退以后，便向松树嘴子以西的蒙汉人民展开了报复性的焚掠。

除火烧永顺寺和云楼寺等蒙汉召庙外，还进入朝阳县城劫狱，沿途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因此激起朝阳广大蒙汉人民的义愤。

天主教徒和俄国兵攻打二十家子时，邓云成叫“联庄”退让，最后天主教徒和俄国兵包围铧子沟时，邓云成才决定抵抗。因为“联庄”那时也有了八厘米快枪，又加民团义愤填膺，在沙皇军队和汉奸洋狗的面前，抵抗得非常英勇，所以铧子沟始终未被攻破。一直从一九〇〇年秋天支持到一九〇一年夏天，由直隶提督马玉昆亲自前来调停才停战。天主教堂斗不过“联庄”，却利用法、比等帝国主义向清廷施加压力，而邓云成表现出地主阶级的投降妥协性，以为事情就此罢休。不料是年初冬，清廷把宋庆的毅军调来，对铧子沟“联庄”按暴民进行了剿除。邓云成和他弟弟邓云祥及儿子等，突围出去跑到柳条边墙的清河门，被追兵杀死，方使松树嘴子的外国神甫消了气，将这一风波结束。

扎鲁特部放垦设治为开鲁县以后，朝阳好多农民都搬到那里种地。我的朋友张秉彝（字子良，朝阳照星沟人），曾任赤峰商埠交涉员和开鲁县长，在那里购买了好多土地，他的儿子张念祖是开鲁的大恶霸地主。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还率领当地的民团，缴过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的武器，得了不少转盘机枪。

朝阳在我出生前后，差不多年年有战乱，因此几乎家家有武器，人人都会骑马打枪。加之当地赌风很盛，到处有赌场，好多青年因为输干要光，逼得当了胡匪。我住的那个第七区，有两班一百二十多人的“京梆子”剧团，春夏秋三季经常在各村巡回演唱。天不落雨唱“祈雨戏”，天要落雨唱“谢雨戏”，无非是利用庙会聚赌，绅士和军警借给戏班抽价向“宝棚”领钱。至于地主人家，一遇刮风下雨就开局，掌柜的把伙计们的工钱，完全用“宝盒子”扣入自己的腰包。这种现象不仅是朝阳如此，我在经棚驻防时，看到西拉木伦河北岸的乡下，赌风比朝阳还厉害。那里有一个当乡约的刘祥兆，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地主，也用“宝盒

子”和其他方法剥削长工，以致给他受苦的人负债累累，成了他的不吃草料的牛马。朝阳因设治已久，不像北边那样“开放”，但是赌毒和烟毒，可以说遍地皆是。至于各部的蒙古人，用一种染有红白颜色的牛骨头作为赌具，也赌得很凶，以致不少人倾家荡产。热河的锥子山盛产鸦片，共有四五个品种，到了天气上冻时，还割不完烟浆。锥子山的鸦片行销热河各旗县。各旗县也多种植此种毒品，使许多人沾染上不良嗜好。民国初年，日本人又从奉天方面给热河输入金丹和吗啡，毒性比鸦片还要强烈。这样赌博添上烟毒，把不少劳动人民胁迫进胡匪里。我家东南八九十里地方，有一座广岭山（亦称鬻巫吕山）便成了关东和热河的贼窝。广岭山东是张作霖的老家黑山县；广岭山西有汤玉麟的故乡阜新县骚虎营子。

热河蒙汉人民称胡匪为“耍人的”。来源主要是染有烟毒嗜好的劳动人民，不过也有民团中的乡勇和军队中的士兵，以及地主家庭的子弟，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此道的。三五成群的小胡匪，当地人叫做“地蹦子”，他们势孤力单，民团还可以对付；如果遇到立起“字号”的大胡匪，他们能成为几百甚至千余人的伙子，民团便须和他们交朋友，不敢采取敌对态度。热河各县的民团，完全由地主和一部分烧、当两行掌握。朝阳附近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虽然不如西拉木伦河以北以及察绥两省的大地主多，但是差不多都像王英的父亲王同春那样，在家中养有护院的“炮手”。并且他们互相连络勾结，结成很强固的“联庄”组织。“耍人的”因他们平日供给械弹和窝藏掩护，必要时，也纷纷前来“帮忙”，成了他们豢养的爪牙羽翼。朝阳的地主阶级结成集团来对抗官府。光绪年间，因为反对成立警察和创办学堂，都跟政府闹过事。民国年间由于反对铲除烟苗，经常把军警赶跑。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曾激起朝阳的民变，几乎被羊山和二十家子的“联庄”和红枪会，把他的五弟汤玉书包围歼灭在朝阳县城。

朝阳的汉族“大家”（内蒙西部称大户）都有炮台，中等户也是好多家建有一个围堡。凡是他们对付不了的胡匪，均在里边窝藏。土默特右旗的王府，除了在黑城子经常驻扎着一百多“小队”，王爷收地租的“局子”以及旗官们种地的“背房子”（即窝棚），均有四五十个“炮手”保护。他们和汉族的地主一样，也包庇、收容立有“字号”的胡匪。至于土默特左旗、喀尔喀旗与库伦旗那里的王爷、旗官、牧主以及召庙的大喇嘛，不仅养有“炮手”和交结胡匪，并且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和内蒙的巴布扎布“宗社党”勾结，受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出过好多亡命徒。民国初年巴布扎布等“蒙匪”，在热、察、绥三省和科尔沁等部造成很大灾难。后来变为我的帮凶的田英（曾任伪蒙古军副师长）和胡宝山（曾任伪蒙古军团长）就是土默特右旗的人。田英于一九一三年参加外蒙军队，到过张北县以北二十里地的白城子。胡宝山在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战死林西之后，才到热河游击马队当了兵。据他们后来和我说，在这些“蒙匪”里，外蒙古人很少，大都是察哈尔和热河的蒙古人。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朝阳一县经常有十几营官兵驻防。二次直奉战争前，朝阳城里还设立着一个镇守使署。官兵开到朝阳，也不敢过于蛮干和硬剿，必须和民团、胡匪取得妥协，才能够站稳脚步。因而朝阳是官兵、民团、胡匪联成了一气，像三座大山压在善良百姓的头上。劳动人民不想做俯首贴耳的奴隶，就得挺身当打家劫舍的盗贼。失败的固然要杀头挨枪毙，立住“杆子”的便会升官发财。我就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里。

土默特右旗设治为朝阳后，王公、旗官、贵族据有大部分好地，山野完全卖给汉人辟为农田，给一般奴才分配的“户口地”很少。王公、旗官因为放垦时得到好多“荒价”，并且年年能向汉族农民收取“小租”，所以都过着腐化堕落的奢侈生活。贵族拥有大面积土地和好多奴才，也是饱食终日，吸食鸦片，多半活不到大的寿数。特别是王爷，以值班为名常年住在北

京，旗下的协理和“堂官”等大肆贪污，因而奴隶们除了遭受官府的苛捐杂税的压榨，经济上还有一层贵族的剥削。在本旗活不下去，出旗逃往外地的很多。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在北京西城的酱养坊占有一顷地大的一座府邸，里边有楼房假山和可以划船的小湖。日本投降后，“小王爷”沁布道尔济想卖给我，索价竟要六十万美金。

我们古力古畜大庙，共有一百多户人家，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汉人。这五十多家蒙古人里边，姓赵和姓朱的三十多户，都是王爷的奴隶。地里所产的粮食，只够吃半年，缺短的口粮，必须以佣工和经商来换取。故姓赵的开着留人店和杂货铺，姓朱的给汉人和我家揽工。他们都是“穷蒙古”，只负担黑城子王府的差丁（因为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只好服劳役）。我们李家由于祖先来自山东，子孙比较善于耕耘土地，收入稍微宽裕一点，故有过念书当了医生的。我父亲从小弯腰曲背，村子里的人，除过因为他舍不得花一文闲钱，给他起了一个“土包子”的外号，通常称他为“李罗锅子”，方圆几十里以内谁也知道。朝阳的土地面积讲“天”，一“天”等于十亩。在生我大哥的时候，我父亲已拥有三十多“天”土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四五十只山羊），经常喂着十几口肥猪，还从几家破产的蒙古贵族手里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我家一面剥削给我们种地的三四个长工和几十个短工，一面也受外边各种势力的压迫、敲诈。

首先干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是一个姓鲍的名叫色楞的贵族。因为他是我们家的“诺颜”（奴隶主），我们是他的奴才，我们姓李的全归他所有。可是他来到古力古畜大庙，不去找我的本家（由于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专门吃喝我父亲李罗锅子。色楞台吉住到我家以后，每天须以好酒好肉和鸦片款待，临走时还要拿银钱和烟土，以及捉猪宰羊拉米驮面。那时我家不说土炮火枪，单是快枪已购到三枝。我几次想拿枪把这家伙干掉，可是我父亲不允许。他说：“诺颜杀了奴才可以不偿命，奴才杀了诺颜

得满门犯抄。”后来我父亲用两万串朝阳的“街市钱”（每百文折铜钱十六文），以一万七千串的整数，交给色楞台吉做了赎身的价款，用其余购买黑城子衙门的“档子房”，给发了和色楞台吉永远脱离主奴关系的执照。但色楞台吉仍不断来我家跌皮、耍赖，我父亲依然奴颜婢膝地对他表示恭维，一直把这个没有儿女的嫠夫供养到死。

我们由奴才变为“自由民”（达尔罕民）以后，很可以像别家蒙民编入朝阳的汉户，但是我父亲又怕亲戚乡里在背后批评，所以跑到北票山南面八里的下府，给土观活佛仓的喇嘛花钱，领了一张印票，变成了那个召庙的“庙户”。最初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就住在下府地方。此处在牝牛河西岸，离我家五十多里。土默特右旗王爷修的这个召庙极为宏伟，里边有五百多喇嘛，附近的好地都归庙上所有，土观活佛的收入很大。属于庙上的“庙户”，只给捐献少数香钱即可，土观活佛每年“游旗”到各村给蒙民和他的庙户“净宅”时，也只收取一些随心布施，所以庙户比蒙户负担要轻。虽然这样，但是富裕庙户也得有人给“抗风”，否则仍然有人欺侮，遭受种种压迫。

我父亲已经不会说蒙古话，我母亲会说而不说。我家除了在院子中间有一根喇嘛给立的“玛尼”杆子，生活习惯礼节以及所供的神位和汉族的庄稼人完全一样。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按照蒙古人的风俗，许在本村庙上当喇嘛。后来父母舍不得叫他去，就让我去顶替。我的乳名本来是那孙巴雅尔（长寿的意思），结果叫成了一个三喇嘛。古力古畜大庙在北往开鲁、南到义县的大路中间。我家是该村的首户，修建着院墙很高的大院，过往军队和商旅，都到我家的伙房中投宿。我家有三枝快枪，仅能堵挡“地蹦子”，但是打不了大胡匪，所以只好和他们交朋友。我七八岁时，胡匪经常拉着整车“肉票”在我家打尖住夜，我们杀鸡宰羊，用好酒好饭招待。到了称为“外八营”的直隶练军开到我村驻防，胡匪才绕开了古力古畜大庙。我从小就爱玩枪骑马，并且

喜欢和当胡匪与当兵的人接近，听他们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因为自己家中有枪有子弹，时常拿到山上打野兔。我十一、二岁时，射击技术就很不错了。我父亲怕我长大后给他生事惹祸，先是以四块银洋的束修把我送到村子里的私塾，念了半年《百家姓》和《三字经》。由于我经常逃学，又叫我带领长工，早起晚睡地做庄稼活，想把我培养成他那样守家过日子的地主。可是，我从小就想到外边广阔的天地去闯荡。我父亲对我没有办法，最后又企图利用女人把我拴住。在我十四岁那年，就给我娶了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名叫德力玛的蒙古老婆。

“庙户”不给土默特右旗负担差了，但是由于我家的土地，大都是向汉族的种地户购买的“粮地”，所以和汉族的地主一样，得给朝阳区衙门交纳田赋，并支应地方上的其它差事。朝阳在宣统以前，各区就成立过名叫义务警察的民团。凡是有地十“天”的担任步警，有地三十“天”以上的担任马警，谓之“步户”和“马户”。我家有地三十多“天”，够上出马警的资格，最初是自备枪马，每年花三百多块银洋雇人到朝阳七区替我大哥当差。我娶过老婆之后，我父亲看见我成天在“外八营”的兵棚子里厮混，并不去田间劳动，索性叫我前去担任“马户”。我当了马警，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每跟小股胡匪作战，老是冲在前边硬打穷追，发出的子弹讲究必须要“吃肉”，我把杀人当成了儿戏，“地蹦子”们听见我很感头疼。我那时还不叫李守信，按我大哥李君、二哥李臣的顺序、教书先生给我起的官名叫李义。因为打了几个小仗很勇敢，“李义”便在民团、胡匪和官兵中间出了点名。连平顶山庙上的大喇嘛和黑城子衙门的协理，也知道古力古畜大庙的李罗锅子家中出了一个少年“炮手”。我父亲听见这些话以后，当然非常担忧，一面怕我“久走冰滩难免有滑倒”的一日；一面怕我跟胡匪结下冤仇给家中招来灾难。因此我当了几年“马户”以后，我父亲又雇人把我替回，以免我在外招风闯祸。

我回到家中，除了当“马户”时交结的朋友，不断前来找我，尤其是“外八营”在我村驻防时，有老板纪小辫部下的一个安大个子（即安静海，又名安占武，朝阳兆星沟人，汤玉麟时代任过经棚县公安局长），这时在朝阳北境当了胡匪，而且立起了“字号”，每次路过古力古畜大庙，总要到我家勾引我去入伙。同时朝阳县的警察、黑城子王府的衙役和过往的军队，路过古力古畜大庙时，因为我家富裕而无势力，老是连人带马住下大吃二喝，吃饱喝足抹嘴扬长走去。我忍受不下这种窝囊气，好几次想把他们赶跑，被我父亲阻止而未发作。我父亲看见我呆在家中也会生事，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到距家十七里的平顶山上去当喇嘛。平顶山庙上的当家大喇嘛姓白，是朝阳佑顺寺外号周仓喇嘛潘成的徒弟。潘成因到锦州搬兵平定金丹教有功，并且和毅军的宋庆、姜桂题、米振标等结交成朋友，后来成了热河的地方绅士。朝阳县官上任，必须先拜望潘成，才能坐稳。他的几个徒弟便借此横行乡里，成了朝阳乡下的恶霸。平顶山庙的白大喇嘛，又名罗旺喇嘛（罗旺是西藏语），我给罗旺喇嘛当徒弟就成了周仓喇嘛的徒孙，我父亲好借以支撑门户。另外罗旺喇嘛收我为徒，并不是给我传授经卷，因为他知道我很会打枪，是托人指名叫我前去给他保镖。我父亲便在我二十一岁那年，让我剃掉辫子到平顶山“出家”，做了成天背着手枪，伺候军官、地主和胡匪头子的蒙古小喇嘛。

平顶山庙是一个只有四十“天”和五十多个喇嘛的穷召庙。可是罗旺喇嘛的声势，却令人侧目。他跟“耍人的”与“官线上的”（内蒙西部称“官面上的”）都交往，热河和关东都有他的好朋友。在我们村里驻过防的纪小辫，跟他磕过头；当了胡匪的安大个子与以后给汤玉麟担任热河保安旅长的赵国增，是他的结拜弟兄。罗旺喇嘛背枪的徒弟，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从小出家叫做吉祥的小喇嘛。此外雇有两个厨师，给他炒菜应酬四面八方而来的客人。由我们两个徒弟，从厨房到客房给端茶递水。他白天

给“官线上的”洗尘，黑夜给“耍人的”接风。有时这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就分别在两个院子里招待，双方都假装不知道，故发生不了冲突。朝阳、锦州和义县等处的大地主子弟和烧、当两行的伙计，被胡匪绑去以后，都得托他给“说票”。他仲裁出“赎价”，如果胡匪不买他的帐，可以调动别的胡匪和官兵去联合剿除。“说票”成功以后，地主和烧、当两行，以上布施和舍饭的名义，用金钱、烟土和粮食、牛羊对他进行酬谢。罗旺喇嘛每次出门，都是坐着带串铃的二骡轿车，我和吉祥骑着快马，一前一后跟着。我们除了背着一枝八米厘长枪，还挎着一枝德国造“自来得”手枪。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商号老板，听见他的串铃轿车从街上走过，多从柜台上出来拱手迎接，称他为“喇嘛爷”。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县官出门，也不如他威风。

我给罗旺喇嘛当了二年多“炮手”。在这期间，可以说大开了眼界。不仅跟许多“耍人的”和“官线上的”人混熟，并且知道了不少为匪做官的门径、道路与诀窍。认识到当时的世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自己有一套“本领”，得到一帮子人的拥护，就可以为所欲为，扬眉吐气。因此我跃跃欲试，很想自己也创立一个“字号”。我那时就懂得了交朋友的重要，用小恩小惠去拢络他们，让他们做为自己的工具。那时候，每年有好多人给庙上上布施和舍饭，但是除了我和吉祥而外，其余的那些小喇嘛，每天早上只有仓里给发一碗米，连老腌菜和大酱都没有。罗旺喇嘛没有客人前来的时候，即到平顶山底下的头道营子，以“回娘家”为名，由吉祥在外边站岗，去和一个蒙古寡妇睡觉。我利用这一空隙，拿枪给小喇嘛们打野兔吃肉，他们当然对我非常拥护。罗旺喇嘛人很聪明。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看见我野心勃勃，恐怕留在身边闯下大的乱子，当我二十三岁那年，说我随便打野兔杀牲，不能当佛门弟子，遂婉言把我辞退，并且把我介绍到黑城子王府，给他的朋友、衙门管印的协理富巴什当了“炮手”。

黑城子因为王府修建着一座黑压压的大土城而得名。城里除

了王府和衙门，便是王公、仕官所开的商店买卖。城门洞像张大的血口，吮吸着朝阳城北蒙汉人民的精髓。王爷每年夏天从北京回来避暑，带着一班京戏艺人在王府享乐，不肯轻易出门，公事全交给这个掌印协理去办理。富巴什在城里有一处大院，里边还套着一个小院，大院中好多奴才给他铡草喂马，推碾围磨，他在小院中和老婆头对头抽大烟。富巴什在城外有四五处“青房子”，土地达好几千“天”，每年收租在万石以上，粮食堆积如山。他除了指挥旗下的“小队”，身边经常有四个“炮手”保护。由他家到衙门只有百十步地，也要乘坐轿车，让我们在前后跟着，做他的“顶马”。他在“档子房”办公时，我们得在门房中呆着。我那时已经长硬翅膀，如何能当这分“穷差”，所以干了三个多月，便把手枪扔给他跑回家中。那年我父亲整整七十岁，我看见他风烛残年，由于我二哥病故终日啼哭，故不忍扔下他远走高飞。到了一九一七年，我父亲七十三岁逝世，我再没有牵挂和管束，翌年我二十七岁时，即被安大个子叫到朝阳的邻县建平，参加了亦官亦匪的热河游击马队。因为安大个子和赵国增等，被熊希龄的同乡张协堂收抚，在那里都当了军官。从此我就跑到外边闯荡江湖，逐渐走上了直接危害人民的反动道路。

热河胡匪与我当胡匪的经历

我从十五岁起，就在热河朝阳的民团中充任“马户”（马警），开始和胡匪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结交朋友。二十二岁剃辮子给土默特右旗的罗旺喇嘛为徒，充当“炮手”（卫士）。因为我这个师父跟好多胡匪首领都有来往，经常替地主和“烧当两行”（烧锅及当铺）的人们“说票”^①，使我知道了胡匪如何组织与怎样活动。我二十七岁在热河游击马队入伍，曾亲自出去当了将近四年胡匪。我三十一岁升官以后，仍不断勾结胡匪。特别是以后我给日本帝国主义组织伪“蒙古军”和给国民党反动派成立“东北人民自卫军”时，更将热河的不少胡匪收编为我的祸国殃民的爪牙。我是热河省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胡匪头子，也是热河省有史以来最坏的一个“耍人的”（光棍、拉杆的）。因为我“合杆”（合并土匪的夥子）合得多，“拉线”（各方面的眼线）拉得长，以及“打窑”（抢劫的地方）打得响，才最后变为伪“蒙疆”的第二号战争罪犯。我在大陆解放以前，和热河的胡匪打了四十多年交道，所以对热河胡匪的情况和处境知道得较详。现在把有关这一方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记述如下。

（一）热河胡匪的概况和特点

热河临近关东，最早完全是牧区，除朝阳境内和赤峰、围场之间山岭较高较大，并有石壁岩洞，其它地方山岭很低很小，且无茂密森林。热河南部因满清皇帝建有避暑山庄和打猎的围场，

^①说票——旧社会有钱人被土匪绑架叫“绑票”。托人从中和土匪说合，用财物将被绑票的人赎回叫“说票”。

康熙年间即开始设治厅、县。热河北部蒙古王公封建区域，进入民国后，还有好多地方未曾开垦。这样，就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中间，出现了一个蒙汉杂居和旗县并存的半农半牧区。在农业区，地主阶级立有民团和联庄（几个村子的联合武装力量）。所以像朝阳的羊山、二十家子和铧子沟一带，地形虽然险恶，但胡匪不能到那里存留。在牧区，人烟特别稀少，蒙古包随着牲畜时常移动，胡匪因不通语言和不熟路径，也无法进行活动。胡匪主要的存留活动区域，是在农业区和牧业区中间的“三不管”地带，也就是老哈河和西喇木伦河两岸刚设置不久的十几个县境内。由于此一地带环境复杂，统治松懈，超经济掠夺成为风气，豪强很容易暴富，外地的流浪人极多，缺少封建的政教文化束缚，具备了不少产生胡匪的更多因素，存在着不少滋长胡匪的更多漏洞。

胡匪因为受到地理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局限，在热河，首先是很难建立根据地。朝阳境内的大山被民团和联庄据守，自然不能利用；赤峰与围场中间的黄岗梁，亦因里边没有人家，进去无法生活。唯一例外的，就是围场、多伦和经棚三角地带，由于行政上是热河和察哈尔的交界，地形上是一片四、五百里的大沙漠，不仅沙漠里有好多小片绿洲，农民安设着“窝铺”（农民的临时住所），而且沙漠上还有丛生的灌木，胡匪容易进入隐藏。在克什克腾旗和围场县，曾经出现了宝振荣（即荣三点）和白凤翔（即白三阎王）这两个蒙汉大胡匪头子。他们发展成为可以窜扰热河西部和察哈尔东部的股匪，最后被奉军收编。除了这两部分胡匪以外，热河其他的胡匪只有潜伏区而无根据地，并且是三、四十人的小股，到了“合杆”的时候，才可以三百二百地聚起，出完了“摊子”（出去抢人）即行化整为零“漫开”（分散隐蔽）。像汤玉麟的副官长李芳亭，在未被收抚以前，因在朝阳北区和阜新一带活动，依靠广岭山小沟中的“地窝铺”潜伏，由于山路崎岖，所带的那帮胡匪，均不能骑马，形成出没无常的步匪，连阜新县都走不出去。

其次，热河在清朝时，有重兵保护行宫和围场，光绪年间并由毅军开来驻扎，还有由毅军分支出的直隶练军“外八营”以及东西南北四路“巡防队”。同时旗县都有“小队”和“巡警”，地主、收主和“烧当两行”也差不多均修有围堡与养有“炮手”，而且能利用联庄的形式，集中起民团来同胡匪作战。可以说统治阶级在热河各处，布置着一个镇压人民武装起义和防堵追剿胡匪的军事网。所以热河的胡匪既不能占山为王，也不能长期在潜伏区以外窜扰，无法发展成山东刘桂堂那样的流寇。这是热河胡匪不能壮大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中，统治阶级和剥削阶层，本身就在制造胡匪，并给胡匪留下好多可钻的空子。他们除了不能协同一致防匪剿匪，还为了本身的安全和利益而通匪窝（藏）匪。所以热河的许多军队与“大家儿”（内蒙西部称大户），都不得不和胡匪妥协，形成一种彼此依附和互相利用的特种社会关系。因而不少胡匪，时而是抢人的“响马”（亦称土匪），时而是护院的“炮手”，时而又成了站岗的官兵。“炮手”和官兵没了钱花，跑出去也就变成了“响马”，使“圈儿”（指胡匪内部，也指自己的活动区域）外边人辨别不清。别看军队民团部署得那样严密，久走江湖的人还是通行无阻。故热河的胡匪虽无固定的点与广阔的面，却有不定点与活动的线，可以用“远攻近交”的策略，和夜行偷袭的战术，照样能横冲直闯，劫路绑票，以及“合杆”集中在一起，破“大家儿”的“窝儿”（住所）与军队的防区。

热河在近百年来，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相当严重，特别在中部的半农半牧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加之军阀混战，帝国主义派遣间谍进行特务活动，使得这些斗争和矛盾更为错综复杂。不论汉族和蒙族，凡是立起堂名字号的“大家儿”，都有王英父亲王同春那样所谓“把式匠”的武装。在热河不叫“把式匠”，而叫做“炮手”，并且差不多的人家都有。好多“大家儿”的炮手，比王英家多过几倍。给大家充当炮手的人，尽是内地的罪犯

和当地的流氓，善良的劳动人民，当不了“大家儿”的凶恶爪牙。同时驻军和县区的巡警，以及蒙旗王府衙门的小队，也是由这一类人组成。这两种类型的人，多半狂嫖滥赌，并且抽鸦片烟与扎吗啡针，手中经常没有零花钱。如不寻求其它生财之道，便无法维持其挥霍浪费，于是当胡匪成为他们的唯一出路，而胡匪头子也把他们看成主要的“兵源”。另外，半农半牧地区土地开垦不久，地广人稀，为谋生从内地来的单身汉，染上赌博和吸毒嗜好，最容易变为胡匪的“线头”（情报人员），和混入胡匪里边去做跟上吃贼食的“爬子”（小胡匪）。胡匪因为干骨头上榨不出油水，多不抢劫贫下中农和穷苦牧民，还把一切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都认为是自己的“横梁子”（有如过河的桥，可托底的意思）。贫下中农与穷苦牧民，对于地主、牧主存在着“幸灾乐祸”的心理，很希望胡匪替他们出气，对于胡匪也尽力帮忙。因而热河的胡匪，在大部地区可以潜伏活动。热河胡匪因为“大家儿”和军队一面防匪剿匪，一面又通匪窝匪的缘故，都由各自结交的“大家儿”和军队供给枪马子弹。“出摊子”回来在相好的“大家儿”和军队中藏身销赃。因而无论谁坐热河的都统、主席，也剿不了热河的胡匪。沦陷期间更能打上抗日的幌子，继续到处出现。胡匪还有政治上的出路，如大小军阀收抚他们扩充队伍，帝国主义利用他们进行民族分裂，更使地主和牧主的子弟以及军队的下级军官，也把充当胡匪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

热河的胡匪，起初来自关东，所以他们的“团语”（即暗语）和关东的胡匪完全一样。而关东与热河以山东移民居多，故东北胡匪的“黑话”，与山东“响马”说的基本相同。只是热河胡匪中没有帮会组织。所谓胡匪，不包括“明伙”中小户的“地蹦子”（当地的小匪）和藏到高粱地里出来搜腰的“穿帐子的”（拦路抢劫的零星土匪）在内，是指组织相当严密，拥有很好的枪马装备的股匪而言。这些股匪中既有汉人，也有蒙人，还有少数的回民。由多种民族纠合起来的叫做“耍人的”，纯粹由蒙古人哨聚

起来的则称为“马鞑子”。“耍人的”和“马鞑子”，均能在半农半牧区活动。而“耍人的”轻易不进牧区，“马鞑子”也很难前往朝阳以南。有些成长于牧区的“马鞑子”，连半农半牧区域亦无法深入。“耍人的”多跟大小军阀勾连，“马鞑子”更被帝国主义利用。如沙俄扶植哲布尊丹巴搞“外蒙独立”，和日本支持巴布扎布搞清朝复辟，有不少“马鞑子”参加，即所谓“蒙匪”。哲布尊丹巴和巴布扎布失败以后，被裹胁的牧民，因为不敢回旗从事生产，也多变成了“马鞑子”。我在热河当胡匪时，是“耍人的”和“马鞑子”在一起“合杆”。我后来成立的“蒙古军”，就是把“耍人的”和“马鞑子”收罗到一起的。不论是“耍人的”和“马鞑子”，他们的组织和规矩以及活动方式，完全相同。除了在依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时候，换上军衣能离省捣乱，通常都是在自己的“圈儿”和朋友的“圈儿”外边沿着几条安全路线，跑到起码也得百八十里以外去“卡线”（拦路抢劫）或在“打窑”（抢劫固定的地方）。得手之后，即行“漫开”（分散开）转入地下。另有“点儿”（联络机关）和“线头”（情报人员），则以老百姓的身分，替他们做交通和侦察工作。胡匪头子根据这些人的汇报，决定再次出动或继续潜伏以及赶快转移。在“大家儿”和当地驻军掩护包庇下，巡警根本无法扣捕和不敢扣捕。上述种种，是热河胡匪的概况和一些特点。

（二）胡匪的组织忌讳与“纪律”

热河胡匪的组织非常诡秘，首领对部下防范特别严。入夥的时候，均经过朋友介绍担保，惟恐官军的奸细混入，或是一些“没膀”和“没腿”的“小缙子”（无枪马、无依靠的小毛贼）们前来往外拐带枪马，另去参加其他的“杆子”。首领谓之“当家的”或“杆子头儿”。他视介绍人的平日信誉，而决定是否收留或是否借给枪马。再看表现经历如何，分派适当的工作。如果

自备枪马，则不须“当家的”装备，分肥的时候不扣枪马股子。仿佛妓院中自混而不吃领家的妓女。凡是久干贼事的“小绉子”，差不多自己都有两三匹马子，甚至于在长枪之外，还有价值一千元以上的德国造手枪。至于有马没枪，有枪没马，和枪马全无以及枪马不多的“小绉子”，都得“当家的”连同弹药预先筹备齐全。这就是“划起来”（匪股组织起来）以后，在“出摊子”以前，所支垫的股本。胡匪以“杆子”为组织单位。“杆子”大小强弱有别，多则一百多人，少则也有三、四十人，不像军队那样有一定编制和配备相同的武器。除了“当家的”担任“司令”，掌握一部分预备队，底下还有好几个主要负责人，替“当家的”分工进行各项工作。他们是调动人马在第一线指挥“开壳”（作战）的“炮头”，守护看管“秧儿”（肉票）、“秧子房”的“当家的”以及办理军需、军械甚至“军法”的“账房”。这几个人是“杆子”里的核心和骨干，多半跟“当家的”磕头结拜。此外在“杆子”当中，除了一般的“小绉子”，还有不少有马无枪的“爬子”，如同军队中的新兵。让他们跟上锻炼，充任铡草、喂马一类的苦差事。最初连“马桩子”（捉马的）都不敢叫担任，恐怕“风紧”时“溜杆”（逃跑）。经过几次考验，才借给武器。要是只能吃贼饭而办不了贼事，引起众人讨厌，便在必要时扔给官兵送礼，谓之“甩爬子”。

“当家的”是“杆子”的首脑，须枪马娴熟，有机智，能够“挑得开”，还要善于团结内部和联络外边，能够“叫得响”。大的“杆子”，除一个“大当家的”外，还有二、三个“当家的”。“当家的”身边都有十几个贴心“硬手”，等于他的卫士和机动武力。在“炮头”抗不住和攻不上的时候，去援助“炮头”。在“秧房”有危险的时候，去保护“秧房”。按照“团语”和黑话来说，抵抗叫“整”，进攻叫“挑”，掩护退却叫“压”。“炮头”指挥的人，约占全“杆子”的一半，分成好几个小组，对付好几方面前来的“跳儿”（敌人）。自己跟前也得

经常不离几个“硬手”，以便冲锋时在前边“挑”，转移时在后边“压”，到敌人主攻的地方去“蹙”。“炮头”不仅要本身“有种”（有勇气、不怕死），还须得到“当家的”信任，众人一致佩服才行，否则便不能充当。“炮头”要是打出名望，交上支援械弹马匹和能够掩护包庇自己以及众人的朋友，便可自立字号而“成杆”。“秧房”是胡匪的“钱串子”（钱库）。得分出四分之一的人妥为保护，情况紧急的时候，宁可“甩爬子”，也不能丢“秧儿”，丢了“秧儿”等于“出摊子”赔了钱。所以“秧子房”的这个“当家的”，本领要和“炮头”差不多，手底下也得有几个“硬手”，不敢依靠“爬子”去看守“秧儿”。至于“账房”只要有一个人担任就成，他对“当家的”在“出摊子”时弄回多少枪马弹药，借给谁多少？发给谁多少？每个人有若干私有财物和“开壳”（打响）“卡线”（劫路）与“打窑”（打劫）时的表现怎样？弹药消耗的情况如何？必须心中有数。并且负责保管零花款项，以及替“当家的”执行向每一个“小绀子”随时搜腰检查。所以“账房”又相同于普通团体的监事，因而是胡匪里唯一的非战斗人员。不过情况特别紧急时，也得开枪保护自己投入战斗。

胡匪除了在“划起来”时，有上述的坚强战斗组织，“当家的”在“杆子”外边，还有一整套特务组织。在“漫开”以后，仍然继续工作，经常和“当家的”保持着联系，对于部下绝对保密。这些之间也不发生横的接触。“当家的”所交的朋友和所要的人，必须遍布到潜伏区和活动地点的多个角落，以及“出摊子”的路线上，如同撒下了一个网。其中包括“窑儿”、“点儿”和“线头”这样三种机关和人员。胡匪所要打的地方叫做“窑儿”。跟“当家的”交往的“大家儿”和军队也叫“窑儿”。“窑儿”可以说是胡匪的兵站和仓库，也是“当家的”与“小绀子”们的掩蔽部和防空洞。“点儿”是胡匪的联络机关，分设在偏僻的山沟或是热闹的街镇地方，进行传达指示和搜集情报的工作。负责人

多半固定在那里，以小农小商的身份掩护，不出村外和街外活动。

“线头”是“当家的”所雇用的侦探和谍报人员，用贩夫走卒的伪装到处打听消息，向“当家的”和“小绺子”们通风报信。

“窑儿”、“点儿”和“线头”，都是由被“当家的”所耍弄的人组成和充任。他们由于怕事贪利和报仇这三个主要原故，和“当家的”勾连在一起。因为朋友都有朋友，便使“当家的”手眼触角伸入到各个阶层和角落，什么东西均可以获得。“窑儿”多是大地主的围堡窝铺，大商人的烧锅、字号，军队的营盘，官厅的衙门。“点儿”多是没有“炮手”的乡村中的中小户和在要路口开店的店家。“线头”完全是一些游手好闲的流浪人，以及旧社会所谓的“下九流”。“窑儿”实际上既是“点儿”又是“线头”，“点儿”也是“线头”，不过“线头”不是“点儿”，更不是“窑儿”，他们三者之间性质相同，而作用各有不同。“当家的”有好多“窑儿”、“点儿”和无数的“线头”。

“点儿”和“线头”也不只交往一个“当家的”，谁可靠找谁，谁能干用谁，谁来了也得应付，谁给钱也得替办事。“当家的”在这个特务组织上捉着一根总线，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地去运用。古人说：“狡兔尚有三窟”，胡匪中的“当家的”可以说三十个窟也够的。所有这些严密布置，都是为了维持团体的存在和保障自己的安全。

遇到“卡大线”，“打大窑”和大部队官兵做对时，则必须把好多“杆子”联合起来，集中强有力的人马，此谓之“合杆”。这时由各“杆”的“当家的”互推一个“大当家的”，如同军队中的总司令，其余为二、三、四、五“当家的”。有时为了加强领导和壮大声势，还以各“杆”的外边找一个最孚众望的人，出来指挥各个“杆子”，这叫做“请当家的”。我当胡匪的时候，曾经不只一次被朋友请去带着一两个人，当过三、二百人的“家”。“合杆”以后，各“杆”的组织基本不变。“大当家的”直接掌握自己的“杆子”或一个“硬杆”，做为预备和机动部

队，指挥其它独当一个方面的“杆子”。哪一方面吃紧，自己带着“硬杆”到哪一方面援救。此外各“杆”都把“秧房”取消，而是派人组织一个总“秧房”，以便共同负责，互相监督，恐怕甲“杆”把“秧儿”划来，而被乙“杆”的人“吃二毛”（受贿）放走。同时还由各“杆”的“账房”出来，另组一个总“账房”，以资加强监视，让各“杆”不能说出闲话。至于各“杆”在外边的“点儿”和“线头”，以及“当家的”所投奔的“窑儿”，仍然秘不示人，只是往出交付枪马弹药和提供各种情报，使“分杆”之后，还能各自单干。胡匪在自己的“杆子”里，是互相猜忌；合起“杆子”更是各怀鬼胎。所以“合杆”的组织非常脆弱，临时凑合，一遇劲敌，即各不相顾，很难连续聚拢到一起。

胡匪忌讳很多，也有规矩和“纪律”。他们大都隐姓改名，不敢在离家较近的地方出现。“兔儿不吃窝边草”，不是照顾朋友和乡亲，而是怕暴露自己。我原来的官名叫李义，到热河游击马队当兵时，连长安静海知道我来意不善，便给我改名为沿用到现在的“李守信”三个字。胡匪里的人，都用“团语”和黑话代名。例如：姓李的叫“抄手子”（赶车的在里手的意思）姓张的叫“跟头子”（由张跟斗这句土话而来）姓刘的叫“顺水子”（取顺水流的“流”意思）姓杨的叫“转山子”（羊转着山头吃草），以及姓崔的叫“喇叭腕儿”（喇叭用口来吹）和姓高的叫“梯子位儿”（梯子可以登高）等等。如果有五、六个“抄手子”，那就得把“李”字显出来，按照各个人的体格相貌的特征，叫成“大个李”、“小个李”、“大眼李”、“小眼李”以及“豁牙李”、“歪嘴李”了。这些姓多是假的，名字越发不能公开，不懂规矩的人，要是硬问“杆子”里的人家乡何处，非跟你翻脸不可，说你企图出卖朋友。因而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家地乱叫。除了“当家的”而外，谁也不能调查谁的历史，初当胡匪的“爬子”常因此而挨揍。

我当胡匪是当的“官胡子”，故不是胡匪的门里出身。一九一八年秋天在林西坝上和“蒙匪”作战，是我和胡宝山（蒙名鄂莫克图）、王明儿、达来四个蒙古人，跟一个汉人刘汉臣，到好尔图庙夺了敌人的马群，“蒙匪”始终没敢进攻林西县城，退回乌珠穆沁。胡、王、达三个人，原来是土默特左旗的“马鞭子”。刘汉臣先在毅军里担任排长，后来耍了人，“杆子”的字号称“刘副爷”。他们都是平日由热河游击马队支垫、包庇，打仗时给统领张连同到最前线卖命。队伍从林西“凯旋”回建平，因给张连同露了脸，越发有恃无恐，又做起了“没本钱的买卖”。因为我这个“初生牛犊儿”，战斗的时候较他们还更机警沉着。我每发出一颗子弹，可以说都能“吃肉”，并且和他们底下的人混得熟，那些“小绺子”们差不多都很佩服我。就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五个人就磕头成为结拜弟兄。当这两部分“马鞭子”和“耍人的”在“合杆”到外边“出摊子”的时候，由于他们名声很大，唯恐有损热河游击马队的名誉，便抓我的“大头”，公推我为“大当家的”。故我没有经过逐步升级，一跃而变成了胡匪的领袖。这在胡匪里是很少有的例子。只有军队和民团的人转化为胡匪，才有此种特殊情况。胡匪的首领都立有字号，他们遂以李守信的“信”字做了“杆子”的番号和代名，对外联络即以“信字”为暗语。有关方面的人听见报出字号，方肯给你“开扇”（开门）或去跟你答话。

一九二〇年我离开建平热河游击马队的防区，跑到赤峰“卡”一个蒙古“大家儿”的烟土驮子没有成功，又到阿鲁科尔沁旗打蒙古“大家儿”的“窑儿”也未得手。后来窜到库伦旗打开一个蒙古“大家儿”的“窑儿”，并且“勒住”两个“秧儿”。不料因时期过长，被军队、民团、巡警和蒙古的“小队”跟上，必须绕道朝阳，才可以返回建平县的军队防区。由于我是朝阳人，家庭又是地主，所以我从库伦旗进入朝阳县境后，即用毛巾把脸蒙住，只露出两只眼睛，不敢让人瞧见我的脸面。虽然这样防备

严密，结果还是露出了马脚。在离我家二十里的刺儿沟和人说话的时候，被一个朋友听出我的口音；在离家四十里的黄土梁子，早晨洗脸的时候让一个熟人将我认出。有些胡匪遇到关系不深的人，往往临时溜出“杆子”，寻找发现他的人杀害灭口，恐怕对外宣扬。我在黄土梁子遇到这个熟人，给了他几个钱，并且打发他到我家里转告给我的母亲和大哥，叫他们赶快到朝阳县出首，告我忤逆不孝，和我脱离母子兄弟关系，这样就不会连累家庭。否则就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借此来大敲竹杠。那次我回朝阳，是夜间带人下马，从我家的西墙和“外八营”纪小辫连部的东墙底下，悄悄地穿过了村子。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事隔不久，便被本村的人和“外八营”的兵完全知晓。因为我没破“外八营”的“圈儿”，纪小辫和我师父罗旺喇嘛是朋友，只是说我“小子有种能行”，并没有追究我的家庭。村子里的人看见我已“划起来”啦，谁还敢“狗扑耗子多揽闲事”。

胡匪为了能够存留和便利活动，有好多“纪律”和前辈给流传下的习惯规矩。“杆子”拉得“清”，还是拉得“浑”，各方面就以此来鉴别。“杆子”是通行无阻，还是到处挨打，也以此来决定。热河的胡匪把外边的一切人，除了当成是朋友，便是视为“横梁子”，即使今天这个人是仇敌，说不定日后也会和好。那怕是一个窝囊人，他有时亦有很大用处。所谓“横梁子”，就是过河跳沟的时候，把它架起来搭上，能使自己顺利通行过去的意义。所以胡匪的“当家的”对于“杆子”里的人，要求得相当严格。但是对于外边的人，却处处留情让步。严禁部下随便杀人放火，更反对强奸妇女，犯了“开锥”（采花）的毛病，“纪律”是必杀无赦，这是首先禁止的一条。其次，对清洗出来的奸细，发现了的叛徒，也是即时以严刑制裁，毫不犹豫、宽恕。在“开壳”时，谁要是不肯向前，随便后退，或是危急时，“溜杆”逃跑，“炮头”可以开枪往死打人。“炮头”如果装蒜，不给死抗和硬冲，“秧子”房的“当家的”为了自己逃命，把

“秧儿”给丢了，“当家的”对他们亦不客气，往往就地正法，就是磕头弟兄，也顾不了这种关系。由于胡匪中的规矩，比军法还严，加之军队逮住胡匪按罪犯处死，胡匪弄住官民以俘虏优待，因而能够以一当十，四、五十人的“杆子”，对付一营骑兵可以说满不在乎，三营五营围了上来，也能突围冲了出去。

还有“杆子”里的人，打上“当家的”字号去“捐小项”（敲诈），或是溜开“杆子”去“开小股”（单独抢掠），以及别的“杆子”借上“本杆子”的字号活动，更为“当家的”深恶痛绝。一经发现，即以严刑惩处，并带上“本杆子”的人，去解决这个盗用别人字号的“杆子”。“当家的”除了外边有朋友和“线头”向他检举揭发和反映有关“纪律”方面的问题，在“杆子”里也有贴身亲信，替他侦察每个人的行动。厉害的“杆子”头，好像长着好几百个眼睛和耳朵，里里外外的事，都很难把他瞒过。

胡匪忌讳说出“死”这个不吉祥的字眼。处死外人叫“擦勒”或“擦掉”；处死“杆里”的人叫“扼勒”或“扼掉”。“当家的”轻易不“擦”外边的人，却经常往死“扼”自己的人，不如此便镇不住所带的那一群狼虫虎豹。“捐小项”和“开小股”被发觉以后，人“扼掉”不算，还把东西送归原主，并绝不泄露检举揭发的人，以保持“杆子”的“清”名，防止“杆子”里的人替朋友前去报仇。有些“当家的”，还用“放黑炮”和“借刀杀人”的手段，处决他所怀疑的部下和牺牲他所厌恶的部下。

“放黑炮”就是暗杀。“借刀杀人”是“开壳”时让“炮头”打发所要准备牺牲的人，到一个地方去“蹙”，众人“挑”的时候，不通知他退却或突围，却叫“线头”告给官兵，说是“给你们甩下了“爬子”，便把这个人送给官兵，回去邀功销差，按照军法和刑法判处死刑，五花大绑拉出去挨毙杀头。好多胡匪头子为了在外边交朋友、得民心，“装孙子”装得和大姑娘、老太婆一般绵善，在“杆子”里边对待部下，却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热河的胡匪除“卡线”和“打窑”而外，不在沿途进行骚扰。“压班”（休息）的时候，问当地的乡约或甲头要吃要喝，弄来啥吃啥，禁止挑剔，想宰猪杀羊可以按市价花钱，铡草饮马亦不拉伏。所以乡村中不怕胡匪过境，倒是害怕官兵前来打尖住夜。“卡线”以前不搜行人的腰包，打开“窑”只耍“勒”住“秧儿”即不许“扫窑”。“扫窑”也只许拿枪械、乘马、现金和烟土四项东西，不得翻箱倒柜，拿人家的衣服。绑女票忌讳单绑一个，必须另绑一个直系亲属陪同前往，如婆媳守在一起，这样能保全女票的名节。女票和男票分别看管，休息时雇佣当地的妇女充任临时“禁婆”，胡匪只在窗外站岗。

胡匪在“出摊子”前，就把各自的私有财物报告给“账房”登记，开一次“壳”，打一回“窑”和卡一趟“线”以后，就得搜一回腰，除了公物和登记在账上的私物，多余的东西即按违禁物品进行处理，浪费子弹和谎报子弹消耗，都是违犯“纪律”。胡匪在行军途中，得预先派出“线头”和联庄接洽，路上碰见民团彼此回避，遭遇到一起也不能拧枪下马（夺枪马）。如果打人和杀人，就犯了“推倒横梁子”的错误。“线头”给送来“谎报”或者是给引错道路，看是出在无心还是有意，也视情节和后果而受处分。“开壳”以后，听“炮头”或“当家的”命令，或是朝天打枪，或是先“撂腿”（打马），没有命令不能往倒“撂人”，这就叫做“枪子留情”。胡匪如果不执行上述的“纪律”，重则当然要“抠”，轻则也要“涮”，就是痛骂一顿，把枪马收回赶走。恐怕结仇记怨，多不殴打。自备枪马的，让他带上自己的东西离开。

胡匪在“划起来”“出摊子”的时候，比较能团结一致，到了做成买卖分项（分赃的意思）时，最容易翻脸反目。“分项”时首先得除过“材料”费（购买子弹的钱）和“当家的”交朋友设“点儿”和雇用“线头”的各种花销，然后按大小“人头股子”来均分。“当家的”顶双股或三股，“炮头”和“秧子房”

的“当家的”顶股半，其余都是单股，就是“爬子”只要没有被甩掉，也得给顶半股。如果“整”得很好，“当家的”以不扣“枪马股子”，或另给赏赐以示奖励。所谓“枪马股子”，就是枪马也能分红，一枪一马能顶几厘。因“当家的”大方或刻薄而不同。胡匪都是贼小子，他们绝不吃亏，必须非常公平合理，众人才没有意见。如果“当家的”乱报花销和虚报“材料费”，把油水尽入了自己的腰包，不但下一次“划”不起来，这一次或许会挨“黑炮”。“分项”时，“当家的”为了避嫌，躲到一边让大家公议公决。以致有些“当家的”负债累累，很难洗手不干。但有些也不是这样。像跟我“合杆”的那一帮“马鞑子”，原先油水全让胡宝山一个人弄跑，部下只跟着他吃饭受罪送死，如同蒙古王爷底下的奴才，经我向胡宝山说明利害，才按“耍人的”规矩办了事。至于“合杆”是先由“大账房”按“杆子”的软硬先开“大股”，然后由“小账房”拿回去再开“小股”。要是“分项”不公平，也会引起互相火并。“分项”完毕即须赶快“漫开”。特别是得了“肥项”以后，恐怕夜长梦多，发生枝节。除了引起官兵民团的眼热，四面八方前来“抢项”，“杆子”与“杆子”亦会互“磕”，“绊子”与“绊子”更要互放“黑炮”。狡猾的“当家的”，多是把钱装入马褡裢里边带上几个贴身的人，和众人“打点儿”（分别指给连络的地方）完毕，就离开“旧摊子”不知去向了。

（三）胡匪活动的方式与战术

热河的胡匪，虽无固定的据点和到处窜扰的势派，每一个“杆子”却有各自的潜伏区域和到“圈外”活动时，可以通过的一些路线。“当家的”把部下“漫开”以后，一方面在逃躲追捕和通缉，一方面也在寻找新的目标，稳扎稳打地再出去活动。

“杆子”里的人除了自己有投奔的“窝儿”，“分项”以后仍然

回“大家儿”护院或是回军队继续当兵，其余的人都得由“当家的”给找安身落脚的地方，不外也是“大家儿”和军队。前述“打点儿”就是在“漫开”以前，让他们去找谁收容包庇和跟谁经常联系，以听“当家的”信息。凡是由“当家的”借给枪马的“绉子”，“漫开”时，都得收回来。“插起”，就是归还给“大家儿”和军队，或存放于“大家儿”和军队。“当家的”离开旧“摊子”后，出去和“大家儿”或军队结账，顺便也就“爬了风”（潜伏躲避）。虽然众人不知他的去处，他却知道众人隐藏在什么地方，并且有“线头”经常和他接触来往。他根据“线头”的汇报，决定再“出摊子”或是继续“漫”下去。如果是再“出摊子”，首先要考虑到做这趟“买卖”是否会破朋友的“圈儿”，是否会遇到硬的“茬口”（势力很大的主儿），以及需要多少人马和从哪一条路线前去。其次是要垫出一笔“本钱”，枪械马匹之外，主要是“上材料”（准备子弹），向谁去筹借？让谁给支援？关于支垫枪马子弹，有的需要以现钱向“大家儿”和军队购买，有的可以向“大家儿”和军队赊借，或是让他们搭股，有的则由“大家儿”和军队，按朋友关系无条件来支援。这要看“当家的”声势和平日的信用怎样。把情况判断明白，利害估计周到，将械弹准备齐全，部署安排妥当，才敢下达“出摊子”的通知，不能轻举妄动。如果必须“合杆”，更要好几个“当家的”见面协商。有时“大家儿”的老闆掌柜和军队的军官这些窝主们也替胡匪的“当家的”充当参谋。

把旧“摊子”拾掇起另组新的“摊子”要隔一段时间才行。除了准备工作要做好，并且上一次“出摊子”惹下的乱子，还没有烟消云散；军警民团集结起来，尚未各返原地；同时“绉子”们“分项”以后，都有钱花也需要挥霍消化一个阶段。到了手中拮据的时候，他们才肯出去拿血和性命去换钱。正当吃喝玩乐的时候，很难动员这些人出去打仗。准备工作决定着“出摊子”的后果，这是一个关键。再出的时候不一定旧人全来，要重新组

织新的“摊子”。因而不能草率从事，有好多问题都得“当家的”预先解决好。决定了再出“摊子”，由“线头”前往各“点儿”去“传箭”（下达通知），告给在什么时间到那个“点儿”去秘密集合。消息传出以后，很快即可把人聚起。连潜伏区里爱打听新闻的老乡，也知道某字号的“杆子”又“划起了”。要是“当家的”名头很大，“没点儿的”（未曾联络）好多“绉子”，也投亲托友前来要求“贴杆”，使“当家的”应接不暇。为了避免狼多肉少和目标过大，以及便于指挥，除需要“合杆”而外，普通“杆子”只要挑选三、四十个“硬手”便成。再指定谁任“炮头”，谁当“秧子房”的“当家的”，谁担任“账房”，即可向目的地出发。不过由于亲友关系的拉引，连“爬子”加在一起往往就成了五、六十人。

“杆子”出发的时候，一方面由“挑线的”（向导）给队伍领路，并侦察前边的情况；一方面由“引线的”（暗探）给监视镖车（抢劫的对象）和烟土驮子出来的动向，打听所要“勒”的“秧儿”在家搞些什么。胡匪都是跑出自己潜伏区好几百里地以外去做“买卖”，行军时必须绕过官兵的营盘。碰见“响窑”（有围堡和“炮手”的“大家儿”）以及通过建有联庄的地区，也得预先派人前去联络，以免发生误会。“挑线的”就是走在“杆子”的前边，从事这一类的工作。好像黄河上面船家的“老梢”，“挑线的”要走一段换一班。“引线的”比“挑线的”还多。有些人平日就跟“杆子”有来往，受“当家的”长期雇佣；有些是为了向“当家的”献殷勤或求赏，临时给通风报信；有些人因私人仇怨，亦主动地跑来效力。“挑线的”和“引线的”，总称为“线头”。他们是“杆子”的通讯联络人员，侦探与谍报人员。离开了他们，“杆子”就很难活动。“出摊子”以后，情况随时随地发生变化。得根据情况而变更原定的计划，不能死板地坚持出动以前的打算。本来是去“打窑”，结果“卡”住了镖车和烟土驮子；本来是去“卡线”，却是打开“肥窑”勒住了“秧儿”。

有时处处扑空，反而被官兵跟上围住，损失了好多“材料”和“吐了”（阵亡）不少弟兄。总之“杆子”既然“划起来”，得不到油水轻易不肯“漫开”。“买卖”的好坏与顺利与否，全看“当家的”本领如何。

胡匪多在“落簾”（日落）以后行动，到了“挑簾（日出）”以前即行潜伏。黑夜走路除了观星，还以四季的风向判断方位。夜间行动时也有口令做为联络的信号。“合杆”时，各“杆”都互相戒备，行军休息时不敢和不可靠的“杆子”相随或聚集在一起。和官兵“开壳”，如被围在山头和大院里，亦是支持到“落簾”以后才敢突围。因为白天突围伤亡大还要被跟上。没有情况都是白天休息，谓之“压班”。进村之前即设上“卡子”，把村子完全封锁起来，找高处派人上去站岗，“团语”叫“瞭水”。然后挨门逐户点名，告给老百姓们不准少了一口，恐怕跑出去走露风声，或是前往营盘中报告。过路的人进来以后，就禁止再行出去，等“杆子”挑开方许行动，并进行盘查。“压班”的时候，轮流“放卡”和“瞭水”，由“爬子”给喂马，当地的乡约或甲头给准备两顿饭。休息时，和衣抱着枪睡觉，马不卸鞍子，只是把肚带松开。“挑”的时候本来朝东走，却往西或往南、往北开拔，四散开绕一个圈儿，然后才归入正路。村里如有自己的“线头”，给拿上扫帚或赶着牲口“漫踪”，遇见河流下水走几里，再上千岸投奔大道。所有这些，都是预防官兵追击。当官兵“搜踪归线”一耽误时间，“杆子”便可走远了。

“出摊子”不外干“卡线”和“打窟”两种营生，以及遇见官兵“开壳”。“卡线”多在白天动手，“引线的”把镖车、烟土驮子和“肥秧儿”出门的日期，和必经的路线探听明白以后，“杆子”预先在险要地方埋伏起来，临时把交通断绝，来往的人都集中到一起看管，除没收武器概不搜腰。如果报出字号，是“当家的”的朋友，连武器也不没收。镖车、烟土驮子和“肥秧儿”，差不多都有“炮手”保护。“杆子”里的人要分开三组，

进行“卡线”战斗。一组专对付“炮手”，把他们轰跑赶走；一组先往打倒拉东西驮货和人骑的骡马，使其走不出现场，另有一组担任警戒，设上“卡子”准备应付突然而来的敌人。因为附近的驻军或是民团，听见枪声往往会寻找麻烦，并且大道上说不定会和走路的军队及其他“杆子”遭遇。东西和“秧儿”到手以后，即火速离开现场。如果卡了“肥线”和弄住“肥秧”，由于贪图钱财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军队会不顾命地追击；民团、巡警以及其他“杆子”，也会在听见消息以后，等在半路或是卡在险道上拦阻。

除了去绑“土包子”财主，胡匪很不愿意“打窑”。因为遇到“响窑”，都有“炮手”站在碉堡上抵抗，一两小时攻打不开，联庄就会把民团调集起来，纠缠住不好脱离战斗。并且子弹很缺，又没有重武器，故忌讳攻坚。所以勒“肥秧”最好不到他家里去勒，而要在“老虎出洞”的时候下手。“打窑”不只惊动军队、民团，并且打草惊蛇，“窑儿”里如果没有“线头”，即便把窑儿打开，也找不见正经的“主儿”，他们有地道可以逃走。要是非“打窑”不可，事先必须由“线头”调查清楚里边的各种情况。如“炮手”住在那间房中，主人睡在那个院里，贵重财物和枪马子弹搁在什么地方等等。全盘情况了解以后，也是分组进行战斗。夜间进入村中，首先派一组人设上警戒“卡子”。一组摸到墙根用横杆登上去夺碉堡。一组人跟着跳进院去。除了撬开大门留下出路，其余猛扑主人的卧室，点着装到洋铁桶里的油浸棉花，扔到房里照得通明，“线头”指给哪个是“当家的主儿”或是全家的“命根子”，外边喊一声：“朋友，对不起得很！”让穿好衣裳送给“秧子房当家的”派人经管。事先估计好有多少家当，如把枪弹、骑马和现金、烟土献出来，即不必往走带人；如款项存在外边或坚不吐露，那就蒙上眼睛叫他上马。因为时间非常紧迫，并且防止“小绉子”们翻箱倒柜。如无“线头”指给确实储存枪弹、现金和烟土的地方，把“秧儿”勒住以后，即不

“扫窑”，而要很快地离开这个村庄，吃饭、休息得到百八十里以外再说。离开“打窑”和“卡线”的现场后，在没有开入“压班”的村庄以前，“当家的”都要突然把众人围起来，下马搜查腰包和马鞭子，要是进入村庄“压班”时检查，“小辮子”们都有路数，那就将抢摸来的东西转移到了别处。“压班”以后出了村子，也进行突然检查。随便乱拿东西会松懈战斗，故“杆子”里不许小偷小盗。

“出摊子”的时候，必然要和官兵或民团“开壳”。特别是破了他们的“圈儿”，还要跟踪硬追，尤其是“卡线”和“打窑”遇见“茬口”，追得越发凶猛。“当家的”朋友不多，又做好了“买卖”，沿途可以说尽是敌人。遇到“挑儿”（官兵或民团）追击，派“炮头”指挥一些“硬手”在后边“整着”，“挑线的”领着大队继续走路。“当家的”看见后边“整不住”，带上人扭回头去援助。前边发现有人拦阻，也是派“炮头”指挥“硬手”去“整”，“挑线的”给引路绕开行走。“炮头”带的人能够“整住”，“当家的”就不必过去援助。如果四面八方前来包围，首先得抢山头。在平川地方一看冲不出去，就得赶快进大院上房，等到“落簾”以后，再往出冲击。无论是“挑儿”前来追击、拦阻或者包围，胡匪都要“先礼后兵”。如果官兵、民团是应付公事，只回给以零星的空枪，或是打发“线头”跑过来叫给扔下一些东西，好回去销差，“甩头”（扔马）不满足，还得给“甩爬子”。如果把东西扔下还不罢休，那就是要抢“秧儿”或解决“杆子”。到了这个时候才设“死卡子”，摺倒马还不朝理，即往倒摺人，因为他们不认这一份儿朋友。突围的时候，预先得“打道”，就是把包围圈挑开一个缺口，队伍从口子冲出去。被包围在大院里，走时在墙上掏一个能通过人马的窟窿，这也是由“炮头”领一帮“硬手”在前边“打道，先把手伸出去向前面、左面、右面放枪，如没有重大反响，再扔出一个物件，亦未招来子弹，证明这个地方敌人包围松懈，出去前左右三面设上

个三“死卡子”，包围圈的缺口就越挑越大，全部人马都可通过。一出了圈儿，军队就不容易再行追上，因为军队是一人骑着一匹马，胡匪多是两、三匹马，骑累一匹再换一匹，昼夜不停，可走四百多里。

勒住“秧儿”如果军队非叫留下不可，也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得给留下。“秧儿”要是女人、娃娃，遇到情况紧急，不好携带，也有“线头”能给找“埋”（窝藏）的地方。“杆子”中有人“贴了金”（受伤），“线头”亦能给很快地安置到安全地方疗养。“秧儿”不论是带走和“埋下”，都有他们的家属打发专门“说票”的人，亲自或派“线头”前来接洽赎取。索价要根据“秧儿”的全部财产来决定，不能因为“赎票”而令其彻底破产，要留下肉好再往起长肉。“秧儿”都是财主羔子，生活上要特别照顾，肉面和鸦片由“杆子”上开支。对于一些爱钱如命的守财奴，还要防备他们轻生自杀。对“秧儿”，除非同“当家的”有血海深仇，绝不“撕票”（杀死）。“出摊子”说不定做哪些“买卖”，能弄到够众人花半年六个月的收项，即可“分项”、“收杆”，把人“漫开”，不能贪而无厌。尤其勒住“肥秧”，要很快转移到几百里以外，等待“说票的”前来赎取。行动缓慢，“秧儿”就有丢失的危险。特别是不能为了零花钱被小钱稳住，而被军队跑来将“秧儿”抢走。

谈到这个地方，我愿举出一个事例，以说明差次一点的“杆子”，即使弄住摇钱树也会把“买卖”做赔。我在热河游击马队当“差官”时，潜伏在那个部队里的胡匪张子元和邢占元等，跑出去划起了“杆子”，从建平到赤峰境内“卡线”。结果把赤峰有名的财主元宝山煤矿前经理“李抓毛”给勒住。他们不知如何是好，叫我前去给拿个主意。“李抓毛”是一个起码值十万块银洋的“肥秧”，应当勒住之后，悄悄通过热河游击马队的防区，带往开鲁一带等待元宝山煤矿前去赎取。张子元等因为把“秧儿”勒住，元宝山煤矿即给送来好几千块钱，还没有“张大口”

(勒索更多的财物)即进行了“分项”，二、三十个人就靠在热河游击马队的边缘，停留不走。竟狂嫖滥赌和大吃二喝起来，用“撕票”威胁元宝山煤矿，不得报告军队前来围剿。我去的那天，元宝山煤矿又送来一千多块钱。我一看情况很糟，便对他们说：“这里是毅军游击马队的防地，等于在赤峰街上绑人。李抓毛被勒住的消息，已经快传遍热河，不只毅军让不过你们，其他部队、民团也想截夺这个“肥秧”。现在要立即离开此处，让元宝山煤矿准备十万块天津交通银行钞票到开鲁去赎。”他们不听我的劝告，仍旧拖拖拉拉，我头一天晚上说完此话，第二天拂晓即被毅军游击马队好几营人“焊上”(包围或追击不放的意思)。“开壳”以后，除了我保护张子元和邢占元“挑出”，其余都被击毙或扣捕。内有热河游击马队孙寿卿营四、五个伙马伙，亦被捆在大车上，路过木尼河孙寿卿的营部门口，带回赤峰街上拉出去枪毙。结果张子元等只勒了李抓毛不到一万块钱，李抓毛却赏了毅军士兵三万，还不说送了常万里和石香亭这些军官们许多贵重礼物，使毅军落了个名利双收。张子元丢人丢枪，最后身上剩下二百多块钱，掏出来要酬谢我救命之恩。被我甩在地下，骂了他一声妈的巴子，还气得我朝他脸上狠狠地唾了一口。

以上所述胡匪的好多活动方式，是指“卡大线”和“打大窑”而言。还有“当家的”创出名头，根本用不着“出摊子”去“卡线”和“打窑”，只要派“线头”给“大家儿”送去一个纸条或口信，即可把银钱和烟土给弄来。这叫做“捐富户”。不过这样的胡匪，在热河境内很少。除了“卡大线”和“打大窑”而外，还有在“漫开”以后，三、五个人“搭小股”到外边去“卡小线”和“打小窑”，这没有一定的方式。全看出去的人如何随机应变。

我在热河当胡匪时，不只是能够大干，也非常善于小干，很可以说是此道上的“全手匠人”。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手中没有钱花，往起划“杆子”来不及，并且“划起来”也所得无

几，只是给自己扬出名声，让好多人跟着沾光，不如瞅准偷吃一口，倒能落得实惠。赤峰是热河的码头，平泉县籍的商人都在节前回家过年。因为路途不靖，百八十辆大车相随在一起走道。他们都是五更天从赤峰街上起身，往西南行二十多里过老李岭，再走二十里天亮到楼子店打尖。我摸清楚这一情况，只从热河游击马队中约了一个围场县人孙三虎，于阴历腊月二十八日的拂晓以前，潜伏到老李岭上，大揸着步枪，并且嘴里都唱着京梆子，和赤峰出来的一百多辆马车走在一起。车老板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送公事的兵。一路就说就唱，走到了车的前边，约摸走了四、五里路，我们突然把马扭回，慌慌张张地跑到车的跟前，谎报南边发现了胡匪，让客人们都下车到一旁隐蔽（怕车里有长枪），诡称我俩替他们堵挡。商人都是很怕死，加之人忙无智，五、六百人如同羊群，完全挤到一起。我看一个也没有带枪（有手枪这时必然要拿出来），便把我们的来意向他们说明，要他们每人凑五块盘费，多的多出，没的可以不出。让车老板给铺了一块毯子，用枪逼着商人，过一个把钱包打开，往下扔五块钱，有“中票”（赤峰的钱帖，一元值三元银币）即不要现洋，怕马子驮不动（每马顶多能驮一千元，驮上二、三千元，马蹄即往上翻土，贼眼一看，就知道带有银钱）。不大一会功夫，就凑起三、四千元。我们把钱装起，天色已经大亮，拱手说了一声：“朋友们，再见！”便上马朝东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商人真是啼笑皆非。因为每人所失无几，并且都急于回家过年，所以未向官厅报案。官厅军队也忙于过年，就是前去报告，亦没人答理。各“杆”的人，知道是我这个小李跑到老李岭上办的“好事”，一时在热河胡匪中传为佳话。商人如同做梦一般，遇到我们两个拦路鬼把钱丢掉。沿途的老乡们听见很乐，当成了嘲弄他们的话柄。

(四) 胡匪和“大家儿”如何勾结

胡匪在热河能窝藏得住和“挑”得开,完全是由于和“大家儿”与军队勾结在一起的缘故。热河的所谓“大家儿”,包括所有的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在内,如同察绥一带的“大户”一样。不过“大家儿”不单纯指地主而言,凡是起立堂名字号以及有钱有势的人家,都属于“大家儿”的一类。其中除富农、地主而外,还有汉族的商号、镖局、寺院,蒙古的王公、牧主、喇嘛以及天主教民与倒卖毒品的烟土贩子等等。因为他们不能成天住在围堡里不出门,必然要派人派车到外边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如果不和胡匪交朋友,很难通行无阻。即使有“炮手”保护和军队给撑腰,也难免“久走冰滩终有滑倒的一日”,并且交上了硬的“杆子”,软的“杆子”即不敢欺侮,恐怕因为“破圈儿”伤了和气。这是“大家儿”不敢得罪胡匪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胡匪也离不开“大家儿”。胡匪在“出摊子”时,必须向“大家儿”借枪借马和购买子弹;“漫开”以后,更得“大家儿”给窝藏人物和销赃。于是互相依靠,形成胡匪与“大家儿”勾通的许多“窑儿”,在驻军防区的大圈里出现了不少小圈。同时胡匪不只交往一两个“大家儿”,“大家儿”也不只交往一两个“杆子”。根据各自的需要和条件,要尽量多交朋友,朋友越多才能越吃得开。胡匪的抢夺对象都是跟自己没有关系的“窑儿”。“大家儿”所以受害,是遇见了跟他没有交情的“杆子”。

“大家儿”和胡匪关系非常错综复杂。必须举出一些具体事例,才可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各种情况。热河有两句谚语,说是“朋友有一百个也不算多,仇人有一个也不算少”。这对胡匪与“大家儿”来说,也是如此。赤峰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有好几家镖局,保护着镖银往承德和北京运送,其中以平泉县刘珍的镖局字号最响。他走镖时不让其它镖局的镖车相随,怕别的镖局跟着他沾光,影响到他的镖局的生意,可谓霸道到极点。刘珍

到北京时是保镖，回来时贩运子弹。热河所有的“杆子”几乎都跟他“上材料”。所以他的镖车，胡匪都不好意思摇动。他也眼高自大，以为从赤峰到北京这条大路归他姓刘的所有。我最初划起“杆子”，立了“信字”的字号不久，因为缺短现钱购买子弹，托出朋友想叫他给赊借几千发“材料”。不料刘珍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给我碰了一个很大的钉子。使得我老羞成怒，处心积虑要专卡他的镖车，以出这口气。我派“线头”调查清楚刘珍镖车准备出动的日期，预先带上自己“杆子”里的四、五十人，在赤峰西南四十里的楼子店附近，在镖车所必须通过的大沟两旁埋伏起来。刘珍的镖车戒备相当严密，三十多个保镖的“炮手”，在道路两侧搜索前进，一百多赶车的车老板也都带着枪械。我分出一半人对付“炮手”，一半人对付镖车。等到“炮手”们过了我们埋伏的山沟，又爬向另一座山坡时，“向其”突然袭击，使他们不能折回。这次我不叫“小绺子”们“枪子留情”，让他们硬往死打人，撂倒了四、五个“炮手”，其他“炮手”都各奔逃生。车老板们听见枪响，都慌了手脚，看见我们把前边和后边车上的辕马撂倒，镖车挤到一起，已经无法四散奔跑，都把枪扔下举起双手。结果这批镖银全被我们弄走，回去每人分了两三千元。因为我们的人数不多，还把大部分扔在沟中。自从刘珍栽了这一跟头，加之商号以后用交通银行的钞票互做汇兑，赤峰所有的镖局，便宣告永远结束。

“大家儿”对于胡匪，分为交匪与吃匪两种主要类型。有的“大家儿”因为怕匪而不得不交；有的“大家儿”却专指吃胡匪发财。以建平县下洼的南陈北王两个“大家儿”为例，就可以看出。南陈是陈子祥，属于吃胡匪的“大家儿”；北王是王子文，属于交胡匪的“大家儿”。陈是下洼的恶霸地主，在下洼街上有好几处“海青房”院落。因为他跟军队中的许多营长级以上的军官磕头结拜，他的“地窝铺”都成了贼窝。他不仅给胡匪供给枪马弹药，并放高利贷、敲竹杠，窝藏胡匪收取巨额“保险

费”。胡匪抢回牲畜烙上他的火印，使失主不敢来认。并且他也有不少“线头”，替他在外边“踩盘子”。遇到有了好“买卖”，还能把各个“杆子”里的“当家的”，“传箭”从外边请来开会，摆上酒席大吃二喝一顿，让他们“合杆”在一起，领上他的“炮手”给他去抢掠。受他驱使的胡匪头子，计有大周、二周、“大夹绊”、“二夹绊”、苏大嘴和王什拉子等好几个人，都能号召百八十个“绉子”。遇到“茬口”，众人不敢前去，他居然敢于冷嘲热讽，如同长官申斥部下，操起他那奉天口音，说是：“妈拉巴子，你们没有办法，都来找陈三爷，现在有了买卖，又装蒜种不敢去，快一齐给我滚开！”众人一看没有办法，说是“陈三爷发火了，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只好硬着头皮前去，弄回东西由他赏赐，分多分少不敢吭气。像陈子祥这样的“大家儿”，简直成了寨主。

王子文是下洼到开鲁中间的第一个大地主。他父亲王三老虎就已发家致富。自夸“从下洼到开鲁四百里，中间不喝别人家的水”。因为沿途都是他家的“窝铺”和烧锅。王子文又称王七东家，在下洼街北居住，临近打鱼泡子盖着一座转角楼房，人装作的非常温文尔雅，使我们见了也由不得肃然起敬。他跟胡匪打交道，完全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出摊子”时，他无条件供给枪马，“上材料”按原价算账。“漫开”时，让“当家的”住在转角楼中以上宾相待，部下都打发到“窝铺”或烧锅中去假充“炮手”。阿鲁科尔沁旗也有和王子文类型差不多的蒙古两弟兄“大家儿”，一个叫“东爬楞子”，一个叫“西爬楞子”，在四合脑包附近相距八里地居住。因为他们两个都任过该旗的协理，家中非常富有。蒙古包里用狐狸皮围绕，元宝和现洋仿照山西“府十县”大财主的办法，都铸成四、五百斤重的银山，即使胡匪把“窠儿”打开，也打不烂，带不走。他们除了拥有土地和牧群，并且派人往来赤峰和朝阳贩卖烟土，一走就是好几十驮（每驮二百多斤，每两值十至二十块银洋），由“炮手”沿途保护。有

名的“杆子头儿”都是他们的朋友，“小绉子”和“软杆”不敢打动。我曾领上“信字”号的“杆子”，在赤峰以南的高梁杆子店附近，“卡”过一次“爬楞子”弟兄的烟土。虽然那次因为驮子前边走着汲金纯部的两个走路的奉军军官，和我们无意中“开壳”，把后边的驮子惊跑了，使这趟“买卖”没有做成。但是东西“爬楞子”弟兄两个听见是我的“杆子”，主动要跟我交朋友。派人向我表示，枪马弹药都可以支垫，“爬风”时叫我去投奔他家。以后我在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担任了营长，“西爬楞子”和我换帖结拜。这两个蒙古“大家儿”和建平县下洼的王家一样，都是贴上钱和胡匪交往，让胡匪不好意思破坏他们的经济活动。

“大家儿”和胡匪勾连，还有既交既吃和扶胜灭败的种种事例。既交既吃就是交往“当家的”吃喝“小绉子”。胡匪多半没有家室，财产均由所交的“大家儿”给保存。做一趟好“买卖”回来，说不定千八百地存在“大家儿”的柜房。有些“小绉子”并不怎样挥霍，想打听到一些钱，好洗手去干正当职业。

“大家儿”约摸够得上下手的时候，他们把“当家的”恭维在碉堡里居住，而将这个有钱的“小绉子”打发到“窝铺”中去安身。临走时向他们贴心的“炮手”使一个眼色，这个有钱的“小绉子”，就会被“大家儿”所派的“炮手”在一个秘密地方处死，将尸骨掩埋，不使“生苗”（暴露）叫别人知道。这个“小绉子”的枪马，做了“炮手”杀人的赏赐；存在“大家儿”柜上的钱，成了“大家儿”的私产。“当家的”住在围堡里，还以为这个“小绉子”投了别的“杆子”。拿胡匪的“团语”来说，此种处理办法叫做“寄封”。“当家的”到了失势的时候，要是错认了朋友，把财产都存在一个“大家儿”的柜上，也有被“寄封”的危险。“寄封”是“大家儿”对胡匪最厉害的报复，既能没收财产，又可以避免胡匪被捕以后往出招供，可以说是一种根除后患的彻底办法。胡匪在战场上和刑场上死的很少，被“大家

儿”弄到秘密地方“寄封”，和自己人在回头转弯时被“放黑炮”打死的居多。

胡匪讲究“义气”。但是遇到别的“杆子”破坏了自己的“圈儿”，或是打动了自已朋友的“窑儿”，也常被“大家儿”挑拨离间，甚至和官兵合作“以匪剿匪”，表演“象拿象”和“象吃象”的武剧，以致很难团结一致共图大事。另外胡匪常移祸于人。“大家儿”更是不断出卖朋友。例如前述我“卡”烟土没有成功，却缴了奉军中两个走路军官的长枪和手枪，汲金纯非叫张长同、刘山胜和“李善人”这三部分地方部队把人扣住不可。刘山胜和“李善人”知道是张连同的人干的，张连同知道是我给闯下的乱子。张连同把我叫去，让我随便找一个“杆子头儿”的脑袋去交差。我就找了一个和我交情不厚的建平县的胡匪首领王五秃子，让他给我当替死鬼。派出“线头”一调查，王五秃子在开鲁西边札达营子大地主蔡汉章家中隐藏。这个“大家儿”也是我经常前去“爬风”的“窑儿”。我到札达营子把来意说明，蔡汉章知道我比王五秃子不好惹，便指给我地方，王五秃子看见我带来队伍，躲进苇塘里的茅菴中居住，我把芦苇点着竟将王五秃子烧死，割下脑袋连同我“卡”到奉军军官的武器，由热河游击马队备了一份公事，派人送到承德交给都统公署，才将此事结束。所以胡匪在“漫开”时，必须投奔可靠的“窑儿”，并且要随时转移，不如此就会陷入罗网。

局外人以为胡匪首领对部下非常神气，其实处处都得低声下气，对谁也不敢轻易得罪，尤其“漫开”以后，更得装孙子和花冤枉钱。“大家儿”都是明交官兵，暗通胡匪。他们和胡匪的来往极为保密，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也不告给，只是最贴心的几个“炮手”和黑夜开门的更信知道。胡匪去投奔时，必须在夜间前去“敲扇”。更信问清字号，回去请示主人后才给开门。先把你领到安排好的地方，让厨房给备饭，等到主人把身子腾出来，才跑过来和你会面。因为“大家儿”的围堡和院子里什么人都有，

绝不能叫官匪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所以胡匪一进入“窑儿”以后，就得由“大家儿”来摆布。“大家儿”对于前来“爬风”的胡匪，那就要看人下菜碟儿。“当家的”多留到客房里，甚至让和内眷相见，他们的儿女们前来认叔叔大爷时，最少也得给每人掏出五十块钱，要是摆上桌子打牌，会打的也得装输。就是他们的下人背着主人向你借钱，也不敢拒绝。所以胡匪未入“窑”前，总得准备下必需的应酬费，如果空手去投奔“大家儿”，不仅冷眼相看，还会吃到冷饭。至于“当家的”所带的“小绺子”们，当夜就被疏散在“大家儿”的“地窝铺”里。有些“硬杆”上的头子，在身旁要留一两个随从。如果没有“当家的”率领，有时报出字号也不敢给开门，先叫住到指定的长工家中，等天亮以后判明情况再说。这些“小绺子”们到了“大家儿”的“地窝铺”里，也得给那些“炮手”和长工们使小钱，把关系处好了，他们才肯替你遮掩，得罪了他们，说不定会吃什么样的亏。

我当胡匪时，比一般拉“杆子”的交游广，知道商人怕事胆小，不象地主那样敢使出毒辣手段。他们在交易上剥削，但不沾胡匪的光。因此我老以“烧当两行”做为自己的“窑儿”。到了建平县的下洼，也不投奔王七东家，更不找陈子祥，而是在商号中落脚。有时风声紧张，便跑到锦州或义县城里在热河做买卖的大商号中隐藏。他们不只在热河的分号中有枪有马，在锦州和义县更能弄到廉价的子弹。由于怕我绑他们的票和截他们的货物，怎敢不跟我交往。我去锦州和义县多半是“爬风”。走时带着大批货物和上过税的税单，化装成长袍马褂的买卖人打扮，带着赤峰、开鲁商号的信件，给赶车的老板多花些酒钱，经过关卡碰见军警检查，自己躺在车篷子里装病，车老板即可代我应付过去。到了锦州、义县，除了所投商号的当家老板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一般夥计们还以为我是热河的行商，前来出售和采办货物。大商号和当地的军警都有交情，根本没人前来盘问，住在里边花费很小而又舒服，比藏在地主的围堡和军队的营盘中还要保险。由于

装其象甚，我不得不用商人们的内行话应付场面，所以我在当胡匪时，便熟悉了投机倒把的各种门径。

（五）胡匪和军队的勾结情况

胡匪和军队是狼狈为奸，兵匪不分。热河的军队大约有一半人是由胡匪转化而成。他们始终更改不了贼性，并且把许多行伍出身的人，也传染得毛手毛脚起来。因为当官的都是贪而无厌，当兵的老是钱不够花，不得不从窃匪和为匪当中寻找经济来源。特别是大小军阀，更把胡匪当成他们打仗的别动队和扩充势力的后备军，平日就得交结一些胡匪首领。一般中下级军官，凡是他不敢明目张胆去干的坏事，都托胡匪去替做；上边交付下来的剿匪任务，更得让胡匪去协助，才可以支应过去。军队因为时常移动，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驻扎，军官多无产业和生意，出门时是带着好多兵走路，通常遇不到被胡匪派人“卡线”和“打窑”的危险，所以军队不像“大家儿”那样惧怕胡匪。因而“大家儿”是交胡匪的居多，军队是吃胡匪的居多。介乎“大家儿”和军队之间的联庄首领与警察官员，是又交叉吃。他们和胡匪的关系，跟“大家儿”与军队差不许多。这里只谈胡匪和军队勾结的情况。

凡是当了胡匪的都很好滑诡诈。他们不是无条件给军队帮忙，必须互相利用。像胡宝山带的那一帮“马鞑子”，经常跑到蒙古草原给热河游击马队张连同和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往回赶马，由张连同和崔兴武随便发付赏钱的事，是很少的例外。

军队如果吃得太狠，不把胡匪按朋友来看待，胡匪对军队便再不买账，惹怒了也会合起“杆子”解决军队，或者诈变军队。双方正如“大家儿”和胡匪一样，是维持着一种表面相好，内心提防的虚情假义，到了害多利少时，也是翻脸不履行诺言，遇到你

死我活的回合，更是保全自己，牺牲别人。胡匪和军队结交，得具备一定条件和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军队和胡匪勾结，也有一定的因缘和局限。除了旅长以上的军官，敢把胡匪头子们按“差官”包庇在队伍里，把整个“杆子”都给穿上军衣，团、营、连长都是半公开地和秘密地将胡匪留在公馆里或安插在兵棚子里，让他们到防区以外活动，回防地以内“爬风”。实在掩护不住，预先通知他们另找躲避的“窑儿”。

军队与“大家儿”对胡匪来说，军队比“大家儿”容易给措急。军队有现成的枪马子弹和人。“引线的”给“当家的”送来“好买卖”的情报，去找军队中的朋友帮忙，可以很快把“杆子”划起来，很能“赶趟”。军官都藏有私枪和养有私马，打仗时虚报子弹消耗，可以支垫给胡匪搭股。当兵的穷得要命，一听说有人划起“杆子”，都能脱下军衣换上便衣，去充当“小绺子”。另外胡匪在“出摊子”时，被好几部分官兵包围，和胡匪有关的军队，不只虚张声势，还可以让开突围的出路，并且在军队出发以前，就把所知道的剿匪部署，派人告诉胡匪的头子，让他们做好准备。同时一跑回军队的防区，别的军队就不敢进来追击、搜捕，如同到了外国租界地一样。有军队出面“抗茬”，不象躲到“大家儿”那里，白天不敢上街。所有这些主要是因为“摊子”里搭有军官们的股子，他们恐怕丢人赔钱，才处处关照。如果胡匪在“开壳”时被别的军队逮住，他们就很难营救。要是“杆子”上的“当家的”被捕，也可以托人用钱买出。至于那些“爬子们”拉出去枪毙完事。因为热河的军队都跟胡匪勾结，彼此心照不宣，也不怎样追究。

由于军队不像“大家儿”那样惧怕胡匪，借枪借马和供给子弹硬敲竹杠。“大家儿”借给胡匪枪马，多不顶股子，军队借给胡匪枪马，不管你“买卖”赔赚，少了他们的不行，卖给子弹也不按行市。崔兴武的团长孙寿卿当营长时，卖步枪子弹是一块银洋一粒，向“大家儿”购买子弹，有一毛多钱就成。到军队中

“爬风”，花费可以说非常浩繁。除了给军官送礼，他的部下也得维持。如果得罪了兵，特别是身上带着好多钱，他们就敢给你“放黑炮”，把你打死怕当官的知道不答应，下手后即开了小差，连人都找不见了。中级军官看见胡匪有人有马有钱，往往把胡匪收编，给“当家的”发表一个连长或排长一类的官儿，等到人跑完钱花光，枪马被留下，成了光杆时，便把你赶出营门。还有一些眼小的军官，接受了胡匪的礼物以后，还不断向胡匪借钱，有时还向胡匪要心爱的乘马和手枪。在“爬风”时，只要他张开口，那怕是价值两千块的德国造二号大金面“自来得”手枪，也得慨然解下递给，不能拒绝。军队吃喝胡匪，已经成了风气。我去热河游击马队投奔连长安静海，因为准备出去打闹，从家里背去一支套筒步枪，还没有加入“杆子”，便被安静海给卖了八十块钱还了他所欠的赌博账。尤其令人苦恼的是因为外边搜捕很紧才跑到军队中“爬风”，可是有些军官还叫“爬风”的胡匪临时出去“卡小线”，给他打闹零花钱，真是不知好歹和不管人的死活，我就有过这种遭遇。

汤玉麟的热河保安旅旅长赵国增，在热河游击马队任连长时驻防于叶柏寿。有一次我跑到他的连部“爬风”。他家和我家相离不远，又是我师父罗旺喇嘛的朋友，按说关系很深，但是对我也不能轻饶。他因为没有大烟土过瘾，得到一个谎报，说是有一批烟土要通过东路巡防队防区内的火石梁，赵国增无论如何叫我领上他的几个兵去做这趟冒险的“买卖”。我到了平泉县城南面的火石梁，发现有十几个骑马的由北而来，以为是保护烟土的军队，上马开枪就打就追，想着把军队赶跑，便可以弄住烟土驮子，所以马不停蹄地追了二十多里，瞥见平泉县城才不敢再追。不料烟土驮子连个鬼影儿都没有见到，只是把军队打回平泉县城。原来这十几个骑马的有东路巡防队的统领“李善人”。遇见我们突然袭击，以为是部下哗变，所以慌忙跑回平泉县城。后来赵国增告诉我，“李善人”就是因为那次出门受惊而病死的。

我在热河游击马队担任“差官”，同胡宝山的“马鞭子”们“合杆”去“出摊子”，可以说是军队分支出去的“官胡匪”。我被张连同视为“爱将”，胡宝山更是他的“聚敛之臣”，这在胡匪结交军队可以说是数上了个儿的。但是张连同底下的十几个营长，也得一一都去应酬。我因为不买一个于在云营长的账，有一次“出摊子”回来，走在合水附近的喇嘛洞沟，被他全营出动包围，挡住不叫进入建平防区。我一看撂倒马也不给让路，知道是要跟我们做对到底。经我亲自开枪，揭了几个士兵头上的军帽，提出了最后的“警告”，他们才把我们放脱。结果我还得备份儿礼物和于在云说了一套客气话，方建立起朋友关系。小胡匪在兵棚子“爬风”，要是不给当兵的花小钱，也是受不尽的窝囊气，如黑夜睡觉不让铺位等等。士兵出去参加胡匪，做完“买卖”归队，也得上下使钱，要是钱多一毛不拔，同棚子的弟兄也会“放黑炮”。

胡匪在军队中“爬风”，并不是给打了“保票”，遇到非叫往出交人不可时，窝匪的军官也得出卖朋友。一九二八年我在经棚驻防时，已经升为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的团长，有一个胡匪首领“大斜瞎子”，破了十九旅旅长石香亭的“圈儿”，跑来被我收编到团内。后来石香亭带着全旅人也开到经棚驻防，他指名叫我往出交人。我把队伍布置开，穿了一个棉袍，内中藏着手枪去见他。他问我为什么要收编“大斜瞎子”？我说：“我经过我的长官许可，你没有过问的必要。”他知道我不好惹，一看我的队伍把他的队伍包围，便说：“我和你们崔旅长说。”我出了他的旅部，才叫队伍撤了警戒。两部分军队因为这个“大斜瞎子”，几乎在经棚街上开了火。石香亭旅吃不住我打，他的苏团长和我磕头，表示了中立态度，所以我没有被石香亭吓住。可是克什克腾旗的协理宝雅卿和经棚县商务会会长崔迎祥，也都是我的结拜弟兄，他们恐怕糜烂地方，力劝我不能因小失大，让我保全自己的前程。我经过几夜考虑，最后还是派人把“大斜瞎子”击毙，

将脑袋送给石香亭。

“九·一八”事变以前，胡匪头子左四点，因为和汤玉麟的五弟汤玉书，汤的副官长李芳亭等勾结，他的那一个“杆子”，在热河东部非常活跃、抗硬。汤玉麟指定让崔兴武的十七旅清剿，并让一定要把左四点扣住。崔将这一任务交给我去执行。因为我知道左的来龙去脉。我把左四点的“杆子”打散，他本人先跑到李芳亭的家里，以后又躲到朝阳城汤玉书那里“爬风”。我从开鲁出来，路过“祥盛号”烧锅，该号的李三东家告我，左四点前几天在他那里，以后就去了李芳亭家中。我到了土默特右旗黑城子王府的南梁，因为李芳亭和我结拜，他的侄子我经常给钱花，便把汤玉书已经开上护照，要将左四点送到沈阳城外马架子地方隐藏起来的机密泄露给我。李的侄子见我准备从北票上火车，又跑到朝阳城里报告给汤玉书。汤玉书怕我扣住左四点将内幕揭开，使汤玉麟难堪，因为崔兴武有过“你老五勾通左四点，还怀疑我勾通”的话。我由于等待开鲁给汇钱，耽搁了两三天，当到了马架子以后，汤老五已派人把左四点跟他的老婆（也能打枪）击毙，来了一个死无对证。说明连汤玉书在热河都掩护不了胡匪，“祥盛号”的李三东家和李芳亭的侄子这一类的“大家儿”更不可靠。

由于上述种种情形，狡猾的胡匪首领多不和军队“搭股”，更不愿意到军队中“爬风”。只是和他们保持一种藕断丝连的友谊关系，留下一条后路。如：“开壳”以后不伤和气；“卡线”和“打窑”不动他们的亲密朋友；扔几个“头”或甩几个“爬子”，往回换一些子弹；必要时通过“说票”的从中仲裁，将勒住的“秧儿”送给他们，“杆子”只收一半赎价，那一半由“秧儿”赏给军队，使军队名利双收，知道“杆子”很够朋友等等。胡匪到了不得已时，方跟军队打交道，好多人到军队中“爬风”是实在走不开了。至于“硬杆”把军队得罪，也不怎样惧怕。只要绕开他们的“圈儿”，军队就无可如何，并且打仗靠兵，兵不

仇恨胡匪，军官干恨也没有办法。若是遇到时局发生变化，各方面都拉拢联络胡匪，军队得派人央告胡匪头子给他们帮忙，或是请求不扯他们的后腿。在此种情况下，军队反而怕起胡匪。总之，“软杆子”得迁就硬军队，软军队得回避“硬杆子”，这完全是实力和形势问题，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没有一定的死板规矩。

(六) 我当胡匪的经历

我只当了四年多胡匪，却尝尽了这种行当的各种酸甜苦辣。胡匪中的“绺子”，全系农村中的流氓，军队中的兵痞，以及少数利禄熏心的中小地主家庭的浪荡子弟。一些为生活逼迫铤而走险的贫农户，由于本质善良，无法在“杆子”中长久存留下来，不是受其他“绺子”的欺侮压迫而“溜杆”，便是被“当家的”按“爬子”甩给军队，剩下的都是奸险诡诈的死命亡徒，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好人。所谓的“绿林英雄”和“江湖义气”，都是一些好听的名词。他们打富而不济贫，得到的“倘来之物”，只是给伺候他们吃喝玩乐的“下九流”之人花费。对真正的穷人并不施舍。他们都是为了想过腐化荒淫的生活，才因目的和命运相同而啸聚一起。但是一旦落网，就得把脑袋丢掉，所以作起战来，比普通军人顽强勇敢。可是得到油水，均各不相让，分赃以后得赶快“漫开”，恐怕被自家人暗算。尤其胡匪是由许多封建的“拜把子弟兄”的小集团组成，时常因为争权夺利而内讧。互下(夺)枪马，互放“黑炮”，由于一句闲话，也要以杀人的手段报复。从前人们说：“伴君如伴虎”，我觉得是“带匪如带狼”，残忍狡猾似狼的人，尚且常被伙伴反咬一口，软弱如绵羊的人，根本不能和胡匪在一起相处。

我因来历和机遇不同，没有从“小绺子”干起，可是知道他们的各种苦处和他们所受的惨酷剥削。每个象一点样子的“绺

子”，都有两三匹乘马，以备替换和伤亡以后补充。夜行军经常是二百多里，白天“压班”以后，还得轮流出去设“卡子”和“瞭水”，可以说得不到休息。尤其是初入夥的“爬子”，只有一匹骑马，随时都有被甩掉的危险，勉强能够跟上队伍，也得在“压班”时铡草喂马，根本没有睡觉的时间。至于爬冰卧雪，披风淋雨，在高粱地里受太阳蒸晒，比当兵和揽长工的还要受罪。胡匪是以鲜血和头颅当赌注，进行特种赌博。“开壳”以后，除了“当家的”和账房而外，前后都有死的危险，抗不住“跳儿”，“炮头”、“当家的”便娶就地正法，只好拿命硬“蹩”，置之死地而后生。“出摊子”不是趟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转战好几千里，结果没有捞到一点东西的情况是常有的。“当家的”固然赔钱折本，众人也得跟着付出无代价的牺牲和疲劳。“卡线”和“打窑”成功，“当家的”很少大公无私，都要先揣满自己的腰包，必须他够本赚钱才行。遇到掌握有十几个贴心“硬手”的“当家的”，更把其他的“缙子”视为仆从和附庸，“分项”时给多给少，“小圈儿”外的人都不敢吭声。关于执行“纪律”，也涉及不到核心和骨干的身上。而是拿着孤单的“小缙子”和“爬子”示众，杀一儆百。虽然这样，但是一上了贼船就只好随波逐流，跟着沉沦下去。胡匪因为生命朝不保夕，和旧社会的煤矿工人一样，有钱随便挥霍，多不攒余粮。花完了出去再抢，抢到手就乱花。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很难洗手不干。所以胡匪都以烈性毒品刺激精神和排遣苦闷。除了经常在枪林弹雨中闯荡，很难寿终正寝。即使漏脱法网，也没有一个能活高寿。多数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将尸骨和头颅扔在战场或刑场。

至于胡匪的首领，别看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以内，前呼后拥，手中掌握生杀大权，似乎天是王天，他们是王二。其实胡匪中的首领，并不洋洋得意和威风凛凛，他们内心的苦愁，比一般“小缙子”还多。由于他们把每一个人都按敌人和叛徒防范，必须时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真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

我当胡匪时，身上老带着三枝手枪，“开壳”时恐怕“炮头”有所闪失，常在“跳儿”主攻的地方“鳖着”，有四、五个人给我装子弹，用步枪对抗“跳儿”。“开壳”完毕，右肩被后座力打肿，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白凤翔任伪“东亚同盟军”总司令时，身上还是老带着七枝手枪，连同子弹在内，共有二十多斤，他一生几乎是背着铁生活，又在铁上边睡觉。胡匪首领成天在精神紧张状态里，窗前落下一片树叶，也会突然惊醒，以致成了半疯半狂的样子。带领胡匪和带兵不同，合起“杆子”二、三百人，全叫“大当家的”给想办法。除了能“挑得开”，还要能“叫得响”，对内对外得应付得面面俱到。许多胡匪首领全是沉默寡言，成天低着头，那就是一方面打盹，一方面在盘算心事。“杆子”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外边的社会情况和环境尤为复杂，一个“硬杆”搭头子，不光是善于运用战术，还得善于运用权谋，并且当机立断，否则自己的生死和团体的存亡就在眼前。胡匪首领还有一个苦闷的地方，就是“小绉子”在外边打家劫舍，还可以回故乡为民。他则成了到处通缉捉拿的匪首，离开羽翼和朋友即无法存留，这就叫骑虎难下。除了带领部下参加军队，再没有其它出路。但是匪首当了官儿，“绉子们”都不愿意永远当兵，为了怕兵跑完了官当不成，官当不成命就危险，还得“挑”出去为匪，因而由胡匪转正为军官的也为数很少。

我是地主阶级出身，加之在为匪以前，就和吃匪窝匪的人经常接触，故头脑比一般胡匪清醒。我一开始就感觉到“出摊子”是到处挨打，“漫开”后是随时受气，世上发财升官的门路很多，为什么偏要做这种真正的血本生意。其次要想“杆子”能“挑得开”和“叫得响”，第一不能克扣部下；第二要多交外边的朋友。这样，每出一次“摊子”，把钱尽给众人分散，将债都压到自己身上。另外，朋友越多，便被朋友们的“圈儿”包围，打开热河中部十几个县的地图，几乎找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结果跑到千里以外，做上一趟“买卖”回来，自己所剩无几。因

此，我当胡匪当到第二年头上，就决定洗手不干，改行另找其它途径。和商人们特别接近，因为恐怕回到热河游击马队被张连同把我“送礼”，所以还得在外边徬徨徘徊，可是越来越感觉不是滋味。可巧一九二二年春天，巴布扎布的余党进犯开鲁，热河都统汲金纯叫热河游击马队由建平前往增援，张连同知道我和胡宝山的“杆子”很能打仗，特别是蒙古人会杀蒙古人，便正式发表我为该部的连长。我才登了“横梁子”上岸，由邪路转入当时所谓的正道。

拉过“杆子”的人带了兵，那要比行伍和军校出身的军官强得多。因为胡匪首领除了具有操场和书本上所没有传授过的战术外，还有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许多实际学问。他们都磨练成社会上的“老油子”，不像行伍和军校出身的人那样头脑简单，不懂权谋。所以山东蓬莱秀才吴佩孚，最后还是叫奉天黑山的胡匪张作霖给打败。我虽不能和张作霖比拟，但是自从当官以后，完全是以当胡匪所学的那一套本领，应付所有的客观事物。因而我敢打仗、会带兵、能交友、善经商，并且这四者互相促进。经过不到七年的时间，便在张连同手底下掌握了三分之一的实力；在崔兴武手底下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实力，同时在热河中部和北部的十几个县内，广树羽翼，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牧主结为同盟，形成了以后投日和投蒋的本钱。

有关“蒙匪”和巴布扎布^①的见闻

从一九一二年秋天，外蒙派兵南下后，到一九二二年夏天第一次直奉战争前，热河北部的林西、开鲁和经棚等县，不断遭受“蒙匪”的袭击和蹂躏。一九一三年哲布尊丹巴派察哈尔的奈登公为将军，率领外蒙和察哈尔兵几千人，攻陷经棚，包围林西，窜扰到巴林和阿鲁科尔沁等旗。以后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的巴布扎布攻陷经棚，围困林西。一九一六年春天，巴布扎布被米振标部击毙于林西城外，其余党仍不断侵扰热河北部，一九一七年攻打开鲁，一九一八年续扰林西，一九二二年最后还把开鲁占领了一天一夜。

我在热河游击马队时，参加过一九一八年第二次林西战役，和一九二二年的开鲁战役。一九一八年曾在林西前线作战，一九二二年还率队收复开鲁。我的部下，有不少人出身于“蒙匪”，如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时，有个副师长田英跟过奈登公，有个团长胡宝山跟过巴布扎布。现在根据他俩过去的叙述和我同“蒙匪”两次作战的见闻，谈谈我所知道的“蒙匪”和巴布扎布的一些情况。

(一) “蒙匪”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强盗

人们称哲布尊丹巴和巴布扎布的军队为“蒙匪”，因为他们真是一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流寇，比热河农业区的胡匪与牧区的马贼(土匪)还坏。胡匪与马贼还可以说“盗亦有其道”，而“蒙匪”则

注①关于巴布扎布活动的记载颇多，李守信写的这篇见闻，有些事件、人物与其它资料有出入，因此仅供参考。

完全是失去了人性的强盗。他们对于汉族人民，固然极端仇视，对于蒙古人民也毫不留情。他们所到之处，真是玉石俱焚，庐舍为墟。牧民遇到他们，壮丁、马群和牛羊也是一掠而光。他们来前，人人谈虎色变，他们走过后，令人惨不忍睹。

“蒙匪”的将领都是王公、大喇嘛这样一些封建奴隶主。他们在蒙地对贵族和宗教上层以外的牧民，完全当牛马来驱使，平日就刻薄寡恩，非常残酷凶狠。他们在府邸和寺庙，高高在上，受奴才和“黑徒”（或称黑人、即劳动人民）的供养。他们跟上哲布尊丹巴和巴布扎布“起事”，是为了保护或扩张自己的权利，更加作威作福。他们驱使奴隶充当炮灰，以烧杀的恐怖手段，造成一种威慑声势，想使当时的北洋军阀对他们让步，广大的汉族人民对他们驯服。“蒙匪”的中下级军官，除了王公仕官的豪奴恶仆、寺庙的管事和掌刑喇嘛而外，便是从内蒙各部吸收的马贼首领，以及其他亡命之徒。“蒙匪”的士兵被迫走上火线，离乡背井，心情苦闷，感到前途茫茫，随时面临着死亡，于是把杀人当成儿戏，以奸淫作为享乐。特别是军官允许士兵“自由活动”，做为攻城略地的鼓励和赏赐，这样就更使纪律败坏到极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地步。

生长在草原上的人，从小就以马代步，不备鞍鞅也能抓住鬃毛驰骋。蒙古地方非常空旷，三五里以外有了奇特的东西，坐在蒙古包里也能看见。因此牧民的视觉锐敏，加之经常打猎，当兵以后枪马都很娴熟。“蒙匪”虽然装备了俄国或日本武器，但是军官都缺乏近代的军事知识，沙俄或日本派来的顾问也不是优秀之材，所以行军作战完全是采用古老的办法和传统的战术。“蒙匪”在出动的时候，均预先带着大批空马，路上遇见马群，不管多少全要抢走。马匹不仅是他们的交通工具，而且是主要给养。他们骑累一匹、再换一匹，人可以不休息地前进。遇到有水的地方，将牛粪和干柴“笼着”，把走不动的马杀掉，用小刀拉肉为条，挂在柳条上烧烤，半生不熟就吃掉，喝完铜壶中煮开的

水便走。吃饭打尖用不了多长时间。马肉很能充饥，每天吃一顿即可，一点也不耽误行军。所以他们的行动特别迅速，不能用日程计算，要以时速来估计，一昼夜可走千里路程。因此，使人猝不及防，以为从天而降。

“蒙匪”以旗帜做为疑兵，拿海螺的声音助威，老远望去是遮天盖地的黄尘，走到临近是大小的红旗。他们为了减少风的阻力，多半弯倒腰骑马，作战时为了避免伤亡，更把头贴在马脖颈上，走到跟前才一跃而起，开始进行射击，往往弄得人眼花缭乱，以为每一匹马上都有伏下的射手。他们在攻击前，活佛和大喇嘛扬言有神佛保佑，说是刀枪不入，军官尽量用酒把兵灌醉，使之神志迷忽，因而冲劲很猛。如果没有深壕坚堡，普通战沟最容易被一突而破。野战能以套马杆子活捉敌人，使对方一个也不容易跑掉。

姜桂题于一九一二年率领毅军号称一百营，到热河北部防御“蒙匪”。由于后路标统米振标在林西筑城，在接连乌珠穆沁的坝上乌尼太沟与沙巴尔台沟等处建有营垒，所以只能守住林西和林西附近的几个据点，而经棚及其他地方完全失陷。一九一三年秋天，姜部被奈登公的部队打了个七零八落，被歼灭了好几个营，有四五个管带阵亡（在林西城外立有石碑）。后经西路的淮军和东路的奉军来援，始把“蒙匪”驱逐到乌珠穆沁，有一年多时间没敢再来。

一九一五年冬天，“蒙匪”又企图夺取多伦。因米振标部有了作战经验，加之这部分“蒙匪”剩下的人也不多了，进至林西附近的罕伯庙即被毅军击退。

摸清“蒙匪”行军作战的规律，对于他们并不难抵御。他们都是密集队形，最容易被重武器和连发武器歼灭，如果拿步枪抵挡，只要官兵能沉着应战，不被他们那种声势吓倒，集中起优秀射手朝一个方向射击，连续击毙四五个后，其余一见血就都跑了。特别是指挥官落了马，队伍当即混乱。他们不会分散开作

战，老是拥成一团，只懂用猛劲冲锋，不善于包围和迂回。第一次攻击被击退后，很难组织第二次攻击，即使组织起来，也是一次比一次稀松。进攻“蒙匪”最宜夜袭，尤其是他们占领了有“烧锅”（酿制白酒的作坊）的村庄，可以说是等于没有警戒，很容易包围歼灭。白天进攻他们，以少数牵制，多数人去夺马群，他们一没有马便慌了手脚。追击“蒙匪”的时候，他们会用坚壁清野的办法，使追击部队寻不见路径和找不到吃喝。只要追击部队能遵守军纪，不要认为牧民全是通匪，逮住俘虏不加杀害，利用走蒙地的商人担任向导，用银元购卖牛羊，对寺庙加以保护，使牧民不搬家疏散，追兵就有办法。

热河的军队军纪不好，进入蒙地逮住牧民，按侦探用严刑逼供，随便焚烧寺庙、帐幕，破坏蒙古人的风俗习惯，所以处于被动的地位，对“蒙匪”只能招架而无法还手。经过几次作战以后，便找着“蒙匪”的弱点。我参加的那个热河游击马队，是一个蒙汉混合的部队，统领张连同利用“蒙匪”对付“蒙匪”，采用“以毒攻毒”的手段。巴布扎布死后，张将巴的余党收容在部队里边，因而成为一支热河境内抵挡“蒙匪”的劲旅，曾经打过三次胜仗。我跟当过“蒙匪”的人共事多年，知道他们并不关心蒙古民族的前途和广大牧民的疾苦，而是用“民族复兴”一类的口号给自己遮盖羞丑。他们认贼作父，把替帝国主义和野心家帮凶变为终身的职业，跟我这个胡匪和马贼混合的匪帮头子一样，尽干助纣为虐的坏事。他们虽然能够横行于一时，但最后终归沦于失败和死亡。

（二）巴布扎布攻打林西的经过

关于一九一六年前，米振标部毅军在林西和“蒙匪”作战的情况，因为我是一九一八年当兵，所以知道得不怎么详细。但一九一六年冬天那次战争，距我当兵时间相隔不久，同时我在热河

游击马队，曾由林西出击到外蒙边境，又参加了一九一八年秋天那次战争，所以谈谈这两次战役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蒙匪”的大本营，长久以来设于外蒙东南边境的由基庙。该庙距乌珠穆沁的盐池五百多里，距林西县城约两千多里。林西北面九十多里有一条东西蜿蜒的大坝（西接经棚以南的黄岗梁，东连乌兰浩特以西的兴安岭），往上走二三里地，往下走也是二三里地，坝南和坝北全是漫梁和平川，为热河特别行政区与察哈尔特别行政区的分界。坝南是昭乌达盟的巴林等部，坝北是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部。林西县城在光绪年间，设治于坝南乌梁素台川口色布敦庙附近。一九一二年米振标的毅军来此驻防，在周围掘了四、五尺深的战壕，并在坝上的几个沟口筑了营垒。经过一九一三年的战争，感到防御工事单薄，一九一四年就大兴土木，在林西修起周围十里两丈高的城墙。并在五十家子、汤上等地建立了驻兵的围堡。林西有东西南三个城门，城外都有一个很大的营盘。一九一六年秋天，巴布扎布亲自攻打林西时，毅军防务较前增强。

巴布扎布以主力进攻林西，还分出一部占领了经棚。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阴历九月十一日）以前，毅军在蒙地的哨探，已经发现“蒙匪”向林西方向出动。十月七日这天，林西虽然戒备，但是估计“蒙匪”还得两三天到达，所以除了常得胜的三旗（旗相当于部队的连）马队在城外巡逻，城里和东营盘的步兵、炮兵、军官，都是打了一宵牌，拂晓前睡了大觉。巴布扎布这次是由乌珠穆沁绕到大小巴林两旗的东北，于十月八日的上午三点多钟，到达林西城外，共有几千人。毅军的三旗马队发现“蒙匪”后，都四散逃跑，以致东营盘被包围，驻守东营盘的石管带所率的那个营，由被窝里爬出来应战，完全被烧杀在营盘里，只从死人堆中跑出一个号兵。城里毅军的步兵和炮兵，被东营盘的枪声惊醒，慌忙披衣上了城墙。巴布扎布没有从四面包围林西，只攻打东门。林西的城墙并不太高太厚，那时还没有发明出手

榴弹，由于“蒙匪”身体笨重，且无云梯和利用坑道轰城的炸药，猛扑了几次未曾攻开，天亮以后全拥到东营盘附近。毅军的炮兵先是盲目射击，十月八日早晨目标已经非常明显，因为平日缺乏训练和临阵胆战心惊，放了好多炮都没命中。这时林西城里有一个卖纸烟的拐腿老汉，是毅军的一位退伍炮目。米振标把这个人弄到东城墙边上，经他瞄准只打了一炮，即落到巴布扎布的跟前爆炸，巴布扎布立被炸死。（编者按：巴之死，有种种说法，一说是一九一五年，被飞弹打死）“蒙匪”看见主帅已死，纷纷向坝上溃退，林西之围始解。

林西解围后，毅军钻到城里二十多天不敢开门。到了阴历十月上旬，除调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向乌珠穆沁搜索，并派步兵和炮兵将经棚收复，曾阵亡了一个炮兵管带。“蒙匪”此次进犯热河北部，单是林西一县即被烧毁房屋一千余间，惨杀无辜人民三百余口，遭受奸污的妇女更多。热河游击马队由林西出发，沿途已无敌踪。因乌珠穆沁的蒙古人对“蒙匪”非常痛恨，所以给热河游击马队引路，由冰冻的盐湖上走过，一直领到外蒙境内的由基庙。该庙非常富有，“蒙匪”在此储存大批军火粮食等物资。张连同以捣毁“蒙匪”的窝巢为名，纵兵将该庙焚掠一空。有一个营长抢了一个玉石几案，回来在多伦出售给英国的古董商人，得了八百块银洋，其他的财宝据说还有许多。热河游击马队回来的时候，遇到三、四尺深的大雪，在北风怒吼之下，冻死冻伤一百多士兵。

巴布扎布在林西被击毙后，热河各部各旗追随他的人大部漫（分散，隐蔽）到坝南。有的把枪交给王府，编到蒙旗的“小队”；有的没有缴枪，又当了马贼。被张连同窝藏在热河游击马队，由胡宝山率领的七八十个人，便是巴布扎布的旧部。胡宝山和巴布扎布同是土默特左旗大营子人，曾和巴布扎布同在陶克陶部下当过兵，故在“蒙匪”里的熟人很多。张连同除了平日叫胡宝山带人到阿鲁科尔沁等旗给他抢马，遇到打仗的时候，便利用这

帮“蒙匪”冲锋陷阵。热河游击马队一九一八年秋天到林西上防堵“蒙匪”，一九二二年春天收复开鲁县城，这一部分人起了很大作用。一九一八年秋天我已当兵，在张连同的第二营管带孙多福手下补了差官，出发打仗的时候，看到热河北部的胡匪和马贼，多来给张连同捧场帮忙。我因为射击技术好，从建平县开拔时，调到了统领部。由于我身躯高大，遂和胡宝山部下的王明儿充了队伍前边扛大旗的差官。我们开拔时是阴历八月间，进入林西县境风吹着快要成熟的莜麦。队伍先到达大坝底下的毡匠营子，一千多人都驻在一个地主的大院和烧锅里。那时林西开垦不久，粮食堆积如山。这家地主姓逯，共有一万多只小鸡，在场面上随便啄食粮食，佣人拣回的鸡蛋，堆了四、五大房。军队前来替他防堵“蒙匪”，除了宰猪杀羊慰劳，并且让兵们尽量吃鸡蛋，一千多人吃的打起噎来都有鸡屎气味，也没有把鸡蛋吃完。

根据前方的探报，巴布扎布的余党已经到达坝北四十多里的好尔图庙。他们此次前来是为巴布扎布复仇，扬言攻开林西以后，鸡犬不留。米振标让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和常得胜的毅军三旗马队两部分骑兵，开过坝到乌珠穆沁搜索。张连同在毡匠营子观望了四五天，编了一百二十人组成的“敢死队”（我也在内），由他的同乡湖南人周道兴担任队长，叫去夺取好尔图庙。“敢死队”于拂晓以前走到坝后，便缩前退后起来，不敢走向山下。只有我和胡宝山、王明儿、带来等四个蒙古人和一个称为“刘副爷”的胡匪头子刘杰臣，五个人冒然走了下去。

好尔图庙在林西通往东乌珠穆沁的大路中间。我们走了二十多里，东方已经发白。好尔图庙南边十五六里还有一个弥苏庙，因为被小土山挡着，故不知道这个庙上的情况。走到临近，才发现弥苏庙也有了敌人，他们正烧火做早餐，烟雾中有好多红旗在晨风中飘扬。因为没有整队出发，马都在召前的滩上吃草。胡宝山叫我们去夺马群。夺马的时候，马群都朝好尔图庙跑去，我一

个人跑到马群的前边，在临近敌人吃饭的地方开了枪，才把三百匹马打得直往南跑。这时弥苏庙的“蒙匪”乱成一片，以为被毅军包围，都向好尔图庙奔跑，结果把好尔图庙的“蒙匪”也完全惊走。我们把马群赶到坝上，坝上的“敢死队”先听见枪声，又瞭见马群踏起的黄尘遮天盖地而来，便朝着我们开了枪。及至听见我们大声吼叫，方停止射击，纷纷过来抢马，跑回毡匠营子去报功。隔了一天，张连同另派人进驻到好尔图庙，赶着马到林西向米振标告捷。“蒙匪”最后攻打林西的战事就这样结束了。

（三）开鲁作战的经过

“蒙匪”攻陷开鲁，是在一九二二年初春。这一股约有四、五千人，在开鲁只占了一天一夜。他们由谁指挥，以及政治背景如何，当时我没有留心，现在更无法记忆。只知前去会剿的队伍，有热河和奉天两处的骑兵，收复开鲁是热河游击马队，到库伦旗扫荡才看到奉军的张海鹏部。“蒙匪”从一九一二年扰乱热河边境，经过连续失败，到一九二二年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可是驻防开鲁的热河北路巡防队统领薛兰亭的七、八百人，却闻风弃城撤走，未加抵抗即退到开鲁东北的哈拉毛都。因此“蒙匪”过来如入无人之境。特别是到了阿鲁科尔沁旗，由于王公把“小队”都集中到王府，牧民不像农业区的地主有民团和联庄的组织，遭受洗劫和奸淫更为惨重。

进犯开鲁的“蒙匪”，是从天山县方面窜来。先到城西北三十里的胡家岗子，那里有一座大烧锅，所以攻城前“蒙匪”都喝得烂醉如泥。因为驻军事先撤走，那时开鲁还没有修起城墙，打了一阵枪，即冲到街上。“蒙匪”这次进入开鲁没有烧杀，开鲁商务会派出做蒙古生意的买卖人表示欢迎，只是进入各家商号后，向商人索要酒肉。离开官长的士兵，则跑到住户家中翻箱倒柜，强奸、轮奸妇女。开鲁因设治不久，只有热河官钱局开鲁分

局占着一个高墙大院。那时朝阳的张子良（以后任过赤峰商埠交涉员和汤玉麟的热河财政厅长）任开鲁县长。他知道“蒙匪”不能攻坚，看见北路巡防部队退走，即把二百多警察和绅商大户的眷属与贵重财物，都集中在官钱局的大院中据守。“蒙匪”在胡家岗子喝得酒还未醒，进入开鲁又喝了不少酒，他们的指挥官叫士兵趁醉攻打官钱局。有些士兵走到官钱局跟前，竟坐在地上狂笑，手软得不能放枪，遂被官钱局房上的警察打死好多，尸体在四周堆下一大圈。打了一白天，都没有把官钱局攻开，入夜后，停止了攻击。

那时热河游击马队仍在建平驻防。我当了四年胡匪，又在热河游击马队升为排长。统领张连同最懂得利用蒙古人打蒙古人，所以把我带的胡匪和胡宝山带的马贼，编了一个前锋连，于出发时提升我为连长。我带着队伍日夜兼程，于“蒙匪”进入开鲁的那天黄昏，在开鲁城南十余里的老哈河岸边宿营。“蒙匪”在城外没有哨探，城里的警戒也不严密。胡宝山派人进去，把他们集中居住的商号侦察明白。张连同带的后续部队，于三更天始行来到，第二天拂晓攻击时，由我那一连进城，其余的十几个营，都在城外鸣枪助威。张连同的目的只是把“蒙匪”轰走，就算应付了热河都统汲金纯交付的公事。我则是初升连长，要大显身手，所以指挥士兵冲进去，把“蒙匪”集中居住的几个商号，差不多完全包围，看见“蒙匪”就击毙，于是城里乱成一片，纷纷向外逃跑，大部分朝北面退往草地，少数朝南面退到库伦旗。

“蒙匪”退走后，张连同留下一部分人在开鲁驻守。清理战场的时候，共昇出三百多具尸体。对于退往草地的“蒙匪”，张连同知道无法捕捉，故没派人跟踪追击；对于退往库伦旗的“蒙匪”，仍令我连为前锋去追，他带着四五个营在后边掩护。开鲁、库伦旗中间尽是沙岗长着毛柳的地带，有一道长达四五十里的大青沟，地形尤为险要。从开鲁退出的“蒙匪”多是库伦旗和土默特左旗的人，因为溃不成军，都背着枪各往各家逃跑。我们

沿途一枪未放，即到达库伦旗，当天奉军张海鹏的骑兵，也从东边来到。库伦街上的商务会，杀猪宰羊慰劳军队，驻于该地的绥东县县长高子瞻，请两张歇兵三天。

张连同因张海鹏的奉军没有斩获，把我叫去说：“我和奉军的张旅长在光绪年间打陶克陶时，就磕头为结义弟兄。他从奉天远道而来，没有和敌人作战，你们给设法弄些枪马俘虏，让他带回去比较好看一点。”我下去问胡宝山有无办法，他说得找眼线（坐探）。经过胡宝山利用他当马贼的社会关系，调查出库伦街南边四十里地方，有两家蒙古牧主和“蒙匪”勾结。退到库伦旗的“蒙匪”，除了四散而外，尚有六七十人在这两家牧主家中潜伏，枪枝完全寄存起来，人都藏到他们两家的窝铺里。这两家牧主非常富有，附近的大片土地雇佣朝鲜人种稻子，大米堆满好几间大房。我们用掘地三尺的办法，翻箱倒柜，搜出马鞍和枪枝，又发现了银窖，士兵们便抢掠起来。当张连同、张海鹏与绥东县长赶到，已把两家牧主的财物洗劫得所剩无几。

后来还从这两家牧主的窝铺中，逮住四十个人，连同那两家牧主都交给绥东县的警察，押回库伦街处理。听说队伍走后，均取保释放，绥东县长高子瞻因此发了大财。牧主的六百匹好马，被张连同、张海鹏各分了一半，真是不虚此行。张连同令我给张海鹏递了门生帖，队伍开回建平，又提升我为营长。自从开鲁战事结束，热河北部再无“蒙匪”窜扰，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看到“蒙匪”不管用，便支持张作霖发动了两次直奉战争。当张学良倾向国民党后，日寇又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为实现“满蒙政策”，并没有停止豢养蒙古族败类充当侵略工具的这一工作。一九三二年成立伪“内蒙古自治军”，一九三五年指使我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察北组织伪“蒙古军”，都是“蒙匪”的继续，而我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则承继了巴布扎布的铁钵。

日寇侵占前的热河地方部队

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前夕，除热河北部有从东北退下来的义勇军，热河南部有万福麟与张作相所指挥的东北军。原先在热河境内的驻军，计有汤玉麟所率的国民党三十六师三个步兵旅，富春所率的东北军步兵二十二旅，崔兴武所率的东北军骑兵十七旅与石香亭所率的东北军骑兵十九旅，以及赵国增所率的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其中三十六师是由东北边防军十一师改编而成，它和步兵二十二旅均系奉军的嫡系部队；骑兵十七旅与十九旅以及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都是来源于热河的地方部队。此三部分地方部队，系由毅军，胡匪和民团凑成，几经分化变迁，发展为各霸一方的小军阀势力，最后成了奉系大军阀的附庸。我于一九一八年到热河游击马队当兵，一九二五年这个部队分编为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和热河保安骑兵第一旅。东北军骑兵第十九旅，是由与热河游击马队同一时期的毅军游击马队演变而成。除了热河游击马队和毅军游击马队外，热河在民国以来还有过张殿如（即老张二扁担）、张鹏飞（即张四皇上）、刘山胜（即刘迷糊）和贾廷骧等率的地方部队。不过后来有的被国民军收编，有的被胡匪解决，有的被友军消灭。到了一九三三年日寇侵占前夕，热河的地方部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官胡子”，不只是成立的时候收容了不少胡匪，打上官旗穿上官号褂以后，军官越发窝匪，士兵仍然为匪。现在把我在热河游击马队和东北军骑兵十七旅中的经历和见闻写出，可以窥出热河地方部队的全貌。因为我曾经是由当兵而为匪，又由为匪而升官，在我给日本帝国主义成立的“蒙古军”和给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伪“东北人民自卫军”时，都是利用热河地方部队与胡匪中的牛鬼蛇神为基干。关于热河的胡匪，我另以

他题叙述，现在先谈热河的地方部队。

一、热河地方部队的一般情况

热河从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平定“金丹道”叛乱开始，到一九二五年国民军把米振标调往河南，在这三十多年的较长时间内，一直由毅军驻防。不论清朝时的直隶练军外八营，民国初年的热河各路巡防以及热河第一混成旅，都是由毅军组成。同时毅军统领姜桂题和米振标，均任过热河都统，毅军的高级军官如殷贵、张殿如和刘山胜等，也任过朝阳、赤峰和林西等处的镇守使。毅军长期驻防热河，不少老官、老兵都流落在口外，同时在热河各县也补充了新兵，从中产生了热河籍的军官。如随赵倜开赴河南曾任归德镇守使的旅长宝德全，还是我们土默特右旗的一个蒙古贵族。毅军于同治初年由宋庆在安徽亳州练成，以后和捻军作战招降了不少山东人，所以毅军的中下级军官最早以亳州人居多，至于一般士兵最早大都是山东济宁州附近的人，故毅军中流传着“亳州老乡回公馆吃饭，济宁州老乡到大厨房吃饭”的笑话。不过自从宋庆随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后开到热河和冀东驻防时候起，这一方面的官兵就逐渐增多。因此热河的地方部队和胡匪以及民团，都跟毅军有很大的关联，凡是行伍出身的军官及首领，差不多都来自毅军。

热河游击马队的统领张连同（字协堂）系湖南益阳人，据说是前清的武探花。他所率的部队，系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熊希龄任热河都统时以毅军为基干，由他收编胡匪而成立的。他曾于光绪三十年左右，在黑龙江作战腿部受伤，因而外号“张瘸子”，并在那个时候和张海鹏结拜为把弟兄。他和我们闲扯时，经常提到他和马玉昆、姜桂题如何相好，以及到郭尔罗斯旗怎样和陶克陶的队伍打仗。他的管带和哨官中，有好多是从毅军中转来，所以我总认为他在毅军中呆过。接了他的摊子改编为东北军骑兵

第十七旅的崔兴武，纯粹是毅军出身，从老家辽宁黑山县到毅军中当兵后，升至帮统，所以人们叫他为“崔老帮”。有人说我由胡匪投入毅军，大概亦是由于这些缘故。日寇侵占以前的热河，地方部队，除了张鹏飞是围场县的大地主，他的部队是民团底子，其他部队几乎全由毅军分支而出。这是热河地方部队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故热河地方部队中保存着许多毅军的腐败风气。

一九一八年我当兵时，已经是民国七年了。可是毅军和热河的地方部队，仍保持着清朝时的编制，以营为战斗单位，下属前后左右中五哨。由常德盛(字子兴、即常八爷子)率领的毅军游击马队三个营还称为旗，所以又叫“三旗马队”。热河游击马队按照都统署的编制也是下属三营。张连同从每营抽去一个后哨，另外组成一营亲兵，老跟着他的统领部驻防，做为他的卫队。其他三个营都是“官枪私马”，唯独这个营的兵是骑着各营剿匪时虏获的马匹，虽然有不少徒步，但称为官马队。张连同实际上等于一个骑兵团长。因为他是少将军衔，听说北洋政府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还给过他一个将军的封号，故当兵的和老百姓都恭称他为“张将军”。至于底下的称谓，营长叫做管带、连长叫做某哨连长(哨官即连长)，排长叫做副爷，班长叫做棚头或什长，副班长叫做伍长，连部的司务长叫大旗，上士叫师爷。在上报册子的编制上，是每营五连，每连两排，每排两班，每班除正副班长而外，有十二个列兵。不过能领到薪饷马干的没有这么多人，而在大厨房吃饭和在兵棚里睡觉，到了打仗时上前线的，却比编制要多得多。由于热河游击马队和毅军一样，团、营、连部都养活着大批差官和闲员，差官和闲员当中，多数是窝藏下的“爬风”(暂时躲避的意思)的胡匪。

民国初年，热河流行着这样的几句话：“穷淮军，富陆军，吊儿浪荡当毅军。”热河游击马队是从毅军分支而来，里边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是带着一支套筒步枪，由家里的长工赶着毛驴驮上，从朝

阳到建平下河沿去投奔热河游击马队三营前哨连长安静海（即安大个子）的。先在连部当了两个月伙马伙，因为剿匪时得了一匹战马，遂给安静海当了马弁，即把老婆搬来防地。以后被管带孙多福要去给他担任差官，并兼了安静海的大旗，从此便去各营串开了棚子，很快就摸清了这个部队的底细。当时张连同带着他的官马队在建平县城里驻防，统领部的参谋长叫萧子杰，是朝阳县小人沟人，乡村的私塾先生出身，对于军事完全外行。执法官杨正卿原来是建平城里讼棍，文化程度很差，写信老引用“大力维持”一句成语，故外号“大力维持”。这便是张的左右幕僚人员，也是全军中的知识分子，其余尽是些没有职务的差官和差官所带的闲员。“官马队”在编制上没有，但是称为第一营，管带叫张茂轩，给张连同带领亲兵，说话口音和统领相同，许是他的弟弟或者是侄儿。底下的四个连长是王汉卿、黄子勤、邢得胜和尹宝山。王汉卿系建平人，张连同大姨太太的哥哥。黄子勤系滦平人，邢得胜系山东人，均由毅军中转来，都是行伍出身。尹宝山是平泉人，后来给我担任了师长，他和刘山胜参加过“李善人”所率领“东路巡防队”，也是毅军的旧部。

热河游击马队第二营管带简庭鉴，是朝阳人，曾在常德威的毅军游击马队中当过管带。他底下的四个连长，除了隋得胜在围场县带过胡匪，于再云（冀东人）、孙凤阁（山海关外后所人）和孙孝卿（密云人），都是从毅军而来。二孙和崔兴武在毅军结拜，崔初到热河游击马队时，在二孙的连里住闲，因为他精于马术，由二孙举荐给张连同为“压马”（调教马匹）的差官，以后升为营长和团长。所以一九二五年崔兴武接了张连通的摊子，改编为东北军骑兵十七旅后，二孙均由营长升为团长，成为崔的左右臂膀。三营管带孙多福是湖南人，系张连同的同乡。他的四个连长里边，安静海是毅军出身又当过胡匪，彭惠东是由毅军转来，孙旭东和阎松林也都是湖南人，孙旭东与孙多福并有亲属关系。孙多福由下河沿移防到敖汉贝子府病死，由毅军出身的河南

人宋秉钧接了他的管带。第四管带李立军，系天津人，出身不详。这个营里的连长除毅军出身的直隶人马仲云，其余都是收编的胡匪头子。除朝阳人赵国增之外，还有建平的王子青和围场的李正东。李正东系二营连长隋得胜的姐夫。他们原先在一起合夥，归降热河游击马队后，把他们的力量分散，被拨开编到两个营里，恐怕弄到一起管带不好指挥。

从以上的军官来源看，可以知道热河游击马队的封建性很强，官与官和官与兵之间，都有一种亲属故旧关系。除了血统、裙带、同乡和老同事所联系的大派别，还有以把子弟兄结成的小集团。热河的其他地方部队也是如此。赤峰镇守使张殿如，外号“老扁担”，他的侄儿“小扁担”担任团长。刘山胜后来住在北京养老，由他的侄儿“小迷糊”刘汉杰代理旅长。这正如毅军游击马队先是由常德盛担任统领，以后换了他的侄儿常万里一样。至于收编胡匪和民团，不仅是地方部队如此，各派军阀也在热河收编过不少胡匪与兼并过许多民团。淮军王怀庆的帮统乔健才（以后在丰镇任过察西镇守使）于一九一二年从锥子出来朝阳镇压辛亥革命起义，为了扩充实力，利用该地胡匪冯先生、李拐子和周糊涂的人马组织了一个骑兵营。直隶练军外八营统领殷贵，一九一六年任朝阳镇守使时，只剩下四营队伍，为了恢复八营编制，除了把朝阳的民团编了四个营，并将朝阳的胡匪编了一个先锋营。至于克什克腾旗的蒙古胡匪头子宝振荣（即荣三点）和围场县的胡匪头子白凤翔（即白三阎王），更是先投了国民军又投了奉军。围场县的另一个大地主姚景川，还把热河的民团带到绥远，在晋军的商震指挥下和奉军作过战。常万里的热河游击马队，曾被阎朝玺改编为旅，一九二五年归附国民军扩充为师时，把林县的民团全兼并在内。常死由石香亭率领其众投奉，编为后来的东北军骑兵第十九旅。这些地方部队的首脑，都把防区当成自己的地盘，形成大割据底下的小割据局面，在里边为王称霸。因而他们是：谁坐都统拥护谁，谁从热河撤退解决谁。他们打起仗

来虽然不能协同一致，遇到劲敌即垮，但是强龙难压地头蛇，热河的都统均得迁就他们。由于耗子不离墙跟，很难把他们调到外地南征北战。

热河游击马队的军饷，是由省库开支。在二次直奉战争前和阎朝玺任热河都统期间，一律关发银洋，或“天津字”的交通银行钞票，连同马干包括在内，每兵月饷是十一元五角，班长十二元四角，排长二十五元，连长六十元，管带连同办公费及其它杂支以二百四十元包干。民国初年热河的农产品特别便宜，特别是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开鲁和林西一带，在赤峰和建平也是一斤白面五个半铜元，五十斤重的一斗高粱二角多钱，并且草料是按市价百分之二十五的官价，由乡约和牌头向农民征要。可是经过军官的层层剥削，落到士兵身上就所剩无几了。加之有一半士兵携家带口，还得私自购买武器，所以不得不换上便衣，出去充当胡匪。改编为奉军归汤玉麟节制以后，关发热河省钞。由于省钞涨落不定，士兵的生活越发困难。热河游击马队最初没有重武器，和毅军一样穿着蓝布军服，使用着七九套筒步枪，手枪归士兵自己私有，故带有大枪小枪外加烟枪，所谓“三杆枪”的兵很多。那时手枪（盒子炮，亦称自来得）价格特别昂贵。一支德国造大金面二号手枪，需七八百块甚至于一千块银洋。士兵为了掌握此种心爱武器，必须干许多坏事才能达到目的。有些士兵恐怕为匪时失去了武器，被查出枪上的号码容易犯案，连大枪也是私购，每支价七八十块银洋。

军官排长以上都有“公馆”，把不少士兵叫去当马弁勤务兵和厨师，伺候太太和姨太太以及前去打牌的客人。营盘里边按说有值日官，实际上由班长们轮流照料，每月只出两次操，军官偶然也点名查哨。士兵除了站岗，其余的时间可以由自己支配，回家也好，到外边赌钱嫖妓也好，只要不在防区以内生事惹祸，军官即不过问。连、排、班长在出操打仗时还像个官儿，平常日子和兵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那样相处。当兵的也能领上自己的朋友到

大厨房吃饭，回营盘睡觉。于是军队里边穿便衣的多于穿号褂的，营盘遂成了胡匪的租界地和防空洞。军官与胡匪头子都在公馆中进行分赃和买卖子弹的罪恶活动。当兵的把称为“地蹦子”的小胡匪领到棚子里边避难。军官到了连长的地位，即不亲自出马到防区以外胡搞，排长经常领上士兵截“镖驮”和截“烟驮”，只是不在营盘中寄放“肉票”而已。士兵单奔出去作案，把东西送给军官一部分即能得到默许，并替他们“抗风”。热河游击马队的军官，在上的作威作福，在下的唯利是图，多半有色癆、烟癮和脾癆，终日昏昏沉沉。因为朋比为奸，虽然内部矛盾并不怎样尖锐，但是统治非常松懈，到处都有空子可钻，遂使我也能混到里边，后来得以“成名”。

我当兵时已经二十七岁，是怀着野心参加这个部队的。按我跟连长安静海的关系，是属于到他公馆吃饭和住宿的闲员；可是我为了跟兵们接近，却下到“兵棚子”中去生活，以防别人说我是靠门子窗子吃饭。而且我也知道必须先当兵然后才会带兵，虽然我曾当过“马户”和“炮手”，毕竟还没有下棚子真的当过兵。我下了棚子不吹嘘和连长有什么关系，是由伙夫、马伙当起，铡草担水特别殷勤以取得其他伙伙、马伙欢迎。营盘中白天可以说空旷无人，吃饭时才熙熙攘攘起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炕上更挤得没有空隙。原来带家的兵都不到大厨房去吃饭。有钱的闲员都在街上下饭馆，到大厨房中吃饭的，尽是穷兵和闲员，故伙食顿顿是小米饭腌大豆，好多人都馋得叫苦。我利用他们的这些困难，使小钱拉拢，有时买上几付猪蹄和几个烧饼，也能在喝完酒后和他们磕头拜把子。一些经济宽裕的士兵当他们夜间到外边赌钱宿娼时，我替站岗，经常一班接一班地站到天亮。这样他们对我非常感激，给我零花钱，好让我周济穷朋友。孙多福和安静海出来查哨，也认为我老老实实地当兵。后来我给管带当了差官，并兼了前哨的大旗，除了继续接近士兵，在验收草料时也向老百姓买好，既不挑剔质量，更不折扣分量。所以我

入伍只有半年光景，不仅队伍中多成了我的连串把子弟兄，在老乡中也结交下不少朋友。等到是年冬天开到林西便露了一手，更得到张连同赏识，我才因而有恃无恐，放心大胆地出去干起胡匪的营生。我作战相当勇敢，又揣摩出一套对人的权术，因而将好几个顶头上司都熬倒，最后终于把热河游击马队这个摊子抓到我的手里。

二、热河游击马队的发展和变迁

热河游击马队在一九一八年，先是驻防于建平。是年秋天因巴布扎布的余党进犯林西，姜桂题调所部和常万里的毅军游击马队两部分骑兵，去协助米振标的步兵进行防守。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进攻林西时，毅军也去打过硬仗，巴布扎布被其部下所杀。但是毅军一营人全军覆没，只逃出一个号兵，所以热河的军队，一提起所谓“蒙匪”，都是谈虎色变。热河游击马队的四个管带中，只有宋秉钧因接替孙多福升官不久，硬着头皮带兵上前线。张茂轩筒廷奎和李立军有了财产，在开拔以前均溜之大吉。张连同因为行军紧急，没有顾及追究。队伍开到林西，即驰往林西城北九十里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以南的坝子布防。幸赖临时前来帮忙的胡匪和统领、管带的一些差官，给组织了一个奋勇队，由我和胡宝山（曾经跟过巴布扎布）等五个人进行威力搜索，在好尔图庙夺了敌人的马群，蒙匪即行退去，林西得以转危为安。外人不明真象，以为热河游击马队打了个胜仗，从此张连同名震热河。提升我当了他统领部的差官。

张连同把队伍由林西开回建平，为了表示这次出征胜利，军官均提升一级，加上原来的三营管带宋秉钧，把十六个连长都提成管带，对外号称有十七营队伍。不过热河都统署仍按从前发饷，并没有给他扩大编制。

一九二〇年直奉联合把段祺瑞的皖系军队打败，奉军二十八

师师长汲金纯继姜桂题为热河都统，米振标为热河军务需办，对于毅军及其他地方部队仍维持原状，故热河游击马队还在建平一带驻防。这时我经常到赤峰毅军游击马队的防区以内绑票和截烟土的镖车。张茂轩走了之后，没人给张连同带领亲兵，张便给他的二姨太太的叔父、北京人邵冠英编了一个卫队，里边有毅军炮队出身的霍清泉担任连长。那时崔兴武仍在孙寿卿的营里住闲。我记得胡匪张子元绑赤峰元宝山煤矿经理“李抓毛”时，是崔兴武供给的子弹。崔是由于替张连同压马得宠，在这以后才给了他一个营长名义，但没有一个兵，等于统领部的高级差官。

一九二二年初春，巴布扎布的余党又犯热河。事前，张连同把我从外边找回，用排长的官衔拢络我，发表了二十多天还未下哨，即接到增援开鲁的命令。开拔时升我为黄子勤营的连长，叫我带上差官胡宝山等去当前锋。开鲁由称为“黑马队”的兰亭所带的北路巡防队驻守。因为开鲁没有城墙，蒙匪一来即退，撤至开鲁以北的哈拉毛都。蒙匪入城以后大肆奸淫烧杀，只有县长张秉彝（字子良）坚守热河官钱局开鲁分局的银行大院，未被攻破。我到开鲁城外驻下，敌人在里边没有察觉。翌晨拂晓的枪声一响，因为蒙匪的官兵都发了财，热河南部的人即朝库伦旗退去，热河北部和察哈尔的人都向西北撤走。由于敌人未曾抵抗，使我又侥幸打了一个胜仗。接着，我率领的前锋向库伦旗追击，在库伦王府和奉天开过来的张海鹏部会师。因胡宝山知道蒙匪的来龙去脉，我们在库伦旗的两家蒙古地主家中，搜出隐藏下的六、七十个人，借此把这两家蒙古地主的四、五百匹马群连同俘虏和枪枝，都弄回库伦喇嘛扎萨克府交给二张后各返原防。张海鹏没派一兵一卒，跟张连同分了一半马匹、俘虏回去请功，故在库伦喇嘛府特别召见了，张连同叫我给递了一个门生帖子。因为薛兰亭把开鲁丢掉，被张连同的人夺回，汲金纯队把北路巡防队的番号撤销，编到热河游击马队里边。崔兴武任过毅军的帮统，张连同就派崔掌握了这支人马。

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在我们驰援开鲁回到建平不久，这时热河的地方部队都倾向于直方，故纷纷起来驱逐奉军。汲金纯的二十八师，在汤玉麟的五十四旅前来接应时，被朝阳的毅军和淮军等部队挡住，不能从东路撤退，所以从承德撤出，企图通过赤峰绕道开鲁往通辽集结，张殿如、张鹏飞、常万里和刘山胜等部均开到沿途拦击。张连同没有公开驱逐奉军，却叫我带了二百多便衣队，联络胡匪王有恩（即王三点）的三百多人，离开建平防区，潜伏到赤峰正南的高梁杆子店一带，去拣汲金纯的“洋捞”。奉军二十八师的步兵大部突围走脱，扔下一团炮兵和许多辎重完全被我和王有恩的人虏获。除夺了八门“关退辘轳炮”，还有八万块现洋的军饷。张连同以收编王有恩为名，将此八门大炮归到热河游击马队里边，派毅军炮兵出身的张子荣为炮兵队长，给王有恩编了一个营。从此热河游击马队从建平开到开鲁驻防，防守热河北路的大门。王怀庆和米振标害怕张连通的势力壮大，并没有给他编成旅和发表开鲁镇守使。因为王有恩于一九二四年阴历二月病死，由我接了他的营长，我的上边没有团长，十几个营均由张连同直接指挥。

一九二四年秋天，二次直奉战争打起来了，奉军吴俊升和许兰洲率领两个骑兵军，由通辽向热河北路挺进，我们首当其冲。奉军前锋穆春师进攻开鲁，被我们用大炮挡住未下，后来许兰洲的骑兵到达，我们即撤至赤峰以西的猴头沟。因为淮军谭庆林的援军从宣化开来，决定两部联合反攻赤峰，由我和谭的营长孙长胜为前锋，在大炮掩护下将赤峰夺回。孙长胜在反攻赤峰时，因为不熟悉路径陷入奉军包围，经我把他接出，故跟我换帖为结义弟兄。我们夺回赤峰不久，听见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山海关的直军阵地也被奉军突破，李景林和张宗昌等闯过滦河，谭庆林的骑兵当即星夜退往宣化，我们遂将赤峰自动放弃，撤至赤峰以北的乌丹城。不久段祺瑞发表奉军第一旅旅长兼洮辽镇守使阚朝玺为热河都统，我们只好投降奉军，因崔兴武是张作霖的同乡，张

连同便派他去北京和杨宇霆等接洽。决定将大炮归还奉军，把热河游击马队编为东北边防军骑兵独立第九旅，并由阚朝玺派保定军校毕业的陈宝泉（字蕴山）和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傅景峰为参谋长和参谋处长，队伍由乌丹城开回开鲁整训。这时原来热河游击马队的十七八个营长，好几年来更换了许多，把尹宝山、张子荣和于再云三个营编为邵冠英的第一团，我和黄子勤、宋万里（建平胡匪）三个营，编为赵国增的第二团；霍清泉和北路巡防队的老营长张凤山与乔某三个营，编为崔兴武的第三团。孙凤翔和孙寿卿等的人马，均编为直属张连同旅部的补充营。邵冠英升为团长，是由于裙带关系；赵国增升为团长，是为了团结胡匪出身的军官；崔兴武升为团长，因为和奉军拉线有功。队伍改编以后，赵国增团从开鲁开到阜新县城驻防，我是赵团的第二营营长，张连同对奉军派去监军的人非常排挤，仍叫萧子杰担任参谋长，后来我和赵国增把陈宝泉和傅景峰接到阜新，让陈宝泉主持二团的军士训练队，聘傅景峰任团部的中校副团长。

一九二五年十月间，郭松龄发动倒奉战争，阚朝玺移师回救奉天，热河又陷入混乱状态。阚朝玺接受了汲金纯退却的经验教训，在离开承德前，给地方部队的各个首脑都拍去电报，叫前来接他遗留下的都统职务，使地方部队互相火并，不威胁奉天侧翼，奉军好安全撤出。张连同接见电报，命令开鲁和阜新两地的队伍，都到敖汗旗的下洼子集中，先夺取赤峰。让三个团都称为旅，补充营都称独立团，张带主力前去赤峰，留下萧子杰协助我收编胡匪，限一礼拜之内，成立三个骑兵旅，由我担任一个旅长，支援他接热河都统。我一共给招集起三千多人，开到赤峰东南的下河沿，听说张连同迫不及待，已经带着赵国增和崔兴武前去承德。我进了赤峰县城，便从邵冠英的口中，得到张连同在承德城外被国民军俘虏和黄子勤团缴械的消息，我和邵冠英正说话的时候，李鸣钟的步兵已经前来赤峰接防。我们没有抵抗，便撤到建平县的魁德索。这时崔兴武也从承德附近退到老哈河

北岸，派人通知我一声，便带上队伍回了开鲁。赵国增见张连同被俘，亦和我们岔开避不见面，后来经汤玉麟的朋友宋鸿钧（字子衡）从中勾搭，跑到了汤玉麟那里。因为我不忍扔下张连同不管，加之邵冠英不叫我离开他，于是东北边防军骑兵独立第九旅这时分成了三股。

国民军接收热河后，先由谭庆林代理都统，张连同虽然被俘，但很受优待，让他住在曾任过县长的张某家中，等于软禁起来，故能托人捎出书信，叫我到承德见他。我招集起的三千多人，因张连同没有接了都统，由赤峰退出即走去大半，只剩下八百人。我挑了二百精骑进入承德，在行宫谭庆林那里和张见了面，并把邵冠英从城外叫了进来。张连同不提队伍今后如何办理，只跟邵冠英谈他们的家务事。因为张连同那年已经七十多岁，在北京和湖南都置下财产，特别是这次没有当成都统还碰了一鼻子灰，志气越发消沉。我再三恳求解说，他还是坚决要去北京休息几天。我看没有办法，只好把队伍带回开鲁去等他。我出城的时候，宋哲元正坐着汽车来到。这时快要立冬，老哈河正在流凌期间。我回到开鲁不久，郭松龄已被奉军在白旗堡解决，奉军又回师前来热河，故国民军只接收了热河西部。阚朝玺因郭松龄倒戈时态度不明，张作霖发表汤玉麟为热河都统。这时张连同由四平街绕道回到开鲁，和众人见了一面，把开鲁的财产整理完毕，将队伍交给崔兴武，带上邵冠英就走。听说他回到北京，即被杨宇霆扣捕，除把截获汲金纯的八万军饷交出，又被勒索了五万，从此即在北京做了寓公。张连同行踪住址，是崔兴武报告给杨宇霆的。

崔兴武接张连同后，部队始改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七旅。因为第九旅的营长除了被赵国增带走和孙凤阁与孙寿卿而外，都成了我的羽翼，所以崔让二孙央告我给他撑台，遂给我编了一个三十四团，并由我部分出一部分人，给孙凤阁凑了一个二十七团。孙寿卿虽然发表为四十一团的团长，但系一个光杆，队伍从

开鲁开到赤峰之后，才收编了围场县陈望（号景春）所带的四百多名团丁。这时孙凤阁二十七团的四个连长是：毕得胜（东扎鲁特旗蒙古胡匪），宋万后（平泉县胡匪）、李鸣远（朝阳羊山民团出身并参加过毅军）和霍清泉。我的三十四团的四个连长是：胡宝山、邹立君（阜新县地主，率领过民团），徐海庭（凌源县喀喇沁左旗蒙人，当过警察）和王庭相（建平县胡匪、王有恩的旧部）。孙寿卿四十一团的四个连长是：陈景春、朱恩武、赵仲九和朱子文，他们都是围场县的地主，由民团首领变成了军官。东北军骑兵十七旅和从前的热河游击马队相较，毅军出身的军官大都离开，胡匪和民团出身的军官，占了很大比重。此外，旅部还保留着未列入编制的好几个独立营，其中仍有尹宝山的步兵营。旅部各处张连同时代的旧人，都被崔兴武淘汰，奉方仍让陈宝泉担任参谋长，傅景峰为参谋处长，副官处长是北路巡防队留下的山东人刘继广，军法处长是天津人唐纳绅，军需处长是当小学教员出身的朝阳人崔景岚（字秀峰），驻承德办事处长是张连同的书记官阜新人李树声。后来这些连长和处长，到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和伪蒙疆政府副主席以后，大都成了伪“蒙疆”的重要军政官员。

汤玉麟在一九二六年发表为热河都统后，即到察哈尔和晋北跟冯、阎作战。临走的时候，让崔兴武给抽一营步兵，崔便打发尹宝山带步兵前去，故尹曾在晋北受伤，回来兵被老汤留下，给了他一个团长名义，派到了刘三胜那里。汤玉麟出征察哈尔晋北期间，热河由他的十一师三十八旅旅长孟昭田留守，并替汤代理热河都统。孟在此时为了收容拢络地方部队，编了一个热河骑兵第一师，自任师长，把刘山胜编为第一旅旅长，赵国增编为第二旅旅长，贾庭骧编为第三旅旅长。赵国增和我们分手时，只有一万多人，我给了黄子勤一些枪马，才帮他编起一个团，另外由宋鸿钧凑了一团人，方把台子搭起。贾庭骧是朝阳人，并且在热河游击马队任过管带，我当兵时他已给朝阳镇守使殷贵担任了外人营帮统，故未曾见面。他可能也是毅军出身，所带的兵除了毅

军旧部，还有不少朝阳民团和土默特部的蒙古胡匪。他的两个团长宝钟华（字揆一）是土默特右旗的贵族，白凤羽（字振彩）是离我家不远朝阳蒙古营子的商务会会长。此时热河原先的几部分地方部队，除了我们毅军游击马队由石香亭率领改编为东北陆军骑兵第十九旅，其他均不存在。曾任赤峰镇守使的张殿如和米振标同时被国民军调往河南，围场县的地主武装头子张鹏飞，一度担任了朝阳镇守使。一九二六年春天奉军和国民军开仗，汤玉麟前来接收热河时，他从朝阳退出，走到七道泉地方被胡匪缴械。

奉军第三次统治热河的时间最长，由一九二六年春到一九三三年春共达七年。汤玉麟从晋北退回改任热河省政府主席，坐了五年多“太平天下”。他的嫡系部队盘据于热河南部，收编的地方部队分驻于热河北部。崔兴武旅后来由开鲁移到赤峰，刘山胜旅驻于林西和经棚，因为围场县的锥子山一带盛产鸦片，那里除驻有石香亭的十九旅，还有赵国增和贾庭骧的两个热河骑兵旅。刘山胜的侄儿刘汉杰，因征收烟款激起林西民变，汤玉麟叫崔兴武在一九二九年春天把这部分人解决。刘的团长尹宝山和丁其昌，编为崔的补充团正副团长。后来崔兴武把孙寿卿撤换，尹宝山成了四十一团团长，丁其昌成了补充团团长。贾庭骧因和石香亭在锥子山逛半掩门子（即暗娼）争风吃醋，石派人把贾击毙，热河骑兵第三旅遂被东北军骑兵十九旅吃掉。赵国增因热河骑兵第一师裁了两旅而撤销番号，先把他编为热河保安总队长，三个团改为保安大队，后来又改称为热河保安骑兵旅。崔兴武的十七旅初是接了刘山胜部林西和经棚的防区，把赤峰让给石香亭的十九旅，以后因辽宁科尔沁部达尔罕旗发生了嘎达梅林的起义，汤玉麟调十七旅和辽宁境内的东北军去联合镇压，我们即由林西、经棚开赴开鲁，直到热河被日寇侵占前夕，一直在那里驻防将近四年。以上是热河游击马队的发展和变迁，也是热河所有地方部队的分化经过。

三 热河地方部队的军官作风

热河的地方部队，多驻于热河北部的昭乌达盟境内。那里距承德好几百里，正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毅军统治热河期间，由于这些部队都由毅军支出，姜桂题和米振标均老朽昏庸，对毅军旧部极力纵容包庇。到了直奉和奉军与国民军战争期间，地方部队更是左右逢源，谁也想争取联络他们，谁也顾不上收拾解决他们。汤玉麟统治了热河后，先是怕这些地方部队被阎锡山和宋哲元拉走，后来又怕他们跟日寇勾通，亦得对他们羁縻笼络。除了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叫崔兴武解决了刘山胜和听任石香亭吃掉贾庭骧，他的三十六师和二十二旅，始终没有直接摇动过热河的地方部队的毫毛。因为这些地方部队在热河存留了二十多年，已经根深蒂固，不仅部队的首脑成了号令一方的土皇帝，而且他们和胡匪与民团联合在一起，如果操之过急，可以暴发民变或其他叛乱。热河的地方部队都驻防在山野草地，和内地的政治集团很少来往，也没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进去，并且这些部队的首脑，都是鼠目寸光，满足于现有的财色货利，故非常封建保守，政治野心并不太高太大，所以还能依附于各大军阀底下，比较相安无事。可是他们在自己防区以内的所作所为，比大军阀头子还不顾脸面。

别的部队的详细情况，我不太清楚。就拿热河游击马队来说，大小军官都可以用“坑兵、扰民、窝匪”六个字来概括。只是程度不同，和方法手段各有各的一套而已。在没有编旅以前，因为有窝藏的胡匪，可以应付点名和前去打仗，各连接编制有六十多个官兵，顶多有三十几个兵可以领到七折八扣后的饷钱。闲员要是当兵，在半年六个月后，才能正式补上名字。可以说，连排长吃一半空额，给管带上缴一半空额；到了管带手里自己截留一半，又得给统领进贡一半。张连同除了用“你没有那么多人

吧”的话语，向管带们明要，并且从各营抽走一哨，组成保卫他的官马队，以征发的官价草料喂马，可以把大部分马干据为私有。到了编旅以后，因为“奉票”和热河兴业银行的钞票价值波动很大，张连同和崔兴武都拿上军饷在开鲁、赤峰两地倒弄买卖。到了钞票跌价的时候，才给士兵们关发。管带有时也拿上钱饷放给投机商人收高利贷息金，两个月以后方到兵们的手中。张连同和崔兴武不仅坑兵，而且坑他们底下的军官。除了三节两寿得给他们送礼，窝藏下胡匪得给他批“好汉股子”，有办法的军官因公出差，有时还得自贴旅费和花销。例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前，汤玉麟叫崔兴武扣胡匪左四点，结果被汤玉书用护照送走。崔派我去沈阳扣左，汤五听见我去追捕，即派卫士把左打死。我去沈阳时给崔兴武去电报要钱，他叫银行从我的存款中给汇来三千块。诸如此类的事，可以说不胜枚举。他们不以治军和战功升迁部下，而视贡品的多寡决定去留和升降。因而张连同率领热河游击马队时，军官多不敢打仗。遇到紧要回合，必须请胡匪给帮忙。崔兴武当了旅长后，凡是他跟前的“红人”，也是些贪财怕死、平庸无能的饭桶和孬种。

至于扰民，暂不谈他们间接扰民，单说他们如何直接危害人民。首先是以“官价”号草号料和征要米面，使人民群众吃明亏。验收草料、米面时又百般刁难，老百姓必须给各级军需人员送“门包”才行。其次对于小地主和小商人，则是扣住胡匪以后给往身上栽赃。张连通的执法官杨正清，是热河有名的活阎王。用严刑拷打捉住的胡匪，非叫供出张连同打算敲诈的地主和“烧当两行”不可。然后把这些土财主提来当堂对质，因为“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只好托人求情出钱，赎此莫须有的罪名。崔兴武当了旅长以后，也惯用此手段勒索“大家”。他在赤峰驻防期间，翁牛特旗有个大财主张义臣，此人和热河行宫与北京故宫管理过古玩姓胡的太监是亲戚，这个姓胡的太监曾用赝品盗换出不少皇宫的珍玩，多寄放在张义臣家中。为此，崔兴武就说张窝藏和

接济胡匪，张赠送了崔兴武一对康熙时的五彩瓷瓶，并暗花了好几万块钱才算了事。热河地方部队的军官，虽然尽干缺德的事情，可是特别爱面子。每次移防的时候，总要让地方上给他们送万民伞和万民旗。张连同尤喜此道，于是上行下效，连长也有人给送这些东西。因为送伞、送旗，又给老百姓加重负担，商务会长以及乡约和牌头，都借此从中捞了外快。

热河的地方部队，可以说是军官莫不窝匪。士兵大半出去为匪，官匪不分。除过穷匪前来“爬风”得贴饭，孬兵出去“要人”给丢枪，一般窝藏下胡匪，对军官有许多好处，不只坐地分赃，而且可以高价出售子弹，到了必要的时候，还能以匪剿匪和雇匪打仗，交待上边派下的公事。张连同更以差官和闲员为名，把小股胡匪好几十人养活在统领部里边，派出去给他打家劫舍。胡宝山那一连人，在未归我以前，经常潜赴蒙古草原，往回赶王公牧主和大喇嘛们的马群，然后弄到承德、朝阳、沈阳、和锦州的马市上出售。崔兴武当了旅长后，也瞒过我把胡宝山叫去给他赶过几次马群。后来胡宝山经我劝告才不做此事。张连同养活的三十多匹名马，由崔兴武给调教出来，每匹均值两三千元），便是从胡宝山给抢来的上万匹马中挑出的。崔兴武在林东的窝棚（即内蒙西部的“牛棚”）有一万多匹马的马群，我投日到了张北，曾一次赶过三千余匹，托刘继广给他卖掉，这也是胡宝山给从草原抢来留下的母马孳生出来的。因为胡宝山和他的闲员都跟过巴布扎布，在各旗都有蒙古流氓做他们的眼线，并且熟悉西喇木伦河两岸的路径，每次出去都是满载而归。

提起抢蒙古草原的马匹，这里需要介绍一下崔兴武吃喝蒙古王公仕官的其它两件事情。我们在林西驻防时，大小两个巴林王因争界发生冲突，把官司打到热河省政府。汤玉麟给崔兴武来电报，叫他就近带队伍前去武装调处。事后那个占了便宜的巴林王，要拿八万块银元谢崔。其时有林西二十家子的大地主，即曾任林西联庄首领韩守礼的叔父韩澹川，加入到东北军骑兵十九旅

里边，给崔兴武担任少校参谋，因为他会说蒙古话，故亦参加了这次调处。韩建议崔兴武要地不要钱，结果巴林王将林东城西北方圆四十里的一片大平川，赠送了崔兴武和韩澹川，做为调处此事件的酬谢。韩澹川非常狡猾，把能上水的十几里东北川归了自己，将不能上水的西北川给了崔兴武，中间辟出两方（每方五顷四十亩）多狭长条子，给了副官处长刘继广，和崔的地隔开，并到林东县政府立了“大照”。崔兴武虽然被韩澹川愚弄，但是得了一片很大的土地。我们在经棚驻防时，崔兴武不知从哪里打听出这么一回事，说是一九二六年的时候，白云梯的党羽乐景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带到热河两千枝苏联造步枪，将三十万发子弹埋在察哈尔省阿巴嘎旗霉坏，把枪分给克什克腾旗二百枝。并且听说经棚街上，在白云梯等组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时，曾帖过打倒王公的漫画，和反对国民党的标语。其时蒋介石的军队正进攻江西苏区，崔兴武借此硬说克什克腾旗的协理宝雅卿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宝雅卿跟我磕头，我知道他和我是一样的人物，我对崔说：“你问宝雅卿要钱，他必然叫旗下摊派，这样就会发生刘山胜在林西激起的那种民变，老汤一定要叫石香亭来解决咱们。据我看来，让宝雅卿把枪缴出就算了。”他听了我的话，没敢向宝雅卿再张“大口”，因为白云梯发给克什克腾旗的枪遗失了一部，宝雅卿把一百六十多枝枪缴给了崔兴武。

张连同带领热河游击马队和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为期将近十五年。因为熊希龄、姜桂题和米振标比起汤玉麟顾全名誉，并且张连同经过好几次，且多在小县分驻防，所以除了坑兵，扰民和窝匪而外，不像崔兴武在汤玉麟统治热河时代，以军饷鸦片为资本，在赤峰和开鲁的金融与粮食市场上，大做投机倒把生意。虽然这样，他带了十五年地方部队，也从热河喝了和刮了最少百万银洋的兵血和地皮。其中包括在承德被国民军弄走第九旅三个月的军饷，在北京被杨宇霆勒去五万，以及被阚朝玺的弟弟阚六借去不还的六万在内。据估计，他脱离部队时家中起码有二十万银

洋存款。此外张连同在北京有五六处房产，大栅栏有一处以他表字协堂命名的“协成祥”商号（他是里边的最大股东，还有后来升任热河财政厅长张子良和热河兴业银行赤峰分行经理石柱祥的资本）。在开鲁有三十方地（合一万六千二百亩），由他大姨太太的哥哥王汉卿给经管。在湖南益阳老家，听说也买下好多土地房屋。张连同在抗战初期仍然活着，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以后，他因自己挥霍，儿子嫖赌，以及协成祥赔钱，财产大部耗尽。所以一九三八年特托宋秉钧和石柱祥前来呼和浩特找我“告帮”，我赠送了他一万元伪蒙疆钞票。后来听说他死后连坟地都没有，灵柩在古庙里寄放，我打算埋葬他的骸骨，因日本投降而作罢。

崔兴武任旅长不到七年，但财产比张连同还多。除了上述在林东的土地、马群，在开鲁有方圆二十里大的一个碱泡子，辽宁黑山和大虎山的商人都来这里贩碱。城里有二十号街基地，一处烧锅和一处“利开银号”，城外的哈拉毛都有五百亩土地和一处烧锅，曹家营子也有买卖。在奈曼旗的盛连村有方圆二十里的一大片土地，和一处烧锅，在黑山县老家，除了有地还盖起两座楼房。这些土地、牲畜，都由他的弟弟们人称为“二大人”和“三大人”给执领，烧锅商号和碱泡子雇用买卖人替他经营。他在赤峰、林西与开鲁驻防时，都兼着这个县的禁烟专员，和赤峰公安局长郭子权等共同舞弊，所贪烟土不下五万余两。他在赤峰耍“钱盘子”时，曾一次赔过四十万省钞军饷，最后在林西把队伍交给我，临走时还拿去二十万军饷。崔兴武不仅有好马，也有小卧车。这部卧车于离开我之后，被巴林旗的蒙古豪强和子章敲去。抗战期间，他在长春当寓公。据日本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对我说，他给溥仪的顾问吉冈忠送了古玩和其他财物，才在伪满的“新京”买下居住权。日本投降后找我，我聘他为顾问，在解放库伦旗的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最后是我买棺装殓，把他的灵柩送回黑山老家。我对国家人民是乱臣贼子，对于这些家伙却是孝子贤孙，因为张连同和崔兴武跟我是一个阶级，我接了他们的衣钵。

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曾喊过“热人治热”的口号。其实他比非热河籍的都统压榨热河人民还要凶。有人恭维他“天高三尺”，实际上是讽刺他“掘地三尺”。因为他头脑简单，听见此话还引以为荣。地方军队的一些首脑，也够上掘地一尺。刘山胜和他侄儿刘汉杰在林西，汤玉麟的五弟汤玉书在朝阳，可以说是掘地五尺。所以这两个地方都爆发了联庄和红枪会的叛乱。汤玉书的情况不悉，刘山胜父子是因征收烟款索要现洋而激起民变。至于贾庭骧在围场，经常有二十辆七个骡子驾驶的大车，给他往朝阳、北票附近的老家倒弄东西。贾的团长白凤羽在贾被石香亭击毙之后，又回蒙古营子当了商务会长。据白亲自告我，贾在朝阳、建平、阜新和北票等地，共有十九处买卖，由白代为经管。热河地方部队的首脑，在自己的防区内，把县政府视为军队的支差机关，虽然不自委县长，但是都统署分派县长及其他行政税收人员时，必须选派和军队有关的人前往。毅军在林西驻防多年，一九二九年我到林西时，那里的历任县长完全是安徽亳州的文人。常得胜在林西购下好多土地，有五、六百骆驼跑买卖。他退休后没有回南方，被林西地主阶级视为地方的耆绅。赵国增虽然不善理财，也在朝阳城边买下八十亩菜园，因为抗战时期他曾跟上孙殿英和马占山混了几天，日本投降后回家，被朝阳的地主阶级选为“参议会”的议长。所以这些人即使不带军队，仍然是可以号召民团和胡匪的地方恶霸。

我所跟过的几个长官，都是表面温和，内心残忍，诡计多端，笑里藏刀，把兵和老百姓视为奴婢牛马。张连同经常摸抚士兵们的头顶，称军官为“我的爱将”，这都是给你灌米汤，叫你打仗时替他卖命。他们做出的许多事却是另一个样子。其暴戾、毒狠的程度，真是骇人听闻。张连同的姨太太和他的本家孙子通奸，居然被他用猪鬃拧成的绳子，在阴户上拉扯处死。崔兴武共有四个老婆，大太太生的未出嫁的姑娘得了水臌症，从林东“高棚”上带来开鲁，叫他给请医师治疗。他受姨太太们的挑拨，认

为姑娘和小长工们私通身怀有孕，有辱他姓崔的门风，就一面叫大太太领上姑娘，先回黑山再去沈阳看病，一面叫孙寿卿几个卫士到半路上去屠杀。孙寿卿打发了一个外号“黑手子”蒙古马弁追到库伦旗的大沙里边，用手枪将母女两个和赶车的车夫完全击毙。黑手子因为好奇，将肚子剖开一看，里边完全是脓水，根本没有胎儿。他们对于自己的爱妾和结发妻子与亲生女儿，尚且如此冷酷无情，对于两旁外人的态度，那就可想而知。由于上梁不正下梁歪，热河地方部队的中下级军官也非常贪婪，并且态度特别蛮横。尹宝山动不动就打老百姓和兵，所以外号叫“尹大马棒”。他跟刘山胜时没有捞着什么，回到老部队没有多久，便在林西二区博立沟西三家村，购买了四十多顷土地。张连同的四个管带，到林西打仗时曾溜走三个，崔兴武的哼哈二将孙寿卿与孙凤阁，也因私囊肥满将他甩开。

最后说到我自己，亦非善良之辈。我二十七岁当兵时，基本上还是个“土包子”。因为得到张连同的默许，曾傻头楞脑地当了四年多官胡子。可是一九二二年升为连长后，由于到了三十而立之年，便一天比一天老练和世故起来。觉得在那个社会里边要想掌握一部分人马，在最初阶段绝不能贪财怕死，这样部下才会跟你，长官才会用你。等到羽翼丰满后，自然有人替你接钱卖命。到了这个时候，也就能贪财了，也就不会死了，我首先是结交朋友，谁要跟我换帖，我都不拒绝，我不仅与军官和胡匪磕头，并且也跟商界、政界与地主、牧主里边的人拜把子。后来虽然不能说是朋友遍天下，但是“朋友”也布满了热河北部十几县的各个阶层和角落。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得意和遭受排挤的人，我越发跟他们表示亲近。例如阙朝玺派陈宝泉和傅景峰到张连同的第九旅，在吃饭的时候受萧子杰和杨正清这些人冷嘲热讽，处境非常难堪。我就叫赵国增把他们欢迎到第二团，和他们磕头结拜，陈宝泉便成了我的军师。有一次唐精武和乌古廷（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给汤玉麟任少校副官）来林西检阅队伍，我那时是上校团长，

他们一个是中校一个是少校，提出要跟我换帖，我不怕降低身份和他们两个磕了头，所以乌古廷在我组织伪“蒙古军”时，成了我很大的帮凶。

我不仅结交各行里边的“状元”，也结交鸡鸣狗盗之徒。“状元”固然能给我充当“智囊”，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做我的爪牙。我并且标榜绝不任用亲属和同乡，尤其不分民族畛域。拉扯起关系来，宝贵廷是我的一个小舅子。我当营长后他来找我，我先把他在营里担任司书，后来感觉不妥当，便介绍给赵国增，由赵国增把他保送到东北讲武堂。他是因为跟了德穆楚克栋鲁普，才成了伪“蒙疆”的要人。我的侄子李景阳，在我升了团长后跑来求官，即把他打发到尹宝山那里叫下棚子当兵，尹宝山过意不去，叫他担任了团部的卫士。我在热河的时候，也娶了小老婆，并且经常狂嫖滥赌。我当连营团长的时候，每次打仗都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任何危急的时候，都不能把兵扔掉。缴获了战利品一半分给官兵，一半缴给上级，自己决不沾染。所有这些无非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我那时不仅不知道中国的历史，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些小说也看不懂，可是经过在热河地方部队的体验实践，加上比我聪明的朋友给我开动脑筋，已经能模仿小说上的人物了。

在热河被日寇侵占前，我除了在政治上“盗亦有道”，在经济上亦有和别人不同的生财门路，我另拟专题叙述。因为在旧社会，钱能通神，有钱可买鬼推磨，交朋友起码要酒要肉，套耗子也得油灯捻。我自从担任连长后，即改变了从前的办法，再不做没本钱的买卖，而是利用职权做有本钱的买卖。由贩运烟土着手，继而倒卖碱盐米面，最后发展成可以操纵赤峰和开鲁两市场吮吸人民血汗的官僚资本家了。我曾以五百两大烟土，在开鲁买了十顷土地，后来以一万块钱洋卖给汤玉麟管理“窝棚”的谢虎臣，又添了八千块钱洋，在官银号村买了十六方地（合八千六百四十亩）和张学良的“窝棚”成了隔畔种地的邻家。我那时除

了能联络赤峰的商界，将把持赤峰商会多年的杨裕文（宋哲元向他耍过三十万元现款，他向赤峰商家摊了六十万）推倒，把我的磕头弟兄李瀛洲选为商务会长。李瀛洲和孙咀子的天主堂斗“钱盘子”，一次赔了八十万现洋，我能在一夜之间，请许多商界的朋友给他凑了四十万。我到了开鲁也是如此。有一次居然能将开鲁全省的省钞，大部调到阜新，卖给老百姓缴纳了全县的田赋和烟款。我在经棚驻防时，经棚最大商号“庆德正”（山西帮，二百多年历史的字号，外蒙独立时有四百多夥计被留在库伦未回）的经理郑培芝，闻名特跟我换帖结拜，并让我参观他的秘密银库。我在市场上，周转灵活，富商跟我关系深厚，我自当官以后，热河北部的富商大贾们即不以“官胡匪”头子看我，而认为是他们的保护者。

崔兴武是扣住军饷不给官兵们发，我是做投机倒把生意给官兵关饷。有一次崔兴武看见热河省钞要涨，把领下的四十万军饷放在赤峰的银号中生息，我从这家银号中把此笔钱借出，除给兵们关了饷还做了其它活动资本，我赚了一个不亦乐乎，最后拿两千块现洋买了四十多万钞票给他还了帐。他以为钞票快要变成废纸，所以向银号要现洋不要钞票，结果又被我用现洋套走。当崔跟汤玉麟打麻烦的时候，汤叫他把旧钞缴上换取新钞，弄得没有了着落。因为热河北部各县的电报局长都是我的磕头弟兄，李树声被崔派驻承德，却是替我办事。所以我的消息特别灵通，加之有李瀛洲等给我参谋，所以在这场“商战”中，把崔兴武打了一个落花流水。因为我用杀人不见血的办法争名夺利，虽然和胡匪没有断绝关系，但是我与张连同和崔兴武比较起来，就显得不过于坑兵扰民了。我在热河地方部队当官时，弄过的钱并不比崔兴武少，当投日的时候，只剩下两万块现洋和六辆七骡大车，其余的财产全在热河北部购买下潜在的势力，做了我成为战争罪犯的本钱。所以日本人要利用我，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还要利用我，这就是我比张连同和崔兴武那些人们更加反动和更加危害国家与人民的原因。

奉军与国民军战争中我随奉军 进攻察北的回忆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季，奉、直、晋三系军阀联合进攻驻防于察绥两省的国民军时，我曾率领由热河游击马队改编为奉军别动队的一个骑兵团，由经棚出发，经过多伦，参加了奉军与国民军争夺独石口外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战役。因时隔四十年，作战的准确日期，已经想不起来了。

热河游击马队，在一九二四年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不久，即归附了奉军。起初编为骑兵独立第九旅，由张连同任旅长，我系二团赵国增属下的营长。后来编为骑兵第十七旅，由崔兴武任旅长，我任三十四团团长。由热河到察北作战是崔兴武带我们去的。由经棚县开拔，先到达多伦东南七十里的峪道口。奉军第六军团长吴俊升在那里担任进攻察北的总指挥。出动的部队，除了奉军嫡系姜向春步兵旅六千多人，穆春骑兵师三千多人，和由科尔沁部蒙古人“郭蒙古”担任团长的一团炮兵外，便是崔兴武骑兵旅的一千五、六百人。崔兴武旅因归附奉军不久，且装备窳劣，出发时编为这个兵团的别动队，担负扰袭任务。可是占领多伦和攻打狼尾巴山时，就成了右翼，由狼尾巴山撤退时，则成了后卫。

我们这个部队由毅军分支而出，以后随毅军归属了直系，后来又归附奉系，是因为二次直奉战争直系失败，另找的新主。奉军从经棚调我们到峪道口，连军饷都没给关发，从峪道口向多伦开拔，子弹亦未予补充。因此，我们离开经棚时把好枪好马压下一部，由后来编为二十七团的团长孙凤阁留守，以备失败回来，不

至于没有着落。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是各怀鬼胎。由于我带的多是蒙古的“马鞑子”和汉族的胡匪，我不是崔兴武、孙凤阁和孙寿卿的基本人，所以崔兴武叫我担任前锋，他掌握着两个团在后边观望，不愿投入战斗。我带的六百多人，一半是蒙古兵，大都没有带枪，而是拿着套马杆子，打主意要在两军交锋时，寻找机会拣枪拣马。奉军的嫡系部队亦不协同一致，穆春的骑兵只顾在沿途抢掠，军官都贪生怕死，在步兵进攻时，按兵不向左翼迂回；在步兵退却时，却一马当先逃跑。如果不是我们给掩护，几乎把一团炮兵丢掉。所以狼尾巴山战役，奉军被打了一个稀里哗啦。以后穆春骑兵师由北路首先进入张家口，是因国民军由于南口失守主动放弃察北的缘故。

国民军为了缩短防线，集中兵力保守独石口外的沽源县城，在多伦没有置兵防守，所以被穆春骑兵师未发一枪而占领。多伦是口北的商埠，并且是内蒙喇嘛教的“圣地”。当地的商务会和寺庙中的活佛，知道奉军纪律很坏，恐怕遭受洗劫，预先就筹备出大宗款项，放在商务会，让奉军的高级军官拿去，好叫他们制止部下，不在街上和庙上随便乱抢。攻占多伦时，我们别动队在穆师右侧掩护。穆师进入多伦没有停留多久，兵们打开商号吃了一顿“四个碟儿下饺子”，小偷小摸了些东西，即向沽源方向推进，把防务暂交给崔兴武旅。崔不许我团进街，让我去占领多伦和宝昌中间的黄旗大营子，他却被欢迎到商务会里，从那里拿了五千块银洋。不知多伦商务会给了穆春和他的旅长、团长们多少。崔兴武出发时带着一辆二骡轿车，因为向商务会拿钱，既怕奉军知道，又怕自己的部下发觉，故由他的副官陆锦堂一个人往车上搬运，车停在多伦街外，每次只能搬一箱，据陆给我说，每箱装现洋一千元，重达四十五斤以上，由于他嫌劳累和奉军姜向春的步兵旅就要进城，所以没有全数搬完。以此估计，多伦商务会给奉军的将级军官每人准备了一万块银洋，那时多伦还很殷富，商家担负十万、八万不成为严重问题。

崔兴武把多伦城防移交给姜旅，带着两个团也到了黄旗大营子。第二天叫我团朝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方向搜索，他在后边跟着前进。穆春骑兵师是从多伦的正路去攻沽源，出发时间比我们提前一天，因为迟疑徘徊，不敢往南深入。黄旗大营子在多伦正西七十里，我们向东南走了五十多里，在多伦、沽源中间骆驼山的蒙古寺庙上打起尖以后，穆师的人马才到达。穆师在多伦没有大抢大掠，到了这个庙上，士兵听见当大官的拿了多伦商务会的钱，便自由行动起来。我看见他们拷打喇嘛，在仓里乱抢东西，用刺刀剖开佛像的腹部，从里边掏取财宝。我的队伍赶快离开，走出十几里点名时，发现丢了六、七个兵，我叫队伍停下等待，一面哨探前边的情况。不久那六、七个兵，每人赶着好几匹马跑来，说是穆师的兵在骆驼山庙上抢马，因为他们没方法套马，便叫我的带着马杆子的兵，帮助他们套马。一共圈住四、五百匹，我的兵也拣好的套了二十多匹。后来这个寺庙的大喇嘛跑到峪道口报告了吴俊升，吴又转报了张作霖，奉军占领张家口后，张学良就是因为查究此事，激起穆春师的兵变，几乎把他打死。

我的队伍前进到狼尾巴山二十里的地方，发现了国民军的骑兵。我的那二百多手持套马杆的蒙古兵，由胡宝山营长率领，在后边的步枪掩护下，弯腰骑马往前冲锋，把这一百多敌人包围，拿起套马杆子就套，将跑不了的三、四十个连人带马完全套住。胡宝山的连长宝俊山，看见里边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马褡褙里鼓起钞票的楞角，走到临近将这个人用杆子挑起，由自己的马上跃到了那个人的马上，使周围的兵都叫了好。原来这个人是谁（汉名宝振荣，热河克什克腾旗蒙人，原先带领胡匪在经棚、多伦、围场三角地带活动，宋哲元到热河后把他收编）的军需，他一共带着十几万西北银行的钞票。其它被套住的兵，也都带着不少钱。我没有顾上盘问他们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些巨款，把枪、马、钱留下，人完全放走。后来我们退回经棚，以五元折合银元一元，完全换给商人。因为那时张家口仍在国民军手中。我们“拣

洋捞”的地方，已经看见了狼尾巴山，根据俘虏供称：“山上有宋哲元的步兵防守，构筑有坚固的工事。”因为后续部队没有到达，我便停止向前搜索，把队伍带进大路旁沟中的一个天主教堂内，当天就在这里宿营。吃过饭太阳还没有落，狼尾巴山在夕阳西照下看得更加清楚。我站到高坡上观察狼尾巴山的形势。这座山是一个由东到西的大山的末端，大山的坡度很大，中间有三、四里长的一段凹坡，凹坡以西又隆起一座小山，小山接连着平滩，绕过凹的下边又隆起的山尾巴，再走二十里路，便是沾源县的县城。沾源被狼尾巴山挡住看不见，西南方向有一个树木很稠密的地方，便是平地脑包镇。

对于当时奉军进攻察北的整个部署，我不全盘了解。只知军团长吴俊什，不仅没有走上狼尾巴山前线，连多伦也未曾进驻，而一直在峪道口用电台发号施令。也许奉军还有一路，从大阁镇向赤城龙关推进。进攻狼尾巴山是在第二天拂晓开始，弄不清楚是穆春指挥姜向春，还是姜向春指挥穆春。当步兵和炮兵跟国民军干开了，骑兵主力停在后边不动。这是由于穆春部在通辽驻扎多年，军官都成了养尊处优的大地主，看着步兵在冒死战斗，他们却在一旁坐观成败。另外，穆师的士兵，沿途进村翻箱倒柜，将马放在村边随便吃农民的青苗。察北都种着莜麦，那时已经半熟，奉军不知莜麦吃下去涨肚，遂把好多马匹涨死，三千多骑兵一半变成了步兵。骑兵配合步兵，迂回狼尾巴山西端，本来应当是穆师担当的任务，结果叫崔兴武的别动队去执行。崔旅集中在狼尾巴山西端小山对面的小土山上。小山上是荣三点的骑兵，崔兴武叫参谋长陈宝泉带上我那一团去攻，他也不向右侧迂回。因为我当过胡匪，兵们跟上我抢到东西以后，我从来没向兵们要过，所以崔兴武本来想叫我团单独进攻，结果连他的卫队营也跟上去了。他只掌握住一半人停留在小土山上看热闹。

荣三点的骑兵也是由胡匪编成，射击技术很高。我从山下向山上仰攻，要是硬冲，牺牲太大，便叫队伍从山下向西开动，做

出朝这个小高山背后包围的姿态。我边往西走，边观察敌人在山上的动静。看见敌人也往西移动，企图切断我们的迂回。这样在东边敌人步兵和骑兵接连的地方，就露出了一里多长的空隙。这时我猛然把马头往回一拧，便从此薄弱环节冲上了山头，把荣三点的两千多人都甩到往西倾斜的坡上。他们沉不住气便退，我跟着就往沽源追击，过了狼尾巴山是一道平川，不大一会就追到城边。因为孤军深入，不能把沽源包围，只能占领城东接连大山的高地，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国民军因为奉军的别动队已经兵临城下，突然从北门外开出两辆小卧车，大概是重要军官到狼尾巴山去督战，车开的速度很快，没有被我们打住。荣三点看见我们只冲过来不到一千人，便把队伍整顿好，在沽源县城外，展开反击。

这时是半前晌，我们八百多人分别占领着三个高地。北面是崔兴武的毕得胜卫队营，当中是我带的两个营，南边是我困吴凤营长那个营。荣三点把我和吴凤的联络切断，主力全朝我冲来，最后打开了交手仗。有一个郭连长阵亡，张连长受了重伤。我叫参谋长陈宝泉领上毕得胜营先退，掏出手枪朝着敌我混在一起的天空，放了好几排子弹，我的兵听见这一信号，便和荣三点的兵分开，跟上我向南猛冲，往出接吴凤那个营。敌人知道套马杆子的厉害，便放松了包围，我便把吴营接出。荣三点看见很难把我吃掉，还是抢夺狼尾巴山西端的小山要紧，便分出一半人去抢占山头。因为我们旅长不仅没有跟上我前进，连我攻下的小山也未上去占领，遂被荣三点的兵一拥而上占领了小山。我只好绕过小山回到对面的小土山。我们崔旅长见我损兵折将回来，连说了几声“对不起”。此时天已过午，狼尾巴山前线的奉军，形成了穆春的骑兵在后边蹲着，崔兴武的骑兵在右边站着，睁着眼看姜向春步兵挨打的不利形势。

姜旅作战相当勇敢，一开始便把国民军步兵的头道战壕突破。但因为孤军作战，以致死伤了七、八百人，还攻不下国民军的第二道战壕，在那个凹地坡上来回拉锯。我们在三里外用望远镜观察，

看见灰茫茫地倒下了一片死尸。因为荣三点的骑兵重新占领了小山，国民军在狼尾巴山已无后顾之忧，步兵阵地愈发稳固，炮兵也开始个了猛烈的还击，并叫荣三点的骑兵，从小山下来抢我们占的那小土山。崔兴武看见来势凶猛，便借交涉子弹为名，带着卫队到后边去找穆春。虽然荣三点迂回的骑兵被我指挥的部队赶上小山，但我们子弹已快用光，崔向穆春只领了五百发。半后晌步兵从狼尾巴山退下，穆春没马的骑兵，瞭见步兵潮水一样退下，都爬上补给马车逃跑，将车上的子弹和炮弹箱子完全扔掉。我们便跑在狼尾巴山北面的平滩上，先拣开了抛下的子弹箱子。奉军退却时是骑兵在先，步兵在后，将炮兵丢到最后，没有掩护部队照管。狼尾巴山到多伦途中，尽遗弃着穆春骑兵师被莜麦涨死的战马以及其它军用物资，景况狼狈到极点。我们“拣洋捞”拣了一个不亦乐乎。便离开大路躲入攻击以前宿营的那个沟中，看看情势再决定下一步行动。

国民军在奉军撤退时，当时没敢跟踪追击。等到丢在后边的炮兵走出二十多里，到达我们所隐蔽的山沟附近，追兵才赶上来。奉军“郭蒙古”的炮兵，看见我们在那个有教堂的沟中，也把驮骡赶到里边，请崔兴武保护。这时荣三点的骑兵从山上窜过，宋哲元的步兵由平川跑来夺炮，这个有教堂的山沟小村，便被国民军包围。我把三个大院中的一个大院让给炮兵往进赶驮炮的骡子，没等把骡子全赶进去，手持大刀 of 国民军步兵也跟着拥入那个大院，同时荣三点的骑兵把山坡上的教堂占领。崔兴武和“郭蒙古”问我怎么办？我叫崔兴武带上人去夺教堂，我指挥我的带套马杆子的蒙古兵去对付国民军的大刀队。其实在这个山沟中，施展不开套马杆子。因为国民军的步兵的大刀探不上我们的兵，加之来的是先头部队，便被我们一阏而赶跑了。我紧接着叫“郭蒙古”赶快卸下骡驮子，朝山上和沟外的平川开炮。国民军的后续步兵以为这个沟中预先设有奉军的埋伏，才纷纷朝后撤退。崔兴武夺了教堂，一直把荣三点的人赶回狼尾巴山。入夜后，骑兵和炮兵合在一起，趁黑往多伦撤退。路过多伦南边三十

里地的分水山，崔把我留下断后，他要保护炮兵撤退，好到吴俊升面前报功。我知道崔兴武随时随地在耍弄我，恐怕被他“甩了爬子”（胡匪的黑话，就是遗弃部下的意思），所以让我的连长李鸣运也跟上他出发，做为我的“座探”，必要时，给我通风报信。

我当夜在分水山布防。前后一点动静都没有，等到第二天半前晌，李鸣运才雇一个庄户人，给我送来一封信，说他和旅长到了多伦没有停留即退往峪道口，让我也经过多伦到峪道口和他们会合。并说这一封信，是他背过旅长给我写的。我到了多伦城边，看见庙仓和街市中间，二里长的空草滩上，牧放着五、六百匹军马，多伦街上鸦雀无声，商民的屋顶冒着烧饭的炊烟。我心里很怀疑，不知这五、六百匹马是那一部分的。所以除了我的兵中有几个回民要到街上去吃清真馆子，其余的蒙古兵和汉族兵，都被我带往庙仓。我一入庙仓，喇嘛慌张地向我报告，说奉军已于夜间完全撤走，一清早荣三点就进了多伦街。不大一会儿，进去吃饭的兵也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这时荣三点的人已经发现了我们，因怕把他们的马群打乱，故没敢向我们开枪，只是派人往回赶马。我因和大队距离过远，没有顾上夺他的马群，从庙仓上下来，排着队由多伦街前边的草滩上开出。走到多伦城东南二十里的公积淖尔，那里有二、四十个荣三点的警戒部队，从山上朝我们射击，我正准备冲上去，回头一看，荣三点的主力由多伦出动，分成两路向我们兜抄。我知道多伦以东是荣三点当胡匪时的活动区域，在此一地带和他打仗不易沾光，不如脱离战斗，不去峪道口，回经棚休息。同时多伦到峪道口途中，已经被退却的奉军洗劫光，反正我等于被崔兴武遗弃，擅自跑回经棚，他也不能把我怎样。遂从公积淖尔折回西北的鄯丹河，使荣三点扑了一个空。因为我也熟悉这一带的路径，所以没有被他的骑兵把我给黏住“焊上”。

荣三点的骑兵共有三千多人，分开好几股活动。在多伦以东

沿途设卡，截击东退的奉军。我走到鄯丹河，遇见他的三十多个跨红十字臂章的兵，被我包围将枪马缴下，人完全放走。走到多伦、经棚中间，距多伦七十里的半截子店，在那里又遇见荣三点的二百多人，我不敢硬打，绕到西北的沙漠里。入了荣三点当胡匪时的窝巢，所以叫部下特别提高警惕。第二天早晨大雾，那里有当地的四十多个胡匪，想乘雾摸我们的枪马，因为我们防备严密，结果胡匪反被我们包围，到天明一个也没跑脱。我仍是将马留下，把人放走。这次随奉军出征察北，虽然在沽源城外损失了二十多个人，但是发了十几万财，得了一百多匹马与八、九十支枪，拣到的子弹，马都驮不动，整个奉军是丢盔卸甲，我却有很大收获。使我最痛快的是我跟荣三点较量了一下高低。我们欢欢喜喜地回到经棚的时候，崔兴武的留守团长，以为我把旅长扔掉，还打算闭门不纳，一看留守的官兵和克什克腾旗的协理宝雅卿都出城外欢迎，他也跟在众人后边和我握手道了辛苦。我回经棚给崔兴武去电，崔从峪道口回电说了一些抱歉的话。不久他带着那一半人，也由峪道口回到经棚。吴俊升因为在狼尾巴山战役失利，对穆春恼恨已极，认为崔兴武把炮兵护送回峪道口，付出很大牺牲，所以二次进攻察北时，没有叫崔旅前去。至于穆春如何又占领多伦，以及奉军最后怎样进入张家口，因为我没有参加，故详情不得而知。不过穆春部抢掠骆驼山寺庙，后来被张学良枪毙的那个于奉林团长却与之有一面之识，于曾在通辽颇久。一九二四年我们在开鲁归附奉军不久，他和我的团长赵国增是朋友，所以叫我们到通辽去玩。我跟赵在子的公馆中住了好几天。他共有八个姨太太，都在通辽女子师范上学，每天用华丽的马车一对一对地接送。于和通辽附近的莫林庙的小佛爷结拜，一共骗了该庙一千多方（每方五百四十亩）辽河上游的好地，他公馆里的陈设，内地的军师长都不能比拟。奉军把这样的军官调到察北艰苦的草地去跟英勇顽强的国民军厮杀，怎能不打败仗？

我镇压嘎达梅林起义部队的经过

嘎达梅林，蒙名老嘎达，是哲里木盟达尔罕王旗（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带兵梅林，汉名叫孟青山，所以又称为孟梅林。他因反对出放蒙地，惹本旗王爷恼怒，将他关在土牢里，准备捏造罪状，把他处死。嘎达有两个老婆，二的名叫牡丹，会使手枪。她联络了四五名亲属，打开土牢将丈夫救出。从此，嘎达被王爷逼上梁山，便组织了许多牧民，展开武装斗争，震动了整个科尔沁部和辽宁热河边境。由于牧民缺乏革命经验和战斗装备，必须联合马贼①来对付王府的“小队”②，难免有不少坏分子被吸收进去，将牧民起义的性质变成流寇式的活动。嘎达无法制止，最后被我指挥的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全部歼灭。

此事发生于何年何月，我已记不清准确时间。战争的结束，则记得是一九三〇年农历二月二十日。那时张学良已经继他父亲张作霖统治了东北四省。他和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都站在王爷一边。所以嘎达起义以后，辽宁派张海鹏部骑兵由洮南向西追击，热河电告驻防开鲁的第十七旅崔兴武部到鲁北从东防堵，以期把嘎达的部队包围解决。我那时任崔兴武部三十四团团长。这一年冰雪很大，崔旅长养尊处优，不肯亲自出动，四十一团团长孙寿卿在开鲁装病，根本没有随军前往，二十七团团长孙凤阁，到了鲁北也躲在烧锅房（酒坊）图舒服去了。因为我好大喜功，这三个团骑兵共一千多人，全归我带领指挥。我那一团人是由马贼和胡匪组成的。嘎达梅林遇见我这个对头，不仅全军在热河的扎鲁特旗遭到覆没，连他本人也被我亲手击毙在北老哈河里。

嘎达梅林的队伍共有七百多人。他们因为被张海鹏压迫得

①马贼——旧中国时东北的蒙族土匪。

②小队——旧中国时东部蒙旗衙门或札萨克的武装。

不能在科尔沁部存留，企图沿着草地畔子，在热河北部大小巴林旗的坝前整休。坝后下了四五尺深的大雪，察哈尔省乌珠穆沁旗的牧民赶着牲畜和车辆，在坝前支起帐幕放牧。乌珠穆沁的牧民相当富有，携带着大量的白面、炒米。嘎达梅林计划利用这一部分给养，在那里度过严寒的冬季。张海鹏部，饷粮非常充足，官兵都不愿吃苦受罪，将嘎达梅林的部队赶到达尔罕旗的草地即停止前进。崔兴武部是由热河游击马队编成，是东北军中的游杂队伍。官兵都想利用打仗发财，所以越省进入达尔罕旗北部。我从鲁北出发时，判断嘎达梅林必然要采用民国初年的“蒙匪”战术。在他们被张海鹏部赶到草地畔子被我部堵住以后，即紧紧“焊上”跟着不放松一步，形成他们做熟饭，我们赶上去端碗，使他们没有喘息的余地。否则，他们空室清野，我们找不到食物，便会越追越远。

达尔罕旗和热河东北部的几个蒙旗，地形越往北越宽广，越往南越狭窄。由于北面的牧区人烟稀少，牧民听见嘎达梅林的部队过来，恐怕抓人赶马，都将蒙古包移到南边的农业区。农区均有地主武装，听说我们仇视汉人，都以“联庄”（各村联合）的形式开出民团戒备。因此嘎达梅林队伍只好在中间的半农半牧区，南北有四五十里的空间地带由东向西流动。在一个名叫土列毛都的村子附近，我们把嘎达梅林的队伍截住，经学堂地（村名）和东西巨勒克（村名）往西直追。一白天追越了五个旗的境界。追到林东北面以后，我感觉这样追不是办法，因为他们能赶牧民的马群，骑累了可以更换，所以跑得很快，这样他们必然会走脱。同时我知道乌珠穆沁有七八百“小队”（王府保安队），在大小巴林旗的坝底下保护牲畜，绝不让嘎达梅林的队伍过去就食，一定要进行抵抗。我不分昼夜追了三天，官兵都把手指冻坏，腹部全冻成铁青，很难再追到大坝底下，同乌珠穆沁的“小队”夹击他们。于是决定转进土列毛都，以逸待劳，等他们从坝底碰壁回来，再在这个地方将他们一网打尽。

嘎达梅林被我追了几天，以为我一直在他们后边跟着。当他们在龙头山被乌珠穆沁的“小队”顶住，不得不由西向东折返。因为来时的路上已经抢掠一空，又怕碰见我的队伍，于是朝北沿着牧区的边缘退却。嘎达梅林的队伍走到土列毛都附近，由于周围再没有村庄，两条路在这里归到一起，必须进村休息。我撤至土列毛都，对外进行了严密封锁，所以嘎达梅林不知我们驻在这里，冒然走进我的埋伏圈内。当时正是半前晌的时候，我瞭见一片黄尘底下来了一千多穿着汉族妇女红绿衣裳的“乌合之众”，以扇面队形向土列毛都跑来。走到临近，我朝天打了一排手枪子弹，士兵全上马追击，一口气冲了七十多里，在东巨勒克川把他们打散。除沿途被击、毙俘虏的二三百人外，一些徒手的被东巨勒克川的农牧民用铁锹劈死。马匹东西被我们卤获，士兵们拣“洋捞”（发洋财的意思）拣得忘了寒冷。

中午，嘎达梅林利用我们打尖的时候，把剩下的二三百人都集中在一座小土山上，准备进行抵抗。我们吃过午饭，用两门重迫击炮轰击，骑兵跟着往上冲锋，嘎达梅林的大太太被炮弹打死，他们连尸体都没顾上携带，即仓皇退去。我们继续追了七八十里，天已经昏黑，我叫手下最能打仗的胡宝山（跟过巴布扎布①）连长，在野滩上笼起好几十堆野火，其余三个团的兵，吃干粮和歇马。我知道嘎达梅林白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绝不肯善罢干休，黑夜一定前来摸营，故布了这种疑阵。果不出我所料，后半夜他们突然冲来，胡宝山的兵在火堆附近打，隐蔽的兵从外边包围，打死了一二百人，其余的人各自逃命，突围以后互不掩护，到了天亮以后，大都沿途四散，我们一直追了二百多里。嘎达梅林只带着四五十人，朝南面败退，连那个名叫牡丹的二太

①巴布扎布——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现为阜新县，属辽宁省）人，民国初年，聚众为匪，响应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称帝，窜扰东北，与日本特务勾结，参与“宗社党”活动，后在攻打林西的战斗中阵亡，所部溃散。

太，也被扔到一个牧民家里。胡宝山走进去见她的脸部和我们一样冻得铁青。经过恐吓，她说了实话，便被胡宝山带上做了老婆。后来我投降日本担任了伪蒙古军总司令，胡宝山跟着我升了团长，牡丹给胡宝山在呼和浩特生了一个男孩。胡宝山在宝昌死后，她下落不明。

我带领着部队紧追嘎达梅林残存的四五十人，始终没让他们走脱。他们进入农业区，被民团打得无法进村，只好忍着饥寒落荒而走。我的一千多骑兵对他们越包围越紧，最后把他们围到达尔罕旗舍伯吐北的洪格尔敖包的老哈河边。因为我的马快，带着十几个卫士跑到河边把他们卡住，令队伍往上兜捕。其时正是开河时期，老哈河里流着冰排，嘎达梅林一看冲不出去，便骑马泅水过河。我下了马和我的张副官爬在一个土埂上，叫士兵给装子弹。我俩用步枪一替一枪地向这四五十个人射击，一共打死二十多个，泅上岸的有二十多个。打死的有八具尸体被马拖上对岸，其余均被冰排冲走。我看见泅过河的二十多个人聚到一起突然折回，知道一定是嘎达梅林没有安全泅过，他们冒死前来接应。我的兵也有十几个骑马跑进河里，有一个被冰排冲走，其余都泅到对岸，还有不少的兵也要泅过去，均被我制止。接着泅过河的兵和原在河北岸边的兵，一齐向这二十多个人开枪，他们不敢前进也不后退，似乎在等待什么。我在河南吆喝着过了河的士兵，将八具尸体上的人头完全割下，用刺刀挑了起来，这二十多个人才向东南退去。

因为有十几个兵搁在河那边，我很不放心，我叫他们带上人头和大队隔岸顺河而走。走到有渡口的地方，找了俩只渡船，放下去也被冰块打碎，后来走到河宽水浅的地方，因为天已黄昏，决定第二天由此处全军泅水而过。我便带着大队和过了河的十几个兵，在河谷的冷风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从这个水浅的地方一齐安全渡过。经过达尔罕旗的一个部队的住处，哈丰阿的父亲滕海山在那里当队长。他代表该旗的王爷给我们准备下肉面，叫我们

在那里吃饭。我在东巨克勒川捉住嘎达梅林的一个小兵，原来是滕海山的差人。因为回去探家，被嘎达梅林的人裹到里边。他怕我带到开鲁枪毙，看见滕海山就哭。我把这个小兵交给滕海山。这个小兵告诉我，八颗人头里有一颗镶金牙的，便是嘎达梅林。滕海山过去认了一认，也说是嘎达的脑袋。我以前把嘎达领的人当成是“蒙匪”，所以死命追剿。听见滕海山说是反对王公的起义部队，感到非常后悔。

我把人头带回开鲁交给崔兴武。崔认为奇货可居，用木匣装起交给汤玉麟，汤送到沈阳交给张学良，张交给达尔罕王爷，在旗下悬挂了好长时期。我们那个军队，打仗时谁拣来东西归谁，士兵们共拣了三百多枝枪和四千多匹马。

我是怎样从“马贼”到汉奸的

(一) “九·一八”事变前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沙俄，乘机侵夺了我东北三省不少权利，并派遣特务潜伏于内蒙东部各旗，派遣所谓“中国通”的日本人训练蒙、汉间谍，对内、外蒙古开展了特务活动。民国初年，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机会，授意逊清遗老组织“宗社党”，进一步勾结一些蒙古实力派，做为其实现“满蒙政策”的工具。

内蒙古东部区胡匪猖獗，蒙古牧民中，也有人成了骠悍的马贼。哲盟科尔沁部与卓盟的喀喇沁部以贡桑诺尔布为代表的王公，倾向日本，聘请日本人办警校，训练警察，派送青年到日本留学。这样在内蒙东部区不仅有敢于兴风作浪的马贼，也有了亲日派的知识分子，所以东部区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分裂祖国的政治活动，表现得很突出。

热河境内除巴布札布由马贼变成受日本利用的“宗社党”骨干而外，不少王公旗官和活佛、大喇嘛等，也同日本间谍、特务取得了秘密联系。如大巴林旗的王爷就经林西“东升泉”烧锅（酒坊）经理、汉奸曾纪纲的介绍，于民国初年以六十万两银子，把林西黑山头的大面积荒地卖给日本人，并把一个日本大夫小桥留在林西，利用“东升泉”地址，改建为医院，小桥以看病做掩护进行特务活动。另外阿鲁科尔沁旗爱根庙的活佛萨布楞，也跟日本早有勾搭，在佛殿中藏有大批日本武器，联络胡匪、马贼，伺机起事。这个活佛于一九二二年秋天，就试探过我。可见热河沦陷前十几年，就已经有人把我看成为第二个巴布札

布。

一九二二年，我在张连同的包底下，领着一帮汉族和蒙族的胡匪，创立起“信”字号拉“杆子”（土匪伙子），在热河北部各县当胡匪四年。这年年初，因巴布札布余党所率的“蒙匪”进犯开鲁，热河游击马队将我收编为一个骑兵连奉命开赴开鲁前线作战，春天收复了开鲁县城，打败了“蒙匪”。夏天队伍到建平驻防，我从连长升为营长。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热河的地方部队群起驱逐奉军，我那个营在赤峰高粱杆子店解决了汲金纯部的一团炮兵，夺获了八门新式德国野炮。当时“直系”的热河都统米振标调热河游击马队防守开鲁，我营在开鲁爱根庙驻防，故和萨布楞活佛认识。爱根庙拥有大面积的土地和成群的牲畜，萨布楞活佛让我的营部扎在他的庙仓里，每天请我吃饭。后来提出要和我换贴，我便和他同包种庙地的三个大地主，摆斋案磕了头。我的骑兵营，由胡宝山（蒙名鄂莫格图）给我带领蒙古士兵。胡宝山曾跟随巴布札布多年，和萨布楞活佛认识比我在前，爱根庙私藏日本武器之事，他早有所闻，便借口爱根庙私藏日本枪枝之事，敲诈萨布楞活佛。萨布楞给了他快马十一匹和大元宝七个。胡把快马卖掉和元宝花完，又找萨布楞要钱。萨布楞见胡宝山贪得无厌，想叫我设法制止，便对我泄露了一些他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事。

萨布楞活佛承认，日本确实给阿鲁科尔沁旗偷运来五百枝步枪和十万发子弹，因为王爷胆小怕事，放在爱根庙里存放。并说日本人还给他一张联络执照，拿上它可以在南满铁路免费坐车，吃饭也由车上招待。他把执照从小皮匣中取出来让我看，原来是一张大正天皇和皇后的像片。萨布楞说：“你如果想成大事，为复兴蒙古民族贡献力量，我愿把枪交给你使用。打出旗号后，连日本的大炮也能给你弄来。我是个出家人，带不了队伍，你是巴将军（指巴布札布）死后咱们蒙古人最有出息的人。我因为看你对张将军（指热河游击马队统领张连同）忠心耿耿，早想对你说

而又不敢，现在此事既然被胡宝山挑明，希望给咱们蒙古人多帮忙。你如大干，别说爱根庙的枪马，整个阿鲁科尔沁旗都能帮助你成立军队。”我对萨布楞回答道：“咱们既磕头为弟兄，就要同甘苦，共患难。藏枪的事只胡宝山知道，我可以替你对付他。假定上边发觉，只要你坚决不承认，我负责保护你。至于你叫我去当巴布札布的蒙匪头子，我坚决不干。因为拉了四年‘杆子’，已经披上永远脱不掉的贼皮，再去当‘蒙匪’更要被人骂我祖宗三代。”萨布楞活佛听见我提出“蒙匪”字样，便没再往下谈他与日本人勾结的其它情况。

我虽当过胡匪，但自一九二二年被张连同收编以后，即认为自己已经改邪归正。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义，当兵后，改为李守信。当官以后被张连同视为“爱将”，他又送了我一个“子忠”的表号。当营长还不到半年，由于拉了四年“杆子”，以淌来之物结交朋友，热河游击马队的十七个营当中，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都跟我磕过头；在士兵中也用钱收买下不少人。

张连同起初包庇我为匪，以后又培养我当官，他对我有“知遇之恩”。当时我只希望能当到象张连同那样一个马队统领，就心满意足了，以后再象许多行伍出身的军官那样逐步向上爬，因此，我没有上萨布楞活佛的钩钩。“九·一八”事变后，爱根庙的武器弹药，被日寇组织的“内蒙古自治军”（以下简称自治军）运走。

据巴布札布三儿子正珠尔札布说：“萨布楞活佛和阿鲁科尔沁旗的王爷代表阳仓札布，曾于一九三二年春天，到郑家屯日本“满铁公所”和甘珠尔札布、正珠尔札布兄弟，以及通辽莫力庙的小活佛阿旺图丹巴等，出席过筹组“自治军”会议。甘珠尔札布被任为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莫力庙小活佛被任为第四军司令。萨布楞活佛临终时叫我去，我为了避嫌没有去，可能与此事有很大关系。由此说明日本特务对我早就暗送秋波了。

（二）热河沦陷以前

我投靠日寇，同我顶头上司崔兴武有关。崔兴武生于一八八五年，比我大七岁。他先给清朝的马政大臣调教马，后来参加毅军升为帮带。一九二二年我收复开鲁时，他还在张连同的营长孙凤阁、孙寿卿那里住闲。由于他擅长马术，张连同爱养名马，由孙等介绍给张，渐得张的宠信。不久张连同任崔为营长。一九二四年二次直奉战争后，张连同任东北边防军骑兵独立第九旅旅长，崔升为团长。一九二五年崔兴武贿通杨宇霆接任旅长，我任团长。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崔的独立第九旅改称东北骑兵第十七旅，孙凤阁为二十七团团长，我为三十四团团长，孙寿卿为四十一团团长。崔兴武和二孙磕头拜把，部队中称他们为“三桃园”，始终把我当外人，打仗老叫我的部队去牺牲。我为了保全地位，处处容忍，表面上对他很忠诚、服从。

我从家里背着一枝套筒步枪跑出来闯荡江湖，不到八年时间，闹上一个骑兵团长。因为在赤峰、经棚和开鲁驻防，和商人来往日久，也学会经商谋利。我做走私和投机倒把生意，比崔兴武赚得钱还多。他把钱花在娶姨太太、买田产、开烧锅等方面，我将钱都应酬了朋友和收买官兵。我的朋友中除少数蒙古王公、旗官、活佛、大喇嘛外，多数是汉族中的官僚、地主、商人和胡匪头子。我的兵中汉人居多，把胡宝山带的那些蒙古兵，当作别动队来使用。我和崔兴武的参谋长陈宝泉，副官长刘继广，步兵团长尹宝山，营长丁共昌等所谓“三桃园”圈外的军官，结成一个集团，他们对我都有好评。朋友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和他们利害一致的蒙人。

一九三〇年，科尔沁部的嘎达梅林组织牧民反对王公，巴布扎布“蒙匪”余部，流窜到热河北部。汤玉麟令崔兴武旅出

动防堵，崔派我和孙凤阁两个团前去进剿。孙凤阁呆到鲁北装病不动，我则穷追痛击，把它歼灭，连嘎达梅林也是我亲自开枪把他击毙于老哈河中。所以在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前，不只崔兴武旅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兵听我的话，热河北部七八个县的绅商地主，也认为我是他们的保护人。以后我就凭借这个声势，做为投日的主要资本。

“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开鲁县驻防。一九三二年秋季，日本人派伪“自治军”由通辽向开鲁进攻，热河北部有一年多处于无战事状态中。在这期间，上自蒋介石下至汤玉麟，都没有抗日的决心。崔兴武为了能在开鲁苟延残喘，跟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取得妥协，开鲁、通辽公路线继续通车，我也决定看一看局势，保存实力。

开鲁和通辽相距一百八十华里。“九·一八”后不几天，通辽局势紧张。一九三一年冬天，东北蒙旗师范学校一些学生和达斡尔族留日学生德古来等以及东蒙一些知识分子，在日军的帮助下企图占据通辽。不久日本关东军进占了通辽，设立了特务机关。攻通辽的蒙古兵组织了“自治军”，由东科后旗统领包善一（额尔敦毕力格）任第一军司令，东科中旗韩色旺任第二军司令，热河土默特左旗巴布扎布的次子甘珠尔扎布任参谋长兼第三军司令，热河库伦旗的鲍殿卿（那钦双和尔）等为联队长，由关东军发给三千枝步枪和六十万发子弹，派松井清助、盘井文雄和小泽一六八等为顾问，积极准备进犯热河。

通辽失守后，崔兴武在投降和抗战两条道路中间徘徊。一方面通过开鲁商务会会长、汉奸蒋金安（旅顺人，领日本人的本钱在开鲁开设甘草收购公司）和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进行敷衍；一方面调我那一个团到开鲁东面九十华里的道德营子布防，摆出抵抗的架势。但通辽和开鲁中间，汽车照常通行。崔兴武指示我，不叫在道德营子检查和盘问商旅。我到道德营子不久，因伪“自治军”中尽是胡宝山的熟人，他们瞒着我派人把胡

宝山叫到通辽，想让胡说服我，同他们一起去投日。我对胡说：

“他们号称四个军，连四千人都不够，军司令都是王爷、佛爷和少爷，根本没有带兵打过仗。巴布扎布当年曾有一万多人，尚且落了一个失败，他们这些乌合之众，连我也对付不了。民国以后，蒙古人就是跟上这些王八羔子们死了许许多多。凭他们这些料，怎能把蒙古民族复兴起来！你如果还不安分守己，小心跟上他们卖了脑袋。”隔了几个月，汤玉麟住热河的军队去辽宁省收复白城子，我即把胡宝山打发到那里作战，恐怕把他留在道德营子，给我生事惹祸。

有一天，崔兴武叫我回开鲁。我到了崔的公馆，看见客厅中有两个日本人和一个蒙古人，由参谋长陈宝泉陪着，不知谈论什么。这时，崔兴武把二十七团团长沙凤阁，四十一团团长沙继广和我叫到他的卧室中说：“通辽自治军的松井顾问和第一师师长鲍殿卿，想认识一下你们三位团长。为了维护开鲁的局面，你们可以和他们见见面。”崔把我们领到客厅，经过介绍，除了松井和鲍殿卿外，另一个日本人是在开鲁当过兽医的仓林，这次来是代表通辽日本特务机关并给松井担任翻译（因为崔兴武不让我在道德营子检查汽车，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到开鲁的）。崔在公馆举行完宴会，松井和鲍殿卿要求先访问我的团部。到了团部，松井问我说：“你们旅长打算怎么做？你打算怎么做？你们肯不肯和我们携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说：“我们旅长得请示汤主席，我听我们旅长的。”他一看我不表示态度，便把鲍殿卿留下，就和仓林回到蒋金安的甘草公司。鲍殿卿跟我谈了一宿，讲了一套复兴蒙古民族的陈辞滥调，最后谈到正题，想叫我把部队带去担任他们的第五军司令。我说：“我是蒙古人，对于蒙古民族复兴很乐意，可是叫我当日本人的自治军，我坚决不干。至于实行民族自治，应当取得老汤同意。你们后台老板，决定不了给我第五司令。咱们不妨交个朋友，今后彼此帮忙。只要你们名正言顺，我一定和你们合作。”第二天我把他们说的话完全报告了崔兴

武。崔说：“你应付得很好。”

崔兴武在东北军里，可以说两头都探不上，张学良不承认他是黑山县同乡，把他的部队视为游杂部队；汤玉麟主张“熟人治热”，也不将他当成嫡系。他在一九二五年归奉军后，没有给他补充过一枪一炮。有一次他向汤玉麟要求子弹，只拨给五百发。

“九·一八”事变后，崔以抗战为名扩充队伍，我一下子就给他招集起五千名胡匪、马贼以及热河与科尔沁部的民团小队，其中有胡宝山给纠合的二千多蒙古人。崔把名册呈报给汤玉麟，想望发给饷项服装。汤因限制崔兴武发展，派三十六师副官长李芳亭接过这部分人，编为一个暂编旅，归崔兴武指挥。李芳亭出身于朝阳的胡匪，和我同乡而又结拜，我很同意由他替我带领这部分人。崔却怀恨在心，准备待机报复，遂在以后参加了张学良和冯占海的倒汤活动。此次松井前来谈判，崔也是把责任往老汤身上推，好捉住汤玉麟通敌的把柄，给自己通敌做辩解。松井不敢亲往承德，崔叫我派一连人保护仓林前去试探。由于朱庆澜组织起“辽吉黑热四省抗敌后援会”，派何清明（何绍南）和王野人等来热河鼓动抗战，仓林和汤没有谈出结果，便匆匆返回通辽。由于形势所迫，汤玉麟不仅拒绝了仓林的诱降，并且为了表示抗战，命令崔兴武指挥李芳亭及通辽的一个商团（司令蒋某），于一九三二年夏初，由开鲁出动收复辽宁的洮南和白城子。崔不愿意，以警戒通辽的伪“自治军”为借口，叫李芳亭和那个商团去，我怕李芳亭掌握不住蒙古士兵，便打发胡宝山带了二百多人前去协助。李芳亭带着这五、六千人，在洮南被张海鹏的伪军挡住，退到鲁北。这时，李桂堂率领八千多胡匪，也打着抗日的旗号由围场、林东和天山窜到那里。李芳亭不仅没打到白城子，并且在鲁北被刘桂堂解决了大半，胡宝山还被刘桂堂扣捕，李芳亭和商团的蒋司令领着两千多人退回开鲁。

“自治军”四个军，于秋天集结在通辽北的舍伯吐，企图绕道德营子，由曹家营子经哈拉毛都迂回占领开鲁县城。崔兴武

看见李芳亭退到哈拉毛都以后，日本飞机即来开鲁进行低空侦察。虽然通辽的汽车仍然通行开鲁，但知道战事已经不可避免，遂决定占领舍伯吐，威胁通辽以保全开鲁。这次崔又让我担任主攻，刘继广团接防道德营子。崔把孙凤阁团和卫队营开出开鲁东门，说是由他率领朝南迂回舍伯吐。我信以为真，便把队伍带往哈拉毛都，让李芳亭和蒋司令的人担任左右两翼，即向曹家营子推进。这时“自治军”已由舍伯吐出动把曹家营子占领。松井顾问指挥着伪“自治军”四个军，前来夺取哈拉毛都，大白天和我们在老哈河两岸遭遇，隔河展开战斗。那时我只有是一门六五迫击炮，由连长霍清泉瞄准，我亲自往里装炮弹，头一炮就落到松井所乘的车跟前，第二炮即把松井所坐的马车打翻，伪军纷纷后退。这时左前方发现有五百多骑兵冲来，企图由河北抄李芳亭的后路，我一看不是蒙古人，象是久经作战的胡匪，所以令右翼蒋司令率队过河捕捉俘虏，我去迎击这股骑兵。当我把这股敌人赶跑，蒋司令已将从马车上跳下来的松井顾问打死，俘虏住松井的一个蒙古勤务兵和鲍殿卿的参谋长，还有两门迫击炮。李芳亭气得拔出手枪，要当场枪杀蒋司令，怪他把一只“肥羊”杀死。经我拦住，让他们配合我一齐攻打曹家营子。“自治军”见松井被杀，便落荒四散。躲在曹家营子抽鸦片烟的伪军参谋长甘珠尔扎布，发现进村的骑兵不是他们的人，即跨马逃走。

这天我们在曹家营子宿营，胡宝山被他的亲家白玉山从刘桂堂那里接出，也跑来曹家营子，还给我招来二百多蒙古马贼。我把松井的尸体运到开鲁街上展览。松井的勤务兵和鲍殿卿的参谋长，我打发胡宝山送他们到舍伯吐，劝告“自治军”不要替日本人卖命。胡宝山回来时给我带来了“自治军”第二军司令韩色旺的一封信，附有他的生辰年月，除了感谢送回俘虏并要跟我结拜，以后我们就成了没见过面的换帖弟兄。第二天拂晓，我把李芳亭和蒋司令两部留在曹家营子，自己单独去攻舍伯吐，中午占领舍伯吐。后半天“自治军”由通辽派出援军进行反攻，但骑兵不

敢下马爬城，经我用迫击炮猛烈射击，即纷纷溃退。

我在曹家营子听说刘继广那个团根本没离开道德营子，崔兴武在我去攻打舍伯吐时，将开鲁城防交给步兵团，自己带上孙凤阁和卫队营去通辽抢了“自治军”第四军伪司令阿旺图丹巴小佛爷的莫力庙，发了一大笔横财。我把松井顾问的尸体送到开鲁，崔兴武却送去出售给通辽日本特务机关。我退回曹家营子，因为人多驻扎不下，便叫李芳亭和蒋司令的人仍开回哈拉毛都，由我的那一个团警戒敌人。蒋司令从通辽退出带着不少银钱，崔兴武便派孙凤阁去哈拉毛都把蒋的人包围缴械，并把蒋打死。崔兴武这样干，据说是被田中玖收买，给松井顾问复仇。崔和孙在抢完莫力庙和解决完蒋后，由于分赃不均，两人大吵一场。孙辞职不干，崔兴武遂让尹宝山接了孙凤阁的二十七团团长。

崔兴武认开鲁通敌的商务会蒋会长为朋友，将通辽抗日的蒋司令当成仇敌，我在舍伯吐打仗，他在莫力庙发财。因此，我几乎也跟他决裂。我在曹家营子由于伪军不敢从舍伯吐南犯，便回开鲁去料理私事，先去旅部见崔。他板起面孔质问我为什么从舍伯吐退下？我说：“你是汉人，尚且亲近田中玖，我是蒙古人，怎能不倾向‘自治军’？”他一听话中有刺，又问我：“你究竟要怎么样？”我说：“我要去当他们的第五军司令，官兵一个也不带，枪马全给留下，咱们好离好散。”这时他又改了一副面孔说：“子忠！我全凭你保我，你一走我就完了，我不过问一问你。咱们都是真心抗日，我和田中玖联络，还不是为了维持开鲁的局面，希望咱们彼此都不要误解。”接着扯了一些闲话，留我吃饭才叫我回家。我盘算了整宿，还是觉得他虽然不仁，我不能不义；他越表现得混账，我越容易出头露面。因而决定还是跟他跟到底，以全我“忠臣不事二主”之心。所以不久“自治军”从舍伯吐绕道开鲁东南四十里，占领了小卓王的卓里克图王府，还是我带队伍从曹家营子过去，给崔兴武把开鲁外围的这一军事据点夺回。

我攻击卓王府时，从二十七团和四十一团抽出两个营，由胡宝山那个营担任爬城，死伤了四五十人，二十七团的许合义营长，也在王府的城外阵亡。我于黄昏时把王府占领，入夜伪军进行反攻，我把二千多人都诱入王府，我占领了王府四周沙岗上的阵地，围了一天一夜。胡宝山代表我去和韩色旺谈判，决定给他开退路。他们自动撤离，保证再不反攻，只是摆出一种胶着对峙状态。伪“自治军”没有撤远，只撤至王府四周的沙岗外，白天双方朝天打枪，夜间派人互相联络。我们子弹很缺，韩色旺打发人送我一万多发子弹。这样在卓王府附近“表演”了不到十天。因为冯占海带着好多义勇军从黑龙江退到开鲁县境，他们奉令撤回通辽，我也受命防守哈拉毛都。崔兴武调李芳亭的部队，接了卓王府的防务。

（三）东北义勇军退到开鲁以后

冯占海和邓文等在黑龙江抗战失败，一九三二年八月退入热河，开到哈拉毛都北面，崔兴武将我的一团人调到哈拉毛都堵防。崔在开鲁对我说：“冯占海的人纪律非常不好，沿途脱老百姓的皮棉衣裳，现在还没有很好整体，还容易对付，要是服装补充齐全，开鲁就会危险，你去把他们赶到通辽或别的地方。总之，不叫他们驻在开鲁境内。我知道你很有办法，不知你以为如何？”我说：“他的纪律好坏是一码事，在江桥抗战，全国都知，我们没有打他们的理由。”崔说：“扰乱地方谁负责？”我说：“他们只是吃些粮食，开鲁有的是粮，养活三五百人不成问题”。他说：“你能负责任吗？”我说：“给我责任，我就敢负。”崔兴武是受地方士绅，特别是商务会长蒋金安的包围，提出驱逐冯占海的主张，因为我不去打，他又不敢去，才决定派我代表他前去欢迎。

我到了召东村，见了冯占海、邓文、檀自新和李海青等，我

说：“我是三十四团团团长李守信，我代表旅长欢迎你们前去开鲁。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和他谈。现在开鲁和哈拉毛都非常复杂，为了不发生意外，你们部队现在就驻扎在这一地区，官兵可以徒手进城和进拉哈毛都购买东西。”冯等非常骄傲，我再没有说客套话，便回哈拉毛都严加警戒。崔兴武在开鲁四门设了“卡子”，当冯等初来开鲁时，除了少数马弁，连卫队也被挡住。冯占海进了开鲁不久，朱庆澜的抗敌后援会派何清明和王野人到开鲁慰劳义勇军，何、王暗中给蒋介石作特务工作，还带来一部电台，后来知道电台是戴笠给拨的。何清明和崔兴武的参谋长陈宝泉是保定军校同学，和陈住在一起，每天被崔请去吃饭。王野人到处活动，后来给李芳亭担任了参谋长。他们尽和冯占海和崔兴武来往，跟我很少接触。也许何清明以为我和陈宝泉结拜，陈可以左右我，而又见我对崔兴武很“服从”，所以不需要在我身上下工夫。他们来开鲁，担负两三重使命：一方面为朱庆澜鼓动抗战；一方面给蒋介石进行布置“曲线救国”活动；另一方面也给张学良做东北军的团结工作。由于他们本身的使命非常复杂，加之义勇军进入开鲁，蒋金安受田中玖指示，从中挑拨离间，结果把个开鲁城弄得复杂起来。

冯占海是张作相的外甥。张学良那时因为指挥不动汤玉麟，有心让冯占海接任热河省主席。抗敌后援会的何清明和王野人说他们能代向蒋介石请求批准，以拉拢冯占海。冯占海向崔兴武表示，他可以向张学良请求，把十七旅扩编为军。何清明也对崔兴武说，张学良不给编，国民党中央也能给编。因此把崔兴武弄得想入非非，除了把何清明视为和蒋介石联络的线头，并派他的侄儿崔玉昆到北平和张学良进行联络。张学良居然交给崔玉昆一本电报密码，让崔直接和他通报。李芳亭受汤玉麟的密示，把军队扔在城外，他和谢国臣就近监视冯、崔的行动，成天和他们在一起打牌。蒋金安为了给日本通辽特务机关搜集情报，更和他们整天周旋，把开鲁城闹得乌烟瘴气。先是崔兴武和冯占海结拜为异姓兄

弟，姨太太们也认了干姐妹，冯答应在他出任热河省主席以后，把石香亭十九旅和赵国增的保安旅都拨给崔指挥。以后李芳亭和谢国臣破坏冯、崔联合倒汤，挑拨冯占海从开鲁驱崔；何清明也愿意把崔兴武干掉，好使陈宝泉掌握十七旅。他们曾秘密地开过好几次小会，因为怕我替崔报仇而不敢下手。开鲁县长于寿山是由地方士绅出任县长的，老奸巨滑，在局外看得非常清楚，唯恐地方多事，商民受糜乱，对崔兴武说：“无论抗日投敌，倒汤防冯，以及指挥石香亭和赵国增，都必须取得李守信的支持。”因此，热河沦陷以前，崔兴武竟把我当成他的家奴，还想让我改姓成崔，并演了一出收我为义子的趣剧。

那年秋末，开鲁城里流行时疫。我在哈拉毛都接到崔的一个电话，叫我赶快回开鲁。我冒雨先回家看了一眼，一个五岁的男孩子，染疫而死，老婆也在病床上呻吟，我料理一下后，才去崔兴武的公馆。他因为等我等得很着急，满脸不高兴。屋里只有参谋长陈宝泉和抗敌后援会的何清明。崔和我说：“子忠！我想叫你改一个姓，好让大伙捧你，我以后就不管事了。”我说：“现在开鲁快要沦陷，你怎能不管事而推卸责任！我祖祖辈辈姓李，子子孙孙还要姓李。”崔见我对他顶撞，再没说第二句话，拿着烟枪抽不下去，坐起来干瞪眼。我说：“我的娘儿们现在快要咽气，我得回去看她。”说完就走。第二天我去找陈宝泉。问他：

“崔兴武究竟叫我姓啥？”陈冷笑地说：“热河的大军头，都是父子相继，如常德胜把军队交给他侄儿常万里，刘山胜把军队交给他侄儿刘汉杰。旅长想把你改成崔守信，使别人不敢欺侮他。我和绍南（何清明的字）认为这样对你也很好，可以把他的摊子接过来。”我说：“蕴山（陈宝泉的字）！咱们是磕头弟兄，原来你也认不得我。姓李的没门没窗，是拿枪杆子打出来的团长，现在就能接他的摊子，只是对不住世人。谁叫我命不好，跟了这样混帐的长官，既然跟了他，就要跟到底，绝不能中途背叛。我往日去接张将军（张连同），带着二百人敢进承德府（时在一九二五年春天

谭庆林替宋哲元代理热河都统期间)。谅有我李守信在开鲁，谁也不敢端他崔兴武的锅。你告诉旅长，让他放心好啦。”原来这里边还有把戏，陈宝泉经何清明挑拨，他想取崔而代之。现在见我对崔的态度如此，便野心收敛，把我说的话都转告了崔兴武。从此以后，崔开始跟我商议起大事来了。

崔兴武先和我商议联冯倒汤。他说：“子忠！我要作这件事，你看怎样？”我说：“冯、汤都是奉军的嫡系，咱们参加进去很不合适。日后人家两个一见面，便会把你出卖。”他说：

“冯占海跟我磕头，不至于如此。”没隔三天驻省办事处处长李树声从承德来电，说冯的参谋长到了承德，汤玉麟质问冯占海在开鲁酝酿倒他的事，冯的参谋长把一切都推到崔的身上。隔了十几天，崔兴武又和我商议，张学良为要汤玉麟坚守热河，联络崔兴武于必要时实行兵谏。但必须由北平方面届时拍来“尺码合适”的电报暗号，才可以行事。崔看见冯占海的义勇军从开鲁开走，想叫我去朝阳解决汤玉书的骑兵（玉书是汤玉麟的兄弟），以雪汤平日排挤压制他的仇恨。他说：“子忠，这次你可以干了！”我说：“少帅绝不肯因为开鲁和朝阳内讧，把热河的两个门户都敞开，让日本人乘虚而入，一定说是‘尺码不合适’”。他叫何清明的电台去电询问，回电果没出我所料。

因为蒋金安把冯、崔联合倒汤的事密报了日本特务机关，所以日本飞机来开鲁只侦察不投弹。可是倒汤没有成为事实，敌机便每天都来轰炸。冯占海在的时候，炸弹都落在义勇军阵地，冯的副官长和卫士等三十余人被炸在一个地窰里。冯占海走后，专炸何清明那个电台小院，连李芳亭和谢国臣住的地方也都炸了，但不炸十七旅的营盘和崔兴武的公馆。为何炸得如此准确？我判断这一定是蒋金安在捣鬼。一天早晨，崔兴武带着姨太太到城外防空，我从前方回来，他叫我也一同前去。他对我说：“抗敌后援会的慰劳品和子弹给义勇军的比给十七旅的多。”又恨这批东西都叫冯占海带走，大骂冯占海不够朋友。

我自从和“自治军”打完仗后，很注意通辽方面的敌情和国内的抗战形势。除了让“东鲁汽车公司”经理王子玉供给我情报外，并叫驻省办事处处长给我留意报纸上的各种消息。因为我还托他们在通辽和承德间作买卖，所以每天差不多都有书信和电报来往。根据李树声的来信，知道全国一致主张抗日，蒋介石被迫把他的中央军开到北方，特别是张学良要坚决保卫热河和河北，已经令东北军沿着长城各口布防。据此情况，我对崔兴武说：“只要抗日就有人援助，十九路军在上海得了好几百万慰劳金。别人投降咱们抗，越发会吃香。开鲁的局面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应当好好计划一下，敌人来了咱们该怎么办！开鲁失了咱们到哪里去？”他说：“我舍不下热河的财产，又不敢当汉奸，咱们走一步说一步。”我说：“中央给你编一个军，咱们就把这个牌子挑起来抗日，热河完了以后，中国地方很大，刘黑七（刘桂棠）和孙老殿（孙殿英）能离开山东、河南到热河抗日，咱们也能离开热河去河南、山东抗日。”他说：“何清明说，朱庆澜已给蒋委员长去了电报，但没有见答复。批准以后，可能叫我指挥石香亭和赵国增。石香亭说，赵国增一定反对，我以先叫你改姓，就是为了让赵国增和你关系深厚，看着你的情面而能服从我。”我说：“军队得自己往大扩充，不能拣现成的；番号也得自己争取，不能专靠上边给编制。咱们有的是人，我从前顾虑官兵不肯离开热河，只要给他们各升几级，不怕带不出去。刘黑七和孙老殿是先表示抗日才编了军。中央恐怕咱们领上人投日，也得给咱们一个象样的番号。”我可以说是把话跟崔兴武说尽，但是谈了半天，看见他仍犹豫不决，不置可否。我说：“如果没有事，我得赶快回前线去。”他说：“你到前方也好，我在后方维持。”我离开他以后，通辽、开鲁间汽车仍旧通行，可是道德营子和哈拉毛都的空气，却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

(四) 我初和日本人“洽谈”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占领山海关，开始威胁热河。日本兵因为秋天派“自治军”进犯开鲁没有成功，从阴历腊月初起，就不断直接袭扰，两翼还是“自治军”。他们来时只是小坦克车朝我们开炮，飞机轰炸扫射，步兵和骑兵不跟我们接触，旨在恐吓崔兴武，叫他把开鲁让出，崔当然不敢在热河首先投敌。这时李芳亭已经带着五六百人到承德去找汤玉麟。崔令我和刘继广在哈拉毛都和道德营子进行抵抗。我在哈拉毛都附近布防，只是飞机在头上扰得非常讨厌。他们天黑退出，天亮又来，我恐怕遭到夜袭，晚上也得防守，弄得官兵无法睡觉。为了使士兵白天能够休息，我选拔出二百多优秀射手，分开好几组专打敌人的飞机。敌人不敢低飞，我的士兵可以轮班休息。阴历腊月二十八日（或者二十九日）有一架敌机被我们用步枪击落，机上有四个日本人，两挺机关枪与两部电台。飞机受伤不太严重，日本人被我们骑兵活捉。我用电话报告给崔兴武，他叫把俘虏和电台、机枪送到道德营子，交给刘继广看押和保管。我一听，这里边有文章。他问飞机如何？我说已经跌毁，因而打完电话后，我就令士兵把飞机烧毁。

因为前方仍然吃紧，我不能回家度春节。一月二十九日（阴历正月初四）崔兴武叫我回去。我见了他，问有什么事？他说：“日本人想让咱们把飞机上的两人给送去，打算派你去通辽跟他们谈判。”我说：“为什么要派我去？”他说：“你能行。”我说：“你打算怎么办？”“跟他们诓些子弹。”我说：“我去很有危险，因为日本人知道我把‘自治军’打跑，不过为了子弹我敢去，别的我可不谈。”我回家考虑到日本的人质押在道德营子，对我不会为难。另外，东北军没给十七旅补给过弹药，经过几次作战，每个士兵只剩下三两排子弹，先把子弹诓到手再说，

所以我敢前去。

一月三十日黎明，我穿上长袍马褂，内藏两只勃朗宁手枪，到了崔兴武的公馆。崔的门口已经停着一部通辽日本特务机关的小卧车。客厅中坐着开鲁商务会长蒋金安和日本人仓林。崔兴武让他的旅部参谋王新民（已换便衣）和蒋、仓坐上汽车先出城，和我徒步走过大街，我边走边和他说：“我死以后，拜托旅长把我眷送回朝阳老家。”他拍了我肩膀一下说：“子忠，你放心，绝无危险。”我问：“为什么蒋金安也去？”他说：“蒋代表商务会，作这次谈判的保人。”我们说着走出东门。等我上了汽车，他才骑马回去。汽车开得很快，午饭前，我们就到了田中玖的特务机关，有刘辑五和胡柄初两个翻译出来欢迎。刘对我说：“咱们是老朋友。我去过开鲁好几次，在开鲁银行的宴会上和李团长还碰过杯。你来到我们这里，请不要客气。”经他一说，我觉得很面熟，只是那时穿着商人的绸缎便衣，现在换成日本黄呢军装。我们在院子里闲扯的时候，田中玖从客厅出来向我握手，让进客厅后，首先问我：“飞机上的人现在如何？”我说：“四个人剩下三个人，那一个人因为夺卫兵的枪，被我打死。”他说：“没有什么，咱们先吃饭。”饭后我向他提出子弹的事。他说：“这个我主不了，得请示关东军司令部，你敢不敢跟我到新京（长春）走一趟？”我说：“通辽既然敢来，新京怎么不敢去！叫我到日本国见天皇，我也不怕！”他说：“那很好。今天我给关东军去电报，明早给你回信。”

“自治军”驻扎通辽，我恐怕遭到甘珠尔札布和莫力庙小佛爷的毒手，便向田中玖说：“我随便上街有无危险？”他说：“没关系，我负责保护你。”我说：“不是怕你们日本人，因为崔旅长抢了莫力庙，我打过舍伯吐，恐怕自治军不谅解。”他说：“自治军是特务机关指挥，你放心好啦。”并问我：“你到什么地方去玩？”我说：“到班子里去玩姑娘。”他笑了一笑，叫两个翻译领上我们坐汽车去逛班子。到了妓院，我问翻译，

“山东有个王子玉他是通辽跑开鲁的东鲁汽车公司经理，你们认识不认识？”他们说：“那是我们的同乡，和我们很好，团长既然问，一定是你的朋友，那就叫他来。”不一会，王子玉被汽车接来，看见我大吃一惊。我走时只带着五六百块钱，他听见我说带的钱不多，忙叫妓院派人到公司要来五千元。蒋金安和两个翻译打牌，我和王子玉谈话，他说：“崔派蒋金安跟你来，不是为了逗子弹，恐怕还接洽投降的事。崔当汉奸要你出名，你可要小心。”我说：“我知道，绝对上不了他的当。”

第二天一早，田中玖把我接到特务机关，领我和蒋金安、王新民、仓林和翻译胡柄初十点多乘火车前往长春。开车时又上来一个喀喇沁旗留日的蒙古人金永昌，田中玖向我介绍说：“金是关东军①司令部“嘱托”（特务），前来欢迎你。”到了长春，关东军司令部派车来接我们去见关东军司令菱刈大将和小矶国昭参谋长。菱刈大将伸出大姆指对我说：“你是一个很勇敢的蒙古人，我佩服你李守信团长。希望你和我们合作，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说：“我是代表我们旅长来接洽送还俘虏，其余都不敢当。”菱刈说：“你为什么不把人带来？”我说：“因为没有谈出条件。”菱刈改口说：“你来顶好，咱们就先谈这件事。”这时小矶插嘴道：“凭你们旅长，我们不相信他；你是蒙古人，我们才朝着你谈。”我说：“我的身份和地位不够，我得按照他的指示办事。”小矶说：“最好先把人带来再谈，看你们有无诚意。”我说：“我们旅长临走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得回去请示他。”小矶说：“人带不来不好谈。”我说：“有开鲁的商务会长担保。”小矶说：“我们只凭信你，而你又不敢负责，所以必须先答应我们的条件，然后才能提你们的条件。”我看谈不下去，便

①注：日本“关东军”——是日本帝国主义派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不仅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元凶，还是控制伪满州国的太上皇。“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辖一个师团和六个独立守备队，后来发展成号称一百万的军队。

起身告辞，菱刈把我送到门口，对小矶、田中玖说：“你们替我好好招待李团长，我因事忙不能出席欢迎他的宴会。”

小矶中将把我送到旅馆，我向他说：“我回去请示，还是把我留下做抵押？”小矶大笑说：“你们都回去。飞机上那几个人送来送不来没什么，我们日本人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已经牺牲了好多人，不在乎这三个人。”小矶走后，我问蒋金安和王新民：“你们留在这里怎样？”蒋、王都说：“我们在这里等你的信。”王新民起初害怕日本人把我和他扣住不放。现在看见日本人极力拉拢我，知道不会遇到危险，想乘此机会，到锦州探亲。我为急于诓到子弹，又恐崔兴武变卦，有意把王留下。田中玖说：“他们留下也可以，我发给护照在满州国旅行，可以到处通行无阻。”晚上小矶约了二十多个中佐以上的军官，就在旅馆为我们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我在致辞中说：“我是代表我们旅长来到这里，因为没有办过外交，恐怕完不成任务，非常抱歉。我愿把贵方的意见回去报告给旅长，今后咱们直接来交涉。欢迎我实在不敢当。”宴会散后，小矶又嘱咐我：“你回去把人给带来，子弹不成问题。你可以和金永昌好好谈一谈你们蒙古的问题。”金永昌和我被安排在一间房里。他谈的和前几个月鲍殿卿说的相同，不外是和日本人携手，复兴蒙古民族，以及让我和“自治军”合作，等等。我听得不耐烦，叫他领我逛班子。到了越香春旅馆，金永昌给我介绍了夏子明，说他是刘桂棠军长的副军长。夏也是胡匪出身，我跟他一见如故。他说：“现在连蒋介石也是脚踏两只船，咱们更要东风大随东风，西风大随西风，不能死抱住一股弦子弹。天下大乱，咱们弟兄们才能出头露面。不然的话，谁能看起咱们。他们利用咱们，咱们也利用他们。马占山先投日后抗日，现在谁不承认人家是英雄，你不要错过机会，甩开崔兴武自己挑吧。”他的话很合我的心意，我和他就在越香春磕头结拜。

二月三日我跟田中玖、仓林、金永昌返回通辽。田中玖派仓林陪着我回到开鲁，向崔兴武报告初次谈判的结果。路过莫力庙

时，小佛爷派出三、四十个人拦车，因车开得很快，子弹没打着。我见了崔兴武，他见我沒有诓回子弹，很生气。他说：

“他们非先要人不可，我非先要子弹不可。”我说：“我已把王新民留在那里，你给与不给，我得再去走一趟，不要叫日本人看不起咱们。”崔坐起来把大烟枪一放，说：“给吧！你带去。”好象是给我办事似的。我到了道德营子给通辽去电话，派来一部大卡车，连人带武器和电台全装上。一到通辽田中玖就说：“你受惊了吧？没有遇到危险真万幸。我已告诉小佛爷，如再给李团长为难，关东军不答应，你不要怕。”这时我感到，崔兴武对我冷酷无情，还不如田中玖对我“热情”、“关怀”。还认为日本将领风度大方，不象中国将领气度狭窄。因此，我还产生过：“与其替崔兴武联络日本人背黑锅，不如自己干脆挑起来干”的念头。

第二次到长春，仍是由田中玖和金永昌陪我前往。小矶参谋长见我把人、武器、电台全给送来，非常高兴。他说：“关东军送你二十二万发子弹，十五支热河造手提机枪，二十五支韩林春步枪，到奉天兵工厂去提取。另外送你三万元天津字中交票①，这完全是朝着你来。”我说：“朝我朝崔旅长，我都不敢接受，我得仍回开鲁去请示，看他要不要。”小矶说：“那也好，你再辛苦一趟。”我在长春又住了一天，回来的时候，看见铁路西侧军运特别紧张，各个站口都集中着好多农民的马车。到了通辽，王子玉告我说：“日本人已决定三路进攻热河，这里也征集马车，有一个茂木旅团开到，你们要赶快做准备。”我回开鲁，首先把此情况报告崔兴武，然后问他子弹和武器钞票要不要。他说：“你被日本人吓住了吧？”我说：“笑话！只要有子弹我就不怕。”崔说：“咱们或打或退，你先把子弹弄回来。”我给田中玖去了电话，说崔愿意接受，叫他转告留在长春的王新民前去洽领。随即雇了二十辆马车，派一排人保护，为了使田中玖不怀疑，我也跟去通辽。

①天津字中交票 中国交通银行天津支行发行的钞票。

（五）崔兴武把我甩在开鲁城

我到通辽和长春完全是为了诓子弹，至于开鲁不战而退，是崔兴武瞒过我和田中玖直接谈判的结果。从我将俘虏送到长春后，日本人就把十七旅当作降军看待。我带着马车进出通辽、开鲁，日伪军并不阻止。田中玖并且允许我住到“东鲁汽车公司”，有事来找我洽谈。我在通辽看见日本的汽车和骑兵向西开拔，就打电话给崔兴武，请他预作准备。他说：“知道了。”我正想留在通辽，不去开鲁，田中玖打发人将我叫去，并说：“茂木旅团已经出发，恐怕和你们发生误会，你得先回去和崔旅长维持那里的秩序，并准备欢迎皇军入城。”我不敢再问其它，支吾了一声，坐车就走了。这时天已昏黑，外边下着大雪，汽车开出通辽，见莫力庙附近火光一片，日本队伍在那里停下。二十日天亮，我绕道到道德营子。见了刘继广，就给崔兴武打电话，问他是打是退？他说：“不用打啦！退吧。”我叫刘继广把马备好，等子弹来到以后再退。等了半天，先是两架飞机盘旋了一阵，飞向开鲁，以后看见日军四、五十辆汽车开来，却不见子弹踪影。我叫刘继广部撤退，我坐车回开鲁。

二月二十日，崔兴武抓车三百辆，搬运他的东西，往林西撤退。我团也从哈拉毛都往林西扎兰营子集中，扔下二百多家眷不管。开鲁县长于寿山也跑了。“东鲁汽车公司”的车和抗敌后援会的电台，一齐撤退。地方绅士推蒋金安代理县长。我进城的时候，崔的卫队营也开出西门外，只有何清明和崔及其副官陆景堂三个人在公馆中等我。我进崔公馆，崔说：“你在开鲁替我应付，叫日本人关照家眷。子弹运来就到爱根庙，到那里再议。我那部道济汽车无汽油不能开动，日本人来了给弄些汽油，开到爱根庙。”说完跳上车，把我甩下就走了。我回家吃过饭，心想去找队伍，但舍不下子弹。半夜跑回几个押运兵，说子弹在半道上被日本军抢去了。

天大亮以后，又跑回一个押运兵，他说，子弹仍由我们押着，只是走在日本兵的后边。因为子弹车和日本兵并排行走，日本兵耍无聊，用手摸我的弟兄们脸上的雪；我的弟兄们认为受了侮辱，对他们开了枪，把几个胆小的弟兄吓的先跑回开鲁。经日本军官制止，他们才没有还手，经翻译解释，误会就消除了。接着刘继广从扎兰营子派人找我说：“三个团退到那里，大家等你出来以后，才往西开，崔旅长去了爱根庙。”刘继广问怎么办？我叫刘团长等子弹车到来以后再说。我返回开鲁县城，和蒋金安出去欢迎日本人。日本兵进入开鲁，官兵都在大街上支开行军锅吃饭。商务会准备两桌席，摆到我的家中招待茂木旅团长。茂木旅团长不去，反而在商务会用葡萄酒和罐头招待我们。茂木首先介绍一个小柳匀少佐，说：“这是开鲁的日本占领军司令。”并向我说：“皇军明天向赤峰挺进，你得给弄四百辆车，运输给养。”我说：“我洽领子弹，不负这一责任。”他说：“就向你耍。”我说：“我就没有。”两个人弄僵，他叫小柳匀派十个日本兵把我押到崔兴武公馆。不过还允许我城外的兵进出崔公馆跟我联络。

我被押不久，运子弹的排长向我报告，说子弹车已经进城，我说：“赶快送往扎兰营子，请刘团长按三股半分给各团和卫队营。”不久刘团长又打发人来向我说：“队伍都由扎兰营子返回，已经接到子弹，我们究竟该怎么办？”我说：“听我的信。”由于跟前没有翻译，我们谈话非常自由。二十二日拂晓，茂木旅团开走，巴特玛拉布坦的“自治军”改称“兴安军”，有一千七百多人，和张海鹏部伪军王永清旅的一千五百多人，一同开进开鲁。王永清对我说：“田中玖从通辽出来，追茂木旅团，去接赤峰的特务机关长。中午小柳匀把看守我的日本兵撤走，让我去找崔兴武。小柳匀放我时说：“你去吧！”我说：“不走啦。”小柳匀问：“为什么？”我说：“下这么大的雪，我追不上部队。”

我跟小柳匀要了五十筒汽油，乘崔兴武的道济汽车开到开鲁

县政府，张海鹏部旅长王永清和开鲁绅商头面人物，都来看我。王永清说：“听说受了委曲，挨了押。”我说：“崔旅长把我甩下，叫日本人把我押了一天一夜，将我弄得人不人鬼不鬼，这份汉奸当得真丢人现眼。我的兵因为日本人摸了他的脸，还敢向日本人开枪，现在小柳匀只剩下二百骑兵，我还这么装蒜种，真没脸见各位朋友。”我越说越气，开鲁的地方绅商看见我声色俱厉，扑通扑通跪下，他们说：“李团长，开鲁的百姓遭难不遭难全在您！”我也跪下，向他们说：“大家请起来，我到开鲁外边去干，绝不连累百姓。”王永清将我搀起，拉我到他旅部说：“我刚才有点莽撞，惹你发牢骚，把那些人吓成那个样子。我在通辽见田中玖时，他对你印象很好。今天他已去了赤峰，你要趁机扩充些军队，到那一天，咱们叫日本人一个也跑不了。宣统皇帝已任命我们师长为热河省长。我的队伍明天就朝南开，咱们以后多联系。”我经他一说，火气压下大半，便和他告别，坐上大汽车开出西门。

西门外集结的二千多人，都纷纷提出要进城巷战，我讲话说：“城里还有咱们二百多家眷，大家不要意气用事。只要真心抗日，以后有的是机会，咱们还是去找旅长。”队伍经我说服，便向爱根庙开拔，三更到达。我问崔兴武：“子弹已经诶来，你是降呀？打呀？”他说：“当然是打，我带两团先退林东，你的团在这儿掩护。”三日我在爱根庙呆了一天，二十四日退往天山，三团人又集结在一起。二十五日我们连夜出动，崔叫我们去打刘桂堂的军队，我说：“咱们从开鲁不战而退，没给汤主席去报告。刘桂堂究竟是敌是友，现在还没判断明白，你奉谁的命令去打，咱们弹药诶来颇不容易”。他说：“不要讲这，我叫你打就打。”我说：“我不接受这个命令，你得给我讲明白。”两人瞪了半天眼，他给陈宝泉下命令道：“他不给打，你指挥那两个团打。”说完就去林东。陈宝泉问我：“怎么办呀？两个团听你的不听我的。”我说：“遇上这样的长官，该如何哩，他叫打就打吧！”于是两

军在天山城东开火了。

刘桂堂曾在鲁北解决过我的胡宝山营，官兵退出开鲁的那股怨气，都发泄到刘桂堂部队的身上了。他们七、八千人前来占领天山，却被我们两千多人抗住。从二十五日夜一直打到二十七日黄昏，他们没有突破我们的防线。刘桂堂的部队冲锋老是用密集队形，被打死六百多人。二十七日晚崔兴武跑来说：“不要打了，一齐朝林东撤退。”我问他：“这又是为了什么？”崔说：“刘桂堂态度不明，咱们也态度不明。跟刘打，对中国和日本都不好交待。”这才给我说了一些实话。但他怎样和日本勾结，又怎样和国民党联络，始终没有对我透露过。刘继广和尹宝山两团于二十七日晚开走，我在后掩护，刘桂堂不敢追击。我于三月三日到林东。尹宝山出城接我，说崔已把刘继广带走，叫我也往林西撤，让他在后边堵刘桂堂。尹又说：“崔不知捣什么鬼！你先走，我不给他抵挡。”我因尹团在后，于三月五日到了林西东门外，尹团也在这天撤到林西城东北二十里地方。

（六）我在林西投降日寇

汤玉麟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不战而放弃承德。三月五日夜，崔兴武在林西把队伍交给我掌握。由于崔兴武的各种政治活动一直瞒着我，我只能从一些表面现象判断。何清明早就表示，要向蒋介石和张学良给他要一个军的番号，但只是一句空话。他和通辽的日本特务机关拉得很近，所以叫我在开鲁欢迎敌人。退出开鲁后，张学良才正式发表崔为五十九军军长，令他指挥十九旅和赵国增保安旅。赵不接受指挥，石秀亭带着两团人于二月底由锥子山开到林西，没敢住米振标的那座大营盘，准备让崔在那里设立军部。崔到天山叫打刘桂堂，便是接了军长以后的表现。可是三月五日承德沦陷的消息传到林西，开鲁的敌人经爱根庙到了林西东南，刘桂堂部南追尹宝山团也到了林西东北，何清明叫崔在

林西指挥两个旅进行抵抗。他听到汤玉麟出走，孙殿英于二月二十三日退出赤峰，不敢把投降的道路堵死。何清明一看无法挽救，就和于寿山带着电台，乘“东鲁汽车公司”的汽车，绕道张家口去了北平。崔兴武还是不敢出面充当汉奸，叫我代理旅长维持林西局面，他自己跑到林西城外的二龙台川观望形势。

三月五日下午我到了林西，听说石香亭的十九旅在城里驻防，旅部和刘继广的二十七团在东门外，我也让队伍在城东寻找村庄宿营。我进城一打听，崔兴武驻在大营盘，他见到什么话也没说，叫我先回家休息。我刚睡下不久，又打发人叫我前去。他说：“我要走二十天，到北平去见少帅。昨天上午承德就丢了，老汤正往西退，看咱们今后如何办，所以叫你代理旅长。”我说：“你去北平接洽抗日，我很拥护，只是日本人怎么应付？赤峰丢了，小柳匀的部队已向这里前进。”他说：“你又被吓住了。我走以后你设法应付。”我追问他：“究竟如何应付？”他不吭声。我又问：“抗呀？降呀？”后来被我问的没了办法，才说：“咱们俩唱双簧。你给田中玖去电报，他现在是赤峰特务机关长，说我得了感冒病，让你代理。如问起打刘桂堂事，说是出于误会，这样就可以缓冲一下，只是二十天。”他说完连家也没回，就自己开上卧车带着随从副官陆景堂，慌忙出了林西城。刘继广来人报告，说：小柳匀和“兴安军”已经到了林西东南三十里的黑山头。接着尹宝山的人也来报告，刘桂堂的人到了林西东北二十多里的二十家子一带。崔兴武出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林西全城，不少人便到大营盘找我。我把卫队营在大营盘四围警戒起来，并把代理旅长的事，通知给城外的三个团。

三月五日夜，我到电报局给田中玖打电话，我说：“旅长到乡下养病，让我代理职务，林西交给我维持。打刘桂堂是出于误会。”田中玖说：“叫崔旅长好好养病。打刘桂堂没有关系，你先来个详细电报，我好指示你今后的行动。”我叫陈玉泉拟了个稿子，说了一派鬼话。不大一会就复来电报，叫我准备欢迎小柳

匀入城。石香亭派人来找我：“你们旅长走了，把一切都托付你，我们这部分人怎么办呀？”我说：“他在林西住了好几天，你们商议过没有？”石说：“我在锥子山接到少帅的电报，叫我归他指挥，所以我把人带到林西，表示拥护他出任军长。”我说：“我今天才来，不知这些事。”石说：“这是什么人，不和部下说实话，现在又扔下林西不管，叫我该服从谁？”停了一阵，石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维持林西秩序。”石说：“我走你打不打？”我说：“你们不抢林西就不打。”石说：“我要从白岔川仍回锥子山，你能不能请日本飞机不追上炸？”我说：“这个话可以传达，你安心往出撤。”石香亭走后，我即给田中玖去电报关照。他们撤出林西，安全回到锥子山。以后他们退到狼尾巴山一带被孙殿英解决了。林西商务会葛会长来见我，我叫他代理县长。不久城外派人来报告，小柳匀的部队到了东门外距城八里地的地方。

这一夜，林西城里乱成一团，城外也不平静。东北方面的刘桂堂部，因井得泉叛变和刘打了多半夜。天明归降了我们的刘继广团。小柳匀听见刘桂堂的人和我们合在一起，不敢进入林西。三月六日天明，石香亭的十九旅完全撤出，在城外驻扎的我部也不敢开进城，怕被日伪军包围。小柳匀在东门外等我出去欢迎，我看见把八门山炮卸下，不知意图如何？于是互相观望到下午，“兴安军”的伪司令给我来信说他们有顾虑，我才带着一个勤务兵出去见了小柳匀。他说：“队伍还没有来齐，咱们明早一同进城。”七日上午八点多钟日伪军才开入林西。

我把日伪军都让到大营盘里，我们的队伍仍在城外。一星期后伪满的“兴安军”调回关东，小柳匀的炮兵和骑兵开到赤峰，我才把三个团开入城内。我为了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求得在崔兴武离开的二十天内，不出问题，当小柳匀开拔时，故献殷勤，建议他的部队从乌丹城的濡陵桥过河去赤峰。可是小柳匀心怀鬼胎，不敢从这条路上走，结果把汽车都陷入河中。小柳匀走后两三天，

田中玖派汽车把我接到赤峰，向我抱歉地说：“你们蒙古人心好，小柳匀认识不到这点。他不听你的话，费了很大力气才把炮从河中捞出，你若是派出一团人进行包围，小柳匀岂不是完了。我找你来就是代表关东军对你表示感谢和信任。并给一万七千块机密费，望你维持好林西的秩序。今后对你一定要重用，你回林西听消息好了。”我问：“什么叫机密费？”他说：“就是给你的钱，你想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我们不管。”我便拿这钱买了八千双夹鞋，发给士兵。

三月末，崔兴武露了头。他回林西住在热河兴业银行经理陆香波那里，打发人把我叫去说：“我不干啦，把队伍交给你。”我问他：“你不是去北平见少帅吗？”他说：“少帅下了野，东北完了，整个中国也快完蛋了，所以我要到长春去住家。”我说：“你把队伍交给我，叫我如何处理？”他说：“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是不干了。我今年已经四十九岁，奔波了一辈子，弄了这点财产，颇不容易，再活十几年，就要死，所以我要到满洲国当顺民。”我说：“有国才有家，有权才有钱。当了亡国奴，手里又没有兵，我看你的财产保不住，望你三思而后行。我跟你要跟到底，这二十天是你叫我代理。你如果怀疑我，我可以离开部队。”他说：“子忠！不要说这话，你对我很忠心，只是我不想干了。”我说：“我不能接，你既坚决不干，也得把蕴山（陈宝泉的字）和润斋（刘继广的字）他们叫来商议，让他们去接。你不干，我也不干。”他再不理我。陆香波坐在一旁，也不插嘴。我便赶快回到旅部找陈宝泉、刘继广商议挽留他。

我把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部召集在旅部开会，说明崔旅长决定不干，叫他们前去挽留。尹宝山首先向我说：“他不干，叫我干，这不就得了。”刘继广接着说：“你怎么做？我们跟着你怎么做。”没等陈宝泉发言，胡宝山便说：“他不干拉倒！我们是朝你李守信而来，不是跟崔兴武，叫他去他的，咱们干。”别的营长也一致表示拥护我，不同意挽留崔。正在乱吵的时候，陆香

波打发人来说：“团长用不着去了，崔旅长已经坐上赤峰日本特务机关的汽车离开林西上赤峰去了。”陈宝泉说：“既是这样，你就干吧。”我说：“咱们如何办呢？”他说：“现在还没有盖棺论定，只要咱们不遗臭万年就行。”

不久，热河完全沦陷，长城抗战也告失败，日本人已到北平附近的通州，于是我最后决定走崔兴武给打通的通路，在林西正式投敌。不久，田中玖发表我为“热河游击师司令”。这个伪军下辖三个支队，每支队三个团。因为田中玖允许给我补充山炮，司令部还附设一个炮兵大队。我的鸡鸣狗盗的朋友，都闻风而来，部队人数由崔兴武时两千多人，剧增至八千多人。田中玖令把蒙汉官兵分开编制，我叫刘继广和尹宝山任第一、二支队司令，胡宝山任第三支队司令，丁其昌为炮兵大队大队长。第一支队的团长是朱恩武、陈景春和井得泉；第二支队的团长是朱子文、邢德胜和门树槐。第一、二支队共有汉族官兵六千三百多人。第三支队蒙古官兵一千七百多人。我开赴察北时，第三支队在经棚和林西一带留守，到了多伦，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来投我，我派乌协助胡宝山整训第三支队，结果被乌古廷带上参加了伪满的“兴安军”，只胡宝山带少数人到多伦找我。我的司令部仍由陈宝泉任参谋长。田中玖派浅田、佐藤和义田等三个日本人为顾问，浅田并兼林西的特务机关长。从此以后，我就在日寇的驱使下，作了危害祖国、出卖人民的汉奸。

我率伪军在察北的罪恶活动

（一）从多伦遣走刘桂堂

一九三三年夏初，日寇完全占领热河后，派往多伦准备侵犯察北的伪军，计有：刘桂堂部七八千人，张海鹏部一千八百人和我部六千五百人，共一万六千多人。张海鹏部来自辽宁，已编为伪满的正规军，张本人出任了伪热河省长，关东军对该部比较信任。我部来自热河北部，正式投敌还不到两个月，除了我是蒙古人这一点而外，其他都待“考验”。刘桂堂部来源于山东的流寇，在热河沦陷以前被北平军分会收编，这年三月由鲁北（热河省的县名）经天山、林东、林西退到围场一带才投敌，所以关东军对该部最不相信。张海鹏有好几旅骑兵，由其长子张子明和王永清、傅景峰、索华岑等分别带领。开到多伦的一千七八百人，是王永清旅。因此承德的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令王永清监视刘桂堂和我，并令林西特务机关长浅田兼我的伪“游击师”顾问，他转告我，注意刘桂堂。这就是日寇对伪军分别对待，相互牵制的作法。除刘桂堂部没有派遣顾问和教官外，我和张海鹏部都有日本人紧紧跟着。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采取的是蚕食政策，逐步侵犯华北。从侵略察北开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前，除了张海鹏和我的伪军中派有顾问教官和由日本组成的“特设队”外，日本的正规军始终没有在察北露面。日寇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刘桂堂的山东流寇进行捣乱，使察省主席宋哲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带抗战，怕刘桂堂不听话，又把我带的那帮热河胡匪调了过去，以威胁二十九军的后方。当宋哲元离开察哈尔，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起“抗日同盟军”时，日本人又把张海鹏部王永清旅

开到多伦，一方面提防刘桂堂和我这两部份新投敌的伪军，一方面阻止汤玉麟反攻热河和冯玉祥由张家口出击。等到我把刘桂堂从多伦赶跑，张海鹏部王永清旅调到沽源以东，在察哈尔北部便由我唱独角傀儡戏。

刘桂堂部于三月五日夜晚，在林西东北的二十家子内讧，打了一整夜。翌晨，他的非得泉团长投归了崔兴武的刘继广团，他本人率领主力撤至围场以北，曾盘踞了一个多月，派副军长夏子明前往承德接洽投敌成功。由于宋哲元把二十九军大部带到河北，察北一带没有驻军，多伦于四月下旬被刘占领，队伍完全驻在街内。张海鹏部王永清旅后来才到，因不能进街故驻在庙上的东西两仓。我是三月五日在林西代理崔兴武交给我的旅长职务，七日将日本的小柳匀部队和伪满的“兴安军”欢迎入城，二十五日崔兴武把兵权交给我，四月初，赤峰特务机关机关长田中玖发表我担任“游击师”司令伪职，把队伍整顿了二十多天，即向多伦开拔，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初旬到达多伦。由于多伦的街市被刘桂堂占领，多伦的庙仓被王永清驻扎，我只好得多伦城东二十里的善丹河沿岸驻扎。

多伦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庙宇，后来才在庙南二里的高地上出现了蒙汉贸易的街市，故多伦又称为喇嘛庙。刘桂堂与我有天山作战（被我毙伤一千余人）及收编非得泉的仇恨，对于张海鹏部王永清旅也严加戒备，把多伦街封锁起来，使我和王永清两部，都不能向商务会征要给养。多伦寺庙东西两仓很大，可以驻一万多队伍，但喇嘛的粮食有限，仅能勉强养活王永清一旅骑兵，我在白沙黄草的善丹河边，必须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粮食。好在由林西开拔时多准备了半个多月的米面，所以初来到多伦的十几天内没有断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号“天下好”，我当胡匪时就跟他磕头结拜，热河沦陷时他在开鲁和我见过一面，到了多伦我们便联合起来对付刘桂堂。这时曾在开鲁当过兽医的日本浪人仓林，也跟我从林西跑到多伦。他和我部的浅田顾

问，看见我的官兵给养困难，恐怕发生变化，遂把此种情况报告了承德的特务机关松室孝良。松室于五月二十六日由承德飞到多伦，想调和我与刘桂堂之间的矛盾，用电话把我从善丹河叫往庙仓，想使我俩言归于好，套在一根缰绳上供他驱使。

松室孝良在庙仓南的自然飞机场下了飞机，住在东仓的一个大喇嘛的院子里，叫我和刘桂堂在那里见面。他说：“你们再不要敌对了，我来给你们调解。”我说：“刘桂堂反复无常，毫不讲信义，他要在这里当场打死我，我的队伍岂不是垮了。”正说话间，听见外边报告刘桂堂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带着我的随从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刘桂堂进门以前，先跑进四个卫士，各扛着一挺机关枪，枪口朝着正房放倒，爬下作预备射击的姿势，然后他才跟着一个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里边。松室打发人叫我过去，我没有答应，以后刘的副官过来请我，见我和我的副官都扞着手枪，一看我有准备，扭头便走。不大一会外边的人跑进来说，王永清的人将重机枪架在四周，刘便匆匆辞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庙仓。他从正房出来，我爬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个短粗的胖子，脸上长满发黑的横肉，怪不得人们叫他刘黑七。松室把刘桂堂送走，回来对我说：“真不是东西，我太冒失了。”并说：“你的困难我完全知道。我给关东军去电报，要求给你解决。”当天，他飞回承德。

我在林西投敌后，队伍由崔兴武时的不到两千人，很快就发展成八千多人。田中玖叫我把汉族官兵六千五百人编为两个支队，蒙古官兵一千七百人编为一个支队。从林西往多伦开拔时，日寇不仅没有补充械弹和关发饷项，并且把那个蒙古人组成的支队，留在林西和经棚驻防。田中玖对我说，是怕到多伦把队伍输光，留下这一千七百蒙古人做为我的另一笔赌注，所以叫我兼任伪“经、林留守司令”。

我知道天下没有便宜的事情，当汉奸也得有一定的表现，才能逐步得到主子的信任。日本军阀的武器和金钱并不随便给人，

对他们有利可图才肯破费。那时我既然披上贼皮，总得摸捞到一些实惠。

松室孝良走后，过两天便是端午节，王永清留下我跟他一起过节。他又拿出二百块银币，向喇嘛买了一些大米和牛羊。我打发随从副官把大米、牛羊送给我驻善丹的队伍，并叫刘继广和尹宝山于过节期间要更加戒备。就在端午节这天拂晓，刘桂堂派出二千多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营垒，结果被我军打得狼败而退。我在仓上瞭得清清楚楚，丢盔擐甲地回来一千多人，被打死三百多人，伤兵约有五百多人，抬到中午才停止。这时冯玉祥正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王永清恐怕刘桂堂反正夺取庙仓，决定把东仓腾出，让我部当天到里边驻扎。我们两部的日本顾问，也同意两部份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后，好联合起来从多伦街上驱逐刘桂堂，我部便完全进驻到庙仓。刘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枪，到天黑以后才停止射击。

五月二十九日，刘桂堂派他的副军长夏子明跟我见面。夏还带着一个姓黄的参谋长，他们说此次事件是刘桂堂部一个在天山县被我打伤的师长，瞒过刘袭击的，希望我不要误会。夏子明曾与我磕头为结拜兄弟，所以我对他们说：“刘黑七打我，你这个把兄弟也不给捎个信，并且是你这位参谋长运筹帷幄给定的计策。”弄得他们两个面红耳赤，只说：“我们哪里知道。”我说：“我这次进多伦，是你们昨天拂晓去善丹河把我请来的。”夏子明看见我的态度很强硬，向我说：“你容许我们五天时间，等我们把开拔准备事项完成，将多伦街腾清后让给你。”我说：“只要你们讲信用，一礼拜以后也行，咱们不服气离开多伦打，不要在街上祸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后的第二天上午，多伦商务会派来代表欢迎我们进街，说刘桂堂的人已经连夜向张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务机关报告了此事，回电叫我完全占领多伦，让王永清当天开回热河。听说刘桂堂从那天开始参加了“抗日同盟军”。

我于五月三十日，留尹宝山支队驻守寺庙的东西两仓，带刘继广支队进街，将司令部设在街内，委热河阜新的一个老秀才蒋正清为伪多伦县长。不久乌古廷从汤玉麟那里跑到多伦，还带过来五百多蒙古骑兵。他说汤部在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从赤峰退过去的孙殿英解决了大半，孙已领着人进驻到关里沙城一带，汤带着残部困居在独石口外，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所以他来投我。乌古廷（原名乌臻泰，字嘏庭，投日后，改为乌古廷）是喀喇沁右旗的蒙古贵族，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我因乌出身于军事学校，又是我的磕头兄弟，以为他可以作我的左右手，于是把他打发到林西，代理我的伪“经林留守司令”，去整训胡宝山的第三支队，我恐怕胡宝山在那里给我生事惹祸。不料这乌古廷竟想拆我的台，叫他四弟乌臻瑞，向第三支队的官兵宣传，说我是朝阳七区的汉人，是一个“假蒙古”，这个部队应当由“真蒙古”带领。胡宝山和团长达理扎布（敖汉旗人）等把这话告了我，我这时正忙于营救松室孝良，并且我是依靠汉人捧我，蒙古的小头子们既然排挤我，他们有真本事，就交给他们带领好了，所以对此事没有注意。

松室孝良在调解刘桂堂和我的矛盾失败后，第二次又来多伦，听说给我带来六万块“天津字”交通银行钞票作军饷。不料飞机在隆化县境内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后被一个外号叫“二寡妇”的女人所带的胡匪，将他和飞机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飞机失事是我把乌古廷派到林西以后发生的。消息传来那天，我即派连长张国治带了四十多个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带寻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张连长无论如何要保护住松室。我企图以此向日本人献媚。后来伪热河省长张海鹏比我许的愿大，用大量金钱将此部胡匪收编，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嘱顾问浅田向他说，我也曾派人前去营救，从此松室对我的印象更好，开始给我发军饷。不过没有给我补充武器，只是派来二十多个日本人组成的“特设队”，附有三辆装甲汽车并配备六挺重机枪，还有四五挺

轻机枪，没有配备炮。吉鸿昌率部由张家口北进时，我就是凭这点力量，在多伦对抗“抗日同盟军”。

（二）和“抗日同盟军”作战经过

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日本帝国主义为使冯、蒋火拼，收渔人之利，除了派飞机在长城内外侦察“抗日同盟军”的行动，并没有派出正规部队向察北六县发动进攻。在六月中旬张家口搞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多伦西南各县，只由张砺生指挥的曹凯和白凤山等部民团驻守，所以多伦到张北之间，可以说阻力不大。

我和冯玉祥的西北军素无来往。但我刘继广支队的团长陈景春（名陈生，字景春）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军队，并和“抗日同盟军”姚景川（字云章）是亲戚，所以他们派姚景川来找陈景春，企图瓦解我的部队。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他的财产都在沦陷区，不敢跟上姚景川轻举妄动。当“抗日同盟军”围攻多伦以前，我曾和参谋长陈宝泉瞒过日本人，召集两个支队长和团长们秘密开会。我说：“谁是真投敌？谁是真抗日？只有盖棺才能论定。我们已跟日本人拉上线，现在八字没见一撇，绝不能放弃多伦，必须死守几天，看看抗日同盟军的力量究竟如何，瞧瞧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怎样，然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参谋长陈宝泉暗中和何清明有联系，主张投靠日本，所以同意我的主张。

我叫尹宝山支队防守庙仓，在西边西仓的小孤山上构筑工事，让日本人“特设队”抽出一部分轻重机枪放在上面，以保护小孤山下的飞机场。我带着刘继广支队防守街市，并控制南边的沙岗地带，把日本人的三辆装甲汽车做为机动部队。日本人听说“抗日同盟军”号称两万之众，前来夺取多伦，浅田等都吓得失去了主张，完全听我调度。七月初旬，日寇由飞机给我运来子弹六万发。“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时，大约来了一万多人。七月七日夜发动攻击时，我一听没有炮声，机关枪声也很疏落，更

有了坚守的把握。多伦虽无城墙，但在房屋上可以放沙袋据守，庙仓本身就是堡垒，没有大炮很难打开，街和庙中间以及其周围是开阔地带，“抗日同盟军”很不容易隐蔽。初攻击时，来势相当猛烈，争夺街南的沙岗，打伤了我的团长郭焕章。但由于我们居高临下，又由于他们在攻打时不能协同一致，虽然进入庙和街的范围，未能集中力量进街或者占庙。

多伦被围后，日本飞机在八日白天来过一次，来时正值“抗日同盟军”的五百多骑兵企图夺取庙仓两边的那个小孤山，飞机扔了四颗炸弹，把这部分骑兵和步兵赶跑，除了日本人的三辆装甲车在召庙和街市中间以及飞机场周围，用机关枪向“抗日同盟军”扫射外，我的兵都没打枪。日本飞机降落时，被“抗日同盟军”的步枪子弹射入油槽，把接济我的六万发子弹和一些慰问品卸下，修理了半个钟头，才起飞回到承德。这次以后，因大雨连续四五昼夜不停，日本顾问浅田急得老打电报，但飞机找不见多伦的目标，无法接济。“抗日同盟军”因后方运不上给养，加上连攻数夜没有奏效，士气逐渐低落，尽找地方避雨，战争遂成了胶着状态。我在坚守多伦期间，日夜不眠，我知道，我个人的命运全看能否守住多伦来决定，所以老到最吃紧地方亲自指挥。因此“抗日同盟军”虽然把多伦装在口袋里边，造成三面包围，但无法往里渗透。由于这时全国都注视“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冯玉祥一听攻不进去，便叫姚景川出面跟我谈判，想让我把多伦腾出。我的团长陈景春大概是七月十日那天到司令部来见我，他说：“姚景川前几天跑来拉我，我没有理他，因为怕你多心，也未向你报告。今天他到了我的团部，想跟你直接谈判，可否让他和你见面？”我说：“咱们在多伦如同闷在鼓里，不知道国内外形势，可以让他来跟我谈谈，以便了解一些外边情况。”

姚景川劝我弃暗投明，我说：“咱们日久见人心，现在还谈不到这一点。”他又说苏联已经决定援助冯玉祥一百万枝步枪，不久即可通过蒙古人民共和国给运来。我心里想：这是给冯玉

祥，冯到手后不一定就给我李守信。后来他说：“冯先生真心抗日，得到了全国各方面的爱国人士的拥护，如果连多伦也收复不了，人们就要大失所望。现在你要把多伦让出，便可以振奋振奋人心，这就是你对抗日的最大贡献，冯先生以后必然重用你。”他并说：“咱们是热河同乡，我知道你两头为难。说实在的话，同盟军已经没力量打开多伦，冯先生派我来，是想向你借一借多伦。冯先生真有办法，你不成问题会和我们合作在一起；冯先生要是没有办法，我负责把多伦归还你。”我因为孤军据守多伦三天三夜，满对得起日本人的六万发子弹，冯玉祥既然派代表来，我不能把这条路线切断，现在正到了两面都能讨好的时候。于是我问姚景川：“你们打算借多长时间？”他说：“借两三个月。”我说：“两三个月时间过长，一个月我能应付日本人，到期你们没有办法，那我就要反攻。咱们一言为定，都要对得起朋友。”我叫姚景川转告给“抗日同盟军”在最近一两天以内要虚张声势地猛烈攻击，等我把日本人吓唬住，退却命令出于他们口中，我再通知“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的日期和时间。

我的兵多是胡匪和民团出身。他们都暗藏着不少的“保命子弹”，轻易不肯外露。八日飞机走后给每人发了十几粒子弹，到九日白天都背着空子弹袋子，日本人看见着了慌。仓林曾悄悄问过我：“子弹没了该如何办？”我说：“没子弹拚刺刀。”因而他们用十万火急的电报，向承德特务机关要求接济，可是大雨滂沱，飞机不能来。我即去找浅田顾问，我说：“关东军给我的二十万发子弹，已在天山和善丹河两次打刘桂堂消耗殆尽；飞机运六万发，每兵平均发了不到十粒，八日夜晚和九日夜晚，已经打的差不多了，我已剩下赤手空拳，你得给我想办法。”日本人一样怕死，浅田便把此种情况又用急电报告到承德，并且为了急于逃跑，把战况描绘得特别猛烈。松室孝良怕把我这六千多经得起“考验”的伪军，被“抗日同盟军”拉走或者吃掉，三十多个日本人跟着丧命，从热河再派出伪军，又远水救不了近渴，就在十

一日夜晚决定叫我们向锥子山（即围场县）撤退。十二日拂晓，“抗日同盟军”进入多伦。

因为事前双方约好，我出多伦的时候，还表演了一番突围战斗，“抗日同盟军”亦派人追击了十几里。我便在善丹河停了下来，做出掩护退却的各种姿态，其实我八九天没有得到休息，在善丹河的公积淖尔附近睡了大觉。多伦距锥子山二百八十里，走了六天，日本人认为我退的井然有序。七月二十日左右，松室孝良派汽车把我由锥子山接到承德，派日本医生把我的痢疾治好，共耽误了七天，临走给我补充了二十万发子弹，五百枝步枪和九万元军饷，叫我赶快回去反攻多伦。我因往来承德又磨蹭了四天，距离八月十一日的限期还有十天，承德的电报直催我开拔，我以准备没有齐全推诿。到了八月四五日，看了看推不过去，便把队伍从锥子山开出，当天走了七十里停下。日本人发现我迟疑不前，第二天便派来两架飞机在我的队伍周围扔开炸弹，我知道这是对我提出警告，只好加快行军速度，于八日到达距离多伦七十里的峪道口。浅田顾问叫我在九日拂晓攻城，我说对敌情还没有侦察明白，在峪道口住了一天，十日傍晚才到了善丹河沿岸。

这时蒋介石调派军队在平绥路东段加紧威胁“抗日同盟军”，并令宋哲元回察哈尔劝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多伦街、庙两处只有张凌云的两千多步兵和几百察北民团防守。十日夜晚，张凌云派出代表三人到公积淖尔见我，痛哭流涕地请我不要夺回多伦。我说：“我不前进，日本人给我扔炸弹，现在你们借用多伦的一个月的期限已到，冯先生并没有办法。回去告诉张旅长，我明天上午十二点钟非进多伦街不可。今晚明晨你们很可以腾清，我保证不追击。”我对三个代表各送了一匹马，把他们打发回多伦。第二天，张凌云未曾开走，反而派出骑兵向我军警戒，我决定采用“跟上敌人马尾巴进城”的胡匪战术，把队伍兜成一个圈，一齐上马，由善丹河向多伦直冲，使“抗日同盟军”无法招架。尹宝山不同意我的办法，按兵不动，我带着刘继广的那个支队，跟在

“抗日同盟军”的骑兵后边一拥而冲进多伦街上，因为张凌云的步兵看见自己的骑兵退下，不能开枪射击，等到把自己的骑兵让过，我的兵便跟了上来，以致步兵都措手不及，纷纷退出多伦向南奔跑。尹宝山掌握不住部队，他的所部也朝街上冲过，被我指给去占领庙仓，那里有二三百民团，见尹支队上去，均落荒而走。日本人对这套胡匪战术，感到非常惊奇，其实我离多伦以前就把几个做小买卖的，收买成我的义务谍报，他们早跑来告给我张凌云进入多伦以后的各种情况。

我进了大街，看见刘继广堵住一个商号的大门洞，墙上爬满了我们的兵，刘说：“这是张凌云的旅部，张和旅部的人全被咱们包围在里边，你看如何处理。”我说：“放走！叫他们带上武器，找夜麦地隐藏，等到日本飞机走过后再行动。你向张凌云致意，我因避嫌疑不能和他见面，他需要什么东西，你给他准备好。”我怕日本人发觉，派人通知他们暂不要进街，说是敌人还未肃清，日本人何乐而不为，便在城外架起电台告捷。不大功夫承德方面就派来一架飞机，我们把对空联络符号摆出，飞机朝南侦察了一阵，没有发现“抗日同盟军”便返回承德。等到张凌云的人退净，日本人才进了大街。张凌云走时非常狼狈，连乘马都被我的兵给牵走，刘继广给弄了些烧饼并雇了一头毛驴，将他打发回张家口。

在我让出多伦期间，内部还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乌古廷听见我退到锥子山，以为我完蛋了，便把我留在经棚和林西一带的第三支队，归附了伪满的“兴安军”。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一开始和我共事，就把我当成外派。他们离不开我而又随时想拆我的台和夺我的权。日本人和蒋介石还好对付，就是伪蒙疆的一帮人难斗，使我很伤脑筋。

（三）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

我二次占领多伦以后，得到日本人的信任。一九三三年九月

间，将我的部队改编为伪“察东警备军”，任我为司令官，两个支队改称为师，由以前的支队长刘继广和尹宝山担任师长。拨来野炮八门和山炮两门，充实了丁其昌的炮兵大队。另外还成立起一个通信队和一个宪兵队。这时浅田专任多伦的特务机关长，赤峰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把他的一个朋友退役大佐下永，介绍给我担任顾问，底下的小顾问和教官，增加到二十多人。“特设队”除了那三辆装甲汽车，还添了三十多辆运输卡车。轻重机枪也不断给我运来，一共有一百多挺，战斗力较前增加许多。同时察哈尔镶黄旗的营长高乐明山，带五百多骑兵前来投我。不久胡宝山从林西乌古廷部队中，也给我策动回来七百多人，加上另外扩充的人，我的人数增加到八九千。

队伍编制就绪以后，我即到长春向关东军司令官谢委。这次是由西苏尼特旗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尖浦领我飞到长春见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尖浦说一口北京话，给我任翻译。小矶给我戴高帽子，誉我为“蒙古的英雄”，希望我为“民族复兴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说：“你有什么困难，就近和松室孝良接洽，已经电告他大力支持你的部队。”我为了表示衷心拥护“满蒙政策”，就便提起乌古廷在林西带的那一千七百多蒙古骑兵，我说：“听说兴安军收编了他们，就让乌古廷带了去吧，都是在关东军领导下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而效忠嘛。”小矶说：“多伦如果占不住，你把人打光，还得用这部分人扩充，得给你留下。”我说：“我一个人分不开两头，最好让乌古廷带领。”他说：“你的心很好，关东军自有办法。”从由德王府的特务机关长尖浦领我前去以及从小矶和我谈的话看来，日本人要大力培养我，因此我以后由侵犯察北的罪魁变成“蒙疆”小朝廷的“兵马之帅”。

从一九三三年八月重占多伦，到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前，国内报纸上称我为“李逆”，我心情特别苦恼。从一九三三年冬天开始到一九三五年春天，我学会吸食鸦片，娶了一个

小姨太太，更加腐化堕落了。这时多伦成立起日本的“善邻协会”，由中岛万藏负责，街上开设了好几家日本料理馆（妓院兼卖小吃的商店），从承德弄来十几个日本姑娘。特务机关的人和我的那些大小顾问教官，完全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浅田管不了下永，把拨给我的大部分经费和一部分军饷，都挥霍在花天酒地上面。我终日陪着日本鬼子们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可是我的士兵却吃不上洋面大米，除了两套单棉军服外连衬衣都没有。兵血全叫他们喝了，但我不敢过问，松室孝良虽曾几次问过我有无困难，我只能说是一切很好。我的参谋长陈宝泉思想搞不通，很苦闷，有一次在郊外打雁，心不在焉，猎枪装火药过多，枪膛爆炸，左手炸掉三个手指。

我和德王携手前，也进行过不少政治活动，一九三四年春天，曾到承德给张海鹏拜过寿。我在一九二二年到库伦旗清剿“蒙匪”时，给张海鹏递过门生帖子，他的旅长王永清和傅景峰又都跟我结拜，张想把我拉到伪满，所以对李树声（李是崔兴武的驻省办事处处长，也兼任我的驻承德的办事处处长）按我的代表来看待，对李曾不只一次示表过这种意图。我去承德给他拜寿时，张的大儿子张子明任旅长，称我为“世兄”。宴会时把松室孝良和我都让到筵席的正面。过完寿我去辞行，张又留下我吃饭。他说：“多伦占不住，回热河来。我老了，把兵交给你和子明，你们弟兄两个好好地干。”我这时的队伍，比张海鹏的四五个旅还要人强马壮，争名夺利的资本怎能轻易让人。

因为我把多伦占住，日寇为了统治察哈尔的十二旗群，为下一步占领绥东做借口，早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关东军便派金永昌和于兰泽两个蒙古留日学生，由长春来多伦酝酿成立伪“察哈尔盟”。他们来到多伦，住在日本特务机关。他们先编造了一本察哈尔人物调查资料，呈给关东军司令部审核，据说只有镶黄旗总管卓世海（即卓什巴扎布）够上担任伪盟长的资格。卓世海这时参加了百灵庙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

会”），并且在张家口有好多财产，不敢回来担任此一伪职，别的人也都不敢出头，所以后来决定让我兼任这个傀儡盟长。我对政务不感兴趣，要抓枪杆子，坚不担任，遂临时由多伦特务机关在金永昌和于兰泽这两个蒙奸协助下，代行了伪盟公署的职权，向察北各旗群征收皮毛牲畜和粮食，并选拔四十多个少年儿童，编为一队童子军，附属在我的伪军里边，由日本教官实施军国民的奴化教育和训练。金永昌和于兰泽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天，伪“察哈尔盟”正式成立以前，都断断续续地住在多伦，除了做其他特务工作外，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分裂活动。

德王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是通过陶克陶和韩风林跟关东军拉上关系的，迟到一九三四年冬天，我才发现这一秘密。有一天多伦机场上降落下一架从百灵庙来的日本飞机，上边坐着两个蒙古人和一个印度人。印度人和一个蒙古人住到特务机关，另一个蒙古人名叫陶克陶，到我这里来找金永昌。经过介绍，知道他们都是关东军司令部“嘱托”（特务）。因为金住在我的司令部，陶也一同住下。陶克陶对我说，他们是到百灵庙去见德王，因为德王回了苏尼特旗，关东军不叫他们到苏尼特旗去，并且那个印度人急于回国，所以路过多伦休息一夜。据我现在判断，那时德王还不敢公开和日寇勾结，他的身边有蒋介石给派过去的特务，如蒙政会的保安处长兼保安大队长韩风林，就是给关东军和蒋介石都做特务工作。在多伦停下，利用两地特务机关的电台，和德王联络。

陶克陶因为没有见上德王，感到非常扫兴。不过一谈起蒙古问题，却洋洋得意起来，表示他比金永昌和于兰泽在关东军方面还要吃得开，想叫我买他的账，他好右手抓德王，左手抓我。我向他表示：“我是一个蒙古人，对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愿意自报奋勇。”并且恭维他：“你必定有更大的贡献。”他说：“那自然啦。”我问他：“蒙古民族真能复兴吗？”他问我：“你看怎样？”我说：“现在我对满蒙政策怀疑，究竟是满洲复兴蒙古，还是蒙古复兴满洲？我没有见过德王，如果见到他以后，请

他好好想一想。”我知道陶克陶和金永昌都是关东军的大特务，便拿满洲来指日本，因为这是我对蒙古问题的一贯看法，不过很后悔对他们两个人说出，于是扯起为什么把伪“蒙古自治军”改编为伪满“兴安军”以及乌古廷把我的人编归伪满“兴安军”的闲话。可是陶克陶经我一问，却吐露出他的一部份真实思想。他说：“你们如果对关东军有所怀疑，咱们还有外蒙这一条路。我要是再见了德王，就以此向他打气。”这时金永昌正躺在坑上抽鸦片，猛然坐起来说：“陶克陶！你说这话叫关东军听见，有没有危险？”陶克陶脸色大变，和金永昌说：“我跟子忠（我的字）随便闲扯，现在关东军毫无疑问支持我们，万一关东军不理我们以后，就得走这条路。”陶克陶因为失言，没再对我和金永昌谈其它事情，假装乘坐飞机疲劳，就蒙头睡了觉。我也躺下闭住眼睛思想心事，只金永昌抽足鸦片才睡。第二天上午，陶克陶便带着那个印度人和另一个蒙古人回了长春。后来金永昌把陶克陶的话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经我向田中玖代陶克陶解释，才没有深究。

我和陶克陶与金永昌，在这天晚上可以说是同床异梦。根据乌古廷把我的队伍带到伪满，德王在百灵庙走着两条路线，陶克陶还有投奔外蒙的意图以及金永昌警告陶克陶等等，使我越发认识到内蒙的这些王公、贵族和接受了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都很滑头滑脑，在政治上乱拉关系，并且互相排斥猜忌。所以从此以后，我对他们更加提防，尽量避免卷入。那时在关东军卵翼底下，已经清楚地看出有三个蒙古组织：一是百灵庙的蒙政会；一是伪满的兴安军；另一个便是我的伪察东警备军。伪兴安军和我有矛盾，蒙政会也会错打我的主意。我决定以后要紧紧靠拢关东军，牢牢抓住自己的队伍，少和人谈论政治，少与蒙古的上层接触。不久，金永昌告给我韩风林在北平遇害，更使我感到脚踏两只船的危险和骑墙派的可怕。关于韩风林的死，据我以后了解，蒋介石曾于一九三四年责问德王勾结日本，德王可能把一切都推在韩风林身上，所以韩风林回北平探家时，由军统特务刘建华（曾

任伪厚和市警察局长，因和马汉三联络暴露，从呼和浩特跑到准格尔旗，担任了马占山部慕新亚骑五师的副师长），半夜叫门架走，据说按军统叛徒制裁杀害。这话是伪“蒙古军”成立以后，我的师长韩风楼对我说的（韩风楼是韩风林的哥哥）。

德王在百灵庙既受傅作义的威胁，内部又分成东西两派，还有白海风和朱实夫等，主张抗日派，使他感到势力孤单和“蒙政会”的环境复杂，早就想到了我的这部分武装力量，但没有关系深厚的人给他联络。继韩风林给他担任保安队长的宝贵廷，拉扯起来算是我的一个内弟。他听到德王老念叨我，便说：“李守信是我的姐夫。”德王遂派他为代表，来和我联络。宝贵廷原从土默特右旗出来先给我当文书上士。当时我是奉军骑兵独立第九旅二团赵国增部的营长，我把他介绍到团部，赵国增又将他保送至“东北讲武堂”深造，和乌古廷同期同学，毕业后回到热河，汤玉麟正利用蒙古人，所以他们连一天兵都没有带过，便成了陆军少校，担任参谋和副官一类的角色。热河沦陷和汤玉麟失败后，宝贵廷跑到北平住闲，生活没有办法，听见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便跑到百灵庙投效德王。韩风林死后，他代理了保安队长。

宝贵廷在韩风林死后疑神疑鬼，没敢从百灵庙经草地前来多伦，而是由归绥，经平绥路和北宁路，进入伪满境内，由通辽绕到林西，先住在乌古廷那里。他从百灵庙出发以前，德王通过日本人，寄到多伦特务机关一封介绍宝贵廷的信。这时多伦的特务机关长由浅田换成了浅海。有一天浅海突然问我：“宝音德力格尔是谁？”我忘了宝贵廷的蒙古名字，便说：“认不得。”浅海就没有叫我看德王的来信，也没有再说什么，这使我非常纳闷。半个月后，乌古廷从林西给我打来电话，说是“宝音德力格尔已经到了我这里，他要到你那里去。”我问：“谁叫宝音德力格尔？”他说：“就是宝贵廷。”我又问他：“宝见我干啥？”乌说：“他给德王当代表，可否我代表你跟他接谈，叫他不要去多伦，恐怕引起日本人误会。”这时乌古廷在伪满“兴安

军”里，因为一半人被胡宝山拉走，伪满对他已不重视，呆在林西并不得意，很想巴结德王。我一听乌古廷的口气，知道他自有己的打算，便对他说：“此事日本人早就知道了，我得请示特务机关。”我到特务机关向浅海说：“宝音德力格尔汉名宝贵廷，是我的一个亲戚，他是德王的代表，已由百灵庙来到林西，是不是让他到多伦来。”浅海说：“叫他来吧！”我给乌古廷又去电话，说是：“特务机关叫他来多伦。”乌古廷派了四个兵把宝贵廷护送到多伦。

伪“蒙疆”的大小头子们，都不把我当蒙古人来看待，连宝贵廷也认为我是老粗，不懂政治。他走进德王的门墙，很看不起我这个姐夫，所以对于德王的内幕跟我只字不提。我问他：“你为什么绕道而来？”他说：“直接走路上有危险。”我又问他：

“德王为什么要联络我？”他说：“德王力量单薄，恐怕傅作义打他，希望你联合起来，复兴咱们的民族。”后来我刺探他：

“德王是否已经和关东军勾结？为什么把信寄到多伦特务机关？是德王自己想联络我？还是关东军叫德王这么办？”宝贵廷说不知道。我一看这个小政客的鬼祟样子，便不再跟他深谈，只对他表示：“你回去告给德王，我很佩服他，至于两人今后如何合作，我得听关东军的命令。”我因处处小心，说完话即领上宝贵廷去见浅海机关长。浅海要留我们吃饭，我托故回了司令部，他被留在特务机关，深夜才回我家中休息。不知他耍了些什么手段，引起日本人对他的重视，第二天即由于兰泽领上飞往长春，后来飞回苏尼特，从那里回了百灵庙。

到了这年冬天，德王才在多伦飞机场和我初次见面。因为这时百灵庙“蒙政会”快要分裂，由于德王以云王名义免去西公旗石王的扎萨克职，引起绥远乌伊两盟王公的反对，傅作义策划成立察绥两个“蒙政会”，于是德王的反心日益暴露。他是到长春见过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回苏尼特路过多伦降落，停留半小时，匆匆和我会谈的。我虽然不愿当汉奸的崽子，但是和德王还没有共

过事，心里以为他是个不平凡的王公，所以带着参谋长和两个师长，并令副参谋长刘正中率领着二百兵组成仪仗队，到飞机场表示隆重欢迎。多伦特务机关长浅海，“善邻协会”会长中岛和我的顾问下永，以及来到多伦的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尖浦，也到了机场。德王乘坐一架四引擎飞机，里边除了司机还有五个带校级肩章的日本人。他拖着长辫子，在军号中走下飞机和日本人握手寒暄后，跟我开始了简短的谈话，因为我的顾问下永跟在我身后四五步地方偷听，使我们不能畅所欲言。

他首先问我“你的军队有多少人？”我不愿告给他真实数目，只对他说“有五六千人，没有好武器。”他又问我“有多少蒙古人？”我说：“留在林西有一千七，带到多伦是少数，并且不是草地的蒙古人。”他希望我给他成立一团蒙古骑兵，做为他的警卫和建军的基干，他要派一个国民党军校毕业的蒙古学生前来训练这个部队。并且叫我越快越好，他等着急用，因为百灵庙没多少兵，怕傅作义前去袭击。他还问我：“百灵庙吃紧时，你从多伦支援，几天可到？”我说：“急行军三天可到。”他喜形于色地说：“这可好了，我有了底了。”又说：“关东军给我拨下五十万交通票，我已汇到天津。”我说：“我不需要钱，你还有什么事？”他说：“见到你以后，我放了心。我们今后要加强联络，这里有电台，我那里也有电台。”我说：“电台是日本人的，咱们要直接联络。”他说：“对得很。只是如何联络？”我说：“你用‘传箭’（蒙古王公有了紧急事，拿上令箭和公文叫牧民日夜传送），我用快骑。”因为飞机上的日本人催着叫他赶快走，我们的初次会见，就如此结束。

德王飞走后，我和日本人一齐回到特务机关。浅海问我和德王谈了一些什么话，我把前半段告给他，至于我和德王直接联络的事，当然不对他说。这天多伦特务机关为我和德王会见举行了宴会，日本人都因我和德王联合在一起而祝酒。可见德王路过多伦会我是关东军的指示，我对此很感不安，恐怕在中间再插进一个

蒙古上司。

我答应给德王成立一团骑兵，舍不得贴本，耍了一个手段，让胡宝山再从乌古廷那里往出拉兵，于是又从林西跑来枪马齐全的六百多人，给德王凑了一个警卫团。乌古廷因部队七零八落，所剩无几，最后被伪满的“兴安军”踢出，在一九三六年春天，不得不离开林西到嘉卜寺投靠德王。那一团骑兵，由德王派南京军校毕业的喀喇沁左旗人乌云飞，悄悄地从百灵庙来到多伦，训练了一个时期，带往嘉卜寺，后来由“蒙政会”的代理保安队长宝贵廷充任了这个警卫团的团长。我给德王成立起一团人，不但一文钱未给，而且自从见面以后，迄未按照我告给他的办法直接和我联络过。他以为我已经成了他的仆从，有事可以发号施令，根本用不着和我商量，使我很后悔。从此我把德王看成一个志大眼小的人，决定不依附他，未来的前途和出路，还得指望自己的枪杆子去打。

（四）占领察北六县经过

一九三三年八月，冯玉祥离开张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察哈尔北部，又恢复了七月间“抗日同盟军”进攻多伦以前的那种状态。一九三五年，情况有所转变：先是一月间日寇派飞机轰炸赤城、龙关；二月间中日双方在大滩开会，决定二十九军的部队撤自长城底下驻防。在张家口外，也发生了一九三五年前的第一次“张北事件”和六月间的第二次“张北事件”，结果由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和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订立了中日双方驻军以长城为界的协定。因为我的伪军还没奉令南犯，二十九军对此不曾履行。这是由于“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人已把东北军于学忠部从河北逼走，想叫宋哲元暂时维持冀察两省局面，故在察北方面不好意思过于压迫二十九军。

我于一九三三年四月投敌，到一九三五年，和日本人相处了二年多，渐渐习惯了当汉奸的那种生活。后来，看到北平的何应

钦向日本人屈膝，宋哲元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便产生了“老子是挂牌的娼妓，你们是半开门的婊子，咱们谁也不要笑话谁，都是些蠢种”的想法。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冬天和德王在多伦机场上会了一面，拿上“复兴民族”的大幌子，更给我的投敌做了遮盖布。所以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多伦进犯察北六县的时候，我野心大增，想把察北完全占领后，下一步去夺张家口，幻想如同我的汉奸老师张海鹏那样，过一过当伪察哈尔省长的瘾。

察北的战事于十二月开始，在十一月间就作了准备。我看见子弹不断由承德运来，便和人们说：“快打仗了。”因为多伦特务机关和我的日本顾问，只是在出发的时候给我下达命令，事前并不跟我商量，我也不敢打听，所以只好揣测。最初我认为是进驻百灵庙，因而我给官兵们买了好多毛鞋，把多伦街上的毛鞋完全买光。由于日本顾问掌握着经费，我是卖了自己从热河带出的十几辆马车和一百多头骆驼的钱给官兵买的毛鞋。还有三百多兵出发以后因无毛鞋而把腿冻肿，都由前方抬回多伦，被特务机关长浅海看见。浅海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派田中隆吉参谋前来查办。经过调查，下永贪污了好几十万，进入张北以前即把他撤换，以后经费由我掌握，到了张北我开始有了钱。

当时察北六县，只张北驻有二十九军刘汝明的部队，其他各县只有警察和民团维持秩序。十二月中旬某日，多伦特务机关向我发布了南犯的命令。宝昌因为没有防守的价值，我们未到以前，当地警察民团即弃城逃走。根据便衣侦察，沽源城内有白凤山所带的三四百民团据守。我为了夸功，谎报日本人说是有二十九军的一旅骑兵。独石口外最大的商镇平定堡，内有天主教堂，察北的地主富户都逃到那里，上边飘扬着比利时国旗。日本人怕引起国际纠纷，禁止我们打动该地，所以决定只攻沽源县城。由宝昌出发时，下永顾问除了把八门野炮留下，保护二十多个日本人和四十多个蒙古童子军，并且叫我也不要上前线，指定参谋长陈宝泉指挥刘继广和尹宝山带着两门山炮，掩护骑兵去攻城。我撤过下

永顾问，对参谋长、师长及副参谋长刘正中说：“下永支配我，小顾问支配你们，你们要听他们，有时也不要听他们。攻城时先用山炮打开豁口，骑兵再往里冲，把敌人轰跑以后，即不要追击。”参谋长陈宝泉一言不发，心情特别愁苦，我怕他们路上寒冷，给了他们一打子威士忌酒。陈宝泉当时拿过一瓶就喝了大半，我把那半瓶酒抢过，他才勉强上了马，去追赶队伍。

防守沽源的白凤山，在察北与曹凯齐名，虽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很热爱祖国。他把三门紧闭，将沙袋堆在土城墙上固守。沽源离宝昌九十里路，我的六千多骑兵，当天就到达城外，里边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惧。我军于第二天拂晓发动攻击，陈宝泉没按我的指示指挥队伍，而是将沽源四面包围，两门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里的县政府乱打，结果把所带的七十发炮弹打的剩下两发，也没有将城攻开。刘继广的兵在城墙下面喊话，叫里边缴枪投降，白凤山的人当然不听这一套，我的兵一露头就射击。从多伦派来两架飞机助战，白的人亦不动摇。飞机在城内扔完炸弹，在城北扔下一个通信筒。松井顾问派兵把通信筒拣起，坐上卧车开到北门外边，到刘继广的指挥所进行研究。陈宝泉本来在西门外掌握部队，见有人拣起通信筒开上汽车到达北门外，他也骑着马跑到刘继广那里。刘的指挥所是三间土房，距北门有一箭之地。刘站在房檐底下，陈和松井竟在汽车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凤山防守北门的民团发现，朝着他们放了一排枪，子弹从陈宝泉的脑部穿过将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刘继广用火药压制住北门上民团的火力，才和松井把陈宝泉的尸体抬上汽车，后半晌运回宝昌。

我一见参谋长阵亡，当时就发了毛，将八门野炮全装上汽车，下永顾问没敢阻拦，两个钟头就开到沽源城外。因为天已昏黑，我叫把八门野炮摆在城北，决定翌日拂晓攻城，下令不许放走一个民团。夜里又想，不能在沽源充好汉，还是少杀中国人为妙，因此又叫刘继广放开东门，好让白凤山撤走，能把沽源占

领，就算交代了日本人的公事。第二天攻击时，八门野炮集中只打一点，各发了两炮，就将北城墙轰开，瞭见白凤山的骑兵从东门跑出，才叫我的兵冲入。他们捉住十几个没有跑脱的民团，主张都弄到宝昌给参谋长祭灵。我不忍完全杀害，又怕日本人知道我故意放脱白凤山，只把一个俘虏弄到宝昌，被二十多个日本人在陈宝泉的灵棚前用刺刀活活戳死。我占领沽源以后，康保、尚义和商都，都没有遇到抵抗，尹宝山部就开入。尹宝山并把一团人开进绥东陶林县城。

陶林是绥远主席傅作义的地盘，因为兵力不够分配，集中队伍去防守集宁，才临时把陶林放弃。我不愿意两面作战，腹部受敌，认为占领察北是履行秦德纯和土肥原的协定，占领绥东五县还找不到借口。宋哲元已经和日本人勾搭，他弃守察北不会成为多大的问题；傅作义抗日，我进犯绥东一定要惹麻烦。我通知尹宝山，叫他千万不要继续前进，建议下永顾问要趁势占领张北。大概是关东军叫我们看一看能否在绥东立足，让我和下永由沽源飞陶林视察。我们上午飞到陶林。午饭后，我趁出去解手时向那进入陶林的团长使了一个眼色，在厕所中和他说：“傅军一来，你就往出撤。”我们回去和下永没有抽完一支烟，突然又来了一架飞机，叫我们两人赶快返回，说到多伦有要紧事情研究。回到多伦特务机关，里边坐着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他问我：“李司令官！你对战局有何看法？关东军相信你，并且特别尊重你的意见。”我说：“现在先要占领张北，把察北攻下再图绥东。”他说：“这很对。我们也是这样打算。”当天浅海叫我把队伍都抽回来去占领张北。

我占领张北的时候，没有遭到二十九军的抵抗。他们事先就撤回张家口，连张北和张家口中间的大坝上，也没有布置队伍，所以我的骑兵一直冲到大境门外。我进张北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白天，第二天是一九三六年的元旦。田中玖是元月初旬到张北的。

张北距张家口一百二十里，中间有一道大坝。从张北往南走五十里上了坝顶，再往南七十里全是下坡。我在这个坝顶布置了一团人，警戒张家口的二十九军，并派便衣侦察其他情况。因为田中玖是我最初接触的日本人，我把他看成知己朋友。还没有等我要求，他便向关东军司令部替我说了好话。占领张北没有多久，关东军便对我的部队认真给装备起来，一次拨来一万二千枝“韩林春”式步枪，三十多门野炮，三十多门重迫击炮，三十多挺重机关枪，一百多挺轻机关枪，还有日造的“拐把子轻机枪”四五十挺。

当这批武器在二月间由沈阳运来以前，田中玖曾开上自己的卧车去了大坝梁顶上好几次。他把汽车停下，张家口也开出一辆小卧车，我的兵以为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的，不敢制止，不敢盘问，只站在老远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我接到类似这样的几次报告，感到里边有重大秘密，便托在张家口经商的一个朋友王子玉替我了解张家口开出的汽车里边坐着谁。原来，王开设着一个“东鲁汽车公司”，往来通辽和林西搞运输。我占领多伦后，“东鲁”的汽车也跟到那里，我占领张北后，又在张北和张家口之间开行。王是山东人，二十九军里有他的熟朋友。调查结果，知道是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的秘书杜运宇和田中玖会谈，其他情况没有打听出来。杜也是山东人，在日本留学时娶了一个日本老婆。由于他很早就当了汉奸，所以张家口沦陷时曾代理过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伪“蒙疆政府”成立以后，他一直担任司法部长。

由于刘汝明和日寇暗中勾结，关东军拨给我的武器，不是由沈阳经承德用汽车运来张北，而是用火车运到张家口，我派日本人驾驶的汽车接运。“七七”事变以前的弹药服装，都是如此的运法。所以给我拨的一万二千枝步枪被刘汝明留下两千枝，运到张北三十门野炮，也给刘汝明运回张家口八门。这时我的八千多人，一律都换上新枪，子弹堆满仓库，大概拨来两千万发。我哇

尹宝山师驻在商都向绥东警戒，刘继广师布置在外围，保护张北县城。“何梅协定”签订以后，华北各重要城市都有了日本特务机关，张家口是由领事馆代替特务机关，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是羽山少佐，张家口的领事和归绥的羽山，均受张北的田中玖指挥。田中玖有时对我也吐露一些真情实况。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间，就叫我准备进犯绥东。他说：“德王已被傅作义从绥远撵出，对于察哈尔长城以南的地方，咱们暂不打动，但是对于绥东则必须占领，这样你们复兴蒙古就有了地盘。日本军队还不能出面参加，需要德王和你以及王英与冀东方面共同出兵，他们都没力量，进攻绥东以你为主力，关东军所以装备你就是为此，你要作出贡献。”

田中玖和我说了这话不久，有一天上午七八点，突然叫我跟上他和羽山少佐坐飞机到归绥上空侦察。这时傅作义以建筑环城马路为名，在归绥旧城构筑了国防工事，我们飞到旧城上空，飞机盘旋很低，我能用肉眼看见碉堡。田中玖和羽山少佐拿出照像机把底下的一切都拍入镜头。飞机飞到西河沿时，见一个女人在院子里挥动日本国旗。羽山笑着和我说：“这是我的老婆。”我们侦察完毕，往武川飞的时候，飞机发生了故障，便在归绥北面红山口以东的小尖山前面的平滩上落下。附近的老乡有好多人在耕地，谁也不敢过去观看。傅作义因为标榜着“有事不怕事”和“无事不惹事”的对日主张，亦未派出骑兵来盘查。我们都很着急，田中玖和羽山跳了下去，寻找飞机的毛病，叫我坐在机仓中不要露面。好在飞机是丢了一个螺丝，修了半个多钟头，即继续发动，飞向张北县。

（五）“乌珠穆沁会议”前

我于一九三五年底进入张北后，到翌年四月二十四日“乌珠穆沁会议”决定将我的队伍改编为“蒙古军”前这一阶段，由于

我把察北完全控制，日本人又给了那么多的武器，比在多伦多时，渐渐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宋哲元想拉我过去，曾托我的团长陈景春向我试探。我怕宋哲元把陈拉走，占领张北后，即将他由刘继广部拨归尹宝山指挥，调到商都、南壕堑驻防。因为宁得罪远亲，不得罪近邻，听见宋哲元在北平给他母亲过寿，我主动让陈景春代表我前去祝寿，送了一架我亲手在围场打住的十五两重的梅花鹿茸，宋赠了我一块价值四百元的怀表。后来宋哲元说他子弹困难，我叫陈景春送到柴沟堡车站三十万发，宋以为我倾向于他，故最后托陈景春对我劝降。

陈景春对我说：“宋主席对你非常钦佩，特地派代表来跟我接头，希望咱们和他们合作在一起抗日，故来向你报告。”陈景春比我年长，我说：“大哥！咱们暂不谈别的，我先问你，宋哲元能给我二十九军的军长吗？能给你扩充枪马齐全的一师骑兵吗？”陈说：“我头脑简单，没有想到这个。”我说：“宋哲元并不比我大，我也不见得比宋哲元小。他虽是蒋介石的干儿子，在日本人跟前还不如我吃香。要找咱们直接找老蒋，我不拐宋哲元这个弯。”陈景春问我：“难道咱们不抗日吗？”我说：“我叫你送给他子弹难道是叫他杀中国人吗？”我并说：“现在日本人正给咱们扩充，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到了一定程度和适当时机，我自有办法。你不要以为我和德王已经联合，这完全是扯淡，他们把我按汉人看待，我也以汉人自居。”我还说：“咱们现在是带着假面具，没有揭破就尽量装着，多装一天能多得到补给，到了装不住以后，再反正也不迟。有这一万枪枝人马，谁也欢迎咱们，不要愁拿上一颗肥猪头找不见庙门。”陈景春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以后便不跟我谈论此事。

继宋哲元之后，傅作义也派代表来跟我接洽。因为察北沦陷和冀察两省特殊化以后，张家口成了一个策动侵犯绥东的地方，故傅把绥远省政府的交际处长刘云峰调到张家口担任办事处长。这个人很能钻营，不知用什么方法和“东鲁汽车公司”的经理王子

玉拉上关系。一天刘继广叫我到他的公馆去吃饭，说是顺便谈一件要紧事情。我到了以后，看见王子玉和一个穿便衣的陌生人在刘继广那里。刘继广向我说：“这是子玉的朋友，绥远傅主席的代表刘云峰处长。”刘指着地上堆的成箱整篓的糕点水果对我说：“傅先生知道李司令官在察北非常艰苦，特派我来代表他向您问候。”寒暄过后谈到正题，我一听是傅作义闻听我和刘汝明弄了日本人很多武器，他因受阎锡山压制克扣，也想诓骗一些武器弹药，以扩充自己的力量，故打发刘云峰来向我“问道儿”。我说：“羽山不是在归绥吗，你们可以和他直接去谈。”刘说：“羽山是少佐不如田中玖大佐在关东军方面说话有力量。”我说：“你想和田中玖接谈，恕我不能给当介绍人，要找其他关系拉线，谈的时候应该张大口，数目越多越好，傅主席为了爱国走这条路，我对他很表同情。”刘云峰只见过我一次，我叫王子玉在张家口买了一些回敬傅作义的礼物。

由于我刚愎自用，除了主要依靠汉人给我扛着八九千枝枪，在政治上可以说非常孤立，故只好认贼作父。德王因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两个“蒙政会”的组织大纲，指定绥境“蒙政会”设于伊盟的伊金霍洛，察境“蒙政会”设于锡盟的嘉卜寺。并且因傅作义支持西公旗的石王，派兵占了乌拉山里边的梅力更庙，将倾向德王的依喜达克登尔大喇嘛击毙，给他很大的难堪。他因“蒙政会”分裂，不能在绥远立足，曾在我占领张北不久，在苏尼特举行一次所谓“滂江会议”。因为德王本人和其左右，从我和他开始合作以后，许多大事都对我回避，老瞒着我去搞，所以这次会议既没有让我前去参加，也未告给我开会的内容。据我判断不外是更进一步投靠日本，撕破脸充当汉奸，企图坐伪蒙的傀儡儿皇帝。为了首先对傅作义进行报复，把已策划组织的伪“察哈尔盟”变成事实，好为进犯绥东做借口。他在召开“乌珠穆沁会议”以前，突然坐汽车跑到了张北。

在一九三四年金永昌和于兰泽到多伦策划组织伪“察哈尔

盟”时，卓世海未敢担任伪盟长，现在他在百灵庙已经呆不下去。当我占领张北不久，卓就主动派人向我联系，说是想回家看看，试探我是否对他支持。由于我不是察哈尔人，他回来和我利害不冲突，故叫他放心回来。他于二月间到了张北，住在熟惯的商号里边，没有回镶黄旗，一直要等到德王到来。我不愿意替德王领导的这一帮蒙古人卖命，对于他们演的丑剧，只作旁观者。卓世海和我没谈别的，我也不向他打听什么，我们维持着普通朋友的关系。

蒋介石为了叫德王悬崖勒马，服从他的察绥分治主张，除了以救济察北和锡盟的雪灾为名，给察境“蒙政会”拨了八万元赈款，并派白云梯由南京来苏尼特劝止。因为伪“察哈尔盟”一旦成立，绥东五县就会发生问题。继派吴鹤龄和尼冠洲前来张北，阻止卓世海就任伪职。吴是喀喇沁人，尼是察哈尔人，白是跟着德王由苏尼特来到张北，吴和尼两人相随着由张家口来到张北，等到德王来到后，他们两人才露了面。随德王来张北的，除了白云梯，还有东苏尼特旗的郭王，布里亚特的迪鲁瓦喇嘛和“蒙政会”的包悦卿。德王住在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那里，他没有过来看我，也没叫我去看他，和他同住的还有从长春来刚下飞机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白、包和郭王以及迪鲁瓦，都下榻到我的司令部，白和包是内蒙的知名人士，郭王是个笃信喇嘛教的人，迪鲁瓦带领的布里亚特人那时正流浪在宝昌一带。

第二天伪“察哈尔盟”就要成立。晚上卓世海带着尼冠洲来见众人，尼的外表和谈吐相当文雅。他说他不同意这个盟的成立，我才知众人这次来张北是专搞此事。尼说出此话，卓世海没有答理，郭王和迪鲁瓦因为听不懂汉语，都闭着眼睛念佛，白云梯和包悦卿亦不表示意见，我当然更不好意思打听。客室中沉默了一阵，我叫厨房给开饭。饭后卓世海和尼冠洲辞走。金永昌从特务机关来到，我问：“尼冠洲是何许人？”金说：“他是跑到南京的察哈尔部的一个总管。”来到这里的人都各怀着心事，郭王

和迪鲁瓦打座养神，包悦卿不住气的抽鸦片，我见白云梯躺在炕上无聊，便和他闲扯起从外蒙往内蒙运枪的往事，我并且很冒失地问他为什么由左向右转，他没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我提起伪“蒙古自治军”的白云航，他说是他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吃过饭，众人叫我也去参加伪“察哈尔盟”的成立典礼。举行典礼的地方，在一个有三间土房的小院里边。这三间土房两明一暗，是特务机关让张北县刘县长派人把住户撵走，准备做未来的伪盟公署。我们走进外间，已经先到了二十多人，打开里间的门一看，德王和两个田中在说话，德王这才向我打了一个招呼。不久卓世海来到，也走进去和他们嘀咕。我知趣地走出那三间土房，众人亦跟着我到院子里边散步。我发现二十多个人里边，有一个长着鹰鼻子的人，跑到墙拐角望着天上的白云沉思。我看见他的像貌长得非常阴险，由不得对他上下打量，金永昌走到我的跟前对我悄悄地说：“这就是吴鹤龄。”不久卓世海出来，叫众人进去开会，卓站在桌子后边，我们都站在桌子前边，卓宣誓完毕，两个田中和德王都来致词，伪“察哈尔盟”就这样成立，出来时门口已挂上了牌子。

这天德王的气色很不好看。我们送他和田中隆吉到北门外飞机场，坐飞机回苏尼特时，他神经紧张地把我拉过一旁，对我说：

“你给吴鹤龄弄五箱汽油，叫他赶快坐上我从苏尼特开来的汽车走，上边有十五个兵保护，越快越好。”我知道这里边有问题，因为机场上的人很多，故未向德王打听，只说了一声“好吧。”白云梯、包悦卿、鄂王和迪鲁瓦都没有走，我领上他们回司令部去吃午饭。饭还没有摆好，外边的卫士便来报告，说是有一个姓吴的人坐着一辆卡车前来，要五箱子汽油，我叫副官给搬去五箱，因为事情紧急，没有留下他和众人在一起吃饭。我们正吃饭时，西门的卫兵给副官处打来电话，问有一辆汽车要出城，允许不允许出去，副官处向我请示，我说：“不许拦阻。”原来日本的小顾问们给四门下了命令，不准随便放汽车出城，吴鹤龄因西

门走不出去，改走北门，北门外是飞机场，汽车来往很多，才跟着好多汽车混出张北县城。

白云梯、包悦卿、郭王和迪鲁瓦以及尼冠洲，都于饭后乘商车回张家口。白云梯等都是在我司令部门口上车，尼冠洲因住在卓世海那里，是从街上上的车。我要出城送他们，白云梯等在门口拦住，都很沮丧地说：“你事忙用不着了。”他们这部汽车是包的商车，于下午一点多钟离开张北，到了三点多钟的时候，田中玖叫我和刘继广以及驻在张北的两个团长去特务机关开会。他说：“刚才开出张北的一部汽车，走在离城十八里的地方被胡匪给抢了，还打死一个蒙古人，你们赶快派队伍去追。”我一听非常吃惊，不知被打死的是白云梯还是尼冠洲，总是他们因为阻挠伪“察哈尔盟”成立，遭了日本人的毒手。我们从特务机关出来，刘继广和两个团长问我：“追到什么程度为止？”我说：“追什么！出去绕一个圈就回来。”队伍开出去不久，我回到家里躺在炕上抽鸦片烟，盘算今天上下午发生的一些事情。突然田中玖的卧车开到。他亲自从车上扛下一捆日本的“将校呢”，气喘吁吁地走进我的卧室。他说：“这个给你，你给团长以上的军官都做一套，这是关东军的赏赐，你收下吧。”我知道他是杀了一个蒙古人以警告其他蒙古人，又怕我带的大小汉奸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故拿上“将校呢”安慰我们。他再没提汽车被劫的事，我也装糊涂，扯了一些闲话，他抽了一支烟便辞走。

我对内蒙古这些所谓知识分子，虽然越接触越感觉他们滑头，但是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又关心起吴鹤龄的安全，便赶快给嘉卜寺的宝贵廷打电话。我知道田中玖的表弟草野谷在德王的警卫团当顾问，我怕吴鹤龄去苏尼特走进嘉卜寺遇害，叫宝贵廷派出人拦阻汽车，让吴鹤龄直赴苏尼特。宝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你们王爷叫我传达的命令。”果不出我所料，我刚吃过晚饭，便被田中玖叫到特务机关闲扯，直扯到三更天才叫我回家。因为嘉卜寺距张北县四百多里，他怕我夜深人静给打电话，

那知道我在晚饭以前就通知了宝贵廷。我为此事一夜未曾睡觉，第二天就叫胡宝山给我调查汽车被劫的真相。张北的特务机关由我派出一排蒙古兵守卫，据守卫的兵向胡透露，在伪“察哈尔盟”成立的那天下午，特务机关的日本人大杉，从他们排里挑出十个人，都带上武器上了汽车，外边用帆布盖着开出张北南门，去追赶那辆商车。追到小孤山附近叫商车停下，大杉问：“谁姓尼？卓盟长请你回张北去。”尼冠洲下了商车走到大杉跟前，当即被大杉掏出手枪击毙，让那辆商车继续开往张家口。尼冠洲是否也像韩凤林那样脚踏两只船，我不很清楚，只是知道因为伪“察哈尔盟”的成立，他是最先流了血。

大杉带着十个兵打死尼返回张北，没停留多久，便继续开出西门去追吴鹤龄。吴鹤龄的车开得很快，大杉望见吴鹤龄的车距离嘉卜寺不远，才连夜折回张北。因为是在半夜三更，宝贵廷没有重视这事，根本没打发人拦车，所以吴鹤龄的车开入嘉卜寺。草野谷接到田中玖的电话，看见吴带着十五个苏尼特兵，自己不敢下手，叫宝贵廷下手，弄得宝左右为难，直撵吴鹤龄赶快走。吴因疲劳不堪，又受了惊怕，知道在嘉卜寺相当保险，所以赖在宝贵廷的团部不走，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坐上汽车到了苏尼特。以后吴鹤龄任了伪“蒙疆政府”的政务院长，宝贵廷也升了伪“蒙古军”的师长。吴曾被人们目为伪蒙疆的宰相，但是他肚子里撑不开船，由于宝给他下过逐客令，故对宝始终怀恨在心。对我暗中搭救他也没有表示过谢意，认为我是德王的部下，应该对他进行保护。我就是在日本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和类似吴鹤龄的这一帮人共事，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乌珠穆沁会议”以后，参加了德王在嘉卜寺成立的伪“蒙古军政府”，在我的个人历史上，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罪恶阶段。

日寇统治伪蒙的策略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伪蒙，完全是采取了他们奴役榨压朝鲜、台湾人民所取得的经验，并抄袭了中国历代王朝、北洋军阀及国民党反动派笼络怀柔边疆少数民族所使用过的手段。随着国际局势和侵华战局的变化，针对伪蒙内部的各种矛盾，运用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把蒙奸和汉奸全玩弄在掌心，使蒙、汉人民不敢起来反抗。伪蒙政权这个历史怪胎，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日在嘉卜寺正式诞生，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随着日本投降在张家口土崩瓦解，一共存在了九年零三个多月。在此期间，经过两度改组，头绪相当纷乱，特别是由伪“蒙古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由草原迁移进城市以后，内幕更为错综复杂。为了便于近代史研究者了解伪蒙历史，还是首先介绍日寇怎样统治伪蒙。兹就我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兼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的经历和见闻，举出事例说明此种真实情况。

(一)

“九·一八”事变后，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其姨父补英达赖的策划下，公开跑到南京，补则密赴大连，和蒋介石与日本“关东军”同时进行政治勾搭。在双方都想争取他的情况下，把身价提高了。加之西藏的班禅喇嘛，在这前后替他由东向西联络内蒙各盟旗的王公，他便有了统一蒙古，想当“蒙古皇帝”的野心。一九三六年，他跟蒋介石表面决裂，在嘉卜寺(今化德县)成立伪“蒙古军政府”时，即以成吉思汗诞生的那年做为纪元。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想利用德王的伪政府和我的伪军，由察北进犯绥东，所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曾默许帮助他建立一个相同于伪满那样的国家。德王和溥仪不同，他不敢搬用君主立宪的帝制形式，

而是让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云王），锡盟盟长索特那木拉布坦（索王）和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充伪政府的正副主席，他任总裁兼伪“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

日寇公开成立伪满洲国，对于蒙古是“分而治之”，绝不许德王把蒙古统一起来。“九·一八”事变初期，他们为了利用东蒙，曾组织过伪“蒙古自治军”，但到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成立以后，即把东四省境内的盟旗划入伪满，以兴安岭这个山脉命名而不以民族命名，分成伪“兴安”东西南北四个省，“蒙古自治军”也改称为伪满的“兴安军”。德王因此在我进驻多伦时，他跑到伪“兴安”西省，和伪“兴安军”总司令巴特玛拉布坦（扎赉特旗王爷）等好多人，瞒过日本“关东军”举行过一次民族团结的“歃血同盟”。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我跟傅作义、门炳岳和刘汝明的军队，在商都和张北作战期间，由于嘉卜寺被袭，德王没敢到察北前线而逃往多伦，巴特玛拉布坦为了践盟，从伪满前来多伦，对他加以保护，东条英机的军队攻陷张家口，他才被陶克陶坐上飞机找回，到张北重新跟我合在一起。

张家口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沦陷，大同于九月中旬，归绥和包头于十月十四日及十六日相继沦陷，从此日寇将平绥路西段打通。德王和我率领伪“蒙古军”等一枪未放，跟在日本军队的后边，由察北进入归绥和包头。长城内外至外蒙边境一带，既是日本人打出来的天下，当然日本人要进行统治，决不肯叫外人去做主子。所以在伪“蒙古军”由察北向西出动期间，日本占领军和特务机关并没有和德王商量，就在宣化、大同两地区成立伪政权，九月四日扶植张家口的商务会会长于品卿为主席，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十月十五日又扶植大同的前清拔贡夏恭为主席，成立了“晋北自治政府”。十月二十七日，才将锡林郭勒盟、察哈尔部、乌兰察布盟大部与土默特旗这个范围，在归绥令德王成立了一个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德王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标榜内蒙古自治是名，而图谋内蒙古独立是实。但

日寇却把伪蒙视为和“察南”、“晋北”以及汉奸殷汝耕的“冀东”相同的政权，由梦想的国家降为特殊地区，使他大失所望，其他蒙奸也大感不快。

伪蒙在“军政府”时代，受“关东军”操纵；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在张家口一地就出现了三个上级衙门。先是日本的张家口特务机关和“驻蒙军”军部，接着是“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月而组织起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此外在张家口日本侨民居留地，还有一个受东京直接“嘱托”、现役少将级军官为首脑的管理及监督伪蒙政权的机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日本虽然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蒙古联盟”、“察南”、“晋北”三个伪政权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随着取消，但具体统治它们的是日本“驻蒙军”军部和特务机关。这种状况一直到日本投降前没有变动，只是名称上更换了几次。特务机关先改称为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以后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始终挂着牌子。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前，它就管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和“蒙古军”总司令部。移到张家口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仍留在归绥，从小仓特务机关长开始，便兼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最高顾问，当然兼管设立在归绥的“巴彦塔拉盟”盟公署。

伪蒙在“军政府”时期，伪正、副主席和总裁之下，只有军事、民政、财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后，有了政务院和参议府。在政务院总裁之下，设立了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并将伪政府所在地的归绥，按蒙古语音改称“厚和浩特”，且定为“首府”。这就是德王硬要把他的伪政权铺排成一个国家的样子。“联合自治政府”迁到张家口后，在纪年和“首府”之外，又挂出了“黄（代表汉族）、蓝（代表蒙族）、白（代表回族）、赤（代表日本大和民族）”的四色“国旗”；同时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添了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

署。政务院下面除了原先的总务、财务和保安三部，又增加了民政、司法和交通三部，以及牧业总局、椎运清查总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附属机关，并且把“察南”和“晋北”两个伪府，改组为属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两个政厅；一九四三年，将这两个“政厅”改为“宣化省”与“大同省”。于是伪蒙政权最后形成了一个辖有五盟两省四市和面积五十万平方公里与人口五百五十万的“国家”局面。

日寇虽然允许德王的上述那样折腾，但是对于伪蒙并不按国家来看待，除了把伪蒙简称为“蒙疆”，在伪府政务院之下却不许设立外交部；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后来改称为公使馆，而没有改称大使馆；伪蒙驻东京、长春和北平的执行外交联络的人员，也称为驻日代表部代表，驻满代表部代表和驻平办事处处长。德王两次访日时，日本天皇裕仁并没把他看成一个国家的元首，象对溥仪那样接待。德王访满的时候，溥仪也未亲往郊迎，只是赐以便宴，而未举行国宴。最给蒙古民族丢人的，是德王见了溥仪，还行了三跪九叩首的跪拜礼。我因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设在归绥，到张家口是暂来暂往，不知汪逆精卫访问德王，和褚民谊与苏体仁代表伪南京“国民政府”与伪北平政权访问伪蒙时，德王如何招待，但伪满驻伪蒙的代表李宜顺，和伪蒙驻日代表代表部特克希布彦（王宗洛），在张家口官场的宴会上，都被恭称是“大使”，这不过是为了听来舒服，叫着过瘾罢了。

从日寇不承认伪蒙是国家来观察，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协助蒙古民族复兴”，完全是骗人的谎话。假借蒙古的旗号，做他们的政治招牌；利用蒙古败类，当作他们的侵略工具；搜刮蒙古人民的物资，充作他们的战争资源，才是日寇的真正目的。德王起初对此还不甘屈服。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家口成立起“蒙疆联合委员会”，日寇曾叫他担任这个机构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委员长，他坚不就职，以示抗拒。推诿到一九三九年四月，才答应担任了这个傀儡。头一次访问日本是在“联盟自治政府”时

代，他以为伪蒙不能建国，是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驻蒙军”军部捣的鬼，不是日本政府的本意，他主要是为告“御状”而到东京的。不料“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警告给德王担任翻译的伪府财政部长吉尔嘎朗（即德古来）不准对新闻记者说出“建国”两个字眼，否则要砍吉尔嘎朗的脑袋。德王见了天皇裕仁和陆相坂垣征四郎，提到“建国”问题，都叫他回去和驻蒙的联络部与军部研究。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很扫兴地从东京回到归绥。一九三九年九月，改组为“联合自治政府”时，先是德王叫东蒙的几个知识分子舞文弄墨，反对“蒙疆”的“疆”字。援古证今，想把伪蒙变成日本体系里边的一个邦，在那个“邦”字上大做文章。但均没有得到东京的批准。以后他便赖在归绥不走，不去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主席的新印。日本“驻蒙军”曾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两次从张家口前来劝驾，并命令我在归绥就近“逼宫”。我虽没有逼他，但“驻蒙军”给他来了一个申斥性的电报，表示他如果不去就职，便要另选旁人，他还是乖乖地到了张家口。

尽管德王以元首自居，吴鹤龄也摆着国务总理的架子，在一九四〇年汪精卫“还都”以前，日寇为了敷衍汪逆，指定华北的王克敏、华中的梁鸿志和“蒙疆”德王，出席坂垣操纵下的“青岛会议”，显出日本人要把伪蒙变成汪精卫领导下的“蒙政会”。德王恐怕降低身份，叫我以伪蒙疆政府副主席的资格前去出席。最可笑的是一九四三年初，日寇在进兵广西以前，唯恐华北的伪军在后方捣乱，冈村宁次（日寇侵华指挥官）以召开联防会议为名，把我和汉奸庞炳勋、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等伪军头脑，都召集在北平软禁了半个多月。在接到“驻蒙军”转来冈村的通知时，德王还曾去电问明允许我坐首席以后，才叫我前去参加。汪精卫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在南京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时，德王受日寇指使，不得不派伪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卓世海）和伪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当该会委员，他和我及吴鹤龄

的名字，虽然没有和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梁鸿志等并列在一起，可是伪蒙疆政府和伪北平政权与伪维新政府，都被人们视为汪伪国民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说伪蒙是日本的孙子辈，没有取得和伪满、汪伪政权同等地位，顶高是等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那样的傀儡政权。

(二)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时，松井任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伪府的政务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和军事最高顾问高场损藏，均受松井直接指挥。其时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长为酒井隆中将，而领导“联盟”、“察南”和“晋北”三个伪政权的“蒙疆联合委员会”，又是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同时在我的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部里边，还有一个次于最高顾问高场的，并且很跋扈的盘井顾问。因为这几个主要统治伪蒙的日本人名字里边，都有一个“井”字，加之自从进城以后，日本人对我们的态度完全改变，不禁使伪蒙群魔产生了“我们吊在井里”的感慨。

在察北的时候，由于他们一方面想利用我们，一方面又怕我们不可靠，所以表面上对我们相当客气，并且处处迎合迁就；可是到了归绥以后，本来是日本出兵打下的地方，而我们却去坐享其成，众人自知礼屈，不由得低声下气起来。另外，国民党的军队在日军进攻之下，都是节节败退，到了一九三八年春，连上海和南京也相继放弃，不少人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日本人虽然嘴上没说，但是眉目间却表现出“你们占了便宜，还不感恩图报”以及“你们想跑就跑吧，看你们往哪里跑”的那种神气，于是大小顾问都板起主人的面孔。他们咄咄逼人的气焰，使伪蒙群魔初次嚐到蒙奸和汉奸的苦头。

“我们掉在井里”的悲叹，和一九四二年我跟德王访问伪满时，听到那里的几个大臣对我发出的“我们被装在坛子里边”的

哀鸣一样，都足以说明日寇对蒙奸和汉奸特别压制，并且跟“国统区”特别是“解放区”的人隔离，所以如同掉在井里和装在坛子里边一样，不知抗战的真实情况。关于压制方面，日寇统治伪蒙主要是由张家口的“驻蒙军”军部发号施令，“驻蒙军”相当于伪满的“关东军”。当一九三七年八月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以后，就在张家口成立。它不仅指挥“蒙疆”境内的日军和伪军，还可操纵“蒙古军政府”政治参谋，对“蒙疆”的三个伪政府实行军事管制。从张家口沦陷到张家口解放，“驻蒙军”司令官更换了莲沼、冈都、柑柏、崎田、神协和根本博等好几个人，但其政治参谋很少调动，先是竹下义晴少将，以后一直是大桥熊雄大佐。竹下虽然脱离了“驻蒙军”军部，但晋级为中将，继酒井隆之后，升为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和大桥熊雄都是日本的“中国通”（竹下曾任过“关东军”的参谋和山海关与上海的特务机关长；大桥熊雄未来伪蒙以前，在哈尔滨的日本领事馆工作多年）。这两个人对蒙奸的印象很不好，公开和“察南政厅”的汉奸们说：“蒙古已被汉人同化得快亡了。”并说：“蒙古人的反心很大，不如你们和晋北亲日。”所以“驻蒙军”军部，老是打发他们向德王施加压力。

日寇的“驻蒙军”军部，是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的顶头上司，经费和师长以上的人事，全由“驻蒙军”军部关发和决定。“蒙古军”每年的经费预算，听说为八百万“蒙疆银行”的钞票，伪蒙政府按“国防开支”费交给“驻蒙军”军部，军部转发给我的顾问部掌握。除了每月给我发两千元薪俸（内中扣去津贴最高顾问四百元和参谋长四百元，我实落一千二百元），每年给我两万元“机密费”外，我只是专刻了一个图章，交给日本人随便盖用，其它情形我从不过问。我的军需处长崔景岚，也仅知管发总司令部人员和各师的数字，此外他更不敢打听。所以归绥的许多“株式会社”和“料理店”（卖小吃喝的商店）里的日本人，也向“蒙古军”总司令部拿钱，顾问们请客宴会的酒资和其

它费用如嫖妓的“床头金”，亦由伪蒙政府压榨蒙汉人民的血汗来开销。我的官兵过着稍高于国民党部队的生活。至于重要人事更动，在没有发表以前，军部还叫我的最高顾问征询我的意见，这不过是走一走过场而已，非到剪除我的羽翼时，我老是唯唯诺诺地表示服从。

由于日寇对伪蒙统治非常严密，无关“蒙古军”的事，我因避嫌疑而忌讳打听，所以不知道“驻蒙军”军部和“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究竟是谁隶属于谁。兴亚院的联络长官，最早是酒井隆中将，以后是竹下义晴中将，最后是岩崎氏男少将。酒井隆初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特务机关改组为兴亚院联络部后，即任联络长官。到了岩崎氏男任长官时，又改称为日本驻张家口公使馆，所以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都是特务机关的化身，能指挥动历任“蒙疆联合委员会”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这个机关不仅管理伪蒙的军政事务，也进行有关甘宁青新回民的特务工作。设立在包头的、由蒋辉若领导的“西北保商督办公署”，就是听命于兴亚院联络部和张家口公使馆的一个特务组织。我因薪俸不够应付伪蒙的政治环境，到达归绥后，又象我在热河赤峰和开鲁驻防时一样，利用职权贩运起大烟土和私货。我是经王英的表弟郭胜三介绍，认识了北平“中央金店”的经理高雅杰，由他给我做生意。此人由包制军衣发家致富，和“东北军”与“西北军”系统的将领都有联络，曾给宋哲元在北平办过小型兵工厂，与马鸿逵交处莫逆，马称他为“高二皇上”，以后和马汉三（华北的统军特务头子）也搭上关系，成了军统特务。抗战初期，高在全国各地共有十一处买卖，西安、银川和甘肃的玉门均有分号和支店。他因周转不灵，曾向酒井隆借钱。酒井隆给金井章二下了一个条子，从“蒙疆银行”贷给他四十万元巨款，做为让他跟马鸿逵“拉线”的交换条件。

张家口的特务机关由兴亚院联络部改为公使馆，归绥的特务机关始终没有取消。“七·七”事变前，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

为羽山喜郎，日本占领以后的第一任特务机关长是松井，第二任是桑原，第三任是小仓。“蒙古军”的最高顾问，到了归绥后，第一任是高场，第二任是三毛一，第三任便由小仓兼任。小仓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便成了归绥的最高统治者。他在这一期间，还把白凤翔的“热河先遣军”收编为“东亚同盟军”。因为德王不买他的账，我们第一次访日时，坂垣送了我两匹洋马，应许给德王发五百枝日造“三八式”步枪，装备德王的卫队，枪枝由东京发到归绥，他霸住不给，到底也没把德王的卫队用日式武器装备起来，一直是使用着我在多伦时给凑的旧枪。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把日、蒙、汉籍特务，分布在各个角落收集情报，并根据特务们调查了解到的线索，派直属的“日本宪兵队”扣捕抗日反蒙的爱国人士与青年学生。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就是被归绥特务机关破获的。

“蒙古军”总司令部也有一个由三五十人组成的“蒙古军宪兵队”。这个宪兵队不是我的特务组织，而是“日本宪兵队”的帮凶。日本宪兵班长，可以指挥“蒙古军”的中校宪兵队长。我在归绥驻防时，由师长陈景春以子弹向天主堂的中国神甫白祥换到一部法国短波无线电收音机，可以收听重庆“中央社”，延安“新华社”和莫斯科放送的华语广播，以及哈尔滨的地下电台“劳动人民声音”。结果被归绥特务机关知道，日本宪兵还不好意思到我杨家巷的家中查看，却指示蒙古宪兵，于黑夜闯进我的卧室，我大发雷霆，把他们骂走。“蒙古军”的宪兵队长席子纯，为此好几个月躲着不敢见我。后来他托人向我央告，说是日本宪兵队叫他派人执行这一任务，我只好干生气。

我在伪蒙时期，实际处在日本特务的监视网里。我的汽车司机，是一个假装朝鲜人的日本人。他和我的翻译郝贵堂与贴身伺候我的勤务兵唐成良，都是特务机关介绍来的。唐成良是热河隆化县的一个乡下孩子，伺候过松室孝良，跟松室学会日本话，由小仓派到我跟前当差。后来郝贵堂和唐成良都被我收买为亲信。

小仓为了能进一步探听到我内宅的动态，又打发来一个名叫哲户的日本老头子当我的家奴和院公，跟我的卫士们在门房中吃饭睡觉。我的家中经常有十几个卫士守卫，“蒙古军”的宪兵，所以能够闯进我的卧室，便是哲户从大门外领到里边的。德王也是如此，他在张家口下堡的公馆中，不知是“驻蒙军”军部，还是“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也给打发去一个名叫山内的日本老头子。此人装聋做哑，据说能懂得蒙古语言，想叫德王对他不加提防。至于我和德王到了外边，旅馆附近密布日本宪兵“保护”，出门乘坐日本司机驾驶的专车，所以只敢跟商人公开来往，其他人都是想法子秘密接触。

(三)

德王在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期，担任伪府的总裁，并兼“蒙古军”总司令和第二军的军长，同时让吴鹤龄和乌古廷郎舅二人，担任伪政府的议长与伪军的参谋长，对这些不仅我不同意，日本人更怕他军政大权全揽，把伪蒙整个抓了起来。所以进入归绥后，在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即叫德王专门负责政治，由副主席兼任政务院长，把总司令让给我担任，同时给了吴鹤龄一个参议府的议长。德王对于我任“蒙古军”总司令，心里很不痛快，听说他为此向张家口特务机关长酒井隆提出质问。酒井反问他为什么在傅作义、门炳岳和刘汝明收复察北期间，他临阵脱逃，由嘉卜寺跑到多伦呢？这样一问，德王没有话说，但是让我担任伪总司令，他却怀恨在心。一九三八年冬天，日寇把宝贵廷于一九三六年夏天从热河征来的六千多蒙古兵都遣送回伪满；一九四〇年三月，在傅作义军进行“五原战役”以后，又把我的嫡系三个汉族师，从“蒙古军”拨出改为三个警备队。他不知这是削弱整个伪蒙的力量，以为是剪除我的羽翼，因而他不表示态度。我由于孤掌难鸣，只好让日寇将我的筋完全抽去。结果“蒙

古军”成了一个空壳。

德王和我貌合神离。两个人不能和衷共济，就使口寇更便于分化利用。德王对汉人和接受了汉族文化影响的蒙古人，都存有成见和偏见。他原先想跟汉人隔离，在草原上建立一个纯粹蒙古人的封建独立王国，进入归绥后，也不欢迎汉奸参加伪蒙政权。无奈日本人正如当年蒙古人征服欧亚大陆那样，把伪满的汉奸按“色目人”使用。由于“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比“蒙古军政府”组织扩大，伪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想把“满系”汉奸调来担任伪府的重要职务。“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就是由伪满调来的一个任过次长的汉奸。德王为了拆倒我“蒙古军”的梁柱，先是叫我的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兼任伪包头市的市长，刘因担任文职被迫把兵权交出。我让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带领我最精锐的第一师。在二次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时，德王把刘继广升为最高检查厅长，将我的第二师师长尹宝山聘为政务院的委员，又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部长。金井章二不知底细，曾提出“军人搞不了政治”，德王说：“他们很有功劳，可以慢慢学习”，用此抵制“满系”汉奸插入。德王还拿官爵收买我的部下。从此在伪府里边，也象在伪军中那样，分成亲日、亲德和亲李三个派系，互不团结。特别是丁其昌出任了伪治安部部长，把我的三个汉族师变成了警备队，就更名正言顺，我只好“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即使能说出话，也是有口难辩。在遣散热河蒙古兵时，日本人说是由西边的五个盟来给补充，可是“驻蒙军”军部紧接着给各盟成立了一个防卫师，由盟长兼任师长，受各盟的特务机关指挥，盟长兼了师长后，就不像以前那样听话，德王向锡盟要兵时，伪锡盟盟长松津旺楚克，便以“如果你非征不可，我就把喇嘛给你送来”的语言顶撞。最后德王和我，一个成了空头主席，一个成了光杆司令，都失去一声喊到底的权力。

伪蒙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替日本帝国主义压榨、征敛的机关。

八年以来，给“驻蒙军”军部提供了无数的战略物资。详细数字，日本人对外保密，中国人谁也摸不清楚。各种物资大都是由日本的“株式会社”，先和伪蒙政府订立经济协定，然后直接和各县的县长，特别是各旗的王公再立合同，进行低价收购或不等价交换。例如日本进兵印度支那以后，士兵染上南方的瘴气死的很多，驻在大同的厚官师团开到广西，也因瘴气，死了一千多人。他们研究结果，认为马肉是大热的东西，可以防御瘴气侵袭。于是在张北县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屠宰场，把成群的马赶到里边，出来全成了马肉罐头。这种战略物资，就是由日本直接向各旗的扎萨克或总管收购，几乎把锡盟和察哈尔部的马匹搜罗殆尽，伪蒙政府却从中捞不到任何油水。王公旗官从此对日本人发生了好感，认为张家口的伪政府成了架在他们头上的枷锁，以致产生了以松津旺楚克为代表的王公和吴鹤龄之间的重大矛盾。日本人向满洲移民不久，还计划向乌珠穆沁一带移民，以防备苏联和外蒙。为此企图在草原上购买牧场或农场，甚至还想叫王公把职爵卖掉，由日本人主宰一切，把王公制度彻底推翻，将蒙古地区变成名符其实的殖民地。这些都是瞒过德王，由特务机关和王公偷偷勾搭进行的。后来由于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才作罢论。

德王心目中的蒙古独立王国，是要把东蒙、西蒙和青海、新疆蒙古都包括在内，可是日本人只许他向西发展，不让他跟锡盟和察哈尔以东的王公发生联系。德王手下的东蒙人，如陶克陶、金永昌和吉尔嘎朗之流，都是“关东军”多年的“嘱托”特务，并且都是在百灵庙“蒙政会”和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时参加或派过来的。“蒙古军”的几个东蒙师长如包海明和璦门达赖等，也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从归绥到张家口，东蒙参加伪蒙政府军队的，大都是热河卓索图盟喀喇沁和东土默特旗的人。他们是因吴鹤龄、乌古廷和我的关系而来的。吴鹤龄曾任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乌古廷出身于东北讲武堂，他们全是自动投靠德

王，故德王对他们比对陶克陶等较为信任、倚重。于是他们把亲信故旧从喀喇沁旗弄来，加入伪蒙军政机关，形成一股很大的中层势力。一九四四年年底与一九四五年初夏，日本人所以把吴、乌郎舅两人先后撤换，就是怕他们在伪蒙兴风作浪。东蒙除了卓盟的喀喇沁旗而外，以哲盟科尔沁各旗的文化较高。那里的知识分子，多被日本人收罗到伪满的“兴安省”和“兴安军”。德王和我访问伪满时，东蒙的蒙奸受日本特务监视，不敢跟我们亲近。日本人领我们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参观，在一次蒙古人的联欢会上，我因伪蒙的中层和基层，遍布日本人培养出的“满系”汉奸，特别是翻译和警官，他们尽干坏事，而察绥老乡分不出热河和辽宁口音，对我的伪军官兵也仇视到极点。我在会上提出要求东蒙派人支援西蒙，巴特玛拉布坦等首脑，对着日本人都不敢吭声，不表示可否，恐怕说出来惹祸。

日本人除了隔离东蒙和西蒙，并且隔离德王和我以及我跟我的官兵。尽管德王和我同床异梦，但日本人怕我们合到一起。一九三九年九月，伪蒙政府二次改组，因吴鹤龄被弄到东京，让我兼任参议府议长，“晋北”的夏恭死后，又叫我兼任了副主席，可是“蒙古军”的总司令部，直至日本投降，并没有跟着伪府由归绥迁到张家口。这样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便不能表演双簧。因为德王在小事上常“跌死皮”（耍赖），到了紧要关头便不象我敢耍光棍，日本人知道我在必要时肯挺身而出维护德王，怕将我们弄到一起，不容易随便摆布。此外，日本人怕我跟官兵接近，经常阻止我到前方打仗。一九四〇年春天，派出“蒙古军”的三个蒙古师，到五原协助王英建立伪“绥西政权”，就是叫乌古廷去指挥。队伍开过去以后，才让我前去视察，看防务布置得如何，并给士兵们讲话打气。在三月二十日傅作义反攻五原那天，以欢送三毛一最高顾问转勤为名，突然派飞机从五原把我接回归绥，其目的，也是为了隔绝我和我的部队联系。不过，这也好，否则，那次我也要象王英和乌古廷一样，几乎被傅作义活

捉。

一九四五年春天，日方看到德国的侵略军，被苏联击退，盟军开辟了第二战场；太平洋战场，也是美军占了上风，知道他们的好景已经不长，一怕“蒙古军”和我藕断丝连的三个警备队，驻在绥远边境惹事；二怕放在归绥很“不方便”，这才把我调到张家口，加以软禁。所以日本投降后，我把伪军的主力扔到归绥，受傅作义收编，我个人没本钱了，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委任，到关外重新召集胡匪，投入反革命的内战旋涡。

(四)

当汉奸一定会身败名裂，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如果没有一点油水可沾和一些权势可图，谁也不肯干这种傻事。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达到“以华治华”的政治目的，很会拿着中国人民的血汗，收买和雇佣替他们充当侵略和统治老百姓的凶恶爪牙，所以有时显得比中国的封建军阀大方。如伪蒙的军政官员，薪俸都比伺候军阀时为高；以后物资受了统制，亦能得到足以养活家口的配给用品；还可放任收受贿赂和敲诈勒索。伪蒙境内曾经流行过“宁嫁警察，不嫁土客”（鸦片烟商人或贩子）的民谣。汉奸们贪婪嚣张到了极点，才用严刑惩处，以平民愤，使老百姓产生“日本人好，汉奸们不好”的错觉。特别是伪蒙境内广种鸦片，向全国各地倾销，造成经济上的表面繁荣，城市金融十分活跃，“蒙疆银行”的伪钞比华北的伪钞值钱。同时让所有的投敌官员都染上毒品嗜好，因烟瘾作祟，不能到解放区或“国统区”过抗战的艰苦生活。在日寇投降前的一、二年，他们的人也开始腐化起来，经济统制露出不少空隙，于是走私盛行，只要胆子大和朋友多，弄钱相当容易。除了劳动人民叫苦连天，青年学生和正人君子都不满现状，凡是担任伪职的人，多利用职权做起投机生意，把伪蒙视为“冒险家的乐园”，过着暴发户的荒淫腐

化生活。一时北平许多胡同里边，新用油漆刷的街门，差不多都是伪蒙县长、局长和烟土贩子们买下的新居。这是日寇侵占内蒙期间，羈縻蒙奸、汉奸的情况，也是蒙奸、汉奸依附敌寇后，不愿再行反正的原因之一。

日寇对于德王和我，一方面固然压制封锁，腐蚀离间，一方面也进行笼络和怀柔，随时给我们些糖吃，灌很甜很稠的米汤。德王和我，是日本人花了很长时间与花了一定本钱制造出来的两个招牌，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肯轻易扔弃不用。德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宇山兵士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手段高超，为了抓牢德王这个招牌，表面上虚伪的“尊敬”他，应付他，好象德王就是“蒙疆政府”的主人一样，而德王也乘机撒娇耍赖地常跟日本主子耍态度、闹脾气。金井章二走后的大桥忠一，曾向伪宣化省长刘继广的日本参事官说：“我是德主席的顾问，蒙疆的家由他来当，我们只是从旁协助，你对刘省长也要这样。”德王听见，更飘飘然了。张家口口的“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归绥的特务机关，也给我面子。前述高雅杰向“蒙疆银行”贷了四十万巨款，就是托我跟酒井隆洽谈成功的。后来高并没有替他们连络马鸿逵，因为“蒙疆”伪钞贬值，他把十万元囤积物资甩出，才偿还了这笔债务。我的最高顾问兼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对我，也和金井、高桥对待德王一样，也似乎彬彬有礼，就连人事更调和队伍调动，事前还让我签字。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人想通过班禅拉拢德王，曾托汉奸张海鹏在洮南给过班禅五千支步枪，让班禅给德王收买内蒙及青海的王公；德王还在西苏尼特旗，给班禅修了一座很讲究的行馆，格局和“金銮殿”一样。据说德王准备统一内蒙后，要在那里“登基”做蒙古皇帝。日本人虽然把伪蒙视为自治区域，并没有允许他建立国家，但在归绥组成“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后，张愷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允许到条件成

熟之后，要给蒙古建国，为此还派陶克陶跑到冀东和汉奸殷汝耕举行谈判，缔结过将秦皇岛做为未来“蒙古国”出海港口的秘密协定，表示要从“察南”的延庆修一条直达港口的公路。德王对此很感兴趣，送过殷汝耕马四百匹。日本人给德王许的愿很大，不只是纵恣他坐内蒙的小朝廷，还给他布置过坐内外蒙的大皇帝。我们第一次访日时，先在张家口集合，我到了下堡德王的公馆，看到由外蒙逃来的迪鲁瓦活佛喇嘛，蹲到德的会客室里一直不走，似有要事和德商量。第二天迪鲁瓦悄悄向我透露：因为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死后无人承继，日本人想叫德王的三儿子顶替。拨了十五万元活动费，先给了迪鲁瓦七万元，叫他由北平的英国公使馆汇给西藏的达赖喇嘛，并叫他亲自前去拉萨活动。达赖承认以后，再续汇那八万元。迪鲁瓦征得德王同意之后，即去北平汇款，并搭海轮由印度转赴西藏。迪鲁瓦从此一去不返，不知下落如何。日本人在“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以后，除了让总务部的日籍参议中岛万藏教德王学习天皇怎样迈八字步，并给德王做过一套天皇和溥仪那样的“龙衣”。德王把此套衣服很珍贵地保存于西苏尼特旗王府，日本投降时，被苏联军队抄走带到乌兰巴托。给德王做“龙衣”的同时，小仓特务机关长在归绥叫来一个日本裁缝，也给我做了一身日本陆军大臣那样的礼服，让我对外严守秘密。可能给吴鹤龄也做了内阁首相的“蟒袍”。所有这些，不外是叫我们死心塌地地认贼作父，为“大东亚共荣圈”卖力。

日寇在伪蒙除了以种植鸦片敛钱，并且允许各地成立“俱乐部”，收取巨额赌税，使人们都沉沦在赌场里，不关心政治。伪蒙赌税的收入比皮毛税收入还多。我从他们内部得到一个数字比例，说是某一年全“蒙疆”收了二十四亿元皮毛税，而“俱乐部”的赌税却收入了三十多亿元，这还不算“俱乐部”养活着好多大吃二喝的地痞流氓。在我的伪军中，一直包庇着二、三百贼性不改的蒙古“马靴子”（蒙古土匪）和热河汉族的胡匪。他们

平日不下连队，在街面上狂嫖滥赌。这些人都由我的胡宝山团长率领，他们没了钱花，什么乱子都敢闯，使我对他们很伤脑筋。胡宝山从察北进犯绥远时，路过武川的三眼井教堂，一下子就抢了外国神甫三十万元款子，到了归绥没几天，便挥霍殆尽。于是日本特务机关根据调查研究，索性让“蒙古军”附属的散兵游勇，经营了各地的“俱乐部”。以后伪蒙的好多“俱乐部”，无形中成了替我安置“闲员”的处所。归绥的“俱乐部”，起初由胡宝山包办，我恐怕他在这个大城市中给我滋事惹祸，叫日本人调他到宝昌县包了那里的“俱乐部”。归绥的“俱乐部”便由我的结拜朋友，曾给汤玉麟当过副官长和旅长的李芳亭包了起来。日本人也不是白养活这些“闲员”。他们为了在华北解放区实行“三光政策”，曾把胡宝山的一个名叫宝中山的连长从“俱乐部”中调出，纠合了二、三百蒙汉“浪人”（流氓），开到山东协助日军作战，全被当地的八路军解决，一个也没有回来。

日寇对德王还有一个“碗大汤宽”的事例，就是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政会”时，蒋介石给他送来一部七十五瓦的电台，由一个姓彭的台长经管。不知是日本人为了表示对德王特别信任，还是想利用这部电台诱降蒋介石，竟然允许德王将此台设在西苏尼特，继续和蒋介石通报。一九四〇年，德王通过“军统”华北区长马汉三，跟蒋介石连络的另一部电台，在归绥被日本宪兵队查获。前“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吉（那时任太原特务机关长）便以“大电台我都允许，小电台算个什么”，替德王在“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跟前做了圆场，这是日寇故示宽大。因为日寇既然不能把德王一脚踢开，就不如捉住把柄也不处理，这样就可使德王更加驯服。这是日本人的权术，使你感到对不起人家，自己就把自己管束得谨言慎行，不敢节外生枝。

在马汉三的电台未暴露以前，德王常跟日本人耍“硬骨头”。例如有一年，归绥特务机关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电台的报务员陈寿山与葛孟庠从新城扣往旧城日本宪兵队传讯，深夜还没

有放回。德在伪府大嚷特闹，说“为什么不通过我，随便捕人？得马上给我放回来。”最高顾问宇山兵士说：“现在关了城门，明天再放。”德说：“城门是日本人关住的，日本人咋叫不开？我现在就要下旧城向宪兵队要人，看谁敢阻拦我这个主席！”日本人没有办法，当夜就把陈、葛两人放回。自从马汉三的电台被破获以后，德王便没了此种勇气，连我也被堵住了嘴，在有关这些事上，无法向日本人求情。所以当我的两个卸职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因抗日反蒙嫌疑被扣，我只好给特务花钱，买通日本人把他们保出。而包头商务会会长董五三等和归绥一百二十多个教员被扣以后，商界和文化界都想托我营救，我也想借此交朋友和收买人心，但爱莫能助，听任日寇把他们杀害。

日本在投降以前，就做了把他们的军队和侨民安全撤出大陆的准备。在伪蒙方面，是把德王的智囊吴鹤龄和我的军师乌古廷先后撤职，最后将我由归绥调到张家口加以软禁。为了把德王和我稳住，还使了不少的花招。在调我到张家口以前，即将“蒙古军”编为警备队的三个汉人师归还建制，并且说是要把伪蒙的警察编为十二个师或十六个旅，都叫我去指挥。为此日本人领上我和德王，参观过他们设在张家口的一个小型兵工厂，表示以此为基础，给“蒙古军”扩建为大型兵工厂。恐怕缓不济急，除了由沈阳兵工厂给拨付武器，伪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还给了我十一万两烟土，叫我到包头先换成皮毛药材，然后再从上海的一家兵工厂换取枪械。我因消息灵通，知道希特勒已经完蛋，日本就要投降，这些都是他们的圈套。德王却信以为实，所以在抗战胜利前夕，始终未和我商量过应该怎样应付未来的时局。直到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传来，两个人都束手无策，只好跟着日本集中起来的两万五千多军民，坐上平绥路的闷葫芦车，灰溜溜地滚出张家口。

伪蒙政权内幕

我在伪蒙政权机构中曾任“蒙古军”总司令，并兼任过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和参议府议长，以及“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等职。因我专负军事责任，从不过问伪蒙的政治，故不知详情，仅就一些表面现象，写成这篇回忆录，以供研究伪蒙史料的参考。

伪蒙政权内部的派系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化德县）出现的伪蒙古军政府（以下简称伪军政府）开始，它便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收罗了蒙族中好几种类型的反动人物拼凑而成的。其中包括由封建王公、贵族或牧主、地主或“马贼”（蒙古土匪）匪首转化而成的文武官僚。从地理上区分，有察蒙、东蒙（东北四省蒙旗）和绥远三大派系；从历史上区分，又可以分为亲德（德王）、亲日和亲李（李守信）等三大派系。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蒙古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盟政府”）。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这个“联盟政府”在张家口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下简称“联合政府”），又吸收了“察南自治政府”和“晋北自治政府”两个伪政权，并安插进去好多日寇在东北培养起来的“满系”汉奸。但中央机构的主要成员，仍是蒙古军政府时的那个班底，表面上一直由蒙古人当权。截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伪蒙政权随着日本投降而解体，根本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更。

在伪蒙政权中，汉奸大部分亲日，以后他们便成了自寇统治蒙疆的忠实爪牙。特别是“满系”汉奸，遍布伪蒙政权的中层和

基层，非常贪横，就如同成吉思汗当年征服欧亚大陆时所豢养的色目人，比日本人和蒙古人还坏。加之蒙奸里边，以卓索图盟和哲里木盟人最多，他们多半通晓蒙、汉和日本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东北汉族人的影响，故察绥两省和山西晋北的蒙汉人民，在日伪时代都有受东北籍汉奸统治的感觉，提起喀喇沁和科尔沁两部蒙人里的少数为非作歹者，以及辽、热两省的极少数歹徒、蒙奸、汉奸，均极憎恨和仇视。

这是因为察哈尔省的蒙古人中，除了德王和少数几个总管，找不出较多能提笔耍枪的人材，必须延聘和联合东北蒙古中的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而绥远的蒙古上层，正如绥远、察南和晋北汉族地主与资产阶级的代表一样，系由于家乡沦陷，被迫参加了伪蒙政权，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另外，东北蒙旗在京北和关东的范围以内，日本的潜在势力很大。他们所豢养的特务、间谍，在卓索图、昭乌达、哲里木和呼伦贝尔等盟活动多年。伪满成立以后，东蒙的一些知识分子同流合污，其中的一部分人和德王的政治野心相同，就投靠了德王，在一九三三年成立百灵庙的“蒙政会”时，就亲密合作，所以他们和察哈尔的总管，形成伪蒙政权的核心和骨干。

德王原系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又称苏尼特右旗）的亲王。在一九三三年末到百灵庙筹组“蒙政会”前，便是锡盟的副盟长，并和锡盟盟长索德诺木喇布坦（西乌珠穆沁旗郡王），察哈尔部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札布（字世海），担任了宋哲元主察时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德王后来所以能成为内蒙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首领，是因为“东蒙”在一九三三年春热河沦陷后，完全划归了伪满，王公、官僚和知识分子与“马贼”头子大部被吸收到伪满的四个“兴安省”和“兴安军”里，故不能出头露面；“绥蒙”的王公官僚被蒋介石羁縻控制，土默特旗有民族觉悟的知识分子多数走向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绥远没有蒙古人率领的胡匪部队，无人起来兴风作浪，他便趁此空隙，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活

动，以“察蒙”作为后盾和本钱，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察蒙”、锡林郭勒盟的十个旗，以东西两个乌珠穆沁旗最为殷富。特别是西乌珠穆沁旗因拥有盐湖，可以说有“日进斗金”的收入。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西乌珠穆沁旗王府的财富，被苏军抄去好几百辆汽车，未拆箱子的新枪即达一千八百多支。所以锡盟的王公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完全以西乌珠穆沁索王的马首是瞻。德王的西苏尼特旗经济条件不及乌珠穆沁旗，但位于张库公路①的乌得至滂江两旁，交通便利，德王比锡盟的其他王公见的世面多，思想较为复杂。加上他幼年常住北京和张家口，聘请过一个山东省的举人作老师，读过四书五经和汉族的其他史籍，历史知识较多，政治野心较大。且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了政治活动，被人们目为是没落的王公贵族里的翘楚，统治察哈尔省的汉族官员对他非常重视。

德王还有一个倚为心腹的主要帮凶，即他的姨夫补英达赖。此人虽是平民，一因裙带关系，二因比梅林②之流有处事经验和逢迎手段，所以出任了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的队官和锡盟驻察省办事处处长，执掌了军队并参加了政务。德王于一九三二年秋，树起“复兴民族”和“抗日救国”两面招牌，便是补英达赖陪上他跑到北平；同年冬天德王去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时，补英达赖便潜赴大连，代表德王跟日本人进行初步勾结。因此补英达赖在伪蒙政权中，自居开国功臣。

当时，哲里木盟和呼伦贝尔盟已经沦陷，溥仪被日本人劫持到长春，组织起伪满政权，通辽也成立起“内蒙古自治军”。锡盟的王公看到日本的“满蒙政策”势在必行，既然德王愿出来跟各方面联络，团结蒙古各阶层应付未来的事变，便从拥护索王转而拥护德王。索王以下的锡盟王公以及察哈尔的总管，都很给德王

①张库公路——张家口至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公路。

②梅林——蒙古旧官制中的职称。

捧场，德王主使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的“蒙古王公代表团”，就是由东苏尼特的郡王郭尔卓尔札布担任团长。索王由蒙政会到军政府，一直给德王充当傀儡副委员长和副主席。蒙政会二十四名委员中，连德王、索王在内，“察蒙”方面就占去了八个委员。一九三三年春汤玉麟放弃热河，同年夏我率伪军盘踞了多伦，因为形势逼人，“察蒙”的总管更成了德王的仆从。

察哈尔在内蒙是一个特殊部落。其祖先林丹汗反抗清朝最力，被征服以后把王公取消，牧民除按照满洲军制编为八旗，另有商都牧群、牛羊群和太仆寺左右两个牧群，共是十二个旗群，供清朝征调作战和给宫廷放牧牲畜。各旗群由非世袭的总管统治，并曾经直隶总督、张家口都统、山西巡抚和绥远将军先后管辖。总管没有爵位，不能集中在一起会盟，在清朝时很受歧视，王公称他们为牛倌、马倌。在乾隆年间就开始放垦设厅，早成了蒙汉杂居地区，牧民受汉族地主排挤，生活相当痛苦。因此哲布尊丹巴在库伦称帝时，察哈尔部的人到外蒙的很多。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设立了察哈尔特别行政区，这十二个旗群和锡林郭勒盟共同受皖、奉、直、晋军阀先后压榨。一九二八年察哈尔由区变省，又把西边的正红、厢红、正黄、厢蓝四旗和牛羊群的一部划归绥远，分成察北和绥东两半。

德王为了统一内蒙，以给察哈尔部建盟来争取十二旗群的总管，把他们和扎萨克列同等级地位，且把“插花”在各旗群的“台站地”也让他们接管。十二旗群里最出风头的牛羊群总管是卓特巴扎布。他一直和德王狼狈为奸。与补英达赖以及索王死后出任锡盟盟长的东浩济特郡王松津旺楚克，成了伪蒙政权里“察蒙”方面的三大巨头。锡盟的王公郭王、雄诺敦都布和察哈尔部厢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与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隆等，以后也都成了伪蒙疆政府的军政大员。所以“察蒙”的总管，不论他们本人和外人，都认为他们是德王的嫡系。伪蒙政权先在嘉卜寺成立，以后又把“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察蒙”人更以主人翁自居。

伪蒙疆政权的五个盟，他们领导着三个，在中央机构中也占有好几个重要职位。

“东蒙”人参加伪蒙疆政权，分为德王招来、日本“关东军”派来和我给带来三种不同的来历。所以背景非常复杂，不象“察蒙”人和“绥蒙”人那样比较单纯。德王招来的“东蒙”人，王公很少，因为他在百灵庙组织蒙政会时，“东蒙”已经完全沦陷，王公都被伪满拴住走不出来，只能让寓居在北平的几个闲散王公，担任名义上的委员。伪蒙政权建立以后，他们连名义也不敢担任了。德王的伪蒙疆政权和哲布尊丹巴的那个蒙古政权相较，僧侣的色彩也很淡，这是德王看贵族僧侣阶级已经没落，尽管德王拖着发辮和穿着长袍马褂，不过是用以象征民族特点。他知道蒙古民族的新生力量，是那些接受了汉族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知识分子。所以他对“东蒙”流落在关内的失意政客和失业青年，加意接纳和收容，把其中的不少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由于这些人颇具才干，并且把政治面貌隐蔽起来，很受德王信任和器重，实际上比“察蒙”的总管还要吃香。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特务，在伪蒙政权中人数很少，但因后台老板不同，以亲日派的姿态，和亲德（王）派的“东蒙”人，明争暗斗得非常激烈。后来亲德派也表现了亲日，原来的亲日派便被战败，最后亲日派的首领陶克陶，叫亲德的首领吴鹤龄赶出政务院。故“东蒙”的亲德派在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时期，相当的飞扬跋扈，和“察蒙”的那些总管，有很大的摩擦与矛盾。

我带进伪蒙政权的人，亦被人们列入“东蒙”的范畴里。其实除了我出身于热河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一个由奴才变为地主的蒙古家庭，其余全是汉族官兵，所以我和我带来的人，也称为“汉蒙古”。因为我主要是抓枪。虽由“蒙古军”总司令兼任了“政府”的副主席，并一度兼任过“参议府”的议长，但很少过问政治。以后我的几个汉族部下，也被吸收到政府里边担任最高检察长、部长、省长和市长一类角色，由于同日寇与德王的关系非

常肤浅，正如“绥蒙”的王公与察南晋北的汉奸一样，只是坐官而不弄权，等于摆在那里的几个牌位。

群众的眼睛雪亮，主要替日本人统治“蒙疆”地区的，还是“东蒙”喀喇沁部与科尔沁部的蒙奸和东北辽宁与热河的汉奸。热河的汉奸里边除了我带来的那些军官，还有和喀喇沁蒙古人有关系的汉族文人。所以伪蒙政权很可以说是“察蒙”总管和“东蒙”喀喇沁部贵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利用日寇侵华的机会，成立起的一家进行政治投机倒把、出卖民族利益的“德记”字号。我和我的喽罗们，被“德记”的老板与夥友一直看成是替他们护院站门保镖，受他们使用的“炮手”。

由伪“军政府”到伪“联盟自治政府”

德王于一九三三年七月间，和“东蒙”的一些知识分子及“东蒙”的日本特务陶克陶等，在百灵庙叫嚷内蒙自治，筹组“蒙古自治政府”时，我已公开投敌，由热河进入察北，把“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压迫到长城底下，盘踞了多伦。其时日本关东军派特务“东蒙”喀喇沁部的金永昌和于兰泽，专做我的军队和察哈尔部的工作，并派科尔沁部的陶克陶，在多伦、百灵庙和西苏尼特旗之间奔跑。由于卓特巴扎布不敢表明态度，他们曾叫我兼任伪“察哈尔盟”的盟长，我怕影响掌握军队，没有答应。德王和我都是彼此闻名，还未发生横的联系。到一九三五年冬，我和德王才初次在多伦会面，一九三六年四月“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方合流在一起。

我没有参加过以前在百灵庙成立的“蒙政会”，只是听说委员里有南京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处长吴鹤龄，察哈尔省政府委员、牛羊群总管卓特巴扎布以及白云梯等“东蒙”的知名人士。补英达赖那时还未露头，在德王的背后筹划一切。“蒙政会”底下有秘书、参事两厅，民政、保

安、实业、教育四处和一个财务委员会，差不多都由德王招收的“东蒙”还未出名的青年知识分子把持。“察蒙”的总管在“蒙政会”的委员中，占去三分之一。“绥蒙”的王公和知识分子参加“蒙政会”原来就非常勉强。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介石为了破坏德王统一内蒙，应绥远省方面的要求，实行所谓“察绥分治”，把百灵庙的“蒙政会”分成归绥的绥境“蒙政会”和嘉卜寺的察境“蒙政会”。从此，“绥蒙”方面就和德王唱对台戏，成了德王的反对派。

在“察绥分治”以后，日本“关东军”嗾使我的军队于一九三六年元旦前夕，进驻张北县城，把察北完全控制，给德王廓清长城口外的地盘。他因百灵庙不好立足，便回西苏尼特旗，自任“蒙古军”总司令。日寇为了给下一步进犯绥东做借口，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间，怂恿德王到张北成立“察哈尔盟”。当时蒋介石曾派吴鹤龄和察哈尔任过总管的尼冠洲，由南京来张北劝导德王悬崖勒马。日寇不知他们是应付公事，故在盟政府成立，卓特巴扎布担任盟长以后，张北特务机关派日本人乔装胡匪，把尼冠洲杀死在回张家口的路上。吴鹤龄因有德王营救，从张北逃往西苏尼特旗，才得免于死。这一期间，白云梯也出现在张北城中，在我的司令部中住过好几夜。最后我听说，他是因和蒋介石闹别扭，从南京到百灵庙装做投奔德王，难怪他和吴鹤龄与尼冠洲不是一道而来，在张北对建立察哈尔盟也未表示自己的意见。日本特务机关对白云梯，还是调查了解得清楚，所以白和尼同车由张北到张家口，仅将尼杀害而把白放走。

吴从那时开始，便不离德王的左右，由“蒙政会”中的活跃委员，变成伪蒙政权里边的头等角色。四月间在西乌珠穆沁索王府召开的第一次蒙古大会上，他开始露出锋芒。那次会议是由索王担任主席和东道主，主要议程是讨论成立“军政府”。这是德王利用索王来团结“察蒙”的各旗王公和总管，并想取得索王在财力和人力方面的支持。所以会议期间，德王一直是按副盟长对盟长的规矩，对

索王极有礼貌。但是会议的倡议和决定，都是德王问过吴鹤龄又教给索王给众人传达的，所以“乌珠穆沁会议”和会议所产生的“军政府”，可以说主要是由吴策划而成。这次会议我亦被邀出席，看见会场上很少“绥蒙”方面的人，除了“察蒙”的王公总管外，剩下的尽是德王从百灵庙带过来的那些“东蒙”的知识分子，还有陶克陶、金永昌、于兰泽几个日本的特务。我坐在德王的下首，可以看出伪蒙政权，是“东蒙”的一些亲日派捧出德王搞起的一个小朝廷。

“乌珠穆沁会议”产生的“军政府”，于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虽然是过渡性质，而且是德王自起的国号，可是为了代表整个内蒙，仍以云王、索王和沙王为正副主席，德王为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实际掌握军政大权。并由吴鹤龄任参议长，特克希卜彦为参谋长（后由吴的妹夫乌古廷接任）；补英达赖以办公厅主任、卓特巴扎布以“察哈尔盟”盟长，都兼了“蒙古军”的副总司令；我那个副总司令比他们只是多兼着一个第一军的军长；第二军的军长则由德王兼任，不过没有多少队伍。至于政府的军事、财政、民政和交通、外交、实业等署署长，由特克希卜彦（汉名王宗洛）、吉尔嘎朗（汉名德古来）、金永昌和于兰泽、陶克陶等分别担任，前两个人是德王在“蒙政会”时招来的“东蒙”人，后三个是日本“关东军”派来的“东蒙”人，并且除了吉尔嘎朗是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人，其余的人和吴鹤龄与乌古廷全是卓索图盟喀喇沁人。

这时最受日本人信任的是哲里木盟苏鲁克旗蒙古人陶克陶。他是“关东军”的“嘱托”^①，协助嘉卜寺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政府和蒙古军的最高顾问田中玖监视德王和其它蒙奸的行动。所以翌年十月“军政府”在归绥改组为“联盟政府”以后，陶克陶便一跃而出任了以后由日本人担任部长的总务部部长，成为吴鹤龄的主要政敌。他在嘉卜寺曾建议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玖，象对待

^①嘱托——意为特务。

尼冠洲那样，把吴鹤龄也干掉，因德王在“关东军”政治参谋田中隆吉跟前为吴解释得免，故陶克陶迁怒于德王，由于惧怕我而未敢向德王进行打击和报复。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日寇的酒井机械化师团，把平绥路西段打通，即折返长春附近的公主岭。包头以东和大同以西以及张家口的长城以北，交给我的蒙古军防守，日军以后即按机动部队使用，分驻于张家口、大同、归绥和包头等几个据点。包头以西以南的半个绥远，一直控制在傅作义的军队手中，日伪只占了伊盟准格尔旗黄河以北的“河套”和达拉特旗黄河以南包头对岸的几个滩头村庄。伊盟七旗除过杭锦旗的郡王阿拉坦瓦齐尔投日，其余王公都打着抗日的旗帜，乌盟也只是占领了四子王旗、达尔罕旗和茂明安旗。乌拉特三旗成了拉锯的战场。先是西公旗和东公旗的福晋^①，都把小王爷带入后套，最后连中公旗的王爷、在云王死后任乌盟盟长的巴宝多尔济父子，也被傅作义从后山抢救到陕坝。日寇就是先在半个察哈尔和半个绥远的土地上，让德王把“军政府”改组为“联盟自治政府”，替他统治压榨这一地带的蒙汉人民。

“联盟自治政府”于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正式组成，仍让云王担任名义上的主席；因索王这时已死，德王便担任了副主席，并兼政务院院长；把“蒙古军”总司令让出叫我担任，以调和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他本来计划叫吴鹤龄出任政务院长，因没有得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许可，让吴担任了与政务院平行的参议府议长。政务院下辖三部，由“军政府”时的军事署署长特克希卜彦任保安部部长，财政署署长吉尔嘎朗任财政部长，民政和交通两署的人都归并到总务部内，由陶克陶包办了一切。“军政府”的驻满代表金永昌，调往张家口的“蒙疆联合委员会”，交通署长于兰泽从此没落，充任了参议府的参议，后在张家口忧郁而死。

^①福晋——满清官制中的一种职称，王公的妻子。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云王病故，七月一日德王召开“第三次蒙古大会”，众人推选他担任主席仍兼政务院长，我被决定为副主席。不久我们到东京进行第一次访日，吴鹤龄坚决要留在日本考察，所以他没有归国，以表示崇日和亲日。吴所遗的参议府议长，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都抢着要兼，德王为了使他们两个人均没有话说，便让我把参议府议长兼起。日伪军进入绥包，“察蒙”和“东蒙”方面对“绥蒙”以征服者自居，云王死了后，伪蒙政权里边再就没有“绥蒙”方面的人了。特别是拼凑下属的五个盟时，德王为了酬谢他的姨夫补英达赖，把土默特旗和绥远中部九个市、县，察哈尔西四旗，绥东五县和固阳县，共是五旗十五个县、市，给补英达赖成立了一个“巴彦塔拉盟”，补遂由平民变成盟长。

“巴彦塔拉盟”是蒙地精华区域，其中的武川县除了占有土默特旗的土地，还占有乌盟达尔罕旗与四子王旗的土地，这不仅“绥蒙”方面敢怒而不敢言，连“察蒙”的总管也为之侧目而视。尤其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因为察哈尔仍被割成两半，更表示反对。德王自知理屈，后来伪蒙机构的大官以及对外出头露面的事，尽让卓去担任。如“联合政府”成立以前，让卓担任“蒙疆联合委员会”的蒙古代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德把政务院长让给卓；吴鹤龄从日本回来“组阁”，把卓调为参议府议长，并派卓和“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去南京担任汪精卫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消卓的气愤。

索王、云王相继病故以后，五个盟里除“察盟”和“巴盟”外的盟长，锡盟任命了东浩济特旗的郡王松津旺楚克（以下简称松王），乌盟任命了中公旗的郡王巴宝多尔济（巴王被弄到陕坝，由云王的儿子达尔罕旗贝子沙拉巴多尔济继任为盟长），伊盟任命了该盟七旗王爷中唯一投敌的杭锦旗郡王阿拉坦瓦齐尔。因为伊盟有国民党的好几万军队防守，“蒙古军”虽曾于一九三八年春进入东胜和杭锦旗，但没有占住脚，所以德王统辖下的伊

盟公署设立在包头市内，除了有达拉特旗保商团长森盖林沁和准格尔旗贵族奇子祥率领的两部分比较能打仗的军队，行政上只辖有达拉特和准格尔两个旗公署。由于德王想叫伊盟的其它王公归附，故让康王的弟弟章巴拉多尔济代理达旗扎萨克，奇子祥代理准格尔旗扎萨克。

至于归绥和包头两个市长，由于归绥商务会会长贺秉温维持地方欢迎日军入城，在归绥改称为“厚和”市后，即由贺秉温担任了伪市长。包头则是因为我的军队驻防，把守着西边的门户，加之当地的汉奸不敢出任市长伪职，故由驻防包头的“蒙古军”第一师师长刘继广（山东人）兼任了包头市伪市长。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首都”由厚和移到张家口，标榜蒙、汉、日、满、回五族协和。由于厚和新城有好几千户满民，包头有好几百户回民，且跟甘青宁新四省未断绝通商，故“厚和”市市长换成当地的满族旧军官李春秀，包头市市长由日本特务机关给派来一个东北回民金朝文担任。

五盟以下的旗仍由原来的王公、总管继任扎萨克和总管，只是土默特旗的总管荣祥参加了抗战。由该旗的知识分子墨尔根巴图尔（汉名亢仁）担任了总管，并兼任了“巴彦塔拉盟”的副盟长。各县的伪县长，初由当地维持会的人担任。以后全由日本特务机关、德王以及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安插了“满系”汉奸和“东蒙”蒙奸以及“察盟”蒙奸的朋友。“厚和”市在贺秉温和李秀春中间，德王还叫他的一个安徽汉族朋友徐荣候任过一度市长。“联合政府”成立后，五盟两市仍维持着“联盟政府”时的状态。并且我的“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驻在厚和未动。这是日寇要把军政隔开，德王也想叫我协助补英达赖看守“绥蒙”。

张家口的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日寇在“联盟政府”建立以前，就随着他们军事上由东向西

的进展，先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南自治政府”，后在大同又建立了“晋北自治政府”。伪察南政府是由张家口商务会会长河北冀县人于品卿和刘汝明主察时的省政府秘书、山东黄县人杜运宇等组成。伪晋北政府是由大同前清的拔贡夏恭和大同商务会会长马永魁等组成。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和日本“驻蒙军”军部。为了便利管理摆布平绥路上的三个伪政权。于“联盟政府”改组还不到一个月，把卓特巴扎布和夏恭，叫到张家口和于品卿一同接受命令，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张家口成立了一个“蒙疆联合委员会”，开始把察南和晋北都划到“蒙疆”的范围内。该委员会下设总务、产业、金融和交通四个委员会。分由卓特巴扎布、陶克陶、金永昌、于品卿、杜运宇、夏恭、马永魁担任总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分工兼任产业、金融和交通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日本人金井章二为最高顾问。成为三个伪政权的上级衙门。

到了一九三八年七月间，“蒙疆委员会”扩大组织，把总务委员会以外的三个委员会取消，增加总务、产业、保安、财政、民生和交通六个部，由卓特巴扎布兼总务部长，金永昌兼产业部长，陶克陶兼保安部长，马永魁兼财政部长，杜运宇兼民生部长和交通部长。在委员会里。卓特巴扎布、于品卿、夏恭、马永魁。都是虚有其名。而陶克陶与金永昌和杜运宇三个人，才是该会的骨干。因陶克陶与金永昌，系日本“关东军”豢养多年的特务，杜运宇除在日本留学，还娶回一个日本老婆的缘故。陶克陶在此一阶段，既是总务部长，又是“蒙疆联合委员会”的保安部长，可谓红极一时，经常坐着日本的军用飞机，在张家口和厚和之间飞来飞去。“蒙疆委员会”的一切工作，主要是由金永昌和杜运宇两个人，秉承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意旨，操纵和监督三个政权。

“蒙疆联合委员会”设有总务委员长，日寇想叫德王担任，德王因为反对这个太上政府，故一再推诿而不接受。第一次访日便是为此想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并呼吁日本朝野协助他建立“蒙

古帝国”东京方面虽然因金井章二不准吉尔嘎朗直译他的谈话，没有听到他的乞怜哀鸣，但是后来在“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基础上，把“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从厚和搬到张家口，受日本特务机关后来改成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管辖。德王很不满足“自治”这个词，想赖在厚和不走以示抗议。经“驻蒙军”军部派政治参谋大桥熊雄和陶克陶到厚和对德王施加压力，而德王又恐怕日寇从蒙古人中另选他人，因之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间担任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同年九月一日，在张家口就任“联合政府”的主席。

张家口的“联合政府”，是一个蒙奸和汉奸混合的政权，统辖五个盟和“察南”、“晋北”两个政权原属地区。“联合政府”在政务院和参议府之外，增加了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厅，政务院由三部扩大成七部，并且添了牧业总局，樵运清查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回教委员会和兴蒙学院等受正副主席领导的附属衙门，以及驻日代表部、驻满代表部和驻华办事处等外交机关。从表面上看，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局面。

联合政府比军政府和联盟政府的寿命都长。它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成立。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垮台，差十天存在了六年。初由德王和于品卿及夏恭三人，担任正副主席，卓特巴扎布为政务院长，吴鹤龄为参议府议长，我和乌古廷仍分担蒙古军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夏恭死后没叫“晋北”方面出人，由我兼了一个副主席。政务院底下最重要的总务部，完全由日本人把持，山关口保和武内哲夫任部长和次长，将陶克陶调为司法部长。因“联合政府”是由“蒙疆联合委员会”蜕变而来，故由“晋北”的马永魁任财政部长，“察南”的杜运宇任产业部长。“东蒙”的金永昌任交通部长。原来任“联盟政府”部长的特克希卜彦和吉尔嘎朗，一个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一个任了樵运清查署的署长。

“察蒙”卓特巴扎布以外的几个首脑，和我带来的几个“汉蒙古”，也在这个新的机构中出现。这就是巴盟盟长补英达赖兼了

最高法院院长，锡盟盟长松王兼了民政部长。东苏尼特旗的郡王郭尔卓尔扎布担任了牧业总局局长，刘继广由包头市长升为最高检察厅长。我的另一个师长热河赤峰县人丁其昌调任治安部部长。

原“察南”“晋北”两个政府改组为政厅时，由于过去宣化府属十县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日伪时期除了参加抗战的外，大部避居北平。“察南”政府是由寓居张家口的几个客籍人组成。现在于品卿和杜运宇参加了“蒙疆政府”，“察南政厅”长官一职因地方无适当人选，由“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从伪满调来曾任次长的陈玉铭充任。“晋北政府”是在夏恭和马永魁到了张家口后，由山西浑源的田汝弼（“安福系”政客田应璜的儿子，曾留学日本）担任“晋北政厅”的长官。

“联合自治政府”设立在张家口，受“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就近摆弄。内部是由日籍的总务部长关口保把守着主要的关口，各部会局署由顾问变成次长或参事官的日本人主事。从政府的重要人选看，表现了几根骨头众犬争，没给“绥蒙”的蒙古人和绥远的汉奸空出一分。夏恭、马永魁和田汝弼相继死后，晋北的汉奸也不能分尝一杯羹了。除了察南的于品卿始终是个牌位外，杜运宇根子很硬、得另眼看待，联合政府里的要职，尽被“察蒙”“东蒙”人平分秋色。

我带来的“汉蒙古”能够参加“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以后还领导了“宣化”和“大同”两省与张家口特别市，是因日本人和德王都怕我借水养鱼，用官爵来分化我的军队中的骨干。我的三个汉族师，以第一师较为精锐，故他们从第一师下手，先把刘继广调为包头市长，我遂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担任第一师师长，去率领这个最能打仗的部队。在“联盟政府”扩大为“联合政府”时，德王既不愿“察南”和“晋北”提出人选，又怕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从伪满调人，特别是日寇和德王要把我的汉族师，从伪蒙古军中拨出另编警备队，以削弱我的兵权，使我没话说，便撻

升刘继广为最高检察厅长，调丁其昌为治安部长。热河阜新人李树声，曾给崔兴武和我担任过驻承德的办事处处长。德王想通过此人拉拢我的其它部下，除把他介绍给“军统”马汉三外，并继韩广森（河北南宫人，曾任张家口商务会会长）出任张家口特别市市长。

“察南”和“晋北”两个政厅，于一九四三年改为“宣化省”和“大同省”后，由地方人充任省长。“大同省”的省长由原来的“晋北”政厅长官田汝弼继任；“宣化省”的省长由怀安县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李焕瀛担任。原“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充任了汪政权的“中政会”委员。后来晋北的马永魁病故，田汝弼继任了由财政部改成的经济部部长，便调最高检察厅长刘继广为“大同省”的省长。李焕瀛死后把刘继广又调到“宣化省”，李树声由张家口特别市长升到“大同省”，李的遗缺由我的军需处处长热河朝阳人崔景岚继任。于是“蒙疆”五盟以外汉族聚居的两“省”，和“首都”张家口特别市，似乎由我带来的“汉蒙古”进行统治，成了德王分给我的地盘。

“联合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一年二月间，德王率领我们到东京二次访日，归国时即把吴鹤龄带回。吴在日本考察期间，学会日文日语，娶了个日本老婆，已经得到日本人的谅解。故在这年四月十八日德王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让吴鹤龄和卓特巴扎布对调工作，叫吴任政务院院长，卓任参议府议长。首先把陶克陶踢出，推到参议府担任参议，将司法部和产业部取消，让原来的产业部部长杜运宇改任了司法部长官。其次是将民政和治安两部改组，合并为内政部，由原治安部长丁其昌担任部长，原民政部长松王调任为兴蒙委员会的委员长，原财政部改为经济部，交通部改为交通总局，由马永魁和金永昌分任经济部长和交通总局局长。此外任蒋辉若为回教委员会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和恩和布林为驻日、驻满代表部代表，将原总务部改为总务厅，由前总务部的次长日本人武内哲夫充任厅长。从此吴鹤龄成

了德王小朝廷的“内阁”总理，专权用事。到一九四四年年底，他看见日本快要完蛋，才知难而退，躲到北平去“养病”，执政时间约有三年半之久。

吴上台后，同乌古廷一起把他们家乡热河喀喇沁的不少蒙古人和汉人，都安插到县政府和“蒙古军”的团部里。乌古廷虽然没摆弄了我，吴鹤龄却在德王左右言听计从，将“察盟”方面的人，全排挤出政务院，安排到冷衙门里，等于闲散王公；将“察南”和“晋北”的汉奸，也摒弃于圈外。自从田汝弼死了以后，部长之中便没有了“晋北”的人。但吴鹤龄却不敢撼动察南的杜运宇。杜既有靠山又有才干，不仅担任司法部长官，还兼任了田汝弼遗留下的经济部部长。金永昌看见陶克陶失掉了权势，知道日寇把吴鹤龄视为头面人物，看陶克陶和他是一般的特务，以后也变成了随风倒，在吴鹤龄面前不敢表示有恃无恐，直到“联合政府”垮台以前，尚能保全官职。

我因有枪杆子撑腰，吴鹤龄对我和我的人颇为客气。故丁其昌得以蝉联下去，刘继广和李树声也能调出去领导宣化和大同两个“省”。可是他对副主席于品卿，却两样对待。部长以上的人都有专用卧车，于在开会时才派公用卧车接送。于在会上一言不发，会后便回他的商号中去当经理。他象“察蒙”的那几个总管一样，见了吴鹤龄高声话都不说，老是曲腰称“是”，连一个私人也无权举荐到政府里担任小官。吴鹤龄任政务院长时代，其气焰炙手可热，所谓蒙疆地区，越发成了“东蒙”的蒙奸和东北的汉奸横行的天下了。

伪政务院院长吴鹤龄

吴鹤龄出身于喀喇沁右旗的一个蒙古族官僚地主家庭，他父亲任过“扎楞”^①，所以自幼通晓蒙汉两种语言文字。青年时即到北京读书，从北京的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还给蒙藏学校

^①扎楞——旧蒙旗官职中的职称，就是参领。

讲过宪法。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他和白云梯处于对立的地位。白等主张取销王公制，他要维护封建制度。在一九二八年秋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提出内蒙自治的要求，当时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委予蒙藏委员会的委员，又受到“东蒙”王公的推荐，当了驻京办事处处长。

德王在未出穹庐以前，就知道要想在政治舞台上高爬，必须延揽人才，求得文人武夫的扶佐。一九二九年秋，他从西苏尼特旗到北平，初出风头，便装做求贤若渴的样子，给蒙古青年的印象是谦恭下士，后来被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陈绍武、陈国蕃、丁我愚、于宝衡、瑞永和陶立宾等，便先后在北平和南京追随到他的左右。这时吴已经和白云梯与李永新齐名，德王早有耳闻，在南京见吴后，一睹风采和一听谈吐，两人一拍即合，恨相见之晚。从此德王就把吴鹤龄视为自己未来的辅弼。

一九三三年德王在百灵庙打起内蒙“自治”的旗帜。国民党中央十月间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前往百灵庙进行巡视，吴鹤龄以两面手法讨好蒋介石和德王，这时他已是内蒙的驻京代表。当时，德王等要求脱离察、绥两省实行“自治”，宋哲元和傅作义主张必须由察、绥两省节制，双方争执各不相让，使谈判陷入僵局。吴鹤龄由南京前往百灵庙，替国民党中央进行斡旋。可是当谈判再度开始，他又站在德王方面力争脱离两省实行“高度自治”，弄得黄绍竑无法接受。后经班禅出面调停，才决定了成立“蒙政会”的折中办法。由于吴鹤龄应付灵活，竟将国民党中央骗过，因而一九三六年春德王在察北建立“军政府”前夕，蒋介石又打发他前来劝阻。吴鹤龄看大利不占小便宜，他任“蒙政会”委员和驻京办事处处长时，对于国民党中央拨给“蒙政会”的经费物资，从没有揩油装腰包，在蒙古的官僚政客里很少有这样的操守，因而更取得了德王的信任和倚重。

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间，吴鹤龄由南京到察北，他在张北阻挠

察哈尔建盟没有成功，同行的尼冠洲被日本特务杀害，他被德王营救脱险，护送到西苏尼特旗后再没有回南京。四月间“乌珠穆沁会议”召开以前，我到西苏尼特旗去找德王，见吴被招待在王府东小院的三间静室里。他整天阅读线装古书，不和旁人来往，因为多年茹素，在吃饭时也不出小院，装作道貌岸然，只是德王常去看他，二人谈到深夜才散。当时他很不引人们的注目，在“乌珠穆沁会议”上才显出他的才干，被蒙古人誉为“圣人”，并更加遭到日本特务机关的猜忌。

“军政府”成立后，日本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田中玖，认为吴被蒋介石打发来操纵德王，曾和陶克陶计划派刺客杀他。德王为了他的安全，又把他弄回西苏尼特旗，故吴虽任参议府议长，但不在嘉卜寺上班办公。日本“关东军”的政治参谋田中隆吉来到嘉卜寺，德王说吴忠于蒙古民族的复兴事业，已经和蒋介石完全断绝关系，他敢以身家性命做为担保。并说：“你们既然承认错杀了尼冠洲，对团结蒙古人建立东亚新秩序造成很大的损失，如果再把吴也干掉，蒙古的知识分子谁还敢来嘉卜寺为军政府服务。”经德王的再三解释，田中隆吉才叫田中玖把吴放过，并且在改组“联盟政府”时，让吴担任了参议府议长，给以后“组阁”创造了条件。

吴鹤龄在归绥的时候，把原配女人从喀喇沁老家中接来，住到新城深居简出，很少参加社交上的应酬。政府开会时，也是打着一般的官腔，没有会议即不上班，回家闭门读书。他因为精神苦闷，偶尔下旧城到我的家里吸鸦片，并和任过绥远通志馆馆长的归绥汉族文人郭象俊，研讨内蒙的历史沿革。此人不仅小事聪明，而且对大事也有一定见解。他在我家初吸鸦片时，一分钟就把打烟泡学会，以后抽得上了瘾，向我要上药丸毅然戒绝。他从郭象俊那里借到不少古书，把长城内外各县的志书完全看过。他向我说：“元朝所以失败，明朝的鄂尔多斯部所以没有成功，就是只会焚掠残杀，不懂得用政治收买汉族人心。我们要想在此一

区域能够长久呆下去，应该仿照清朝康熙皇帝的做法。”

我在这些方面，对他产生了钦佩，觉得这样一个能干的人投降了日寇，未免可惜。有一次我问他：“你为什么也和我们落水到一起？”他说：“我在南京时，见军政部挂着一张全国地图，把标志军队布防的箭头，都搁在黄河南岸，证明国民党已把华北放弃，将蒙古扔掉。并且听说蒋介石因全国人每人平均只有五颗子弹，故不敢抗战，要进行曲线救国。何应钦主张退守黄河以南，以争取外援，叫他暂缓投降。我感到抗战没有前途，就跑回来了，想协助德王拯救咱们的民族，使得少受一些灾难。”他对别人也是如此说法，让蒙古人和日本人听见都不刺耳。

“联盟政府”成立时，德王由副主席兼政务院长，让吴鹤龄任参议府议长，就打算叫吴“组阁”。因为当时日本人对吴还很怀疑，同时陶克陶也以“开国功臣”自居，看到自己在哪一方面也比得上吴，所以到处对吴造谣中伤。德王既怕日本人，又不敢得罪陶克陶，他们遂用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在我们第一次访日时，把吴鹤龄留到东京进行“考察”，实际上是叫日寇考察他。我们第一次访日，大概在一九三八年年底，吴在日本呆了两年，到一九四一年二月，我们二次访日时，即把他带回张家口。吴鹤龄走时把参议府议长辞掉。他走后，归绥的日本特务机关，还派宪兵搜查过他在新城的住宅。因为吴不留痕迹，结果一无所获，所以一九三九年扩大组织“联合政府”时候，他虽然身居国外，但仍给他留下一个参议的位置。

吴鹤龄在东京的两年期间，日本方面按外宾招待他，他很快就学会日文和日语，并娶了日本老婆。他所以娶日本老婆，完全是为了表示亲日。我们二次访日时，他住在一幢很雅致的小楼里。他指着那个日本女人，用汉语和我说：“我半年就学会日本话，她快两年还听不懂中国话。我跟她结婚，是他们的人给介绍的，故她来我这里，负有监视我的使命。经过我对她体贴，他对我很忠实，已经在精神上脱离了日本国籍，成了咱们蒙古的女

人了。去年日本的宪兵，还不断来我这里，在楼底下问她关于我的情报。她什么也不说，逼得没办法的时候，只是痛哭，我把耳朵贴在地板上，听得非常清楚。宪兵走后她跑到楼上，把经过一五一十地都告给了我。”由此看来，吴很会应付环境。他在东京期间，从事社交活动，和日本的一些权贵人物来往，最后终于使日本兴亚院由怀疑转变为信任。

在吴出国期间，陶克陶以“联盟政府”总务部长和“蒙疆联合委员会”保安部长的双重身分，大肆贪污，分配节余的经费时，他比德王分得还多，竟达到三十万元，数字相当惊人。他改任了司法部长以后，仍然受贿和揩油，并且顾头不顾尾，连日本人也敢吃喝。“联盟政府”的最高顾问宇山兵士托他向我借了两万元，他就从中克扣了五千元，因此声名狼藉，引起日寇和蒙奸的公愤。吴鹤龄这个政敌，没有经过吴的打击而自己倒了下去，所以吴从日本回来不久，就由参议府议长调为政务院院长。

吴鹤龄执政以后，先是引用自己的亲信故旧，硬往政府各部门中插入，分布了好多羽翼。他和我的参谋长乌古廷是郎舅关系，乌古廷引用的多是喀喇沁的武人和“东北讲武堂”的汉族同学；吴鹤龄引用的除了老朋友和老同学外，还有他二弟吴椿龄在喀喇沁培养的蒙汉学生。

在吴鹤龄引用的私人中，有一个蒙古人戴仲元和一个汉人罗勋甫最为吃香。我忘记了他们所担负的职务，人们都称他两个为吴鹤龄的“哼哈二将”：一个给吴在张家口和北平倒卖房产；一个给吴在天津北平做投机倒把生意。我在张家口上堡的那处院子，就是戴仲元倒卖给我的。戴是以房产做抵押放高利贷，到了业主无力赎回，便以低价收买，再以高价售出获利。吴鹤龄干了一年多政务院院长，看见日寇挑起太平洋战争，感到德王的政权好景不长，不趁此大捞一把尚待何时，便叫罗勋甫利用政府的公款，大做买卖。由于罗闹得太不像话，遂引起“察蒙”方面的反对，因此吴鹤龄还向德王闹过一次辞职，经过德王给他下了一跪，他

舍不下捞钱的机会，才又厚颜无耻地继续干了下去。

察绥两省和山西的雁门关外在沦陷时期，出口了大宗皮毛、牲畜、粮食、煤炭、盐碱和鸦片，这些战略物资和土特产品，除了由日本的“驻蒙军”军部和日本的各种“株式会社”控制，也由政务院经管一部，详细的情况我不大了解。我只知伪蒙每年卖给“华北”十五万头羊，按“华北”的伪钞折价，由罗励甫负责此项牲畜交易。罗励甫收到羊款以后，他不马上交给伪蒙疆银行的北平办事处，而是将款套购成黄金、布匹，等待“华北”伪钞下跌到一定的程度，才带回张家口结账。这样罗励甫从中获得了暴利，蒙古王公、总管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结果卖出一头羊，用羊价买不回一张羊皮。乌盟在“朝”中无人，巴盟和察盟产羊很少，补英达赖和卓特巴扎布碍于德王的情面，不好意思顶撞吴鹤龄；锡盟不但产羊很多，而且盟长兼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松王从不让人，因而在一次正副主席和盟长们召开的会议上，当众把此事端出。

我比德王爱交际应酬，在归绥和张家口的院子，都较德王的公馆讲究吃喝，雇有山东厨师和备有鸦片烟灯，伪蒙政府的一些首脑们，均爱到我的家中聚谈。那次会议的正题目，是向各盟征兵，以补充蒙古军的缺额，在我的客厅中举行。可能是几个盟长事前开过小会，大家坐定未谈正题以前，松王劈头就提出卖羊的事情。吴鹤龄说：“我不知道此事，可以叫罗励甫来给大家交代。”松王的秘书当即给“政务院”打去一个电话，罗还以为是吴对他吩咐别的事情，所以带着一个公事包走来，以致嗫嗫嚅嚅地无话可答，吴便以蒙语替罗解释，使罗好能措辞。松王一看此种情形，手指着吴和罗，用汉话挖苦地说：“噫！叫他交代，你给翻译，哈哈！你们两个人……”。弄得罗越发呆若木鸡，吴更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德王和补英达赖与卓特巴扎布等都不吭声。我看陷入僵局，便用“不要谈你们的羊了，先说我的兵吧，如果没有兵，狼来吃羊谁给你们打”的逗趣话，才给吴鹤龄解了围，松王也就坐在沙发里面不说话了。

不料讨论到兵上，会场又起了风波。德王私心很大，处处偏袒他的苏尼特旗，给西苏尼特旗拨的款项多，向西苏尼特旗要的差事少，早就引起锡盟九个旗的王公不满。松王由于怒气未消，便在征兵数额上和德王争执起来。此次向锡盟征兵四百人，本来数字很少，松王偏说锡盟没有如此众多的适龄壮丁，很使德王难堪。德王由于松王奚落了他的宠臣，也老羞成怒，板起主席的面孔，非叫松王答应不可。松王说：“你如硬要，我把喇嘛给你送来。”德王说：“我保护宗教，不要你的喇嘛，”两人在会场上吵起了嘴。吴鹤龄是想给德王找台阶下，问松王“少出几个行不行？”德王因松王由于吴和他发态度，所以说吴“你少插嘴”。吴鹤龄一听此话，把满肚怨气都向德王发泄。他对德王说：“你是元首，我是院长，元首当众羞辱院长，这成什么体统？我现在向你告退，请你另选贤能。”说完拂袖走出客厅，到我的卧室中吸鸦片。我装作劝解，也跟着他走进去。

吴躺在我的烟榻上，很伤心地和我谈：“主席给我这样的钉子碰，我这个政务院院长怎能再担任下去？”我只是说：“你多吸几口消消气吧。”我们正说话中间，德王亦从客厅中跑了进来，他什么话也没说，便扑通一声跪在床前，将手搭在吴的腿上，吴抽了一个烟泡，才跳下床把德王搀起，两个人沉默了十几分钟，我便把德王拉到客厅中重新开会。我将锡盟征兵的名额，由四百核减为三百，松王再没说负气的话，会议草草结束。散会后，德王和吴因各怀心事，坐上汽车各自回家，其余的人被我留下吃饭，便在餐桌上纷纷讨论起来。

松王首先说：“他给吴下跪，等于给所有的王公丢人。”卓特巴扎布也说：“他就认得吴是人材，把咱们都当成土包子来看待。”我亦因德王给吴下跪，联想到他削我的兵权，利用日本“关东军”与“驻蒙军”军部向我施加压力，思想上受了很大的刺激，由于补英达赖在座，没好意思发泄心中的牢骚。这顿饭是用德王和吴下酒，所以每一个人喝得很多，因为均有受德王驱使和被吴

利用的精神苦闷。此一场闹剧是吴“组阁”以后第二年演的，地点在我下堡的院子里，时间在一九四二年这一年内。吴虽被“察蒙”方面反对，但被德王视为一刻也不能离开的灵魂，结果吴也舍不得院长这个高官肥缺，在家里呆了几天又去“政务院”上班。

日本投降的前一年冬天，吴的宦囊已经很满。一方面看到日本快要完蛋，恋栈无好下场；另一方面日本人怕他留在“蒙疆”给德王和我出主意，也有意把这个危险人物排除出去，他便以养病为名，辞职躲到北平观风。日本投降以后，他除分到很多日本丢给蒙奸的物资外，还把德王和我耍弄到重庆，重新进行政治投机。蒋介石委他为军委会蒙古宣导团主任，他的妹夫乌古廷也担任了东北行辕的少将高参，辽沈战役结束以后，他俩把北平的财产都变卖成黄金，完全转移到台湾。一九四九年夏德王和我到阿拉善旗，搞西蒙自治，他俩去阿旗走了一趟，看到凶多吉少，便从兰州坐上飞机逃走了。

德王对待蒙奸、汉奸的态度和手段

首先，德王对汉人怀有成见，除我这个“汉蒙古”外，认为其它的汉奸都不可靠，特别是日本人给安插进的“满系”汉奸和一些留日的汉人，都示意蒙奸要严加防范。跟日本没有历史渊源，由“维持会”冒出的汉奸，如张家口的于品卿、大同的马永魁、厚和的贺秉温等，德王和补英达赖对他们很不客气。贺秉温因为当了“厚和”市市长，到处受气，感到居官不如经商，等到“土业组合”成立以后，他便跑到张家口担任了这个“组合”的理事长，又经营了他原来的烟土生意。德王因读过汉文书，见了大同的夏恭，比对别的汉奸稍稍有些礼貌。此外对于杜运宇这个汉奸，因为杜的根底硬和能力强，德王另眼看待，有时也采纳他的意见。例如张家口最初也有聚赌的“俱乐部”，把“首都”弄得乌烟瘴

气，就是经过杜运宇的建议，由德王下令驱逐到崇礼县的。

其次，德王把“察蒙”的蒙奸，当成自己的嫡系，尤其对他的姨父补英达赖，可以说言听计从。“政府”由厚和移到张家口之后，补在厚和、张家口中间来回奔跑，一方面替德王监视我和“绥蒙”的王公，一方面参加德王的各种机要工作。德王给补英达赖成立“巴彦塔拉盟”，引起“察蒙”总管特别是“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扎布的反。他为此让补和卓结为儿女亲家，以缓和这种矛盾。不料补英达赖的儿子赵宝钢，把卓特巴扎布的姑娘休弃，弄得两个人更加不和，开会时补出席卓就不出席。以后德王挑选大官叫卓特巴扎布去坐，但又引起锡盟盟长松王的醋意。由于松只兼着一个兴蒙委员会委员长，所以松王后来团结锡盟的其它王公，反对德王和吴鹤龄，把壮丁充实了他的“防卫师”，而不愿给“蒙古军”补充缺额。日本人叫各盟成立“防卫师”，我忘记是诺门罕战役以后，还是张高峰战役以后，日本人为了充实边防，想把蒙古人武装起来防苏。我曾建议德王趁此多向日方要些武器，德王恐怕盟长们有了军队，越发不听他指挥，结果没有积极进行。后来日本人变卦，以致把机会错过，只是盟长们挎起战刀，士兵们仍使用着旧枪。

再次，“绥蒙”的王公只有乌盟达尔罕旗的云王（云端旺楚克）、四子王旗的潘王（潘德恭扎布）和伊盟杭锦旗的阿王（阿拉坦瓦其尔）一直和德王合作。云王虽被德王拥为蒙政会的委员长和军政府与联盟政府的主席，但云王死了以后，并未重用他的儿子沙拉巴多尔济，只是叫沙贝子任了乌盟的副盟长，直至盟长、中公旗的巴王到了陕坝才升为盟长。四子王旗的潘王死了以后，也只是让儿子索德那穆绰克珠尔袭任了该旗的札萨克。杭锦旗的阿王，一直被德王搁在包头，尽管他的“防卫师”战斗力较强，亦没有叫他参加德王当副主席、主席的“政府”。

厚和的土默特旗蒙古知识分子，文化程度和领导才能，并不低于喀喇沁和科尔沁的蒙古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多数是德王的反

对派，走着革命路线或参加了抗战阵营，所以德王对土默特旗的蒙古人按被征服了的汉人来看待，让补英达赖去进行统治，只把一个参加过百灵庙“蒙政会”的默尔根巴图尔，安排为土默特旗的总管，兼“巴彦塔拉盟”的副盟长。默在日伪时期，从不出头露面，所持的态度和普通的汉奸差不多。土默特旗还有一个知识分子贺云章，因留学日本的关系，被留用为归绥毛织厂的厂长，他虽给德王拉过皮调，但没有被德王重用。贺因和国民党的“军统”特务来往，跟补英达赖手下的梁致祥与萧兆庶一案，被日本特务机关扣捕，梁、萧经德、补保释，贺由于没人给说情，被日寇用凉水灌死。这正如同厚和日本特务机关扣捕起一百二十多个教员，每天三三两两地拉到新城东门外活埋，我叫补英达赖出面营救，他说“咱们不管汉人”一样。

德王最重视投靠他的“东蒙”知识青年，根据不同的来历分别对待。在百灵庙“蒙政会”前后拥戴或投效他的知识分子，大都倚为股肱，如让吴鹤龄“织阁”，出任“政务院”院长；乌古廷和宝贵廷善于投机，先后担任了“蒙古军”的参谋长；吉尔嘎朗和特克希卜彦为人很正派，故一直让吉经管财政，并兼了“兴蒙委员会”的副委员长，特克希卜彦先主持军事，以后出任了驻日代表部代表。还有一个“东蒙”知识分子包悦卿，他在“蒙政会”任过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军政府”时代任过“蒙古军”第八师师长，以后任蒙疆银行总裁，一九三七年夏在多伦病故。此人如果活到“联盟政府”和“联合政府”时期，地位也不在吉尔嘎朗和特克希卜彦以下。

吴鹤龄称为“小鬼们”的“东蒙”青年，给德担任随员和秘书，每天晚上在德的公馆中办公，和补英达赖在一起，跟德王商讨大事。吴拟出的各种底稿，都经他们修改后才明文规定，故他们和吴时常发生摩擦。其中有陈国藩的内兄丁我愚，则是派到西苏尼特旗给德的小王爷都嘎尔苏龙担任小丞相。因德领导了伪蒙政权以后，即把他的扎萨克职位，让给他的长子。上述这几

个“小鬼们”很能迎合德王的心意。德王弄下的不少造孽钱，多被他们五鬼分尸。吴鹤龄辞职以后，他们也采取了吴的手段，把日本“会社”向蒙旗换取的皮毛物资，都堆到张家口东山坡的仓库里，不给各旗分发，想从中牟利。我建议德王让运盐骆驼和勒勒车①的回脚向各旗运输，他没有理采，结果日本投降时，给张家口的地痞流氓和苏联军队做了“好事”。

由日本“关东军”派到德王政权中的几个“东蒙”特务，除会说日本话外，几乎没有一个有才干的，并且品行极端恶劣。陶克陶是个大流氓，喜怒哀乐完全表现在脸上，他的内心活动，很容易被稍微善于察言观色的人看出；金永昌尽占人的小便宜，而不会弄大的钱，把好几十万元存在邮局里，结果全变成了废纸；于兰泽在投日以前，曾到南京投奔过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德王对于这几个人，在表面上不敢得罪，象对待杜运宇那样，有时也听他们的话，等到他们渐渐不被日本人信任之后，就跟他们疏远。在厚和改组“联盟政府”时，便没给于兰泽要职，到张家口扩大成“联合政府”不久，又把陶克陶踢出“政务院”，把他俩都打发到“参议府”，只有金永昌能看风使舵，由亲日转为亲德捧吴，保住了一个“交通总局”局长。如同把我的两个卸任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也安排到参议府，以示不忘旧人，并且使得他们能在“蒙疆”地区继续鬼混下去。

因为“蒙疆”的武力，基本上掌握在我的手中，所以德王对我和我带来的“汉蒙古”，曾使过不少笼络和收买的手段。他知道我是地主出身，很爱土地和牲畜，故表示要从他的西苏尼特旗给我拨地，让我派人前去设立“窝铺”。我对他说“领了你的土地，岂不是成了你的奴才。”他见我拒绝接受，又要我买羊到西苏尼特旗放牧。我因盛意难却，托在百灵庙驻防的宝道新，从达尔罕旗买了五千多只羊，他叫牧工给放得很好。因为德王在厚和

①勒勒——锡盟一带民间使用的两个木轮的牛车。

②窝铺——在野外从事农、牧业生产搭盖的临时住所。

纳范玉英（即金娥子）为外室，他的女儿迁怒于我，把我的好羊信换走，使我的羊群受了很大损失。我只赶到厚和二百只，让“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大伙吃掉；剩下的六千多只和德王的全部牲畜，都在日本投降以后，被苏军赶到了外蒙。

德王为了收买我的部下，不仅把我的亲信刘继广、丁其昌和李树声等，抽调到政府里担任了部长、省长和市长，并且把他们的几个仍在带兵的汉族师长，都介绍给“军统”华北区区长马汉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委状，给他们另找政治出路，以削弱我的力量。伪蒙古军除了三个汉族师，还有六个蒙古师，这几个蒙古师长起初分亲德和亲日两派，以后他们多数都倾向于我。德王为此于“联盟政府”时期，曾在他的西苏尼特旗仿照蒋介石庐山训练团的办法，想把伪蒙古军师、团长以上的军官，分批弄到王府去受训。因为订出禁止吸食鸦片等清规戒律，并且让他们和他在一起过住帐幕、吃炒米的艰苦生活，他能坚持下去，大家都感觉吃不消。这徒徒引起日本特务机关的怀疑，并没有给蒙古军官灌输进去些什么，并且收到相反的效果，只办了一期就再没继续办下去。

“蒙古军”成立初期的情况

(一)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德王在西乌珠穆沁索王（索特诺木拉布坦）府举行第一次蒙古大会时，事先他并没有把我叫到西苏尼特商量，也未派人来张北征求我的意见；只是在开会的前两天，张北特务机关长田中玖通知我前去参加。他说：“这次会议决定建立你们蒙古的政权，你应当同我一块儿去出席。”第二天他和我坐上飞机，飞了两个多钟头到达了西乌珠穆沁。同行的还有金永昌和新产生的伪“察哈尔盟”盟长卓世海以及察哈尔的两个旗的总管（特达海与鲍总管）共六人。到了西乌珠穆沁，他们住在王府里边，我和田中玖被招待在王府西边五里地方该旗协理胡图龙嘎的家中，将我们和出席此次会议的其他人隔开。从这些情况看，大会好像把我按外宾看待，故我也以旁观者的心情，来对待这一“隆重”会议。

会议举行了三天。会址设于一个特大的蒙古包里边，内中可以容纳二百多人，正中悬挂着成吉思汗的遗像，转园圈都摆着桌子，以显示民主的形式。锡林郭勒盟十个旗的札萨克和察哈尔部的十二个旗群的总管，都出席了大会。绥远乌、伊两盟的札萨克和土默特旗的总管，因在傅作义的控制下，多数避嫌没敢前来，但均派仕官充当代表。由于是一次秘密会议，如乌盟四子王旗的潘王、达尔罕旗云王（云端旺楚克）的侄子沙贝子，中公旗巴王的儿子林贝子以及伊盟杭锦旗的阿王（阿拉布坦）还是从绥远偷偷地跑来了。其余参加会议的，便是从百灵庙“蒙政会”过来的那一帮班底。黑压压地坐满一堂，空气感到非常闷热。

这次会议是由西乌珠穆沁札萨克兼锡林郭勒盟盟长索特诺木拉布坦担任主席，德王担任秘书长。索王的左边坐着有王爵的札萨

克，右首紧靠他的是德王和我与田中玖，察哈尔部十二个旗群的总管，也和其它盟旗的札萨克坐于上席（主席台）上面。这是过去没有先例的，他们感到特别光荣。德王的桌子对面坐着吴鹤龄，我和田中玖中间坐着金永昌，吴鹤龄给德王担任秘书，金永昌给我和田中玖充当翻译。这三天戏可以说是日本“关东军”编剧，由吴鹤龄导演而成。德王问过吴鹤龄以后，又教给索王给众人做传达。田中玖不说一句话。我在旁观看，觉得看他们表演得很滑稽。

会议的第一天，由索王先讲成立伪“蒙古军政府”的意义和筹备经过，让众人发表意见。与会的人都是想借此升官，当然是无异议地一致通过，并说了一些反抗汉族军阀统治的大话。第二天讨论伪“蒙古军政府”的组织，按照吴鹤龄草拟的大纲，决定伪政府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总裁一人，下设办公厅和军事、财政、内务、交通、教育、实业、司法和外交八署，另外成立“蒙古军”，设总司令一人，副总司令一至三人，先组编两个军。其次决定以成吉思汗出生那年为纪元，推算结果，公元一九三六年为成纪七三一年，伪政府暂设于嘉卜寺，将察哈尔省政府在此设治的化德县改称为德化市。第三天进行选举。因为德王想独揽军政大权，早于一月间在西苏尼特成立起伪蒙古军总司令部，自称总司令，想把我的“察东警备军”归编到他的麾下，让我担任副总司令。但此事因没有跟日本人谈妥和向我挑明，故这天对于伪“蒙古军”的人事，未敢在大会上提出表决。会上只选出乌盟的云王（云端旺楚克）为伪府的主席，锡盟的索王和伊盟的沙王（沙格都尔札布）为副主席，德王为总裁，吴鹤龄为参议府议长，德王的姨父补英达赖为办公厅主任，王宗洛为军事署署长，德古来为财政署署长，于兰斋为交通署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为内务署署长，金永昌为教育署署长，王辑唐为实业署署长，特穆尔博罗特（特大海）为司法署署长，陶克陶为外交署署长。我因政治嗅觉迟钝，以为这里组织“蒙古军”和我的“察东警备军”是两回事，看到会上未选“蒙古军”的总司令与副总司

令，还没体会到德王在图谋我的现成军队。

田中玖在二十六日闭幕后的宴会上，说了一些蒙古要和日满提携，为建立东亚新秩序而共同奋斗和祝贺此次会议成功的话。二十七日田中玖去参观乌珠穆沁的盐池。他看见好多人都跟着德王回了西苏尼特，把我一个人扔在胡图龙嘎家中，由于听不懂蒙古话，感到非常苦闷，故叫我陪着他前去参观。我们当天在盐池的收税局子住了一宿，二十八日上午参观完盐池，即返回西乌珠穆沁王府，二十九日乘飞机回了张北。“乌珠穆沁会议”是日本“关东军”的参谋田中隆吉在张北组织起“察哈尔盟”不久，到西苏尼特和德王策划而成，所以田中玖对于内幕也不太了解。因而德王在开会期间，不仅没有到胡图龙嘎家中看我，连田中玖亦未朝礼。田中玖以后担任了嘉卜寺特务机关长兼伪军的最高顾问，由于德王没改变藐视田中玖的高傲态度，两个人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田中玖这次参观盐池，并不是游山玩景，而是受“关东军”司令部的指示，前去完成一种视察战略物资的任务。原来碱盐中含有制造炸药的化学元素，乌珠穆沁的碱盐含此元素最多。这个盐池方圆四十多里，夏天落雨后能涨八十多里。后来经过日本人钻探，池内共有三层碱盐，第一层两丈五尺，第二层和第三层均是一丈五尺。听说日本人为此曾和德王、索王订立秘密协定，于一九三七年绥、包沦陷后，在此大量开采，用汽车装载到张家口，都拨给日本人所开办和接收的兵工厂中，做了制造军火的原料，用以屠杀各国人民。

“蒙古军政府”于五月十二日在嘉卜寺正式成立。伪府大小官员宣誓就职的前一星期，也就是五月五日那天，德王把从乌珠穆沁带到西苏尼特旗的人，举行了一次所谓“滂江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决定，是让日本“关东军”向我施加压力，要我把“察东警备军”改编为“蒙古军”第一军；并要求从热河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征拔蒙古壮丁，组编“蒙古军”第二军；由德王任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让我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除了他在我

头上压我，另外还让乌古廷担任参谋长，在我的脚下绊我，从四面八方剥夺我的兵权。这种决定我当然不能接受。日本“关东军”也怕把我逼上梁山，所以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中间，派田中隆吉来张北向我“摊牌”。

田中隆吉因为碍难开口，未和我谈话以前先咳嗽了一声，接着对我说：“老李！关东军打发我来和你商量一件事。”我见他说话吞吞吐吐，遂对他说：“有话直接了当地谈吧。”他说：“你相信关东军，关东军也不欺哄你。德王在滂江开会，大夥推举他担任蒙古军总司令，让你带上军队参加“蒙古军”担任副总司令，关东军问你可以不可以？”我说：“关东军的意见如何？”他说：“关东军没有法子，只好如此应付他，兵权还在你的手中，他不过是个牌位。”我说：“关东军不欺哄我，我就干，只要关东军相信我，那怕担任副官也行，我答应了以后，总要对得起关东军。”并说：

“德王凭什么战功叫他担任总司令？我犯了什么过错让我担任副总司令？我也是蒙古人，为什么他们不信任我？复兴民族不能光拿嘴说，而要用枪去打！”田中隆吉听见我发牢骚，忙说：“老李！行啦！”打断我的话头，随即把我的手握住，很得意地说：

“我的任务可完成了！”其实田中隆吉没有把我说服。由于德王是通过关东军叫我入他设好的圈套，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好口头应承，我遂被迫勉强地参加了“蒙古军政府”。因为“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从此我和德王发生了矛盾，并且一天比一天加深。直到一九三七年十月间，在归绥另成立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他把“蒙古军”总司令让出，我们才开始比较统一起来。

在田中隆吉跟我说好的第二天，德王便派乌古廷由西苏尼特前来张北，代表他欢迎我到嘉卜寺去宣誓就职，并叫我兼任伪德化市的市长。乌古廷于一九三三年从大阁镇脱离汤玉麟，跑到多伦找我给谋出路，我因曾和他在林西结拜，所以叫他到经棚代理我所兼的“经林留守司令”。不料他把我的一个由蒙古人组成的支队，带上归了伪满的“兴安军”，有对不起我的地方。这次德王叫他担任“蒙古

军”的参谋长，为了以后好在一起共事，他极力对我表示靠拢，一见面就埋怨我不该把总司令让给德王担任。他明知内中的原因，却故意以此进行挑拨，使得我们两个发生冲突，他好从中寻找便宜。我虽不记前嫌，但是对着这样的人不能表示自己的真正态度，遂按照我听评书得来的一些陈词滥调，跟他打起了官腔。我说：“我不是成吉思汗的龙子龙孙，没有坐蒙古皇帝的福分。蒙古军的副总司令，就是德王的兵马大元帅；现在又叫我兼任德化市长，更成了德王的九门提督。既然答应扶保他的江山，就要尽忠到底，希望你这个军师，也要像诸葛孔明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只有大家一致拥戴德王，蒙古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乌古廷听了我的这番大道理，再没有跟我深谈，于五月十一日陪上我和田中玖由张北到了嘉卜寺。

德王在五月十二日宣誓就职。任“蒙古军政府”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那天，百灵庙“蒙政会”的那一帮蒙古人，都来攀龙附凤了。察绥两省盟旗的王公总管，亦多来觅官寻爵，比在西乌珠穆沁索王府召开“第一次蒙古大会”时显得热闹。嘉卜寺是蒙古的译音，当地并没有召庙和寺院，它坐落在张家口通乌兰巴托的中间。最早设有西苏尼特旗的收税卡子和驻兵的营盘，形成草原上的商镇。由于附近察哈尔的牧场放垦，察哈尔省政府在此设治化德县，德王因为化德两个字有侮辱他本人的含意，所以改称为“德化”市。“蒙古军政府”设在一个一连三座的瓦房院里，朝南开着三个大门，当中是政府，西边是特务机关，东边是司令部，都有小门可以通行。我们去的时候，德王已搬进政府里边，田中玖被日本人迎接到西院，我由乌古廷领入东院，加上写字的录事和司书，还不到二百人，就在这里坐了一年多时间的小朝廷。

我到了嘉卜寺后，德王当天过东院来看我。他说叫乌古廷担任参谋长，完全是因为乌曾和我结拜的缘故。我对此没表示意见，只是淡淡地说：“你既然决定了，就叫他担任好了。”以后，我从旁一打听，原来乌古廷是吴鹤龄的亲妹夫。他参加了伪满的“兴安军”以后，由于所带的兵被我打发胡宝山前去秘密动员，大

都来到多伦参加了宝贵廷所带的警卫团，他成了光杆，被人家踢出来，不得不去百灵庙投效德王。起初德对他很不重视。自从吴鹤龄被南京的蒙藏委员会派到张北阻挠“察哈尔盟”的成立，经德王保护未遭日本人杀害，弄回西苏尼特旗，逐渐成了德王的“丞相”，乌古廷才一步登天，于吴任了伪府的参议长以后，他也任了伪军的参谋长。大兄哥和妹夫两人，企图玩弄德王和我，故德王被吴鹤龄蒙在鼓里，还拿上乌古廷来跟我送虚假的人情。

“蒙古军政府”的成立仪式非常简单。因为云王和沙王没敢前来参加，德王念完吴鹤龄所起草的稿子，大家都晃了晃拳头，田中玳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以后，即宣告礼成。伪府究竟着手搞什么名堂，我没有过问。在伪军方面首先是把德王的人和我的人往一起合并。决定把“察东警备军”司令部由张北移至嘉卜寺，改组为“蒙古军”总司令部，将张北做为前方。德王的人很少，只有百灵庙“蒙政会”的那个残缺不全的保安总队和我在多伦给他成立起的警卫团，却从百灵庙至嘉卜寺拉着一条长线。“蒙政会”的保安总队主要来源于“九·一八”事变以前补英达赖给德王率领的“乌滂守备队”。这个部队是德王的看家本钱，最初在乌得和滂江中间护路，兵士都是自带两个月的口粮前去轮班应差的牧民。不过德王早有政治野心，所以附属有军官训练班，像李××和乌云飞等，便是那里训练出来的学生。一九三三年十月德王在百灵庙成立了“蒙政会”，即以“乌滂守备队”做为基础，蒋介石给拨了五百枝步枪和日本人供给了一部分武器，扩大组织为“蒙政会”的保安总队。在韩凤林担任保安处长兼任保安总队长期间，除了由土默特旗的云继先担任队长，朱实夫等担任教官，继续训练军事干部，并由蒋介石从南京中央军校派去姚长青、张启祥、陈玉麟、于福赓、薄文俊（以上是热河蒙人），云蔚、陈应权、任秉均、×××（以上是绥远土默特旗蒙人），马福聚（察哈尔蒙人）和苏斐然（宁夏额济纳旗蒙人）等十几个学生，参加到保安总队里边。此外还有好几个汉族的青年军人，也混入保安总队内部，例如：刘建

华曾在黑龙江跟过吴俊升，“九·一八”事变后，退到关内，经万福麟介绍给德王，担任了保安总队的副官。故“蒙政会”保安总队的成分相当复杂，不像我的“察东警备军”，比较单纯。

韩凤林子一九三四年在北平被蒋介石的宪兵第三团杀害后，先由从汤玉麟那里前去投效的热河土默特右旗蒙人宝贵廷代理总队长。后因我在多伦给德王成立起警卫团，由乌云飞前去训练，调宝贵廷到嘉卜寺担任该团的团长，保安总队长派曾任索王驻张家口代表宝道新继充。一九三六年初察绥分治，原来的“蒙政会”保安总队，被云继元和朱实夫等拉走一部，另组了“绥境蒙政会”的保安大队。德王因为不愿放弃百灵庙，仍叫宝道新带着剩下的兵在河东营盘中驻守。所以德部和我部在嘉卜寺合并为“蒙古军”时，可以说他有官无兵。因而我的第一军，由以前的两个师扩充成三个师，由刘继广，尹宝山和陈景春担任师长，他的第二军就立不起架子，不得不要求日本“关东军”给他向热河征了六千蒙古士兵，才编成四、五、六三个师。

“蒙古军”总司令部，最初由乌古廷担任参谋长，刘正中担任副参谋长，郭光举任参谋处长，张启祥任副官处长，崔景岚任军需处长，纪树勋任军械处长，陈康烈任军法处长，李甫民任军医处处长，丁其昌任炮兵队长，王占元任警卫队长，刘建华任宪兵队长，刘荣久任通讯队长。其中除了乌古廷和张启祥是蒙古人，刘建华是唯一的新人，李甫民是我在多伦时从热河朝阳松树嘴子天主堂请来的一个西医，其余都是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和崔兴武“东北军”骑兵十七旅的那一班老幕僚人员和我自己的几个亲信故旧。如副参谋长刘正中，虽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他是我当团长时的连长李鸣远的女婿，和我都是热河朝阳人。至于警卫队长王占元，更是我岳母改嫁汉人以后，所生的一个儿子，和我有“隔山小舅”的裙带关系。

我投敌后，由师长、司令官，爬上副总司令的高位，真是“一人成仙，鸡犬升天”。我不仅把曾给崔兴武任过参谋长的刘胜

三委为伪张北县长，还把曾任开鲁县政府垦务科长兼“热河游击马队”统领部蒙务科长、热河喀喇沁中旗蒙人、我的结拜兄弟张子荣，推荐为伪德化市的副市长。张启祥能担任总司令部的副官长，就是因为他是张子荣的儿子。我所以要如此来安排，一方面是不叫德王的人插进指挥部，另一方面德王的人全是刚出学校两三年的学生，根本负不了一个部门的领导责任。德王抱怨我不提拔蒙古青年，我说：“蒙古人能值几个钱！我的这些老人都搞了半辈子军队，初出学校的青年，连个箕斗册子都造不了，把最高统帅部搞成乱七八糟，你不怕丢人？我怕无法交代关东军，被底下的师长、团长们骂大街。”我因为对军队绝不松手，所以一开始就给德王钉子吃，让刘建华担任宪兵队长，是叫他替我得罪人。结果乌古廷担任了参谋长，指挥不动我的三个师，连我的幕僚也不听他的话，也如德王的总司令一样，成了空牌位。

德王因为没抓住总司令部和掌握不住我的第一军，因而急于成立他的第二军。由于他不相信汉人，想成立一支名副其实的蒙古军队，做他打江山的亲军。他在蒙古人里边最信任锡林郭勒盟人，索王虽能出五千骑兵，但索王和东苏尼特的札萨克林沁旺都特等，都舍不得让自己的旗民带着枪马给他做炮灰。察哈尔部的总管也都是保存自己的实力，不给搭股，因此只好要求日本“关东军”从热河给他征兵。热河的蒙古人只知道敖汉旗有个老德王，根本不知道锡林郭勒盟的这个小德王，他怕热河各盟旗给派出一些七瘸八拐的人马，滥竽充数，特打发他的警卫团长宝贵廷，回热河进行动员，想叫各旗把年轻力壮的人派出来训练成一支可以南征北战的劲旅。临走前为了让宝贵廷给他认真挑兵，还向宝贵廷许下回来担任第二军军长的口愿。宝贵廷是我的一个远房内弟，他虽是土默特右旗的贵族，但资望很浅，所以不得不打上我的幌子做号召。热河的蒙古人口，主要集中在土默特部的左右两旗，右旗是农业社会，左旗是半农半牧社会，据调查共有四十万蒙人。因此这两个旗一下子就出了五千多，昭盟的阿鲁科尔沁旗和大

小巴林等旗才凑了一个团。我是土默特右旗人，并且在热河北部驻防多年，这些蒙古人都是朝着我而来到嘉卜寺的，大半带着枪械。德王欢迎生长在草原上的蒙古兵，不料从热河来的官兵，多数和我一样，完全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会说蒙古话的很少，特别是有好多带兵官当过“马贼”和“胡匪”以及“蒙匪”。

热河各盟旗此次出兵，都是军官带着士兵前来，形成大大小小的团体，使德王的人插不进去。土默特左右两旗出兵最多。左旗是由该旗统领(蒙语称“索津”)依恒额率领。依恒额字绍先，我当营长时即和我结拜成弟兄，给他编了第五师；右旗是由该旗札萨克沁巴多尔济的四哥，即离我家不远的七星台庙的活佛宝音乌勒吉率领，人称他“四佛爷”，给他编了第六师；把剩下的那几旗的兵，给宝贵廷编了第四师，因此，三个师的人数各不相同，并不是每师两千名额。宝贵廷贪而无厌，由团长升为师长还不满足，一心想当第二军军长。因为德王未履行诺言，遂对德王怀恨在心，加之第四师的人最少，也由瞧不起我而倾向了我。至于第五、六两师的官兵，更是我的大小同乡。五师副师长田英，曾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一九二三年就来过察北，他和我一见如故，经依恒额倡议也和我换了帖。特别是第六师师长宝音乌勒吉，哪能带了军队，不过这次出来是想过官瘾，故主动叫我派人协助他。因为土默特右旗和朝阳县合在一起，我遂派朝阳二十家子的李鸣远给他当副师长。所以德王要求日本“关东军”从热河弄来的六千人马，却给我添了羽翼，无形中我的第一军由三个师增加成六个师，他的第二军还是没有组织起来。

到了是年冬天，百灵庙被傅作义占领。一九三七年夏末，嘉卜寺被石玉山捣毁，德王退到多伦以后，才以两处退却下来的残兵败将，另外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了一些新兵，给镶黄旗总管穆克登宝编了个第七师，百灵庙“蒙政会”时代的财政委员会主任包悦卿编了个第八师，科尔沁部留日学生包海明编了个第九师，和西阿巴嘎旗王爷雄诺敦都布编了一个警卫师，总的人数不到

两千五百，等于我的四个团。包悦卿在多伦死后，继任第八师师长的扎青扎布，也是热河土默特左旗人。他的父亲姓戴，任过该旗的扎兰章京^①和我又是磕头弟兄，故他和张启祥一样，按父辈对我，言听计从。包海明看风转舵，也对德王日渐疏远。因此“蒙古军”初成立时，不仅是汉人多于蒙人的热河蒙汉混合部队，而且也可以说是张连同的“热河游击马队”，崔兴武的“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和我的“察东警备军”，这一脉相传下来的小军阀集团，在日本侵华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

(二)

“蒙古军政府”的主要成员，均系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他们既不是甘心投日，也不是真正为了复兴民族，而是一些政治野心家想依靠帝国主义的扶植，打上蒙古人的旗号，达到自己升官发财的目的。除了我比较出身寒微，由奴才的身份和念了三冬汉书的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闯荡，打成一个伪军首领，还懂得些许人情世故，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其余全是利用日本侵华这一时势，投机取巧，一下变成为伪政府的“帝王将相”，真是沐猴而冠，那能认识到天高地厚。所以都妄自尊大，谁也瞧不起谁。“蒙古军政府”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国民党军队收复察北的战争开始以前，内部一直在明争暗斗，并且和德王与田中玖的矛盾交织到一起，极为错综复杂。

首先是军政互不团结，演变成德王和我貌合神离，形成张北和西苏尼特的对立局面，把嘉卜寺变成了一个空壳。我投降日寇，和这次受“关东军”指示而参加“蒙古军政府”，都是为了借水养鱼，给自己储备力量。我的原则是，无论到了什么时候，绝不能把兵权放弃，将枪杆子交给别人。按照旧社会“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观点，德王要是真诚和我合作，我也愿意跟他狼狈为奸，

^①章京：官名。清代文武办事官员多称章京，为满语的音译。蒙古各旗扎萨克的属员有管旗章京。

打个铜帮铁底的“江山”。无奈德王不以“国士”待我，受补英达赖和吴鹤龄等包围，挤我于圈外，并千方百计图谋我的军队。宝贵廷从热河搬来六千蒙古骑兵，对我如虎添翼，德王感到我的潜在势力雄厚，这个副总司令很难搬倒，虽然心里头气得直冒火星，但表面上稍微改变了对我的态度。我把司令部和家眷由张北迁移到嘉卜寺后，德王为了表示对我亲近，连他的福晋(太太)和喇嘛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儿，也跟我底底帮帮地都谈了；但是对于蒙古民族如何复兴和“蒙古军政府”怎样巩固，还是不和我商量，背着我进行活动。

我并不想过问政治，而是两个人既然勾连在一起，我要知道他想得对不对和行得通行不通，以免他受到挫折，我也跟着身败名裂。像他打上蒙古的旗号，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即派补英达赖到大连勾结日本人和联络复满的“宗社党”，在北平接洽司徒雷登，以及他和国际间谍迪鲁瓦(迪在北平把僧衣换成西装，经常出入东交民巷)来往的事，我就不愿打听，而是在嘉卜寺从别人口中得悉的。德王以为他是天生贵胄，蒙古王公中的杰出领袖，在日本人和蒋介石的扶植下，更成了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然看不起我这个老粗，以为跟我谈论国家大事，等于对牛弹琴，有失他的身分。殊不知我在政治上，也一天比一天圆滑起来。我的社会经验以及处事待人的权谋，似乎比他这个从小被人捧大的王爷要高出一筹。我的弱点是爱虚荣，好叫人给戴高帽子。他只要向我略加敷衍，在我跟前走一走过场，就不难把我使唤得俯首贴耳。可是他连这种手段都没有。他只是以闲扯家庭琐事，使我感觉他跟我无话不说，对他不加提防。但在他回西苏尼特期间，却让补英达赖代行总司令职权，掌握住“蒙古军”关防的印把子不放。此外还指使乌古廷交结从热河来的几个师长，在背后说我的闲话，并把他从百灵庙带过来的青年干部，一股劲儿地往各师，各团中渗透。因此，我和德王的意见加深，无法往一起调和，虽然没有公开翻脸，但成了各自单干的状态。

宝贵廷从热河搬兵回来，我把新增加的三个师编制就绪，日本“关东军”派板垣为校阅官，于七月间到嘉卜寺阅兵。在这以前，日本人在嘉卜寺修了一个大飞机场、机库，可以容纳二十架飞机，阅兵仪式就在这个机场的机库前举行。我留下少数人防守察北六县，把一万多骑兵，和带着五十多门大炮的千余炮兵，都集中在嘉卜寺受校阅。这天德王穿着长袍马褂和板垣的坐骑并列，显得非常耀武扬威，俨然是三军最高统帅。我和补英达赖、卓世海跟在他们后边，不免成了配角。我的部下从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马集中在一个广场上面，我参加上万的骑兵检阅，也是平生的第一次。看到士兵骑着壮马和背着新枪的雄纠纠气昂昂的气概，确实令我心爱，要凭空被德王指挥，我真不甘心。校阅完毕，板垣相当满意，宴会上鼓励德王和我再加强训练，准备秋高马肥以后，由察北向绥东出动。他没有在嘉卜寺停留，当天即飞返长春。

我送走板垣回到总司令部，六个师长和二十几个团长、队长，分别来见我。三个汉族师长和两个蒙古师长（依恒额与宝音乌勒吉），都对我表示反对德王担任总司令，说“咱们的人为什么叫他带领”。第四师师长宝贵廷，因为没有当上第二军军长，亦怀恨德王，也说：“姐夫你不该把总司令让给他。”他们不知这是日本“关东军”的安排，并非我真的为复兴蒙古民族而带上这么多的人来投效德王，叫德王做我的顶头上司。他们更不知这一万多人的武器服装是由日本“关东军”装备起来的。我受人卵翼扶植，就得听人摆布调度。在我没有其它政治路线可走以前，老是寄于日本人的篱下，漫说叫德王来当总司令，就是叫刘汝明来当，我也无可如何。我发现我的部下为此非常激动，只好婉言相劝，对汉族师长、团长们说，这是为了复兴民族。关于我当汉奸、蒙奸的苦闷，却不敢向他们吐露，而是一个人在心里边反复思考，越想越感到酸咸苦辣不是滋味。

板垣阅兵完毕，我即要求田中玖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留下

宝贵廷的第四师一个团，其余五个师都调回张北一带。说是为了防御刘汝明和傅作义，实际是要和德王及其左右隔开。同时瞒过日本人和蒙古人，赶紧和内地的军政集团拉拢关系，以备一旦和日本及德王决裂以后，带上这么多的人有投奔的方向。我自始至终，都是想直接归附蒋介石，认为他是正统，他是中国的真正领袖，但在“蒙古军”初成立时，没有人给我拉线。对于宋哲元与刘汝明以及阎锡山与傅作义，我都没有瞧在眼里，不愿拿上我这个肥猪头，寻找他们的穷庙门。一九三六年初秋，因为中央红军于年前长征到达陕北，四月间刘志丹将军东渡黄河抗日进入山西，五月间红军发布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蒋介石叫张学良把“东北军”带到西安一带，积极部署围攻陕北苏区。张不愿参加内战，提出“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并派人联络退到关内的“东北军”旧部准备声援。我接过张氏父子两代（指张作霖、张学良）的委任状。从一九二四年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到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以前，隶属于“东北军”的系统，现在我的实力超过了万福麟和何柱国这些将领，当然也是张学良联络的主要对象。一九三三年崔兴武派我到长春和日本“关东军”接洽时，随行的参谋王新民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学生。他因和我在伪满共过患难，以后王成了我的亲信。“蒙古军”成立后我把他升为刘继广第一师的团长。张学良就是先打发讲武堂的学生来和王新民接头，后来通过王和我搭上关系。我因参加过“奉军”和“东北军”，又是东北四省中的热河人，听见“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心中很感动。特别是愤恨日本“关东军”叫我隶属于德王，很愿给张学良充任打回老家去的前驱，从而把热河主席拿到自己的手中。当时日本的顾问教官对我监视很严，我的周围多一个和少一个人，他们也加以注意。所以派不出代表前往西安，向张学良表明我的心迹。我和王新民秘密研究的结果，不得不派他的副官孙尚武充任我的驻西安代表。于八月间让孙悄悄离开张北，所以是年冬天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搞起了“双十二事变”，我的名字

也列入东北将领之中。

我一方面和张学良暗中联络，一方面还得和日本人及德王继续周旋。德王很重视“蒙古军”总司令部的那颗木刻关防，不仅叫补英达赖保管，并且大小公事全是补英达赖亲自往上盖印。板垣阅兵完毕，德王以为万事皆备，只等我给冲锋陷阵，把傅作义从绥远赶走，他好到顺义王俺答^①建筑的那个归化（今呼和浩特）城中去坐蒙古的新皇帝。所以离开嘉卜寺回了西苏尼特。补英达赖于德王走后不久，也回家去纳福，临走把关防锁在一个玻璃卷柜里边，以致总司令部有二十多天无法用印办公。我一看不给他们一个厉害，他们还不知我是一个不好惹的家伙。有一天副官长张启祥为此请示我如何办理，我说：“你把这柜子踹开，给我拿出来用吧。”张启祥早就想这么做，用皮靴几下把锁印的玻璃卷柜踢了一个粉碎，将关防拿出来交给一个监印的副官。补英达赖回来一看没有印了，心里干气，嘴里不敢吭声，便叫德王向田中玖报告，说我抢了总司令的印信。田中玖听了报告，因为德王听信田中隆吉而瞧不起他这个特务机关长兼最高顾问，加之我和他的交情比较深厚，故对我相当偏袒。不过他对我说：“他锁住印你可以叫我去取，这样一来，很使德王难堪。”我也认为我的举动，有些过于莽撞，可是这是他逼出来的，以致让我演了一场“夺印”的丑剧。后来经过田中玖向“关东军”建议，让我在张北另外组织了一个行营司令部，颁发了一颗行营司令的关防，我便把总部各处的主要人员都带回张北办公，留下乌古廷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在嘉卜寺看门。

日本“关东军”除了派田中玖经常驻在嘉卜寺，并不断派田中隆吉乘飞机由长春前来照料。我听说乌古廷开始学习日语日文，打发他的几个兄弟和儿子到日本留学，怕他日久天长将两个田中巴结住，乘机说我的坏话，所以每逢田中隆吉飞到嘉卜寺，我接

^①俺答：明朝内蒙古西部地区土默特万户的首领，即阿勒坦汗（1507至1581），隆庆四年（1570），明朝封为顺义王。

电话后，即坐上汽车由张北前去侍应。田中隆吉完全是军人气概，非常粗暴爽直，不像田中玖沉默寡言，纯粹是一个官僚和政客。德王和乌古廷都舍不得花钱。我的总司令部里边有最讲究的厨房、客厅和卧室，卧室中备有好几套烟具、赌具，不论我在与不在，伪府的那些要人，都可以到那里随便吃喝玩乐，无形中成了一个高级俱乐部，使得陶克陶、于兰泽、金永昌等全成了我养活的食客。除陶克陶把家眷带到嘉卜寺，于兰泽和金永昌经常在总部中住宿。田中隆吉每次来观察，也下榻在我的总司令部里，在吃喝嫖赌四项中，就只缺少女人。田中隆吉非常好色，对此感到美中不足。我为了巴结田中隆吉，不惜以每月一千块“交通银行”钞票的包银，托我在张家口的办事人“东鲁汽车公司”经理王子玉，从那里弄来一个回族妓女小五子。以后嘉卜寺有了日本妓女充任招待的料理馆，田中隆吉便把小五子甩开，我扔给金永昌和于兰泽，让他们两个轮流玩弄。由于别人也想染指，粥少僧多不敷分配，他们也从张家口弄来四、五个，都安顿在我的总司令部里边。每晚我回家中休息，总司令部内总司令室便成了宣淫的“大炕”。因而秽声四闻，骚气薰天，连住在伪府院里的德王，也是馋涎欲滴。

德王因为要独揽军政大权，有时日本人也主不了他的事。这并非他和我比溥仪、于藏山等的骨头硬，而是伪满处于日本“关东军”的严密封锁之下，伪蒙则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前方，日本人怕我们倒戈，有些地方不得不迁就应付。因此，德王在嘉卜寺，不大听特务机关长兼军政最高顾问田中玖的话。日本“关东军”得不断派田中隆吉前来嘉卜寺，调处他们中间的矛盾。田中玖是个阴险家伙，他感到欲使德王就范，必须先叫德王沉缅于酒色，然后他才容易支配这个傀儡。田中玖观察到德王对张家口来的妓女，在眼神和语气中表示出特别欣赏，但因在众人前一贯装腔作势，不好意思向陶克陶和于兰泽等开口问津。田中玖知道德王当了“蒙古军”总司令，我的醋意很大，所以他想借刀杀人，让我引导德王腐化堕落。有一天田中玖把我叫到特务机关，对我说：

“德王老跟咱们调皮捣蛋，你不妨给他弄几个妓女，把他迷弄得神魂颠倒以后，你就可以完全掌握住军队。别人限于身份、地位，不敢和他谈这些事，只有你才能办到。未知你以为如何？”我对田中玖说：“德王是我们蒙古的元首，眼看快要占领绥远，把他弄成那个样子，怎能号召蒙古人复兴民族。我怕‘关东军’知道以后，咱们两个人都要担当过错。”田中玖见我不肯拉这个皮条，他的手段没有使成。接着就要谋杀陶克陶，以剪德王的羽翼，就像在张北杀尼冠洲那样，叫德王看看他们的狰狞面貌。

我那时没有学习过“矛盾论”，但懂得我和德王的矛盾是属于蒙古人的内部；我跟日本人的矛盾，才是真正的敌我矛盾。应该区别对待。我和德王一九三五年冬天在多伦开始结交时，即把他当成盟友，所以想法子给他成立了一个警卫团，并表示百灵庙一旦紧急，我要率领“察东警备军”前去援救，使他的摊子能够搞好。也是我的“狡兔三窟”中的一条出路。至于我参加“蒙古军政府”，本心是要让德王主政，我执掌军权，两个人互相依靠，以他的政治声望和我的军事力量，“棒柴合伙”到一起，就会成一股比较强大的势力。德王毕竟不同于一般昏愆的蒙古王公，他在民族运动中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我在“蒙古军政府”里边对于坐第二把交椅，思想上能搞通。凭我这个二十多年以前的热河土默特右旗的蒙古奴才，今天能和锡盟西苏尼特旗的王爷并列在一起互争雄长，完全是枪杆子给我撑腰，所以我把军队当成本钱。由于德王想夺我的兵权，我们两个人才发生了矛盾。但是我和德王命运相同，他和我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把我们当成他的亲生儿子，而是把我们看成他们实现“满蒙政策”的两条走狗，有随时被一脚踢开和烹而食之的危险。这就是我和德王又矛盾又能统一的地方。从我们的处境上来看，可以说是难兄难弟。况且德王张罗了一阵，并没有把我的军队抢走，从热河征来六千人，主要还是他向日本“关东军”要求的结果。所以田中玖叫我对德王使用美女计，我产生了“兔死狐悲”的感触，遂婉言拒绝，不

使日本人把所有的蒙古人都看成是混账东西。

另外我出身于兵痞和“胡匪”，因为善于交友和“耍人”（用权术、手腕耍弄人），并以“忠勇信义”四个字做为标榜，才由一枝套筒枪，扩充成千军万马。在我“盗亦有道”的逻辑中，也讲究我所认为的人格。只有当我的切身利益遭受损害的时候，我才拿出明枪来抵挡，除此而外绝不以暗箭对人打击或报复，特别是对人是主张“好离好散”，最反对“过河拆桥”，以免给人留下阴森可怕的印象。我给田中隆吉弄妓女，是一种“耍人”的权术。要是让德王麻醉于女色里边，那就不够交友的义气。尤其我自从参加了“蒙古军政府”以后，更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尼冠洲在张北被杀，给了我很大教训。至于我和张学良拉拢，完全是为了有备无患。但在跟德王合伙期间，无论如何要维护他，即使决裂，也要让蒙古人避免流血。因为我不和德王交处，还要跟别人共事。尽管德王不尊重我，他的左右排挤我，可是我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当日本人要谋害他们的时候，我除了不参予同类相残，还挺身而出给他们保镳。不只是德王，连陶克陶在嘉卜寺也受过我的暗中搭救，而未遭日本人的毒手。

先是田中玖要杀陶克陶，叫我给做罪状的证明人。这件事是因在一九三四年冬天，陶克陶从百灵庙回来，路过多伦住到我的司令部里，曾对我和金永昌说过：“关东军如果不支持我们，还有外蒙的路线可走，我再见了德王，就要以此向他打气。”不料事隔一年零七、八个月，因金永昌和陶克陶在日本人面前争宠，就将这几句话密告给“关东军”，故田中玖在嘉卜寺问我有无此事，我说：“当时陶克陶和我说的是汉话，他并没有提这些话，是否他和金永昌用蒙古话谈此，我没有听出来。外蒙被俄国赤化，要锯倒王公和共产共妻。陶克陶受“关东军”多年栽培，我想他不会有此种主张。”我对田中玖回答得很圆滑，听起来非常中肯。前几句是为我作开脱，后几句是替陶克陶作解释，以致我把田中玖混过，他对此没有继续深究。我从特务机关回来，可巧陶克陶由家里到我的

司令部中闲扯，因为金永昌不在，而于兰泽在我的屋子中抽鸦片，我向他使了一个眼色，把他叫到另一个屋子里，将田中玖问我和我回答的话完全告诉了他。我说：“你今后要特别注意，金永昌把你告了。”他说：“哎呀！我的命危险极了！”差一点要爬在地上给我磕头。我并且背过一切的人，向金永昌提出警告说：

“你想杀陶克陶，叫我也当刽子手，姓李的不干这缺德事。因为我也是个蒙古人，大家都吃这一碗饭，何必互相陷害。”金永昌被我说得面红耳赤，可以说无地自容。因为他再没敢出坏，亦不了了之。

田中玖因为想用美女计蛊惑德王，我不予协助；想杀陶克陶以警告德王，我又没有给当人证。而德王还是只听田中隆吉的话，仍不买田中玖的账。因此田中玖想鼓动蒙古青年，发动政变将他杀害。原来日本人不仅利用蒙古的上层、中层，对下层他们也进行收买，以便互相牵制监视，都供他们摆弄驱使。嘉卜寺的日本特务机关，有一个类似蒙古青年俱乐部的组织，专门吸收伪府办公厅和各署科长级的青年干部。田中玖经常请他们到特务机关聚餐，并经常单独接见，付给金钱，收购情报。宝贵廷于一九三五年春天，代表德王由百灵庙到多伦联络我时，曾被于兰泽领上坐飞机去了一次长春，就从那个时候当上了日本“关东军”的“嘱托”（特务）。因为他这次没有当上“蒙古军”的第二军军长，对德王产生了恶念。田中玖把他看中，故此一期间宝贵廷是这个蒙古青年俱乐部组织中的首领。田中玖计划杀害德王的事，是宝贵廷亲口告给我的。他知道我很不好惹，所以事先需要向我请示，得到我的支持或者默许，他们才敢下手。

在阴历六月数伏天，连嘉卜寺的气候也非常闷热。有一天后半晌，我坐在西山坡上乘凉，宝贵廷喝得醉醺醺地跑来找我。我们有郎舅关系，所以我说他：“你小子在哪里喝酒，看你那个熊样。”他说：“我们有要紧事。”我问他：“是什么要紧事，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他说：“姐夫！我来请示你，你看干得干不

得？”我说：“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事？”他说：“我们想杀德王。”我当时把脸一沉，睁大眼把他瞪了半天，然后对他说：“宝贵廷！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们大伙来到嘉卜寺，都不是为了复兴蒙古么？德王领导的好坏是另一个问题。眼前他是个头儿，把他处置了，今后如何办呢？你们考虑过没有！”他说：“我们只知干这事，别的没有考虑过。”我接着说：“没考虑就干，你们太冒失了。我痛快地告诉你，打动德王，我首先不依。日本小子想任意而行，鼓动你们干这事。你们今天要杀德王，明儿也会杀我。他夺了我的总司令，我心里不好受，但都忍了；你没当上军长，就忍不下去了吗？我没有干的事，你居然想干。宝贵廷！我要问你，你有几个兵？”他看见我神色俱厉，酒醒了一半说：“我因为不敢干，才来和你商量。”我说：“你要是做了这事，我就要割你的脑袋！日本小子出头我也不怕，你小心好了。”宝贵廷一听我保护德王，知道此事很不好办，岔开话题跟我扯了一些闲事，便夹着尾巴走了。

这年冬天，德王的母亲在西苏尼特旗病故，蒋介石秘密派了一个姓黄的（黄绍竑，就是给百灵庙“蒙政会”送来五百支步枪的那个人），由张家口前去吊唁。安葬那天，我也由嘉卜寺去参加了人土的丧仪，但没有注意到蒋介石的挽幛。回来和陶克陶同车。陶是一个喜形于色的人，路上怕开车的朝鲜司机听见，悄悄地和我说：“我得了一个好材料，蒋介石给德王的母亲送来一付挽幛被我发现了。我得回去报告关东军，把他推下去，拥护你干。”我说：“老陶！你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保护蒙古人的，特别是保护德王的。你要是向关东军告密，不要怨我对不起你。”陶克陶以为我和德王有矛盾，恨不得把德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没想到我说出这样话来，因而此事未被日本人发觉。我对于欺哄日本人，主张“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但最痛恨互相攻讦，遇到此事即挺身而出。德王最初不知我这番对他的好意，以后因为日久见人心，才慢慢地知道了。所以伪蒙政府成立九年多期间，我处处

给德王抗花。虽然他藐视我，但是又离不开我。他的出卖国家民族的种种罪恶，是得到我的帮凶助长而成。

(三)

“蒙古军”于一九三六年五月间组成，到七月间才编制完毕。板垣前来阅兵之后，除了我和德王摩擦而外，主要是日本“关东军”让我威胁察南和准备进犯绥东，所以部队只留下第四师宝贵廷的一个团保护伪政府，其余都由嘉卜寺部署到张北和商都一带。初步计划是先夺取集宁，切断大同和归绥的联系，并把绥东五县置于“察哈尔盟”的统治底下。因而我经常在嘉卜寺和张北中间来回奔跑，不过在张北行营的时间居多。我去嘉卜寺是观察和应付蒙古人在捣什么鬼，在张北是掌握我的一万多人马。这时嘉卜寺是勾心斗角，张北是周围环境复杂，对我都有很大关联，我必须两方面都照顾到才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蒙古军政府”和“蒙古军”，就是利用溥仪建立了伪满以后，又叫德王和我组织伪蒙政权与军队，为其“满蒙政策”服务，达到逐步蚕食中国的目的。无论伪满和伪蒙，都离不开汉奸的参加。于是在“蒙古军”建成以后，日本“关东军”又把被阎锡山和傅作义从后套逼到张家口，誓与晋绥军阀集团为敌的王英寻找出来，组织了一个“大汉义军”，充任“蒙古军”进犯绥远的向导。王英和我一样，也是用“曲线救国”的论调遮羞。并且听说王英是一个老做糊涂事的纨绔子弟，外号“三没底据”。所以自从他到了张北后，我更放心不下我的军队。从九月间即停留在行营里边，很少再去嘉卜寺去，以便注视时局的发展。

王英是绥西后套的头号大地主，也是当地的一个民团和土匪大头子。因为绥远于民国以后历经各派军阀的统治，故王英参加过“直军”、“西军”、“国民军”、“奉军”、“晋军”，并且接受过蒋介石“中央军”的委任。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时，

蒋介石叫他在绥远捣乱阎锡山的后方没有成功。一九三一年傅作义出任了绥远主席，把他驱逐出绥远。他部下的两个旅长杨猴小与袁占鳌仍变成土匪，他本人跑到张家口担任了宋哲元的参议。所以一九三三年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时，他也参加到里边。一九三四年孙殿英进攻宁夏时，即以王英的旧部杨猴小充当先锋。孙殿英失败以后，杨猴小率领队伍前来商都投奔王英，故杨曾一度任过二十九军的骑兵旅长。由于王英掌握不住部下，杨猴小在一九三四年秋天从商都哗变，一九三五年初春窜到陕北。杨死后，部队被井岳秀解决，王英便没有可以号召的队伍了。他在二十九军很不得意，和绥东的土匪头子石玉山及绥西的烟土贩子亢宜斋等，在张家口的上堡开设了制造海洛英的料面公司。因他在天津日租界有房产和公馆，故和日本特务机关的人结识。到一九三六年秋天，日本“关东军”派田中隆吉把他找了出来，叫他到察北我的防地中成立“大汉义军”。

因为王英是一个光杆司令，不得不从各方面给他凑数。他的五、六千人，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张万庆向刘汝明借来的原二十九军的兵。张是冯玉祥的旧部，先给石友三当过炮兵队长，加之他的身体粗短，所以外号叫“张炮弹”。王英和苏雨生及赵有禄初任“国民军”骑兵团营长时，张即为该团的团长，因而王英这次组织“大汉义军”，叫张万庆担任副总司令。第二是石玉山给收罗的察北和绥东的土匪与民团。因为石是察北民团首领张诚德（即野猫张）和绥东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龙（即长胡子）的乾儿子，且为土地横跨察绥交界的大地主张七（即二魁先生）的义子，故这个“三姓家奴”在此一带很有一些号召力，纠合起七、八百人，遂编为“大汉义军”的骑兵师。第三是日本人从冀东殷汝耕那里调过来的伪军，其中包括王子修、安荣昌（即安华亭）、金宪章、葛子厚等所带的山东河南与河北省的土匪。由于“大汉义军”是临时搭成的班子，都是些想跟日本人拐枪骗钱的家伙，所以一打即垮，实际是王英给傅作义送了“礼”。

日本人在张家口进行组织“大汉义军”的筹备工作，我早有耳闻；及至王英从张家口到张北的前一天，田中隆吉才向我说明。他说：“你们复兴民族，真是得道多助，不仅我们日本人大力支援，连汉人也愿意帮忙。现在有一个反对阎锡山和傅作义最有力的王英，为此组织起‘大汉义军’。此人在绥远和你在热河一样，有很大的声望；特别是过了归绥以西，老百姓都愿意自备枪马给他当兵。因为傅作义卡在绥东，他的人不能完全过来。‘关东军’由于交通困难，短期内拨不来大批武器。你剔退下来的旧枪和破军衣很多，需要在这里把他们装备起来，好做为进攻绥远的前驱，让他们好替你们蒙古人效力。”我当着田中隆吉表示非常欢迎，决定叫他们向商都县的南壕堑集中，以便我的陈景春第三师监视他们的行动。王英来到张北以后，我把他招待在我的行营中住宿，想从他的嘴里探听他们的真正意图。王英的嘴很甜，见面以后亲热地直叫我大哥。我首先问他：“你的人从哪里招来的？”他说：“从张家口招得最多。”我又问他：“是你的旧部？还是其他人？”他说：“都是我的旧部和老朋友。”我见他贼头贼脑，一句实话也不和我说，便不再问他，给他安置了一套烟具，让他一股劲地吸食鸦片烟。

王英来到张北不久，他的徒手徒步的兵，每天百二八十地不断由张家口来到张北，均从我那里换上军衣，拿上枪械，住一宿吃完饭去了南壕堑。据行营参谋处派出便探回来报告，从柴沟堡车站出发，经过洗马林还有穿着二十九军服装的整队的兵，他们沿着兴和、商都交界开到南壕堑。因为刘汝明的人混入“大汉义军”里边，恐怕路过张北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所以都从柴沟堡绕了小路。另据我第三师师长陈景春给我报告，二十九军开到南壕堑的有将近两个团的样子，都没带大枪，有几个军官在宋哲元任热河都统时和他同过事。接着张万庆也来到张北，要求田中隆吉从我部队中拨给大炮。此人比王英精明，我没有跟他深谈。根据这些情况，我背着张万庆又追问王英，听他以何言解释。

我说：“这几天路过张北的兵都是山东、河南口音，恐怕不是你的兵吧！听说有两千多人从柴沟堡到了南壕堑，那又是谁的人呢？”王英经我一问，便沉不住气了，结结巴巴地叫了好几声大哥，才面红耳赤地向我吐露了真言。他说：“从柴沟堡过去的，多是张炮弹招来的。其中也有刘汝明借给的。二十九军很穷，打发兵出来挣饷，请你不要误会。至于这几天又从张家口来了几批带枪的兵，那是殷汝耕从冀东给派来的。宋哲元同意他们通过二十九军的防地，他很给我帮忙。”我说：“二十九军可能除了挣饷而外，还有别的企图。杰臣（王英的字）！你不要哄我，咱们都是拉杆子的人。”王英一看瞒不了我只好承认他和刘汝明唱双簧，想骗日本人的东西，进行所谓“曲线救国”。我对他说：“至于你们怎么搞，我绝不干涉。要是打我的主意，我也不害怕。这样做也很好，我表示同情和援助。不过你不要和外人扯这些事，提防被日本人发觉。”王英听了我的话，对我特别感激，他先把张万庆打发到南壕堑，以后他也去了那里。我因他们鬼鬼祟祟，只借给王英八百多支步枪，加上田中隆吉从承德弄来两千多支新枪，和冀东方面带来一千多支，共凑了四千多人的武装。故战争开始以后，南壕堑有一千多人以等枪为名，未上红格尔图前线。田中隆吉叫我拨给张万庆八门野炮，由于他们步兵多于骑兵，还叫我拨给一团骑兵。我让胡宝山带了七、八百人和三门山炮前去。王英因为得到胡宝山的保护，他才没有被他的部下捉住，送交傅作义。

“大汉义军”在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开始装备，到十一月中旬方投入侵犯绥东的战斗。他们在南壕堑和我的陈景春师混在一起，驻了两个多月。在这一期间，由于王英爱说大话和好贪小利，先是把他组织“大汉义军”的真正意图随便向部下暴露，他的兵骂我的兵是真汉奸，说他们是假汉奸。以后因为克扣饷项，部下对他很不满意，扬言要把他和我一齐弄上，进贡给傅作义。因此我把刘继广的第一师和依恒额的第五师也调到南壕堑附近。有一次王英，

和张万庆来到张北，我就直接了当地警告他们。我说：“你们这么弄，我援助你们很伤心。我在南壕堑的哪一个师吃了亏，我可绝对不留情。”他们于十月间编组就绪，田中隆吉叫我陪上他到南壕堑阅兵，我很有顾虑，但无法推辞不去。行前我通知陈景春，叫他把弟兄们把子弹都压入枪槽，和王英的兵对面站到路的两旁，吹号欢迎我们，阅兵仪式开始以后，即把操场四面包围起来。

王英的部下看见我们已有准备，故没敢有所举动。校阅完毕，田中隆吉非叫我给他们讲话不可，我让他们的军官在我跟前集合了一个半圆圈，因为田中隆吉不大懂中国话，我遂对他们这样说：“你们王总司令先到张北见我，我已向他们表明了对你们的态度。听说大家对我有怀疑，我不知因何而起？现在全国人都骂我们是汉奸。那只有用事实来证明。我们因为走着一条道路，所以对你们竭力帮忙，你们的任务很大，希望努力完成。”校阅完毕，我就到了陈景春的师部。石玉山、王子修、安荣昌等都跑来见我。他们说：“我们过去不知道李总司令的心迹，刚才听您讲话才明白了。”我说：“我虽是老粗，但早已看出你们这次的来意，特别是王总司令都跟我说了。他没有把我当成外人，所以我让你们和我的部队在一个地方驻扎。你们对我有所误会，得好好想想。现在咱们不多谈，彼此心会就是了。”经过我对他们的官兵如此解释，他们不再背后给我“放送”（说坏话）一切。由于我比较善于调处矛盾，所以“大汉义军”和“蒙古军”驻在一起才未发生乱子。

“大汉义军”在十一月十四日那天，由商都县城向绥东陶林的红格尔图发动了进犯。起初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计划叫我的人担任左翼，德王和卓世海的人担任右翼，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左右两翼于战争开始后，都没有行动，结果王英的人变成孤军深入。并且张万庆所借刘汝明的人，因为在南壕堑等枪没有参加，只是石玉山和我的胡宝山两部骑兵，和冀东来的人担任了此次的攻击。这时王英的总司令部移到商都县城里边。十三日那天，田中隆吉叫我陪他到商都给王英饯行。我去王英的总司令部吃饭时，

大卡车装载着十几挺轻机关枪，并且让尹宝山在街头巷尾设上警戒，以防发生不测之事。赴完这个“金沙滩”式的宴会（即鸿门宴），王英随着我和田中隆吉到了尹宝山的师部。我问王英：

“你计划怎么打法？”他说：“我们还没决定好。”我说：“你的参谋长干啥？”他说：“他现在还抽大烟呢。”我对着王英由不得冷笑起来。他便问我：“大哥你看怎么办？”我说：“你带的是一支危险部队，指挥不好，傅作义就会把你活捉住。你马马虎虎地把打仗当成儿戏，明天进攻，今天还没做出作战计划！应当把辎重放在北路，骑兵从南迂回，步兵在炮兵掩护下向红格尔图进攻。”王英听见我这样一扯，以为得了锦囊妙计。再没谈其它的话，便慌里慌张地回了他的总司令部。

红格尔图距商都二百多里。当地的农民建有一座防匪的围堡，战争开始的时候，只驻有“晋绥军”赵承绶部骑二师彭毓斌的两连人。因为王英的四、五千人没有攻开，傅作义的董其武步兵旅增援上来，步骑联合一齐反击，便把王英打了一个大败而逃。王英的兵于十三日下午就纷纷开出商都，于黑夜到达攻击位置，翌日拂晓发动进攻。我见他们的士兵都是无精打彩地从街上走过。王英走后我和尹宝山说：“这种出发简直如同出殡。”王英打红格尔图，犯了我的参谋长陈宝泉在一年前打沽源的同样错误。他把我借给的三门山炮架在山上，不突破围墙的一点，打开缺口让步兵冲入，而是让步兵四面包围，开炮往里边乱打，使赵承绶的骑兵得以坚守待援。天亮以后，从嘉卜寺派出二十架日本飞机，一方面助战，一方面督战，于是攻击的步骑兵都四散隐蔽，还开枪打落一架飞机。因而董其武的步兵前来增援，如入无人之境，把王英和三门山炮围在山上，由我的胡宝山团上去接下。因为傅作义没敢叫董其武进入察哈尔境界，战斗当天即告结束。张万庆招来的那些人，听见前方失利，连夜跑回柴沟堡。石玉山、王子修和安荣昌等脱离战斗，向傅作义投降，宣布反正。只有王英带着金宪章和葛子厚的人，在胡宝山掩护下，退出绥远境界，

既不敢再扑红格尔图，也不敢回商都县城。红格尔图战役的经过，就是如此简单。由于王英无能，却使傅作义大肆宣传，结果轰动了全国，成为有名的抗日战争。

田中隆吉此次跟上王英，在“关东军”方面也很丢人，气ได้ใน商都城裡直跺脚，便派打沽源时被白凤山部击碎肩章的那个松井大尉处理善后。十五日下午，由嘉卜寺开来五、六十辆汽车，把金宪章和葛子厚部，连夜送到西苏尼特旗，走时松井大尉拿出三十万块“交通银行”钞票，扔给二十多个军官。德王在苏尼特旗给他们吃了一顿饭，十六日天亮把他们送到大庙（在百灵庙东北约二百华里处）驻防。部队下了汽车，看见四周荒无人烟，便拿开车的日本人和朝鲜人出气，结果打死和打伤了十几个司机。汽车都逃回商都，田中隆吉派松井前去，经过贿赂他们的军官，才把士兵安抚住。王英将人跑光走光，剩下张万庆和他两个人，躲到胡宝山的团部里边，不敢回商都，真是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王英直给我打电话，叫“大哥救我”。我向田中隆吉请示，田中说：“不杀他，叫他回来吧。”遂于十六日用汽车把他们送到嘉卜寺，改乘飞机回天津日租界又当了寓公。王英临上汽车时，递给我六万块钱，他说：“这是我此次捞的一点油水，怕日本人搜出来没收，托你派人送到天津，交给我的老婆。”我把款子让张家口“东鲁汽车公司”经理王子玉送到天津以后，王英和张万庆才下了飞机。可能他们到了长春一趟，向“关东军”去作检讨，所以他们虽然乘着飞机，不如我派的人坐火车先到天津。

傅作义于十一月十四日在红格尔图把王英打垮，隔了十天即把百灵庙占领。并且乘胜前进，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将大庙收复。我于王英和张万庆走后，即从商都回了张北，傅作义由于不敢扩大事态，只是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加之我的力量较大，故没到察北碰我。张北和百灵庙相距一千多里，那里由德王的人驻守，所以战争的详细情况我不很清楚。只知守军由“蒙政会”的保安总队长宝道新指挥。在王英进攻红格尔图时，德王把卓世海招集起来

的人也调去增防。因此，抵抗了傅作义、王靖国和赵承绶的三部分人，战况比红格尔图激烈。德王是否被围在百灵庙，和他是否在百灵庙紧急时亲自前去救援，对于此事我也没有注意。不过以后德王为了对我显示他也是成吉思汗那样的马上皇帝，曾和我吹嘘过从百灵庙出来的追兵，被他亲自开动轻机关枪击退，使跑出来的人安全撤至西苏尼特。（编者按：傅作义部攻百灵庙时，德穆楚克栋鲁普未在百灵庙，亦未前去增援。）百灵庙并没驻有日本军队，只有一些日本顾问和教官，他们从百灵庙退出，到了大庙。所以金宪章和葛子厚在大庙反正时，共杀了小滨大佐以下二十九个日本人。金、葛二人反正时，除过杀了日本顾问教官，并抢了附近蒙古人的马匹。

伪军侵犯绥东失败后，田中隆吉很不服气，驻到嘉卜寺策划再犯，所以我也由张北到了那里。十二月十三日那天，他跟德王和我幸灾乐祸地说：“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臣扣住了，咱们暂时用不着打仗了。”我听见后，未敢多问，心里边又欢喜又焦急。欢喜的是快要打回老家去了，焦虑的是我没有接到张学良的指示。为此，我托故回到张北，等了一个星期没有消息，也不见孙尚武回来，又去了嘉卜寺。在二十六日那天上午，田中隆吉又和我们说：“糟了！糟了！张学良昨天把蒋介石放走了。”弄得我越发不知所措了。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我派到西安的那个孙尚武副官，由张学良的黄参谋长，打发他从西安乘飞机越过潼关，经洛阳坐火车回到张北。他说：“少帅被老蒋扣在南京了，抗日不抗日还没决定，东北军是完了，咱们再找别的路吧！”不久，何柱国派他的张副官给我送来一封张学良的亲笔函，大意是叫我顾全大体，不拘小节，是张学良失去自由以后，被迫给每一个东北将领写的。何柱国和我的儿女亲家热河耆绅李筱朋是亲戚，我的儿媳称何为姑父，张副官来找我时，带着我亲翁的介绍信。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给蒋介石充任伪“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路过锦州时，戴笠的人还叫我看他们所拍的张学良给

我的亲笔函全文照片，做为我参加“西安事变”的把柄，想叫我不立反共与反人民的功，而赎回投敌和联络张学良的罪。

(四)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为了表示决心抗战和国共合作，看到绥东形势紧张，于一九三七年初春，把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汤恩伯的十三军和门炳岳的骑七师开来绥远。据日本人统计：连同“晋绥军”共有四万多人。我看见绥东方面部署收复察北，汪精卫和阎锡山也到归绥鼓舞士气，首先把二百多家眷都集中起来，由我过去的亲信营长赵仲九挑了二百多老兵负责保护，完全住到多伦与宝昌中间有天主教堂的榆树沟，以备反正时万一带不走她们，好托外国神甫按国际公法进行保护。我的家眷仍在嘉卜寺，怕引起日本人的怀疑，故不敢移动。但我的大老婆患了八年的呕吐病，请了多少大夫也无法医治，用鸦片烟和葡萄糖药针维持生命，成了我的一个很大包袱。听说沈阳南满医院设备很好，我想到那里给她把病根除掉，省去我身边的麻烦和拖累，恐怕以后没这机会了。于是我向两个田中提出带上家眷到沈阳看病的要求，得到他们的允许，并由“关东军”的飞机接送。原来日本人知道蒋介石还没下了抗战的决心，把“中央军”调到绥东只是一种姿态，所以准了我二十多天的短假，让我扔下队伍离开察北前线。

我到沈阳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我的大老婆入了南满医院。我和我的二老婆带着一个孩子住在最豪华的日本“大和旅馆”。我们全家能住这样的医院和旅馆，都是“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长小矶中将的介绍。因此南满医院五个中国大夫和五个日本大夫，给我大老婆进行会诊，只用了两个礼拜的时间，即将她的胃病（胃偏垂）完全纠正过来。大和旅馆是“关东军”在沈阳的宾馆，里边住的都是日本的高级军政人员，四边有日本宪兵守护，普通日本人也住不进去。在一楼中间有一座大客厅，里边有各种报

章杂志，摆着水果糕点和香烟，任旅客随便取食。我因呆在房中无聊，除了上医院而外，不敢四处乱跑，常到客厅中看画报解闷。发现小矶、板垣以及担任过多伦特务机关长的浅海，这些“关东军”将校级的好几十个军官，也都住在大和旅馆里边，每天吃完早点和午饭即到二楼上去开会，这样连续了四、五天。有两天小矶和板垣见我坐在客厅里边，都和我打过招呼。浅海知道我也住在这里，开完会即到我的房间里闲扯。他不谈别的，老是向我打听关内各地的风土人情，如北平夏天热不热，华北什么时候是雨季，以及什么地方的民风最强悍，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比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如何等等。这就引起了我的怀疑，断定他们是召开大举侵略中国的军事阴谋会议。于是我也向浅海进行刺探，但他非常诡诈，闪闪躲躲地不说，只给我泄露了土肥原也来参加。

给大老婆看好病，我从沈阳飞回嘉卜寺，把家眷扔在那里了。停了两三天，即坐汽车回了张北。先是有我随从副官于德新的姐夫，从张家口来找我。他姓戈，忘记了是给关内那个军担任参谋长，劝我率部反正。我说此事容后再说，先叫他把我从沈阳大和旅馆观察出的情况，赶快转报蒋介石注意。以后蒋介石派黎明来张北和我联络，他和我一见面，我就向他说：“日本人要侵占整个中国了。”他说：“你是被日本人吓住了，咱们几天就要收复东北。”我对黎明说：“寸土不失，我姓李的才乐意呢！日本全面侵华就在今年，我到沈阳看出来，信不信由你。”他说：“咱们有办法。”我说：“华北很危险。”黎明这次来见我，没提蒋介石给我编一个骑兵军的事，只是说蒋派他跟我联络，叫我在适当的时机，听他的信再反正，暂先不要轻举妄动。他走的时候，我又叮咛他，无论如何把我在沈阳大和旅馆的见闻，回去报告给蒋介石，赶快进行准备，不要等闲视之。我说：“我如果没有爱国心，绝不和你谈这，这可不是道听途说，我愿对此负责。”“七七”事变以后，黎明第二次来和我联络时，他说：“我已报告了蒋委员长，可惜队伍调动得迟了。”

在我从沈阳回到“七七”事变期间，石玉山还袭击了一次嘉卜寺。那时石玉山已编为国民党的新编骑四师师长，从达密凌苏龙那里装配了四、五百匹战马。他熟悉察北的路径，并且知道“蒙古军”的六个师集中在张北一带，嘉卜寺等于一座空城，进来拣了不少的“洋捞”。“蒙古军政府”的人发现情况后，乱成了一堆，各自逃生，谁也不顾谁。我接到电话，怕国民党的军队袭击商都，所以没往嘉卜寺派兵，只开去一辆小卧车往出搬家。我在嘉卜寺有一辆大片车，结果被伪“德化”市副市长张子荣利用，连他的小猪都装在车上，把我好多皮箱扔掉不管。我的女人和孩子是光身坐小卧车跑出来的。于兰泽是交通署长，掌握着几部大卡车，也是只顾搬他自己的东西，把公共物品完全遗弃。德王本来要坐上汽车跟田中玖前来张北，补英达赖躺在车轮胎底下苦谏，说：“李守信随时都有倒戈的可能，你去张北很有危险。”遂改变了寻找军队的计划，领着乌古廷和众人跑到了多伦。陶克陶到北平去玩乐，把东西也完全丢尽，不是于兰泽招呼，差点连老婆也被石玉山的兵抢去了。石玉山在宝海明的抵抗下，没有很快把嘉卜寺占领。包海明看见汽车完全开走，便朝张北撤下。石玉山进去之后，能拿的东西完全拿走了。拿不了的均予以破坏，呆了一两天即行放弃。从此我在张北，德王在多伦，谁也再没回嘉卜寺去。在“七七”事变以前，伪蒙成了无政府状态。

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以后，我在察北陷入两面作战状态。好在刘汝明和傅作义没有互相配合，我还能够左右招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和日本人在宛平县打开，汤恩伯的十三军即到南口布防，平绥路西段的各部队，由第七军团总司令傅作义指挥向东挺进。他们首先在察北收复商都，派门炳岳的骑兵和董其武的步兵，把我的尹宝山师包围在商都县城里边。董其武的步兵攻城时，据说损失了一个团。尹宝山在那里坚守了一白天，我即率领两个师从张北前去把他接出来。按照尹宝山师平日的战斗力，在我带着两个师对付门炳岳的情况下，他很可以多守几天。但我急于把人集中

到一起，以备全部带上反正，所以当天晚上叫撤离商都，连夜和我一齐退到尚义。第二天我就把这三个师和南壕甄的陈景春师，都调到张北附近的公会和白城子一带地区。

我去商都接尹宝山时，带的是刘继广的第一师和宝音乌勒吉的第六师。宝音乌勒吉听见出发打仗害怕，叫他上汽车时，他向我告辞说：“我不干了。”于是我叫乌云飞指挥了第六师。因为乌云飞在多伦给德王训练警卫团时，我看见这个“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出身的喀喇沁左旗蒙古青年很有将才，组织第六师时，即把他吸收为团长。由于他把警卫团训练好，德王派宝贵廷去当团长，曾向我表示反对德王，故我对他特别加以提拔。他这次前去援救尹宝山，一出马就指挥得很好。国民党的军队收复商都，是门炳岳的骑兵把东西北三面包围，让董其武的步兵从南面爬城，还有炮兵在外边助战。我从张北走时，只带了两门山炮，把包围圈轰开了一个豁口，乌云飞便冲了进去，即把国民党最精锐的骑七师打乱，把他们压迫在西北面，我们即控制了东北面。炮战了一下午，等到天黑以后，尹宝山坐着汽车带上队伍冲出去，便把商都扔给门炳岳和董其武。尹宝山出来和我说，国民党军队炮打得很准。他们正吃午饭时，炮弹落在师部好几颗；他放下筷子跑出去，炮弹就将饭厅打塌，几乎把他炸死。

我退到张北的第二天，东条英机从长春飞来指挥进攻张家口。他看见我在商都不给硬打，当天来了九十九架次飞机，从承德空运来五百多日本兵。因为每架飞机只能装载六个人，不能多运，所以天已昏黑，飞机场还停下十几架飞机。东条没来以前，刘汝明派一个马旅长化装进入张北，叫我把城给让出来，说他们的队伍已从大境门开出来，到达了坝顶。我因不愿拿上张北给二十九军送礼，所以没有答应。晚上他们即把张北包围，向飞机场发动进攻。由于人少没有把张北围严，公会的电话仍然畅通。这时五百名日本人在城里把守街道巷口，一面保护东条，一面在监视我的行动。东条住在另一个院子里，田中隆吉住在我的行营中看

我。前来收复张北的，除了刘汝明的步兵，还有赵承绶的骑一师师长孙长胜所带的骑兵。孙长胜在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给宣化镇守使谭庆林担任营长。张连同和谭庆林在赤峰打许兰洲时，孙被围，经我死命接出，故跟我结拜为换贴弟兄。他这次前来张北，是奉蒋介石的密令呼应我反正，所以到了张北西南十八里地一个有教堂的村庄，便停止前进。由于他来的以前，张北已经开火，半夜三更无法和我联络。刘汝明的人主要是想夺取机场，城外面都是虚张声势，并且听不见炮声。飞机场有我的两个连防守，我知道足可以抵挡，因为刘汝明既要援救宋哲元，又要保守张家口，他不会把好多人派来张北。所以我给公会打了一阵电话，叫他们在张北外围兜成一个大圈以后，即高枕无忧地脱衣先睡了觉。田中隆吉和我说：“你真能沉住气，满不在乎。”后半夜外边的枪声停止，指挥保护机场的团长给我报告，说马旅长在飞机场附近阵亡。二十九军已退回张家口。

第二天东条留下三百名日本人在张北，派出二百人从小道过坝占领了孔家庄车站西边的大桥，因为陆空没有联络好，日本飞机前来炸桥，炸死守桥的日本兵，日本兵急了便开枪打毁一架，正落在孙长胜所占的那个有教堂的村子外边。我在多伦的时候，忘记是由于什么关系，司令部吸收进一个名叫龙超的河北省人，参谋处派他担任侦察参谋。原来此人是戴笠打入我的部队中的一个“军统”特务，这天才引起我的怀疑。他从张北城外侦察回来，跑到行营要单独见我，说：“孙长胜叫我给总司令捎来一个口信，他说跟您在赤峰结拜过，这次他到张北附近是蒋委员长派他呼应咱们反正。现在情况变了，汤恩伯已经失守南口，刘汝明准备撤往蔚县，从涞水方向去追随宋哲元。张家口眼看快要失守，他接到中央电报，叫您暂不要动，另等适当时机再行举事。”并说：“孙长胜急于回大同保护山西，村外掉下日本飞机，也没顾得派兵出去看看，和我说完这些话，即带上队伍朝西退走了。”他说的有根有叶，没有特殊关系怎能见到孙长胜。我便依照龙超给带回的口信，未敢在张北反

正。改变了原先但等黎明派人一来，即捉上东条英机倒戈的计划。

第三天陆续有一百多辆汽车，把日本的一个旅团运到张北，我只好派尹宝山的第二师，担任掩护进犯张家口的任务。尹师到达坝上，因老乡逃跑一空，人马找不到吃喝，田中隆吉领我去见东条英机。东条说：“用不着了，叫他撤下来吧！”这时从承德开来的那一个旅团，除了攻陷张家口，并在孔家庄附近歼灭了傅作义的孙兰峰旅七百多人。防守天镇阳高的李服膺军闻风溃退，傅作义部都往大同集结。门炳岳和董其武也主动放弃了商都。门炳岳临撤的时候，通过他的参谋长的关系，把尹师的井得泉团拉走。尹宝山外号尹大马棒，对部下压制很严，所以把井得泉逼走。田中隆吉为此要杀尹宝山，我以“井得泉是刘桂堂的人”为词给抗住，把尹宝山撤换成王新民，让尹担任了伪德化市副市长。井得泉在红格尔图给我来信，说他很对不起我。日军攻陷张家口时，二十九军曾作了英勇的抵抗，故有十几辆汽车的日军尸体，盖上帆布运回张北焚化，另有三百多人被刘汝明的毒气弹熏伤。张北的日本特务机关，有一个专门研究密电码的小组，田中隆吉对我说：“我们已翻出二十多种。”他并不是吹牛，我事后调查，跟他当时和我所说某一方面是一部分完全相符。傅作义在孔家庄附近损失了那么多人，就是因为被日本人翻出密码，并且被窃听了电话，而跑入敌人的埋伏和包围圈内的。

东条英机占领张家口后，没有继续西犯，而是折向下花园和南口过来的板垣师团完成会师，一起回到北平，从涞水方面进攻了平型关。所以傅作义的步兵被阎锡山调回山西，防守雁门关与忻口，晋北和绥东只剩下各部骑兵担任警戒。察南地区成了军事真空地带，由杜运宇代理哈察尔省主席。我的六个师，仍停留在张北一带待命。这时日本人急于让伪蒙政权统治察哈尔全省，田中隆吉和田中玖派陶克陶坐上飞机去寻找德王。后来据乌古廷跟我谈：德王由嘉卜寺退到多伦以后，在那里利用锡盟和察哈尔的人，组织了穆克登宝的第七师，包悦卿的第八师、包海明的第九

师和雄诺敦都布的警卫师。包悦卿调蒙疆银行总裁后，由扎青扎布继任第八师师长。这些热、察两省和辽宁科尔沁的蒙古实力派与少壮派，还在多伦搞过一次插血同盟。伪满“兴安军”总司令巴特玛拉布坦，也由长春赶来参加。“七七”事变后，德王听见商都被门炳岳和董其武收复，他怕国民党军队进入西苏尼特，即带上军队回去保家，故被陶克陶在西苏尼特把他找见。德王来到张北，先和我到张家口慰劳日本伤兵，我们见有二、三百人躺在病床上边，多是中了毒气将头肿成斗一样大。关于在张家口建立伪蒙政权的事，因为遭到汉奸的反对而没有办到。不久由张家口的商务会长于品卿出名，成立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德王为了表示关怀部下，特打发于兰泽到赤峰购买慰劳品。不料于兰泽从中贪污，给弄来四、五大汽车霉坏的赤峰“哈达火烧”，我一看长满白毛，当时给了张北城里喂猪的老乡。我说：“拿这种东西给当兵的吃，简直如同骂人，花那么多的钱，为什么不就近在张家口买些香烟、肥皂、手巾？”德王没有吭声，第二天扫兴地回了西苏尼特。

日寇进犯平绥路西段，是九月中旬才发动的。除了从公主岭调过酒井机械化师团，还有一个步兵师团。他们是经过赤峰、多伦到达张北的，一共有一千多辆汽车，从公主岭出来，有伪满“兴安军”的一团骑兵把他们引到察北。他们从张北出发时，没有让“蒙古军”配合作战，即经过张家口长驱直入地进入大同。到达大同后，那个步兵师团沿同蒲路投入忻口战役。他们经过天镇、阳高、左云、朔县，到处惨杀百姓，晋北各县遭了空前的浩劫。酒井机械化师团的纪律稍好，在大同扶植起当地的一个举人夏恭，成立了伪“晋北自治政府”，继续西犯，把丰镇、集宁攻陷。因大同以北、以西有骑兵和傅作义的新兵进行抵抗，故在集宁把队伍停顿下来。到了十月初，方调“蒙古军”去配合作战。我接到出发命令，当天率领六个师由张北到达集宁附近，把总司令部设于城内的第二师范学校。酒井这个人非常谨慎，所以在集宁部署了十几天，始向归绥前进。在此期间我陪着他参观了老虎

山上傅作义部所筑的国防工事，他说：“建筑得很好。”我心里说：“可惜没有用上。”集宁北门外遍布傅作义军队所埋的地雷，我叫工兵完全起出来。到了“双十节”后，日军和伪军便向归绥出动。我担任打通铁路的任务，酒井师团经岱海滩(凉城)向归绥南边迂回，德王带的四个师，由草地从大青山后向西进犯。我因这四个师人少，并且没有重武器，派胡宝山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怕他们被门炳岳和马占山的骑兵吃掉。

归绥是十月十四日沦陷。十二日我派乌古廷指挥攻击旗下营西边的斗金山，那里有马占山部防守。我的老上司、曾给汤玉麟任过保安旅长的赵国增也在那里，写信叫我反正。我当然瞧不起马占山，没有听他的话。乌古廷从集宁坐火车到了旗下营，既不开炮轰击，也不派队迂回，想叫骑兵冲锋抢夺山头，所以打了半天拿不下来。后半天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马占山不过比画比画，到了这步天地他怎敢坚守？你派一连人兜到斗金山背后，他即收兵西退。”两个小时以后，他又来电话说：“照你的指示一办，马占山果然退了。咱们是在旗下营停留，还是往西追击？”我说：“先休息一夜，等我明天早晨去了再讲”。十三日我全部人马，都带到旗下营一带，集宁县城里边没留一个人驻守。我下了火车，听见西南方面炮声隆隆，知道酒井师团还没进城，便叫队伍都开到陶卜齐车站以东的山沟里边，严禁往归绥近郊移动。一方面不愿跟酒井师团抢功，让光荣归于日本人，一方面怕国民党的军队临退抢掠，把帽子给我的人扣上。

这天包海明的第九师，也把武川县城占领，到达归绥北二十里地的坝口子村。派人到陶卜齐以东和我部联系，说是沿山走了五、六十里，没有碰见一个国民党军队。我指示包海明，也是叫他不要夺取归绥。十四日上午马占山等部坐上火车从归绥退走，酒井师团下午入城。我叫队伍沿着铁路，向萨拉齐前进，自己带了警卫队的一连人，于天黑以后进了归绥旧城。归绥维持会长贺秉温派傅作义旧部、青帮头子刘长荣，把我欢迎到牛桥附近的归绥

中学里边，和酒井叫通电话，由刘长荣从饭馆要来一些饭菜，就在那个学校里休息了一夜。据刘长荣和我说，日军进入归绥未杀一人，马占山临走时，也未抢掠。刘长荣叫我在归绥好好休息几天。我说：“我怕日军沿途杀人，得赶快到萨县和包头去，遇到他们屠杀老百姓，我可以向酒井师团长恳求。”

十五日酒井师团续向西犯。德王进城住于新城傅作义扔下的省政府里。省府东边有个小院设置了日本特务机关。我为了尽可能保护老百姓，和酒井一同坐上汽车随军前进，十五日在萨县停了半天，十六日上午进入包头。我把我的总司令部设在从前王靖国的十九军军部里边。酒井叫我派一师人向安北搜索，我给包海明打电话说：“不要急追，让他们慢慢地跑。”日军在包头也未杀人，在萨县杀了几个国民党军队的溃兵，比起那个由大同南犯的师团，酒井机械化师团的军纪要好的多了。十七日上午出席完当地维持会会长刘澍为酒井和我所召开的欢迎宴会，酒井叫我陪他出城参观黄河。他望着河对岸的伊克昭盟沙漠非常发愁，自言自语地说：“追！追！追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中国的地方这么大，绥远过去有宁夏和甘肃，甘肃过去有青海和西藏，这个计划我不赞成。”我在一旁不敢吭声。从南海子转了一个钟头，即乘车回城。不久酒井机械化师团由火车开回公主岭。另派黑石部队接防。我因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于十月二十七日在归绥成立，在包头停留了不到十天，也回到归绥。

我在侵犯绥包时，只在旗下营附近打了一仗。虽然我带的“蒙古军”纪律很坏，汉族官兵完全是“奉军”的那一套作风，蒙古兵和“蒙匪”差不了许多，特别是胡宝山路过武川的一个天主教堂，一下子就抢了外国人三十万块现款。但是我在包头的十天当中，也做了一件“聊表寸心”的好事。包头是西北的水旱码头，商务比张家口和归绥还要繁荣，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在包头设有分行，金库中存有巨额款项。酒井师团开走后，我成了包头的最高统治者，当地的富商都请我吃饭。有一天中国银行分行经理郑相

臣，招待我和几个师长在他的行里打牌。他避开众人递给我一封赵国增给我写的信，说郑相臣是他的朋友，叫我特别关照。我问郑：“你有什么困难想叫我给帮忙吗？”郑说：“我有三十三万现款，已经埋到窖内，还有几千万钞票，这都是国家的财产。请你设法由包头先运到归绥，我再派人往天津分批转移。听赵国增说你很爱国，现在是因环境所迫，并说你有肝胆义气，是一个完全可托的朋友。”我听了很受感动，便对他说：“你不怕我是当胡匪出身的，敢以千万金相托，我一定能给你办到，因为这是逃避资敌，我分文不要报酬。”

日寇侵占绥包后，我即把家眷从张北搬到归绥旧城杨家巷。在我去参加“第二次蒙古”大会时，郑相臣派人给我抗来十几个大柳条箱子，和我同坐汽车上了火车。这时归绥已有日本宪兵在车站检查旅客，我下了火车被他们拦住，非要打开这十几个大柳条箱子进行检查不可。我叫翻译向他们说：“我是蒙古军总司令，你们如有怀疑，可到我的公馆中去检查，不能对着老百姓污辱我。”他们见我的卫士想要动武，只好放我通过。郑相臣派的人岔开到我的门口等待，我把大卡车停下，一一交付了他们。日本特务机关以为我进入包头以后，搜刮了一些大烟土，也未向我追问。他们哪里知道全是钞票？后来郑相臣跑到兰州，请总行经理把转移经过报告给蒋介石。故蒋介石始终认为我比德王忠实可靠。日本投降后，我初次见到傅作义时，他还提到“包头中国银行窖存的现金，始终未被日本人发现，最近刨出来，只短了十几元，这事亏了你给守护和保密，要是另外一个人，早就把它没收了。”

“蒙古军”的发展变迁

德王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因为国民党中央决定“察绥分治”，他于一九三六年一月，公开投敌，自任“蒙古军”总司令。这时，除了他在百灵庙有他以西苏尼特旗“乌滂守备队”为基础扩充起来的七、八百“蒙政会”保安总队，和一九三五年冬我在西苏尼特旗给他组成的五、六百警卫团外，锡林郭勒盟的王公及察哈尔部的总管，大都不敢或不愿出兵协助他进行政治投机和冒险。所以，他虽栽起了“引魂幡”，并没有招来多少牛鬼蛇神。因此，日本“关东军”让我跟他合作，以支持他的伪蒙政权。

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嘉卜寺“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任“蒙古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我任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

“蒙古军”第一军，是由我的“察东警备军”改编而成。它来源于驻防热河的“毅军”旧部、围场县的民团和朝阳一带的胡匪以及土默特左旗与科尔沁部的马贼。除了我是蒙古人外，官兵中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蒙古人，基本上是以汉人为基干的。编为刘继广（山东人）的第一师，尹宝山（林西人）的第二师，王振华（辽宁人）的第三师，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汉师”。但，德王的第二军搭不起架子来，就向“关东军”请求，由伪满统治的蒙旗给补充兵员。可是，日本人恐怕蒙古人团结起来，他们不好驾驭，并且有意让我同德王发生矛盾，不使我们和衷共济，特从我的家乡卓索图盟和我长期驻防的昭乌达盟，借来六千多人马，派德王的警卫团长宝贵廷，前去接兵，于七月间带到嘉卜寺附近。这六千多人，大都是土默特左右两旗的蒙古人和朝阳、阜新两个县的汉人。蒙古人，都会说汉话，汉人，全改成蒙古名字。蒙古

人比汉人超过两倍，军官多数是蒙古人。这批人就编成宝贵廷的第四师，人们统称为“蒙古军”的“蒙师”。

德王，想把四、五、六师，编到他的第二军内，可是这六千多人不是征拔的壮丁，而是有枪有马的现成队伍。他们主要来源于土默特左右两旗的蒙古“小队”和朝阳、阜新两县的汉族民团的“小队”，还包括被蒙古王公、汉族地主所收抚的胡匪，还有“毅军”的少数旧部。因为在热河落户，购置了上地，也以地主的身份充任了“小队”或民团的首领。他们在热河沦陷后，虽然是地方团队，而未被日军消灭。但在伪满统治下，不象以前随便了，他们听到我在察北由“察东警备军”司令官而组织起“蒙古军”，认为跟上我走能有出路，所以宝贵廷回到热河不到两个月，便把六千人给带来了。由这六千人编制的四、五、六师的“蒙师”，成份和一、二、三个“汉师”基本相同，只是蒙古人占的比重较多。德王在蒙古的中下层社会，知道他的人很少。日本“关东军”明白，这六千是来投我的，除了我别人无法指挥。故四、五、六三个“蒙师”没有编到德王的二军内，却壮大了我的第一军。

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都是胡匪的“合杆”^②性质。在热河人的大团体中，有好多各自独立的小团体。按照“合杆”规矩，宝贵廷当了师长，因为他不仅没有拉过“大杆”^③连“小杆”都没有。不过他一方面是德王的人，一方面又是我的人，再加上他回热河辛苦地去了一趟，因此我把昭乌达盟各旗、县的人，给他编了一个第四师。由于宝贵廷和我都是土默特右旗人，还是我原配女人的一个远房兄弟。他从家里初来做事，先在我的营部担任文书上士，后来，我把他推荐给团长赵国增，赵又保送他到东北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前，他和“蒙古军”的参谋长乌古廷同期毕业，被热河主席汤玉麟吸收到承德，均担任

^②合杆：指各股土匪的合伙。

^③大杆：指大股土匪。

汤的少校副官。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汤玉麟退到察北没有办法了，他们分别和汤玉麟脱离了关系，先后投靠到德王处。因此，宝贵廷在伪蒙时期，一直在德王和我之间来回摇摆。他是住过新式学校的蒙古上层，我始终不把他按嫡系对待。

从热河来的六千人，土默特左旗的是由该旗的统领伊恒额率领；土默特右旗的是由该旗王爷沁巴乌尔济的四哥宝音乌勒吉（七星台庙的活佛，人称“四佛爷”）率领。热河各盟旗以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口最多。所以，这六千人当中，土默特部的蒙古人、左旗设治的阜新、右旗设治的朝阳的汉人，就占五千多人。伊恒额跟我结拜，宝音乌勒吉和我是同乡。所以，我把土默特旗的蒙古人和阜新县的汉人编为第五师；土默特右旗的蒙古人和朝阳县的汉人编为第六师，由伊恒额和宝音乌勒吉分别任师长。将土默特左旗的蒙古人田英和朝阳汉人李鸣运，充任了五、六两师的副师长。田英出身于马贼，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李鸣运出身于胡匪，后来参加过“毅军”，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老同事。这次前来投我，都带着自己的“杆子”。于是五、六两师，很自然地就成了我的羽翼，他们都服从我，而不听德王指挥。在一九三六年秋天，日本“关东军”派坂垣前来检阅前，三个“汉师”在张北附近驻防；三个“蒙师”在嘉卜寺附近驻防。以后，我和德王因争权发生了冲突，日本在张北给我另外组织了一个“蒙古军”张北行营司令部，我就把五、六两师和一、二、三师集中在一起，留下宝贵廷的第四师，担任嘉卜寺的城防，以保护由我的人组成的总司令部，并表示我和德王没有完全决裂。“七七事变”后，傅作义派石玉山攻占嘉卜寺时，宝贵廷没有跟德王逃往多伦，也把队伍带到张北附近。

“蒙古军”中真正的“蒙师”，是德王跑到多伦以后成立的七、八、九师和警卫师。这时，德王“蒙政会”时的保安总队，已于年前在百灵庙被傅作义打垮了，他是以自己的警卫团改称为警卫师，由锡盟阿巴嘎旗王爷雄诺敦都布为师长；以察哈尔部的

东四旗和四个群(相当于行政区划的旗)的兵编为第七师，由厢黄旗总管穆克登宝为师长，以从科尔沁旗一带招募的兵和从锡盟各旗征的兵，编成包悦卿和包海明的第八师和第九师。二包都是“东蒙”的知识分子。包悦卿曾任绥境“蒙政会”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包海明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这两个“蒙师”，和我的那三个“蒙师”有显著的区别。它们是蒙古上层把牧民、奴隶组织起来的军队，里边很少由“小队”和马贼出身的人。至于第七师的察哈尔部官兵，差不多都会说汉语。有的军官、老兵，并且参加过哲布尊丹巴的“蒙匪”和当过马贼。特别是那个警卫师，是我利用热河的蒙古人先给德王组成的警卫团，里边几乎全是马贼。因此，后来由警卫师缩小为伪蒙政府的卫队时，德王把老兵拨给八、九两师，另招了西苏尼特旗的新兵。这四个所谓“蒙古师”，没有一个是德王所理想的蒙古军队。锡盟、察哈尔部里的兵，都掺着汉人。

一九三七年九月，“蒙古军”配合日军进犯绥远以前，我同德王由于形势所迫又言归于好，不过仍是各带各的兵。我带的三个“汉师”，因第二师长尹宝山，在商都作战和协同东条英机攻占张家口时不听指挥，并且把收抚刘桂堂的井得泉团逼到马占山那里，所以被日本最高顾问田中玖撤了职，调充了伪德化市的副市长，由该师团长陈景春升任师长。陈和另一个团长朱恩武，都是热河围场县的大地主。围场的土匪很多，地主武装力量相当雄厚。象“东北军”里边的荣三点、白凤翔，便是围场的胡匪头子。跟“国民军”有关系的姚景川，便是围场地主武装的首领。我的第二师原先有两个围场人，陈景春升任师长后，他一方面领上队伍向绥远出发，一方面打发人回家招兵。到了归绥不久，便把井得泉带走的缺额补齐，这个师越发成了由围场民团组成的团体了。我带的三个“蒙师”，在进犯绥远前，也有变动。第六师师长换了德王“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培养出来的青年军官乌云飞(卓盟喀喇沁左旗人)。因为原来的师长宝音乌勒吉是个

活佛，他参加“蒙古军”是想过官瘾，恐怕上火线被枪炮打死。听说队伍到商都解尹宝山第二师之围，便装孬向我请了长假。我为了表示和德王重新合作，便叫他的学生乌云飞担任了师长。实际上是由副师长掌握一切，乌云飞和宝音乌勒吉都是有职无权的傀儡。

德王的四个师，在进犯绥远前，由伪满的“兴安军”给介绍扎青扎布来担任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的父亲人称戴扎兰（戴是汉姓，扎兰是官衔）和我是磕头弟兄。他从多伦来张北见我，便以此种关系跟我表示近乎。所以，德王虽然号称有四个师，除了扎青扎布倾向我，和包海明又极端亲日，他只能把握住穆克登宝的第七师，他连警卫师也难掌握住。因为德王成立警卫团时，我用“偷兵”办法，从伪满“兴安军”中叫出五、六百旧部，只要我说一句话，仍能把编到“警卫师”的马贼，叫到我的第一军里边。德王所谓的四个“蒙师”，合在一起，也不如我的一个“汉师”人多。我是以八千多人分编为三个师和一个炮兵大队，每个师的人数都在两千人以上；而德王的每个师平均才五、六百人。并且我把日本人先后给我拨到的一万一千多枝新枪，都装备了自己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四、五十门野炮和山炮，也完全掌握在我的炮兵大队长丁其昌手中。德王的四个师，有一半是旧枪，自动武器很少，更无重武器。从装备上看是不能和我相比的。

从占领绥包后，穆克登宝的人马便所剩无几，遂把第七师的番号给了正黄旗的保安队，由该旗总管达密凌苏龙担任了师长。此人胡须很长，编着一个辫子挂在耳朵上边，非常老奸巨滑。提起这位“长胡子”在东五县家喻户晓，能号召起这一带的民团、土匪。他在政治上反对德王而倾向傅作义。绥包沦陷前夕，就是他给他的义子石玉山补充五百多匹战马，壮大了石的“骑四师”把嘉卜寺的“蒙古军政府”捣毁。绥包沦陷后，他投敌了，还是不听德王的话，自此德王在“蒙古军”中，越发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了。加之日本人不让德王独揽军政大权，所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德王担任了政务院总裁，由我担任了

“蒙古军”总司令。由乌古廷任参谋长，再没有安插副总司令。这时补英达赖任了“巴彦塔拉盟”的盟长，卓特巴扎布并以“察哈尔盟”盟长兼了张家口“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

“蒙古军”初到绥远的时候，总司令部设在包头。准备由包头再往西进犯，去占领后套和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对伊盟形成三面包围以后，再去占领鄂尔多斯部（伊克昭盟）七旗。因为日寇恐怕战线拉得过长，决定了以包头为前进的终点。于是我们由进攻变成了防御，遂把总司令部移到归绥旧城。同时归绥成了伪蒙的“首都”，也有必要让总司令部和政府驻到一个地方。至于各师驻防的情况，刘继广的第一师驻在包头，陈景春的第二师驻在归绥，王振华的第三师驻在集宁，宝贵廷的第四师驻于包头黄河对岸的达拉特旗大树湾，伊恒额的第五师驻于四子王旗，乌云飞的第六师驻于张北的公会一带，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在正黄旗原地不动，扎青扎布的第八师驻于武川西部的乌兰不浪一带，包海明的第九师驻于百灵庙。德王在 multen 由警卫团改称的警卫师，到了归绥改为伪蒙政府的卫队，驻在归绥新城保护机关、仓库，已不列入“蒙古军”的序列。以后除了临时调动，建制变化（第四师与第六师合并，第八师与第九师合并）外，防区一直维持着这种状态。一、二、三师改编为伪“治安警备队”的三个集团，也只是随着伪蒙政府扩大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三集团调到“察南”的平绥路东段，第二集团将防区扩大至集宁，总司令部和第一集团始终没有离开绥包两地。

我任“蒙古军”总司令的初期，也就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到一九三八年年底这一阶段，一共拥有一万二千骑兵和两千炮兵的主力，加上七、八、九三个师，可以指挥调动一万八千多人。所以这一阶段，是“蒙古军”的全盛时期，也是我的黄金时代。却也因此而使日本感到不安，并引起德王的嫉妒，都想削我的兵权，于是向我施展偷梁换柱和抽筋剥皮的手段。在“汉师”方面，我进入包头以后，为了迅速恢复地方秩序，便让驻防包头的第一师

师长刘继广充任了伪包头市的市长（日本人和德王都知道我的第一师，是由“毅军”的底子给打的基础。纪律和战斗力比其它的师要好、较强。所以先从我的第一师下手），脱离军队去当文官，使我失去一员健将。我不得不派炮兵大队长丁其昌去担任第一师师长。丁其昌担任师长到一九三九年秋天。在这年九月一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时，即把丁调为治安部长，同时把刘继广调升为伪政府的最高检察厅厅长，都由包头弄到张家口，和第一师完全隔离。把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还为以后把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做了借口。因为我手下的人材很少，选不出率领这个基干师的将领，遂由该师行伍出身的团长郭秀珠升充了第一师的师长。

第二师和第三师驻到归绥、集宁附近以后，一天比一天腐化堕落。二师师长陈景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在率领民团参加崔兴武的“东北军”十七旅以前，曾参加过宋哲元的“国民军”，故社会关系和头脑里的思想比一般行伍和胡匪出身的军官复杂。他在归绥驻防期间，除了贩运烟土致富，并且想望在政治上另找出路。故和抗战部队派过来的人乱拉关系，特别是和驻在后套的国民党军委会热河特派员姚景川（围场人）来往非常频繁。他怕事情暴露以后，身家性命难保，便在一九三九年脱离了军队，给德王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由团长朱恩武升任了师长。第三师大都是收编的胡匪，我为了使这个师走向正规，在察北开始组织时，即让曾给崔兴武任过参谋主任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的王振华担任师长。王在一九三八年夏天傅作义反攻归绥时，因团长慕新亚投降马占山而被撤，我又调总司令部的副参谋长刘星寒去接充第三师的师长。刘是我的朋友刘子布（曾给常万里和石文华当过营长）的儿子，又是第六师副师长李鸣远的女婿，并且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我是用他来顶替乌古廷的。由于刘不像乌古廷那样巴结日本顾问，担任师长不久便以暗通抗战部队的嫌疑，被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撤职，调到归绥的一个日本“株式

会社”中领取干薪。后来他出走到重庆投奔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乐景涛（克什克腾旗蒙古人，和刘子布是朋友）没有找到适当工作，北返到陕北府谷哈拉寨，参加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我因再派不出人去充任第三师师长，即使把人派去也要被日本人顶回去，遂把该师胡匪出身的团长宋鹏九，提升成第三师的师长。所以三个“汉师”在一九四〇年夏天改编伪“治安警备队”以前，师长全换成了新人，各团也不是原先的那班人马了。

日寇在“七七”事变以前，所以用一万多枝新枪和四、五十门大炮装备我的“察东警备军”和后来的“伪蒙古军”，并且由伪满借来六千多人，充实德王跟我的队伍，是由于他们原先不打算亲自出马，而让我们前去进犯绥远。不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和共产党合作起来抗战，因而日寇于一九三七年七月挑起芦沟桥事变，决定全面侵华，于是我们成了配角，他们感到壮大和装备“蒙古军”成了多此一举。因为他们统治中国占领区，有的是为虎作伥的汉奸，对待一般老百姓可以利用日本参事官与“满系人”组织的伪警察；对付抗战部队也能利用日本特务机关直接指挥的其它伪军。在“蒙疆地区”除“蒙古军”而外，还有于志谦的“防共自治军”，王英的“绥西联军”和白凤翔的“东亚同盟军”等等。这样，“蒙古军”进入绥远以后，对日寇来说已无必要，而且成了当时的赘瘤和未来的后患。不过日本既然标榜协助蒙古人复兴民族，当然不能把“蒙古军”取消，也不敢把“蒙古军”的武器收走，而是用很毒辣的政治手段，使“蒙古军”逐步削弱，变成伪蒙政权的装饰品。他们的方式方法很多，我另以专题叙述。此处我要说的是从“蒙师”中往走抽人和把“汉师”编为“治安警备队”，因为这两件事对“蒙古军”的关系很大。以后我被弄得无能为力，挣脱不出日寇的罗网，也是受了这两件事的影响。

日寇从“蒙古军”四、五、六三个师抽兵的借口，是伪满要人充实“兴安军”，预防苏联进攻热河，时间是在一九三八年

底。这时武汉沦陷，抗战的形势正处于低潮阶段。并且德王也有心拆我的台，所以他不表示强硬态度，我只好把士兵交出，于是我的三个蒙师马上成了空壳。德王想把这三个师的番号操到自己的手中，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兵补充缺额。先给了宝贵廷五、六百人，但迟迟不给五师和六师补兵。五师师长伊恒额和六师副师长李鸣运，对于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且无耐性等我从热河给往来招人“偷兵”，都向我递上坚决不干的辞呈。德王借此叫乌古廷举荐韩凤楼（被蒋介石先兵第三团在北平暗杀的百灵庙“蒙政会”保安总队长韩凤林的哥哥）为第五师的师长，第六师也被乌云飞完全抓起。由于宝贵廷对我并不忠实，我已没有了可靠的“蒙师”。伪“蒙古军”在进入归绥不久，便成立起军官学校，由原伪满“兴安军”的脑门达赖（汉名高庆春，一九三六年即从伪满到了西苏尼特旗，任伪“蒙古军”上校）担任校长。后来德王要叫他的人抓军官学校这个教育机关，于是乌云飞和脑门达赖对调，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脑门达赖担任了第六师师长。四、五、六师被德王操起来之后，每师只给补充了五、六百新兵。宝贵廷的第四师在大树湾驻防和黄河南岸的国民党军队经常接触，伤亡、逃跑所剩无几，在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以后，即和第六师合并，宝本人调回总司令部担任了教育部部长。此外的那三个蒙师，除达密凌苏龙的第七师一直没有变动。第八师在武川被八路军和傅作义的游击部队打垮，扎青扎布阵亡以后，和包海明的第九师合并。包继乌云飞担任了军官学校校长，调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乌力吉敖喜尔充任师长，乌云飞离开军队充任了伪蒙政府参议府的参议。这样伪“蒙古军”的六个“蒙师”从一九四〇年开始就把四师和八师的番号取消了，只是七师的人数不减，其余三个师合计不足两千人，成了布置在大青山后的边防军了。

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成立了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把第一师师长丁其昌调为治安部长时，即已内定，不过当时没有公布，到一九四〇年夏天

“五原战役”结束之后，张家口的日本“驻蒙军”军部才给我下达了这一命令，把三个师改为三个集团，团改为大队，连改为中队，排改为小队。为了改编工作顺利进行，由原来的每师三个团，改为一个集团下辖四个大队，将师的直属部队完全取消，共是十二个大队。集团长的手中没有了兵。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不愿扔枪，屈就了大队长。把第一集团长的空地位，让给了总司令部的参谋处长郭光举。这三个集团中的第一集团和第二集团分驻在绥远各县，集团部仍分设在包头和归绥。第三集团开到察南，集团部设在怀来，都被化整为零。“治安警备队”名义上受治安部长丁其昌指挥，实际上由驻在地的日本部队或特务机关操纵，成了各自为政的十二个小单位。因此，军官尽吃空额，把原先三个师的六千多人，变成每一个大队只有三百多人了。日寇和德王把我的“蒙师”的兵抽走，等于去了我的左胳膊，将我的“汉师”整个编走，等于去了我的右胳膊。所以这两件事完成以后，紧接着就改组我的总司令部，结果负责的汉人全被挤出，炮兵大队也被张启祥操起，给我只扔下一个警卫连。郭光举就是因为在各处之上增设了管理各处的参谋、教育和总务三部，参谋处长之上有参谋长和参谋部长，他才下了部队。他担任了“治安警备队”的第一集团长，遗缺补了乌力吉敖喜尔。乌力吉敖喜尔出任第九师师长。这是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这一阶段的简要情况。

从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后，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蒙古军”有名无实了。并且我除了在暗中掌握“治安警备队”，已把“蒙古军”的事，让日本顾问和参谋长乌古廷去折腾。可是日寇对我仍不放心，对乌古廷也有所怀疑。在德国快要垮台、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失利的一九四五年春天，先把乌古廷撤职，调宝贵廷为参谋长；后将我由归绥叫到张家口，将我跟绥远的部队隔离开来。在此期间突然让“治安警备队”归还“蒙古军”建制，把三个集团编成六个“汉师”，加上四个“蒙师”，以及一个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纠合起的两部分人，共

凑成十二个师。“汉师”是按一、二、三、四、五、六排列，“蒙师”的七、九两个师未动，因为“治安警备队”已由三个集团很快改成了六个师，姓白的汉人和伪萨拉齐县长某某的队伍还未编制就绪，日本就宣告投降。故我弄不清“蒙师”的五、六两师，是否改为八师和十师。我只记得“汉师”是由伪宣化省省长刘继广兼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为第二师师长，宋鹏九为第三师师长，郭光举为第四师师长，朱恩武为第五师师长，门树槐为第六师师长。郭秀珠那个大队原来驻在包头，因赤城、龙关一带的八路军非常活跃，把宋鹏九的第三集团弄得无法招架，遂把郭秀珠的那个大队由包头调去。故归还“蒙古军”建制时，将察哈尔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一、二、三师，绥远境内的“治安警备队”编为四、五、六师。

日本投降前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解放察北，八路军把张家口、大同至归绥之间的铁路切断，傅作义也从后套跑了出来，于是“蒙古军”的十个师没有集中到一起。“蒙师”里边除了第九师由乌力吉敖喜尔率领，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韩凤楼、脑门达赖和达密凌苏龙所带的三个师，完全被苏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缴械。“汉师”驻在绥远的三个师，都被宝贵廷抓起，连同张启祥的炮兵大队以“新十路军”的名义归降了傅作义的“十二战区”。大炮让傅作义的四个军瓜分了。骑兵最后缩编成一个旅，由安恩达率领，跟上董其武起义了。驻在察哈尔的三个师，因刘继广离开部队多年，郭秀珠回包头探家，全倾向了宋鹏九。宋掩护着马汉三的一部电台，把我派去协助他的丁其昌顶回，想望国民党另给他编制队伍。“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叫他先在解放区扰乱，以致马匹大部饿死，士兵大部逃跑，结果三个师只剩下一百八十多骑兵和三百多步兵。听见我带上刘继广和郭秀珠出关给蒋介石组织伪“东北民众自卫军”，他在南口附近无法存留，便跑到热河开鲁找我，我给他编了一个师。开鲁解放时，我只身脱逃，刘继广因未去开鲁，其余

都被解放军俘虏。“蒙古军”可以说是从开鲁起家，最后还在开鲁完全覆灭。它祸害了察、绥两省，连前带后共计十五、六年。

“蒙古军”的战斗表现

“蒙古军”由察北进入绥远，由于国民党不坚决抗日，除了一九三八年夏天、一九三九年秋天和一九四〇年春天，傅作义为了收复他原有的绥远地盘，曾发动了反攻归绥，袭击包头和夺回五原三次较大的战役外，以后和敌人便成了隔着黄河对峙的休战状态。从一九四〇年夏天开始一天比一天受到八路军的威胁，队伍开了出去，可以说是到处挨打，缩到围堡里边，不能安心睡觉，连我设在归绥的总司令部，亦常受虚惊。如果不是随着日本投降而分裂瓦解，也要被八路军累倒拖垮。因为日本在抗战初期，怕我率部反正，一九三八年夏天的归绥战役，就没有让“蒙古军”参加。马占山的骑兵扰袭绥南、绥东时，把门树槐俘去和将慕新亚的那一个团拉走。傅作义的步兵挺进至归绥城南六十多里的一间房村附近，是被归绥的日本驻军和大同开来的日本援军击退的。他们的战斗详报，对于下级军官都保密，只有“驻蒙军”军部的参谋处知道，中国人很难了解。由于日寇把我看守得很严，不叫我跟下边的队伍接近，到五原协助王英，也没敢叫“汉师”前去。我是在包头战役结束以后和五原战役开始以前，去包头、五原进行过视察，并没有指挥过这两次战役。兹将当时我在包头、五原听到见到的事情，连同我在归绥感受到的红色恐怖和驻防大同的日本厚宫师团长跟我对于八路军的谈话写出，用这些侧面见闻，以概括日伪在“蒙疆”地区的战防全貌。

包头战役的经过

一九三七年绥包沦陷以后，日寇即把包头当成向西北进军的据点。“蒙古军”到了包头，只派包海明的第九师，搜索到安北

一带（大余太地区），旋即调到百灵庙驻防。从包头到后套中间的乌拉山山前山后，很长时期成了真空地带。包头以南的伊克昭盟，国民党没有配备河防部队，故宝贵廷的第四师曾推进到东胜县城附近，并一度占领了杭锦旗王府。我为保存实力，不叫宝贵廷继续深入，把第四师撤回达拉特旗，把守大树湾的黄河渡口。一九三八年春天，榆林高双成的部队北上，沿着达拉特旗的沙梁布防，但没有控制了黄河南北的滩地。傅作义这年夏天反攻归绥失败，退回山西河曲，在一九三九年春天，他脱离了阎锡山，把队伍都带进后套，担任了第八战区的副司令长官。从此国民党绥西前线有了统一指挥，各部队开始向包头外围延伸。黄河以南方面因宝贵廷的兵抽回热河，不久，第四师和驻在察北的第六师合并，我叫包头的第一师派出一个团到大树湾接防，除了大树湾西边的柴登召，有达拉特旗投日的森盖部队驻守，黄河以南的滩地便成了国民党部队的游击区。河北方面傅作义的步兵也由乌拉山前后推进，前哨到达现在包头新市区的麻池镇和前口子一带；山后的安北（编者按：指大余太地区），也被傅作义的游杂部队控制。于是包头三面被围，里边非常空虚，只有日本一个联队组成的小岛部队和“蒙古军”第一师郭秀珠的两个团骑兵。

傅作义在抗战胜利前，对绥、包虎视眈眈，他的谍报工作也做得比较有些办法。一九三九年冬天袭击包头和一九三八年反攻归绥，都在日军的换防期间。进入包头的那一夜白天，小岛部队大部东调，和傅作义勾通的当地商务会与伪警察局局长，便知道了主攻部队到达城郊的消息。这夜拂晓以前，有孙兰峰指挥的一个营，从西北门附近的水道爬进，走到财神庙街和南河湾一带，才被“蒙古军”第一师的哨兵发现而开了枪。郭秀珠据报以后，指挥相当沉着，他不准士兵们备马，一律投入巷战，集中起两个团的重机关枪和迫击炮连，把入城的傅作义部封锁到财神庙一带，并派出一百多名敢死队，跳到西北门的城墙外边，进行敌后偷袭，把攻城的部署打乱。这时日本的少数驻军以及机关人员和侨

民，全持枪上了城墙。“蒙古军”没有了后顾之忧，把城里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战局就趋于稳定，成了胶着状态。

战斗到天亮以后，归绥的日军即行开到，在外围展开疯狂的“扫荡”，城里也发动了反攻。傅作义进入包头的兵，因水道口上有督战队卡着，先是不许撤退，以后我的兵把水道口封锁，便无法往出突围，只好利用家屋拚死抵抗。外围的傅作义军队，于归绥的日军开到以后，因受战车追击，都爬上北山，把好几门大炮扔到城外。日军追击了一上午，下午即全开进包头，傅作义的军队无力反攻，沿着乌拉山退回后套。

我是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和张家口的“驻蒙军”司令官冈部，伪蒙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等，相随前去包头视察。“蒙古军”第一师这次本来打了胜仗，可是冈部听了跟我作对的盘井顾问的谗言，不但对第一师没有奖励，并且对第一师表示怀疑。冈部和金井质问我：“为什么上一次傅作义打归绥是在日军换防时期，而这一次打包头还是同样时期？一定是你们蒙古军告给皇军开走的消息，他们才乘虚而来。”我说：“你们一调动，连侨民也都缠上臂章，在街上阻止行人，断绝交通，并且车站宣布戒严，让客车垂下黑布。日久天长，人家的谍报咋判断不出是军队调动；至于城门口站岗的，不光是蒙古军，也有皇军和警察，责任应当分担。”他们听我说得理直气壮，便不再责难。

傅作义这次袭击包头，虽然受了些损失，但是给了日军和“蒙古军”以打击，并且鼓舞了沦陷区的人心。“蒙古军”和日本军民，在歼灭入城的傅作义部队时，也死亡了三百多人，战况相当惨烈。他们进城后，居民自动以好饭招待，并且替他们往房上搬运沙袋，掏掘逐屋前进的窟窿。所以张家口“驻蒙军”军部，决定要把傅作义赶出后套。在一九四〇年的春节以前，日军发动了向五原进攻，并且在“五原战役”结束之后，在包头关闭城门捕人。包头商务会的会长郗相国、董武山和伪警察局长王文治等四十余人，均被押解到张家口杀害。

五原战役的经过

包头战役结束没有多久，王英从天津跑到包头。他路过归绥下车，穿着日本的中将制服来找我。我说：“你又闹起来啦，谁给你向日本人活动的？”他说：“是我二姐。她跟包头的日本特务机关谈妥，田中隆吉（当时任太原特务机关长，给王英成立伪“大汉义军”的也是此人）从天津把我带到张家口，决定给我成立“绥西联军”，把傅作义赶出后套，还让我担任绥西政厅长官。我这可打回老家了。”他对此感到十分高兴。我问他：“你在哪些方面需要我给帮忙？”他说：“大哥，我有的是人，武器他们给装备，只是我该如何去做？你在这些方面比我有经验。”我说：“傅作义很难斗。你已经吃过他好几次亏。现在绥远的老百姓倾向他而反对咱们，你要见机而行，不可粗心大意。”他说：“后套人都听我的。傅作义这次打包头已经溃不成军。只要日军攻下，我就能够守住。到时我送你一个牛帽（等于热河的窝铺），咱们明年好种麦子。”我见他仍是那样大言不惭，不是来向我请教，而是来向我夸官，便再没跟他深谈。他吃过一顿饭，便趾高气扬地坐火车去了包头。

进攻后套的时候，日军只开去一个旅团，另外征调了伪蒙境内的二百多辆商业载重汽车，装了“晋北”的两千多伪警察以壮声势。傅作义为了避免损失，把队伍分开两半撤退，一半撤至北面的狼山湾，一半撤至南面的沙畔。因为冬天河渠冻结，日军和伪警察便长驱直入，没有遭到抵抗。遂于二月三日攻陷五原，二月四日攻陷临河，一直冲到宁夏磴口县三盛公教堂以南的乌兰布和大沙漠附近。这样，从包头把战线拉了八百多里长，装入傅作义的口袋里边。日寇感到不妙，先把临河自动放弃，后来决定控制东半个后套，他们即把队伍撤回包头，留下两千“晋北”的伪警察据守五原。让王英和我的人在外围担任警戒。王英在进攻后套

以前，只纠合起包头附近的七八百土匪、民团；日军占领五原之后，又把他带过的杨猴小旧部，从黄河南高双成那里叫了过来，共凑了三个骑兵师，人数约两千人上下。我派去的是韩凤楼的第五师，扎青扎布的第八师，包海明的第九师和炮兵大队的一个中队，人数也不足三千。由乌古廷率领前往，受归绥特务机关长桑原指挥。过了春节不久，从后山由乌不浪口进了后套，开到五原附近。

傅作义争夺五原的准确日期，是三月二十日夜晚。我是十日由包头乘汽车到了那里，次日王英曾陪我去看队伍，并在五原周围参观了他父亲王同春的“牛棋”。约四、五天后的一个下午，日本即派来飞机，把我接回归绥。五原分新旧两城，相距四、五里路。新城有商店，桑原的特务机关和王英的司令部设在那里，驻着一千五百多伪警察，旧城有土修的围堡，乌古廷的司令部设在那里，驻着炮兵和五、六百伪警察。桑原从归绥前往五原的时候，就非常提心吊胆。他知道我的“汉师”的兵，比“蒙师”的兵能打，临走时从第二师调了一排人，给他的特务机关担任警卫。在五原城外，我的三个师放在西北，王英的三个师放在西南。不论我的人和王英的人，都是集中驻在相离不远的几个村庄里边，兵在房上瞭望，马没有隐蔽的地沟。那时，冻地已经消解，但在村外都未构筑防御工事，并且互不联络，尽是空隙，老乡随便来来往往，而无军队放哨巡逻，摆就了挨打的姿势和一有情况就跑的架子。

我去五原的那天，傅作义的军队以钳形攻势，从临河和百川堡方面，移动到城西七八十里的地方。我在新城看见从“晋北”来的伪警察，在街上三五成群坐在一起窃窃私语，脸上都带着张惶的神色，无精打彩地好像没吃饱饭。到了旧城的“蒙古军”司令部，看到炮兵没有构筑阵地，大炮全摆在民户的院子里边，如同刚从远处开拔而来。城墙有好多豁口，无一点工事设备，司令部可能是设在一个高营盘里边，四个拐角的炮台全部露天，也没

掘下隐藏马匹的地沟。队伍开来已经一个多月，不知乌古廷究竟干了些啥，总是成天和王英在一起鬼混，忘记了身入险地。我到司令部的时候，好多人都到新城去找舒服，像在归绥那样满不在乎，完全不是兵临城下的样子。经我向他们说明大敌当前，绝不可疏忽玩忽，他们推诿了一天，次日上午才胁迫民夫动起泥工和土工。

四、五天后的一个下午，桑原、王英和乌古廷把我送上飞机，他们就到特务机关去开会。吃饭抽烟闲扯到夜晚十点多钟，还没决定出防御部署，街上便打起乱枪，并且手榴弹的爆炸声和杀声连成一片，跟各师联络的军用电话全被切断。桑原和王英由卫士保护，都跑到“绥西联军”的司令部；乌古廷在流弹和手榴弹破片纷飞中，带着四五个人，穿街过巷闯出新城，又拐弯抹角进入旧城。他下马走入司令部的前院，后院已被傅作义的军队占领。附近驻扎的炮兵，还没卸下炮衣，听见伪警察从院子里给往出扔枪，他们也把八门野炮和三门山炮扔下四散逃跑。乌古廷由于穿道往后院走的时候，前边的几个卫士被傅作义的兵抱住，他身边的一个卫士揪了他一把，两个人才上马跑出司令部。

乌古廷出了旧城，迷失了方向，带着一个卫士，朝西南瞎跑，正碰见自己的骑兵，由西北方向跑过，把傅作义的炮兵阵地冲破，他看见扔着四、五门大炮，没有一个兵保护。也不知道从西北过来的，是“蒙古军”的那几个师。于是他又折向东南，糊里糊涂地跑进新城里边，和伪警察与傅作义的兵，混搅了多半夜。天快亮的时候，他的头脑开始清醒，外边枪声渐稀，才混出五原新城。瞭见东方的曙光，直往西山咀奔跑，路过一条大渠，把马陷到里边拔不出来，卫士把自己的马给了他，搀扶着他走到西山咀附近，方寻见自己的部队。因为傅作义包围得不太严密，并且没敢追击，他们方逃出后套，狼狈退回包头。乌所带的三个师，均在五原外围受到袭击，他们先是以为来打自己，都缩到一起，保护师部；以后瞭见城里起火，才判断出五原是主攻目标。于

是，马上往出冲，并没有多少敌人包围。因为消息隔断，不明五原城里的情况，加之傅部的骑兵到处活动，他们只好绕开城垣向东南退下。就是这样，也都溃不成军。后来，各师才把团、连收容到一起。检点了一下损失，共丢了三百多人，连同总司令部和炮兵大队，死伤、被俘约一团人的样子。

至于桑原和王英的情况，据保护桑原的那个排长陈玉修回来向我报告：王英的“绥西联军”司令部，共占着两个并摆在一起的大院，桑原怕王英投降，拿上他给傅作义送礼，故叫王英的人坚守西院，他和日本人以及我的兵坚守东院。傅作义把五原城内敌伪的驻地，调查得非常清楚，故集中起一个步兵营，猛攻王英的司令部。陈玉修在桑原被击毙以后，自己的一排人也剩下了三个兵，便将东院放弃，跑过西院保护王英。王英的人这时也所剩无几，给陈玉修许了一个师长，叫陈给上房抵抗。让他的人在底下挖逃跑的窟窿。他们往外跑时，没有通知房上的陈玉修，先是王英的表弟杨守成（曾给王英当过旅长）带着人往外硬冲，均被傅作义的兵击毙；后来王英独自跑时，蹑手蹑脚地没敢打枪，包围的人夜间看不清楚，以致使他贴着墙跟溜脱。王英从小在五原长大，地形、路径很熟，跑到城东他的一家佃户房中，那里的人给他备了一匹马，派人领路从小道找见部队。陈玉修在“绥西联军”司令部的房上，打了一个多钟头，听见底下没有了动静，从房上跳下来一看，王英的那盏烟灯仍然点着，屋里屋外却空无一人。他也用王英的办法，从墙上的窟窿里边爬出。回到包头以后，王英早把陈玉修忘掉。我因陈给“蒙古军”要了面子，在归绥把他提升为连长。

三月二十三日白天，日本人就叫不通五原的电台，派出飞机侦察，知道五原已被傅作义收复。他们除了以汽车载兵前去接应外，还把我叫到包头，让伪“蒙古军”第一师紧急集合，马上往后套开拔。日寇的汽车还未进套，就看见我的三个“蒙师”和王英的人，都退过西山咀以东，他们没敢继续西进，当天下午都折

回包头。偷听广播的人早把真象传遍绥、包两地。二十四日，日军由后山进套，傅作义的军队在乌加河南岸抗了一天，二十五日晚用橡皮艇渡河，进入五原将桑原等的尸体寻获，没敢在那里停留，旋即撤出后套。因为日寇兵力不够分配，决定再不触犯傅作义，命令“蒙古军”各返原防，王英的“绥西联军”驻到乌拉山前的中滩。因白凤翔投敌编为“东亚同盟军”，让他的人填补了乌拉山后的空隙。“蒙古军”总司令部有个参谋贾秀山，他是最后一个跑出后套的人，见了我仍惊魂未定，说话时下巴壳子直抖。我说：“这里是包头，我又不是傅作义，你还有啥可怕？”他这才恢复了正常的精神状态。可见，一九四〇年春天的“五原战役”，傅作义确实给了敌伪以很大打击，不过傅作义也尝到了丢掉后套的苦头，所以，再没敢来碰包头。

八路军在沦陷区

八路军于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在大青山和蛮汉山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起初日伪很不重视这个革命部队，没有把他们瞧在眼里。到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后，因为傅作义钻到后套养精蓄锐，只派游杂部队出来点缀战争，八路军便成了“蒙疆”地区的抗战主流。还不到两年功夫，他们在时间上，完全把黑夜控制了；在空间上，也由面上活动，切断交通路线，而袭击开敌伪的据点。不仅在察南山区，打死日寇“讨伐”他们的一个中将司令官与一个少将旅团长，而且先后摸了伪警察一万八千多支步枪（据伪治安部长丁其昌在一九四〇年以后告我），使得“蒙古军”黑夜不敢出去活动，白天也不能三五成群地到乡下滋扰，怕被民兵解决。最后连经常驻有日军一个旅团和“蒙古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归绥，也受到八路军的严重威胁。

归绥沦陷后，把旧城通向郊区的街巷大部堵住，除了连结新城的那一条大马路，只留下东西南北四个口子。人们只能经口子

来往通行。各个口子都有日、伪军、警察三方面的人站岗，防备相当森严。有一天晚上，八路军摸掉东口子碉堡和炮台上的枪，从平康里大街冲进不知有多少人，进至距我总司令部不远的市中心大什字一带。他们一打枪，全城便陷入混乱状态，机关部队都是各守各处，唯恐被冲进自己的院子内，均朝街上盲目射击，更助长了八路军的声势。我的总司令部的官兵，有眷属的都回了家，没家的全到外边去宿娼赌钱，里边连个值宿的军官都没有，大门口只有一个兵站岗。我的身边除了自己的女人、孩子和老妈子、厨师而外，只有五个卫士，真是无法应付危局。我叫五个卫士，协助站岗兵把守前门，自己带了两支手枪，一个人招架后门。好在八路军没有到达杨家巷和西顺城街一带，直到日本兵的坦克和装甲车从麻花板军营开进旧城，马达声把枪声压住，驻扎在牛桥附近的警卫队，才派出二十多个人前来保护我。那一夜我穿着衬衣，在院子里站了一个多钟头，因头中风得了神经疼痛，医治了三年才用好药治好。八路军完成袭扰的任务，据说停留了不大功夫，即撤出城外。第二日单是“蒙古军”的第二师和直属部队，就报销了一万发子弹；连同日军和伪军，消耗弹药达两万多发以上。日、伪受了这次教训，开始建立了到口子外边巡逻会哨的制度，并且晚上值宿的军官，认真地查起了岗哨。

“蒙古军”的炮兵大队，驻扎在距离总司令部不远的明顺召内。那里佛像全毁，抗战以前就驻扎傅作义的炮兵。我们来到以后，因为看到四面是荒野和河滩，便修起钢筋水泥碉堡，并在四周围起好几层铁丝网。炮兵大队长郭勒明色，有一天到总司令部向我报告，说他那里新补进一个伙伙，非常勤劳俭省，饭做得特别好吃，士兵们全都喜欢他。这个人带着一个老伴儿，住在大队不远菜园的小土房里边，天一亮就来上班，不往家里偷米盗盐，我感觉这个人很有问题，除了八路军和共产党员，那里有这么好的人，故向您请示该如何处理。我对这没有加以注意，认为是扯淡的小事，把他呛白了一顿。郭勒明色碰了我的钉子，对这

个人仍不放心，回去便将那个伙伙开革。可是，这个人和他的老伴住在炮兵大队附近的土房里边没走，隔了一个多月，又被兵们瞒着他叫了回去。

出事这天的晚上，有一个排长带着一个兵，到营盘外边去查哨，走到西面有小树的地方，排长猛不防被人拦腰抱住。他拔出战刀抵抗，反被那人将战刀夺去将他砍死，那个兵一看不妙便开了枪，把营盘里的人全惊动起来。守门的哨兵正在惶恐期间，突然看见那个新补的伙伙从里边跑了出来，向哨兵说：“叫你去看看西面出了什么事，让我替你站岗。”就说就往手里边拽枪。这个哨兵相当乖觉，抱住枪不敢松手，两个人便扭成一团。这时从南面摸上来好几个人，向站岗兵打了一枪没有打中，他装死躺下，那个伙伙带着枪走了。站岗兵说出了经过的情形，其余的兵把伙伙住的土房围住，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内中空无所有。据附近种菜的老乡们说，伙伙的老伴，于出事那夜的白天，便带着行李、碗盆离开土房，有人见她从乌素图沟上了大青山。

“蒙古军”的各师各团，遇到上述的那些惊险离奇的事，可以说层出不穷。八路军真把我们搅得日夜不安，无法防范应付，老处于被动状态。大同的日本厚宫师团长，有一次在张家口对我说：“皇军一出动，就踩着地雷，把老乡的牛赶了上去，却不爆炸。共产党真有办法，准是叫庄稼人给埋的。现在到了乡下，已经分不清谁是八路军，谁是农民。”我问他：“你们实行三光政策就是为了这个吗？”他说：“对。”我说：“你们越三光，越要把庄稼人逼成共产党。”他说：“我们也知道。可是，那该如何办呢？”我说：“你们不是有飞机、大炮、坦克吗？多配备上就可以把八路军吓跑。”他说：“他不跟你摆开阵势打，找不见人轰谁炸谁呢？”我怕他试探我的思想，没敢再跟他闲抬杠。由此说明不仅我对八路军甘拜下风，叫部下尽量退避三舍，不要寻事惹麻烦；连日本的高级指挥官，对八路军亦束手无策，伤透了脑筋。

蒙古军腐化堕落的情况

“蒙古军”的成分非常复杂。除了后来由锡盟和察哈尔补充了不到两千蒙古奴才与牧民，最早可以说是由热河境内汉族的胡匪、民团、“毅军”和蒙古的马贼、“小队”，“合杆”聚集起来的一锅“大杂烩”。军官多是地主牧主出身，士兵也尽是汉人和蒙古人里边的兵痞土匪，所以军官特别贪婪，非常野蛮。他们全都不愿降低或放弃从前那种吃喝玩乐的生活，并怀着升官发财的目的，跟上我这个穷凶极恶的战争罪犯，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因此“蒙古军”的纪律，只是稍好于哲布尊丹巴和巴布札布的“蒙匪”。至于素质和战斗力，连张作霖率领的“奉军”都不如。他们在察绥两省盘踞了十二年，给蒙汉人民带来历史上少有的灾难。由于里边汉人居多，以及受到日本一定的约束，没有造成民族仇杀，不敢公开的去奸淫抢劫，而所干的其它坏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我因没有特务组织，常受部下欺骗蒙蔽，并且假装糊涂，好多事情不能认真查究，故这篇资料中所谈的，仅是自己耳闻目睹的一些现象，不是“蒙古军”腐化堕落的全貌，和“蒙古军”的全部罪状。

关于“蒙古军”的腐化堕落情况，应当先从热河境内的胡匪、民团、毅军、马贼、小队以及“察东警备军”谈起，因为“蒙古军”主要是由这些杂牌部队演变而成。在热河，胡匪、民团、毅军、马贼和小队互相转化，并且彼此勾连，以致官兵、匪贼、团队不分，只能以驻防于城市集镇，据守于窝铺烧锅和活动于山野草泽来区别。胡匪与马贼尚有一定规矩，否则就无法存在。民团多有家口，亦不好意思欺压乡里；可是胡匪、马贼和民团一旦穿上号褂（军服），变成官兵或小队以后，那就到处横行，比匪贼、民团还坏。这五种不同类型的部队，在热河都有各自的势力范围，按照

胡匪的黑话来说，叫做“圈儿”，于是在大军阀统治底下的大地盘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地盘。特别是官兵的防区以内，更是各自为政，可以委任县长，截留税款。民国以来的历任都统和最后的省政府主席汤玉麟，都没有把各种四分五裂的封建局面打乱而统一起来。因此，在小朝廷之下还有不少土皇帝。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后，他们害怕被日本人各个击破和分别兼并，多跑到林西跟我“贴杆”（合伙）。我把好些“小杆”合成一伙“大杆”，由一千多人的崔兴武东北军骑兵十七旅，扩充成八千人的“察东警备军”，最后编为“蒙古军”的三个“汉师”。至于“蒙古军”的六个“蒙师”，其中从热河来的四、五、六师和“汉师”性质相同，在察北成立的七、八、九师则近乎“蒙匪”，七师后来把绥东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隆的保安队编到里边，成分亦和热河来的三个“汉师”与三个“蒙师”大同小异。因此“蒙古军”既不是军阀的武装，也不是王公的武装，更不同于日寇卵翼下的其他伪军。我和德王以及日本“驻蒙军”军部无法整顿，只好听任它烂了下去，让蒙汉人民跟着遭殃。

拿“汉师”来说，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刚编为“察东警备军”的时候，因为大夥儿命运相同，除了给日本人硬打外，再没有其他出路，尚能同舟共济，比较团结，所以先从多伦赶走刘桂堂的悍匪，以后又在多伦战败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并且能在多伦城外的善丹河沿岸掘土野营，过了二十多天喝被面糊糊的艰苦生活。可是把多伦占领以后，他们便出开了“洋相”，主要的表现是第二师师长尹宝山不听我指挥。因为尹宝山在我当兵时，他是担任了毅军的管带，到了“东北军”骑兵十七旅时代，他和我都给崔兴武担任团长，投敌以后我成了司令官，他很不服气。在二次进攻多伦时，他不和刘继广的第一师配合行动。在二次占领多伦以后，日本“关东军”给“察东警备军”装备了一千多枝新枪，我怕剔退下的旧枪，放在街上被日本人收走，完全隐藏到第二师驻扎的庙仓里边，以备再往大扩充队伍，不料被尹宝山私

自卖掉大半。“察东警备军”在多伦盘踞了将近三年，到一九三六年的元旦，始进入张北。由于多伦附近是沙漠草原，察北其它县分的大地主，这时都躲进天主教堂里边，可以说没有油水可榨。并且日本人给我们开发的薪饷，都是交通银行钞票，士兵的生活不低于投敌以前。因此除了上述尹宝山私卖武器，以及我用枪械向多伦庙会的喇嘛换了好几件珍贵文物，运到长春送了日本关东军的菱刈大将和小矶参谋长而外，还没有发生其它的重大毛病。

尹宝山外号“尹大马棒”，动不动就打兵骂官，团长们对他很有意见。在改编“蒙古军”时，我把刘继广所带的陈锦春、朱恩武与朱子文率领的围场县民团和收抚的刘桂堂的井得泉团，让尹宝山去带；而将尹带的“毅军”旧部，让刘继广去带，番号仍是刘为第一师和尹为第二师，另将刘尹两师里边胡匪的“杆子”拨出，编成王振华的第三师。这样我的三个“汉师”，就分成了“毅军”、民团和胡匪三种类型。因此“蒙古军”以后以第一师的名誉最好和战斗力最强，成了我的基干部队。尹宝山担任了蒙古军的第二师师长后，仍跟我继续捣蛋，在商都作战前，就和马占山与门炳岳勾通，在他的师部里边，曾窝藏过马占山的二十多个谍报人员，因疏于戒备，受到门炳岳和董其武的猝然包围袭击，如不是我带着第一师和第五师前去解围，几乎全师被歼。他从商都撤往张北时，还如获至宝地用轿车载着门炳岳的一个联络参谋。经我说他：你有本事可以直接去找蒋介石，弄这个崽子干嘛？叫日本人发现，不是给大家都惹麻烦！他才在途中，把那个人打发回去。配合东条师团进攻张家口时，他又以张北南边的坝上没有草料为借口，没得到我的命令，自动把队伍撤到张北。加之他将井得泉和朱子文逼得投降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我无法对他遮护迁就，终于被最高顾问田中玖把他撤掉。后经德王委为伪德化市的副市长，扔到嘉卜寺去留守。

我从热河进犯察北时，除了我随军带着大小老婆，其他军官的眷属，都集中在林西城内。占领多伦后，全迁移到多伦附近。

一九三六年改编为“蒙古军”，因为三个“蒙师”刚刚成立，并且眼看快要打仗，故都没携带家口，可是“汉师”的眷属，就达到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军官们临时姘度的在内，差不多排长以上的军官全有太太。我感到这是军队最大的拖累。为了准备反正，便把他们集中到多伦附近那个有教堂的榆树沟，并派一个很坚强的团去保护。加上每家眷属都有一个至两个勤务兵跟随，这样是把七八百战斗力量抽走。同时每户平均有一辆三骡轿车，口粮和马干的消耗和两个团差不多。他们住在多伦和榆树沟，由于害怕日本人和西洋传教士，当然是公买公卖，不敢怎样祸害地方。可是队伍进入绥远，这些家眷从多伦到张家口途中，据说把路过的村庄骚扰得非常厉害。以后分散在各个防区和绥包两地的街道上，更成了警察不敢管理的母老虎。当时老百姓对“蒙古军”的太太，都侧目而视。“蒙古军”于一九三七年秋天到一九三九年冬天的全盛时期，官兵不到两万人，眷属发展到一千多家，都过着荒淫腐化的生活，把军官尽逼的喝兵血和贩烟土，将子弟们也弄成流氓恶少。从我的儿子到连长们的儿子，全成了游手好闲、不愿念书的花花公子哥儿。

“蒙古军”由察北分两路，进犯绥包时，山前是我指挥的六个师，山后是德王指挥的三个师，山前的约一万四千人，山后的不足三千人。我因德王的三个师，是由王爷总管和学生率领，恐怕他们在路上吃亏，把我豢养的三百多蒙古马贼，组织了一个别动队，由巴布扎布的旧部胡宝山率领，借给德王调遣，充任了开路先锋。我带的人只在旗下营车站附近打了一仗，便到达归绥以东五十多里的陶卜齐。等了三、四天没有进城，除了因为不敢和日本的酒井师团抢功，主要是知道这些人贼性难改，恐怕入城以后抢掠，给我丢人现眼。好在这次是胜利进军，我的人还没惹出乱子，可是仅仅是人吃马喂，便使沿途的村庄遭了重大兵灾。据说我的军队打尖宿营的地方，都是马料遍地，鸡毛乱飞，一片狼藉。德王带的那三个师，因为胡宝山的马贼，洗劫了武川三眼井的教堂，给他们做出了榜样，除了保护德王的人还遵守纪律，其余虽没随便杀害汉人，但

是强奸蒙汉妇女的很多。整个情况是“汉师”跟在日本人后边狐假虎威，“蒙师”以征服者自居，老百姓对于他们都以二日本人看待。因为吃不住那种藤条皮鞭的下马威，和“妈拉巴子”的咋唬，以及宰猪杀羊，索要鸦片，甚至强奸妇女，汉族人听见“蒙古军”出动，由村社雇佣的顶命鬼给支应差事；蒙古人听见“蒙古军”过来，留下老姑子接待他们。如果逃跑一空，他们找不到吃喝，那就要用门窗生火，进行报复性的破坏。自从八路军在大青山建立了根据地，“蒙古军”的士兵才不敢三三两两地到乡下滋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得到了一点保障。

德王恐怕“蒙师”入城以后腐化，主张“汉师”驻防市县，蒙师驻防盟旗，不往一块混搅。我因掌握“汉师”，对此很表赞同。所以把“汉师”放到铁路沿线，将“蒙师”都搁到边缘。这样“汉师”的三个师部，分设于包头、归绥、集宁，团部分设于土默特旗境内各县和绥东的丰镇、凉城。他们驻定不久，便故态复萌，把热河的那一套完全搬到绥远。“蒙师”因为分散在东起乌珠穆沁西至百灵庙这一条线上，形成山高皇帝远的样子，并且不和日本兵在一块驻扎，越发成了拥兵独立的状态。“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蒙师”由六个师合并为四个师，防区很少变更，于是热河时的那种小的割据局面也在绥远出现。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比起中国的封建军阀，控制比较严密，他们在各自的圈儿里边，还不敢象在热河时候那样为所欲为。总的来说，因为我上梁不正，影响到下梁全歪，军官都是层层大吃空额，偷卖武器弹药，跟地主伙种鸦片或向村社征收鸦片，包庇商人走私或自己走私。因此大官发了大财，小官发了小财，大官在北平买了房子，小官在绥包买了房子，几乎都染上鸦片嗜好，娶上了姨太太。被社会上的应酬和家庭中的纠纷，弄得神志萎靡，昼夜颠倒，没有心思整饬纪律，缺乏精力训练部队。把兵打发出去号草买料，骚扰讹诈良善人民，他们则钻在围堡里边吞云吐雾，到了城镇地方狂嫖滥赌。自从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以后，战斗力一天比一天衰弱，跟上日本兵出去扫荡，由于

有人给壮胆还能打几下；单独一个连出去，也只能勉强对付傅作义的游杂部队，要是遇见八路军，很难完全走脱。不过具体情况，“蒙师”和“汉师”有别，应当分开叙述，不能一概而论。

“汉师”的三个师部，分设在包头、归绥和集宁。这几个地方的日伪的军政单位很多，“蒙古军”很受约束和限制。师长们的主要表现是：刘继广从事政治活动，陈景春倒弄买卖，王振华跟团长们进行勒索。刘继广是毅军旧部，给崔兴武任过副官和团长，他带着第一师驻到包头，被当地的冀鲁籍商人——包头电灯、面粉公司经理赵冠一等包围，怂恿他出来兼任伪包头市的市长，他们可以托庇保护。刘也依靠他们像我在归绥那样，倒贩烟土布匹。因为他有这一经济来源，在包头拒受贿赂，不克扣兵饷，担任了两年多伪市长，还落了个清官的称誉，临走时商界给他送过万民旗伞。由于德王想把我的第一师搞垮，叫刘继广正式担任伪包头市长，刘因为舍不得离开这个水旱码头，便把师长让给了丁其昌，从此转入仕途，由伪包头市长而升了伪蒙政府的最高检察厅长和伪大同与宣化两省的省长。继任第一师的师长丁其昌和郭秀珠都是我的心腹。丁接任不久即被德王调到伪蒙政府担任治安部长，郭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以后仍在包头驻防，到日本快投降的时候，才开到宣化附近对抗赤城、龙关一带的八路军。他们两个人系行伍出身。丁是崔兴武收降的刘山胜部下，郭在热河时给我担任连长，所以他们在热河时就不懂邪门歪道，来到包头还由我给津贴花费，因而把第一师的名誉保持得较好，老百姓对这个师的印象不太恶劣。

第二师从察北向绥远窜犯的时候，即把师长更换为陈景春。陈原来是围场县的大地主，和姚景川有亲戚关系，先是带着民团参加了“国民军”，后来才参加了“奉军”。他外号“土豆”，可是心眼很多，并且社会关系复杂。我因为他不太可靠，便让他的师部设在归绥，以便对他就近监督。陈景春在归绥驻防期间，除了贩运烟土，还通过天主教的中国神甫白祥，同后套的傅作义与姚景川勾扯，曾卖给天主堂六万发子弹，怕我进行追

究，送了我一个法国制的短波收音机。他的家底本来就厚，担任了师长越发钱多了，在北平买了十几处房子，还娶了个三太太。此人非常吝啬，因为舍不得给日本人送礼，顾问、教官常刁难他。他看着呆不下去，便把师长让给团长朱恩武，向德王弄了一个伪蒙政府的参议，到北平做了寓公。这时尹宝山也在北平寓居，他们不甘寂寞，和国民党好几方面的特工人员来往，致被日本宪兵扣到张家口管押审讯。经我花钱托人，才把他们营救出狱。尹宝山跑到了其昌家中吃了一顿干饼，将胃部撑坏，送至北平的德国医院治疗，得知三太太于他被捕期间，把林西窝铺和烧锅的财产都倒贴了所恋的情夫，因生气崩裂肚肠而死。陈景春出狱后在北平当小商小贩，每天从前门外贩一人力车面粉，到东城什锦花园一带出售，赚下的钱除了他能吃一顿饺子王的饺子，还能买回全家的小米窝头。家里的人过不下这种艰苦生活，三太太跑到外边搭捞嫖客，两个扎吗啡针的儿子偷他的东西，家务事搞成一塌糊涂。北平解放以后，他和朱恩武畏罪跑到南方，我和他们在上海见了一面，以后即不知下落。

第三师师长王振华，原任崔兴武东北军骑兵十七旅的少校参谋。在那种队伍里边，干副差事的人根本捞不到什么，所以王在热河时期非常勤苦。可是我把他逐步提升为师长后，便渐渐走向腐化堕落。第三师师部设在集宁，当地不是繁华的商业城市，环境引诱不太厉害。加之他是讲武堂毕业，我叫他担任师长是为了搞好部队，他也不好意思胡作非为。无奈他娶了一个小老婆，还带来一个小姨子，姐妹两个把裁缝叫到公馆里边，不停息地缝制新衣；他的父母和儿子，听见他升了师长，也从辽宁老家跑来，要当老太爷和大少爷。他因为既不敢贪污，也不会经商，只好拿上给父亲过寿与给儿子结婚，让底下的团长、连长进贡，叫集宁的商人送礼，弄得被部下小瞧，街面上对他也议论纷纷。他的团长慕新亚就是由于他勒索过甚，于一九三八年夏天把队伍带到马占山那里。经我给维持未被“驻蒙军”军部追究，但在部队中丧失了威信，干到

一九三九年冬天，因跟跑到后套的蒋金安（曾任伪开鲁县长）通信，被撤去职务。我叫他到我张家口的家中住闲，以便再给他安排其它工作，让丁其昌劝他不要心灰意懒，家里的生活由我给担负。这样他越发感到对不起我。并且听说他家里的大太太行为不好，因为他在外边娶了小老婆，竟和他父亲乱搞起男女关系；于是写下三封遗书，一封骂日本人，一封骂他父亲，一封向我告别，趁人不注意，用手枪自杀于我客室里边。他死在半夜，我打发人找不见他的儿子，原来这个小家伙正在妓院中宿娼，第二天下午才跑来收尸。

“汉师”的师长们是以上所述的那种样子。团长们因多在外县驻防，离日本驻军和我很远，更是肆无忌惮，胡作非为。连日本人和德王委任的县长，也不敢得罪他们，恐怕把他们逼到抗战部队那边，临走时将自己杀害。所以他们和地主伙种鸦片，“土业组合”不敢收购，他们包庇商人走私，伪警察不敢检查。当班长的都有姘头，士兵吸食鸦片的骤增。凉城和清水河城里，有两个士绅人家的女子是师范毕业生，在学校中教书，被慕新亚和安恩达先后用武力强娶去做妾。蒙古军初到绥远的时候，“汉师”每一个团有六百多战斗兵，以后每团剩下三四百人，并且战斗力衰退，没有了在察北时的那种劲头，老兵都退伍做了小买卖。门树槐有一次在绥南和乌占山的军队作战，由于警戒疏忽，被敌人摸营活捉而去，带过黄河送到府谷的哈拉寨，受了一个阶段的优待，放回做策反工作。我仍叫他担任团长，因为我知道连长们都舍不得离开蒙疆，不肯跟上他过河去啃小米。“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后，共分三个集团，以大队为单位，大队长们都不听集团长的话，跟我更成了藕断丝连的关系。部队的军纪和官兵的作风，完全堕落到伪警察的那种样子。留在绥远的几个大队，以后归还蒙古军建制和改编为国民党的十路军，他们于日本投降和解放战争初期，是在立功赎罪的情况之下，才参加傅作义部在归绥和包头打了两次硬仗。

关于“蒙师”的腐化堕落情况：我带的那三个师，来到绥远一年多，即把兵抽回热河，并且除了四师驻在包头黄河南岸，五师

和六师是在四子王旗与察北驻防，故没有糟糕到“汉师”那种地步，以后四师和六师合并，跟五师都驻到锡盟和察哈尔部各旗，由德王给补充了锡盟的新兵，我对他们不加过问，对他们的军纪风纪不太了解。只知韩凤楼和脑门达赉这两个师长，因为在草地横行霸道，和锡盟伪盟长松津旺楚克摩擦很深。松王向我说过他们的坏话。几个团长弄下钱，都到张家口挥霍。有一个汉名叫郭景春的团长，由于赌博把军饷输干，还在张家口的花园旅馆，把锡盟某旗王爷的房间撬开，偷过人家刚领下的皮毛牲畜价款。第七师来到绥远后，即把番号给了正黄旗总管达密凌苏隆，原先穆克登宝所带的兵，都拨给八、九两师里边。达密凌苏隆是绥东的坐地虎，和当地的许多大地主磕头结拜，跟民团土匪都有连络，石玉山便是他的干儿。他的兵平日都回家务农，到了有事时才往起召集。他领着蒙古军两千多人的饷，实际能号召起五六千人。在第七师的防区以内，蒙汉如同一家人，国民党的杂牌部队为了托庇保护，都不敢破达密凌苏隆的圈儿，因而日军不去扫荡，伪警察也不敢进去敲诈勒索。达密凌苏隆为了永远保持他在正黄旗的统治地位，除了吃喝军饷，不像“蒙古军”的“汉师”及其它“蒙师”那样纵兵殃民，老百姓比较能够安居乐业。他不敢把事情做绝。五原战役后，即把他的儿子打发到后套，住了傅作义的干部训练班。达密凌苏隆一直保持着耗子不离墙根和兔儿不吃窝边草的原则，很会应付环境，所以他的防区太平无事，农牧业没有受到很大的摧残破坏。

第八师在师长扎青扎布未死前，一直在武川县驻防。包海明的第九师，长期据守着百灵庙。第八师向武川各村征要鸦片，九师向绥远到新疆的商人收税，扎青扎布和包海明以及他们的团长，经常来归绥在乌古廷家中聚赌。乌收他们的“头儿钱”，并且借上他们的款项，作为他六弟乌老四做投机倒把的资本，从绥远往北平贩运鸦片。扎青扎布因经常和八路军与鄂友三的人打仗，还不敢怎样脱离部队。包海明由于百灵庙附近无事，三月两月地住在归绥不返防地。八、九两师的兵也是由锡盟和察哈尔部征来，

他们在家里都是过着每天一把炒米和两碗荞面糊糊的悲惨生活，初入伍时全似些饿殍，连一个钟头的出操时间都支撑不下去；可是用白面和羊肉养壮以后，便在那种部队里边，把兵痞和马贼的各种坏毛病，全沾染在身上，由柔软的绵羊，变成凶恶的狼狗。遇见蒙汉老乡，都要起王爷和旗官手下的那些豪奴恶仆的威风，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背着军官还强奸妇女。因此除了染上鸦片烟瘾，并患有花柳性病，军风纪比热河来的蒙古兵还要坏的令人发指。乌力吉敖喜尔接第九师师长时，这个师已被包海明带的剩下五、六百人。他到了百灵庙，看见士兵都卧床不起，打来电话问我怎么办？日本顾问要按时疫处理，我给配了六包烟土的戒烟药丸，弄去好几箱德国狮牌“六〇六”药针，很快就把他们的病给治好，大部离开了病床。傅作义不知“蒙古军”的底细，要是知道的话，只派一个团，就可以把这个师解决。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直属部队，以炮兵大队的纪律较好，通讯队和警卫队都分驻在商号的店院里边，把商人骚扰得敢怒而不敢言。宪兵队受日本特务机关的领导，它和日本宪兵队，是当时归绥的两座阎王殿，官兵都因捕人、押人和打人而发了大财。至于总司令部的官佐，汉族处长都是毅军和东北军里边的老幕僚，他们胆小怕事，相当循规蹈矩。例如军械处长纪树勋，从毅军时就经管了械弹，可以说几十年来没敢卖过一枪一弹，所以后来德王慕名把他调到伪蒙疆银行，照管了张家口的金库。他的老婆染上鸦片嗜好，有一次到北平探亲，在小脚里边裹了几个过瘾的烟泡，都被西直门的女警察抖开裹脚条子搜出。我的师团连长们在火车上运毒，都是一手拿着护照，一手持着叫起机头的手枪，铁路警察不敢盘查，日本宪兵在火车上遇见他们，也不敢得罪。纪树勋因为没这种气势和其它门路，才让老婆给丢丑。蒙古官佐就不像纪树勋那样窝囊，都是见钱就抓，领了日本顾问的机密费，也敢领马汉三的军统特务津贴。副官处长张启祥在他家里聚赌，怕日本宪兵队前去干扰，竟异想天开，跑到我的外院设开了赌局，把归绥的大商人叫

去赌博，因为分配“头儿钱”发生冲突，和我的几个贴身副官吵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才知道他们搞此勾当。

我的亲信爪牙，除了十几个不离左右的随从副官和卫士，还有一个警卫队，以及不列入编制的三百多蒙古“马贼”。这三百多“马贼”进入归绥后，我完全把他们介绍到当地和外县的“俱乐部”里边去鬼混。由于他们在里边吃好汉股子，一切地痞流氓都不敢去捣乱。我的兵换上便衣进里边赌钱，亦不好意思跌皮耍赖，因此“俱乐部”的秩序得以维持，而不少良民子弟却跟着破了产。由于人们赌尽输光，逼得上吊、跳井的很多。我因他们的名声太坏，先把他们的头领胡宝山打发到察北的宝昌县，叫他远离我赌博，不久胡病死于宝昌。其余的人在日本扫荡山东抗日根据地时，“驻蒙军”军部让“蒙古军”派遣骑兵前往，我就把他们交给宝仲山连长率领，开到山东去执行“三光政策”，后来被八路军打死，一个也没有跑回归绥。我的警卫队在城里不敢讹诈，却跑到近郊的乡下随便勒索。从包头返回归绥不久，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有三个兵跑到茂林太村要猪，引起当地老乡的愤恨，把他们灌醉解除武装，全扔到大黑河的冰窟里边。天暖发现尸首，警卫队长张国治把茂林太村包围，将该村村长和地主都扣回归绥。我为了收买民心，没有加以深究，拿出三千元给了死者的家属，让伪厚和市市长贺秉温把扣捕的人领走。不料到了一九四五年春天，宝贵廷担任了参谋长，把警卫队扩充成警卫团，让我的侄儿李景阳担任了团长，乘我离开归绥到了张家口，他们两个把旧事重提，又将茂林太的村长、地主扣起，全村摊款才赎保开释。不知宝贵廷弄了人家多少钱，我的侄儿向我承认弄了人家三条黄金，气得我骂他：老子祸害绥远八年，只买了这一点点人心，也被你们给卖了！

我是怎样掌握“蒙古军”的

我是兵痞和胡匪出身。小时在家里仅念过三个季度的冬书，投敌前，一直在热河北部鬼混。打起仗来不像旁人那样贪生怕死，在战术上比较灵活一些。还舍得花钱，用吃喝玩乐交朋友，能够和社会的中下层接近，受到他们的拥戴。不懂得什么政治策略，更不知道历史和时事。由于长期在昭乌达盟驻防，局限在一隅之地，孤陋寡闻，见识很少。我跟过的长官张连同和崔兴武，都是偏僻地区的小军阀，只有一个旅的局面，我的师傅亦不高明，全是些刚愎自用的土皇帝。我更不接近文人，跟前没有好的幕僚，缺少替我出主意想办法的谋士。多少年来，只能用旧的一些社会经验来应事处人，处处感到黔驴技穷。我虽是一个蒙古人，但生长于农业地区，受汉族封建思想和伦理观念的影响，不能大刀阔斧地去蛮干。加之我飞跃得太快，在三、四年之内，就由一个骑兵团长，升任率领了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并未具备应有的条件，很不成熟。尤其是“蒙古军”这个部队，还有日本人和德王的人参加在里边。他们压在我的头上，搁在我的身边，使我处处束手束脚。到察北的时候，我处处用兵比较顺利。进入绥远后，就跟不上形势变化的发展了。我只能用“毅军”和“东北军”的军阀办法来治军和带兵。以我在赤峰、开鲁等地跟商人们学得那些市侩手段，去应付环境。

在“蒙古军”刚到绥远的全盛时期，九个骑兵师和一个炮兵大队，有将近两万余人。除了包海明第九师的六、七百人，其余我能直接掌握一万五千多人，能团结四千多人。那时，我任“察东警备军”司令官时的参谋长陈宝泉，已在进攻沽源期间作战阵亡。乌古廷虽是“蒙古军”的参谋长，但他代表德王监师。副参谋长刘星寒是我朋友刘子布的儿子，又系我的第五师副

师长李鸣运的女婿，固然是我的一个心腹，可是他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久，社会阅历很浅，见识和想法非常幼稚。对于怎样掌握“蒙古军”这支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我只好一个人躺在鸦片灯前反复考虑，经过分析各方面的情况，琢磨出：“依靠汉人，收买日人，敷衍蒙古人，到了适当时机再找主人”的策略。紧握枪杆，鱼不失水，保存实力，以此作为争夺地盘的政治资本。我的想法，由于“小鬼盘算，阎王听见”，被日本人和德王阻挠破坏，都没有完全办到，结果是事与愿违。上述的策略，是我掌握“蒙古军”始终没有变更的原则。

我在伪蒙政权和德王最大的区别是，他代表蒙古王公、贵族、封建反动上层；我代表蒙汉杂居地区的地主与中小官僚以及下层的流氓无产阶级。“蒙古军”中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都是由这些人组成。我不象德王，把民族界限划分得那样清，所以，我带的汉人不把我当成蒙古人；我带的蒙古人，也被德王一派认为是汉人。达密凌苏隆的第七师，也是这种情况。他的军队里边除了正黄旗的蒙古“小队”，还包括丰镇、集宁县的汉族民团，以及收编的土匪。所以第七师比包海明、韩凤楼和璦门达费几个“东蒙”新知识分子用“察蒙”牧民、奴才组成的五、六、九师，倾向接近我。我胸无点墨，仅是一勇之夫，竟能和德王并驾齐驱，除了得到上面所述的那些汉人的支持，也是由所谓的“汉蒙古”捧起来的。另外，我对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知识分子比较轻视，认为他们不会带兵打仗，愿意用那些在军队中闯荡出来的人。“蒙古军”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因为他没有住过新式学校，我也把他视为依靠的对象。

“蒙古军”的蒙汉官兵，绝大多数是热河人和临近热河的哲里木盟科尔沁部人，连倾向德王的那一派军官学校培养出的军官，也是来自这一地区。除了士兵外，大多数军官不是地主阶级，就是出身于兵痞、胡匪和马贼的人，当官以后差不多都购买了土地。他们跟上我投敌，就是为了保护各自的财产，不愿失掉提到手中的

枪棒；日寇所以敢装备他们，也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已被伪满统治，不致于走到抗战的道路上去。由于“蒙古军”不是王爷驱使奴才的牧主军队，而是蒙汉地主的武装。它从“毅军”的“热河游击马队”开始，中间经过“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胡匪的“合杆”组织形式一直存在，军官都有独立性，因而有的排比连的人还多。如果笼络不好，随时随地都可能哗变。“蒙古军”除了德王用征兵办法组成的八、九两师，其它七个师都是这种性质。连日本人也承认这些特点，一直把我视为“大杆”的首领，通过我这个拉过“杆子”的人，去掌握各个“小杆”。所以我不能整军经武，叫部下“艰苦奋斗”，只能用率领胡匪的规矩带兵，让他们朝着流寇的方向发展下去。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六日，我跟在日本的酒井师团后边到达包头。有一天，酒井叫我陪他去看黄河，他望着河南岸的鄂尔多斯沙梁发了愁，自言自语地说：“中国的土地这么大，过了宁夏、甘肃，还有青海，西藏，追到什么地方为止？”我回头一瞧包头这个水旱码头，心里嘀咕：“由此往西尽是荒凉地区，带上队伍去投蒋介石，谁肯跟我去吃苦受罪呢？不如叫他们暂时在大青山前后安家落户吧！”于是我首先对自己的军队，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既不打算反正，也不进行整顿。按照“蒙古军”的编制，每师是三个团，每团是四个骑兵连和一个重机枪迫击炮连，每连三排，一百二十多人。德王想叫五、六两师多余的人，去补八、九两师的缺额。我说：“谁多少就算多少，只要你能说服了达密凌苏隆，我就能让伊恒额往出拨人。”他不吭声了。日本顾问亦叫日本教官加强训练，我说：“你们要是三操两讲堂地把兵逼出乱子，我可不负责任！”他们也就作罢了。这样，官兵皆大欢喜，因为与其当汉奸受限制，哪如参加抗战。所以他们的想法全是办不到的事情。

我以前能把官兵带住，和在热河的中下层社会有相当的号召力量，主要是由于既不贪财又不怕死，才把好多知识不高的胡匪和马贼网住。根据我为匪当兵的经验阅历，发现明火执仗地去进行抢

劫，或是吃喝士兵与勒索人民是最笨拙的升官发财办法，因而我从担任了连长开始，便以武装走私来养活部下，从不接受贡品，而常给他们赏赐。因此他们就把我当成首领，拥护我。加之，我能替他们“抗茬”，还能给他们寻找出路，这样我越发有了吸引力，像滚雪球那样滚了下去。同时我和城市的商人和乡下的地主来往，从不以势欺人，非常讲交情信用，完全按买卖规矩办事，我保护他们，他们也为我服务。因此，我除了能够买住军心，也能买住“民心”。这样互相利用，相辅相成，我不仅官运亨通，财源也茂盛起来。来到绥远以后，我更把这一套“发扬光大”，用手上“倘来之物”，四面八方地买好。故我在“蒙古军”中，虽由最初的一手包办，变成中期和德王平分秋色，但是到了最后阶段，即使我没有了直接掌握的军队，仍能跟日寇和德王似乎鼎足而立。

“蒙古军”在“蒙疆银行”的钞票没有贬值前，每年据说有八百万元军费开支。我只是每年领取给总司令规定的两万元“特别费”，每月应领两千元薪饷，我实际只领取一千二百元，剩下的八百元津贴了最高顾问和参谋长。其余都交给顾问部去处理，我从不过问。以此讨日本人的欢喜，让部下认为我一尘不染，叫他们和日本人在钱的问题上，去经常发生矛盾。至于我的经济来源，是依靠从绥远运往平津走私烟土，并且瞒过伪蒙的人，在平津两地大搞黄金交易。我所以能够这样做，就是利用职权掩护、包庇以及跟商人结交朋友，由他们替我通风报信与买进卖出。我在热河时就从事此种勾当，因而我是这一种行道上的老手、内行，况且带着两万多军队，谁也不敢哄我和骗我。我初在归绥贩运烟土，是和绥远的大(烟)土商贺秉温和东北的大土商张玉轩等搭股。他们给我在平津吹嘘宣传，以后凡是西口的大宗货，那里的商人都认为是我的，因而空口说一句话，也能把百二八十条黄金调来。过去我弄到的钱，大部和朋友兄弟吃干花净，在归绥弄下的钱，除了在北平买了好几十处房产，全给“蒙古军”花了，所以我的总司令能够坐稳。

我在归绥和张家口设有两处公馆，并在归绥的剪子巷给高级军官设立了一个俱乐部。这三处地方因为天天排宴和夜夜摆席，以及经常点着四五盏烟灯，准备着上好的香烟、鲜果，遇到吝啬的来客，连赌资和叫姑娘的钱我也垫付。因而把伪蒙政府的重要人员和一部分当权的日本人，也都被我引诱到家中或俱乐部里滥赌狂嫖。他们酒醉饭饱，特别是在妓女面前得意忘形之际，什么话也能说出，甚至把重要消息泄露出来。我跟他们不仅加深了友谊，而且也收听了情报。不过我设立俱乐部的用意，主要还是联络我的部下，因为我避嫌不能到底下去看他们，并且总司令部和我的家中都有特务，我就用此种方法和他们见面碰头，趁着旁人吞云吐雾，聚精会神打牌，和被妓女弄得神魂颠倒的时候，我们谈了我们自己的事。“蒙古军”的军官很受日本顾问、教官的压迫，投敌以后情绪非常苦闷。我设立俱乐部还有一个不能告人的目的，便是让他们来此消愁解闷，能跟我鬼混下去。如果他们有了国家民族的思想，我便不能依靠他们给我充当爪牙和羽翼了。

我的部下不仅到了张家口和归绥吃我喝我，有时还大量的花我的钱。遇到他们有了困难的时候，我一察颜观色，用不着他们吞吞吐吐地说话，便主动解囊相助。尹宝山和陈景春调到伪参议府后，因为仍跟国民党各方面派来的特务乱拉关系，在北平住家期间被日本宪兵扣回张家口，是我花了十几万块钱，上下打点（行贿）才把他们先后释放。武钧玉的电台暴露后，把接了蒋介石委任的第一师团长邢德胜吓跑回山东老家，由于在那里生活无着，又跑来包头被扣，我替这个团长往出买命，也花了四、五万元。我为了往出搭救他们，曾以“蒙古军”总司令的大将身份，和特务机关与宪兵队翻译以及看守所的日本中士班长，低声下气地说过软话。刘继广和丁其昌以后的第一师师长郭秀珠，看到我能处处为他们着想，不仅把德王勾引他们接受蒋介石委任的秘密，向我完全坦白，并且在改编“治安警备队”时，为了对我效忠，还把集团长让给郭光举担任，又回他原来的那个团担任了大队长。

我不仅给部下花憨钱，替他们说软话，到了紧要关头，也能为他们像胡匪那样耍光棍。德王用“军统”瓦解我的嫡系部队，是背过我偷偷干的。他曾先叫马汉三到李树声家中，跟我见过一面。我对马说：“你搞你的，我干我的，咱们先交一个互不侵犯的朋友，日久再见人心。”德和马汉三见我不肯上钩，便给我的师长、团长都发了委任状，总司令部的好几个科长也领取了他们的津贴。武钧玉被捕的当天，小仓最高顾问就找我。我说：“家奴有过，罪在主人。你们不能扣他，应当办我。”他说：“我主不了军部的事，咱们去见冈部司令官。”我去张家口以前，打发人通知各师各团不要惊慌，一切有我承当，我去顶这杠子。到了张家口见了冈部，也是把责任全揽在自己的身上，对武钧玉的那部电台，承认是我叫他架设的。冈部说：“我们知道与你无关，所以把你请来，咱们商量如何处理，以后再不发生类似事件。”我说：“查有实据，应当从轻惩办，其余不可株连，小心弄假成真。”武钧玉受非刑拷打，把一切完全供出，由于德王装聋，伪蒙政府被扣的四五十人被杀不少。“蒙古军”只扣起武钧玉和第五师的团长李锦章（副师长李鸣运的侄儿）。杀武钧玉时，把李锦章也绑赴刑场。小仓看见我要调警卫连去拦汽车，才把李锦章放回。前述那个第一师的团长邢德胜，因为自己沉不住气跑了，凡是听上我的话而没动的，都未进行追究。

一九三三年初春，崔兴武派我和旅部参谋王新民到长春和日本“关东军”初次勾搭时，是由开鲁的汉奸商会会长蒋金安领上我们前往。热河沦陷以后，蒋出任了伪开鲁县县长。当我在归绥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他被伪满踢出，跑到归绥找我，想担任一等县长。我给活动了个二等县，他嫌小不干，便不再理他。他穷极无聊又跑到后套，给国民党做了特务工作，说是能策反我的部下。因此，不断给“东北军”十七旅的旧人来信，给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刘星寒和第三师师长王振华的信，都被日本特务机关查获。跟我做对的那个盘井顾问建议小仓最高顾问要往起捕人，也

是因为我给硬抗而未扣捕。

日本人老给我面子，除了不敢跟我闹翻，他们平日被我收买，遇事替我帮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千里来做官，为的是吃和穿”，日本人远涉重洋前来中国大陆，全怀有抢劫和掠夺的目的。他们看见中国的东西什么也都喜爱，给上他们一些，他们就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为此，我给日本人花的钱，比给我的部下花的还多。我为了“蒙古军”的存在，跟德王在日本人面前争宠，可以说费尽了心机，干了好多卑鄙齷齪的坏事。除了请日本人吃饭，给日本人拉皮条（找妓女），并且投其各自的所好所爱，给日本人送过许许多多的礼物。我收买日本人，在“察东警备军”时代就已开始。那时我在多伦驻防，那里距离辽国建都的赵氏乃莫城不远。我把多伦庙仓中的珍贵佛像，赵氏乃莫城的出土文物，向不成器的喇嘛和不识货的乡下人，用破枪换下，用小钱买下，都送了日本“关东军”的司令官、参谋长和察北的几个日本特务机关长与我的大小顾问。到了归绥以后，是以皮衣和古玩给日本人进贡。因此我和归绥的细皮庄与北平的古玩铺，都打起长期的交道。所以我以后不仅是烟土贩子与黄金鬼子，也揣摩成半个细皮商人与古玩商人了。

我收买日本人，是由下而上地去进行。首先把特务机关派在我身边的翻译，司机和勤务兵的嘴都给完全堵上，使得他们不仅不收集我的情报，反而供给我情报。像日本国内反战厌战、寡妇向政府索要男人，由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日本朝野发生恐慌，以及一九四四年底，就有好多乖觉的日本人看见他们的好景不长，便把家眷悄悄打发回国等等，就是给我看门的那个日本老头子哲户，向我偷偷透露的。其次是收买总司令部的日本顾问。如交给他们手章让他们随便开支军费，此外还给他们送礼。最高顾问兼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我本来知道他非常有钱，却故意和他说：“机关长为天皇陛下效忠，来我们蒙疆拯救生灵，我见你清廉奉公，生活一定困难，愿意从我的薪饷中，每月给你四百块津

贴。”他当然感到高兴。加之我还用其它办法，把他喂得站不稳立场，所以当武钧玉的电台暴露以后，他想牺牲德王，而包庇我的部下，怪怨我不该在冈部司令官前硬撑。此外，我对能跟日本人说上话的蒙古人和汉人，也一律收买。我知道陶克陶这个家伙很坏，便在长春的“月香村”妓院花钱给买了一个小老婆。

由于“蒙古军”里边虽然以汉族人居多，但是以蒙古人为主，况且我本人也是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故不能表现得过于“汉化”。尽管初到绥远划分防区的时候，我把三个“汉师”放在铁路线上，将五、六两个“蒙师”搁到后方，而是让宝贵廷的第四师担任河防，包海明的第九师把守百灵庙，扎青扎布的第八师掩护大青山后，可以看出我的私心和对于部属的亲疏远近。有一次参谋长乌古廷和小仓最高顾问，把队伍调动出去以后，打发担任参谋的陶克陶的弟弟都固伦仓，拿上电报底稿叫我签行。我在上边批了“不知道”三个大字，给他们碰了一个很大的钉子。其它方面我对德王那一派蒙古人，也尽量去敷衍。只要他们用民族的帽子扣我，我都忍痛去戴，凡是不涉及我的汉族部下的事，都交给乌古廷去随便处理。乌古廷贩运烟土被日本宪兵查获，假借我的名义向张家口“驻蒙军”司令部要出，我也没有表示什么，只说：“你有困难可以先和我商量。”我从来不接受部下给送的贵重东西。儿子结婚是到北平去办喜事。可是“蒙师”的几个师长给我送礼，我从来没有拒绝，只是过后回赠比他们礼物高几倍的赏赐。所以日本人和德王把我三个“蒙师”的兵抽走，将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以后，剩下的四个“蒙师”的师长，并不是完全不听我的话，我仍能影响他们。日本人和德王对我依然有所畏惧，不敢从伪蒙的政治舞台上，一脚把我踢了下去。

我的最高顾问小仓兼归绥的特务机关长，曾叫我派驻乌盟和锡盟的“蒙古军”，保护载重汽车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给那里的边防军扔去茶叶、布匹和宣传品，搞破坏瓦解活动。我叫他们扔给国境线以南的牧民，千万不可越过国境线以北。后来日

本人亲自前去扔弃散发，我的兵只好跟了过去，结果被那里的边防军包围，把日本人完全击毙，将我的兵放回，以后便再不敢前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在那一期间，也不断派遣蒙古人和华侨，越过国境深入到“蒙疆”和华北各省，收集有关日伪的情报。我也指示驻防乌盟和锡盟的部队，睁一眼闭一眼地不要认真盘查。国境附近除了驻有“蒙古军”，还有日本人架设的电台，以及潜伏到召庙里边多年、伪装成喇嘛的日本特务。这些情报人员，经常被日本人发现扣捕起来。小仓为了离间蒙古人之间的民族情感，扣住华侨完全处死，扣住蒙古人想让“蒙古军”加以训练后放回，去做宣传工作。我叫乌古廷不要揽这差事，就说“蒙古军”里边没有这种人材，如果弄不好，官兵反而会被赤化。我如此对待蒙古人民共和国，就是到了必要的时候，在中国呆不下去而投外蒙，所以不愿意恶化关系。我所以包庇乌力吉敖喜尔，并且同意乌力吉敖喜尔把他提升为第九师师长，就是把他放在百灵庙，需要的时候叫他去拉外蒙的关系。

“蒙古军”驻防于平绥路沿线、大青山后与黄河东岸北岸，除了跟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还有好几方面受敌威胁。从一九三八年夏天开始，八路军在大青山和蛮汗山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时傅作义的游杂部队，也在我们的后方活动。我为了保存实力，曾采取了“敌不犯我，我不犯敌，敌若犯我，坚守待援”的方针，曾经悄悄嘱咐部下：无事不要寻找麻烦，有事不要赶尽杀绝；跟日军配合作战时，只是虚张声势，始终要遵守胡匪里边“枪子儿留情”的规矩，切忌穷追痛剿。他们根据我的这些指示，只是傅作义的军队进入包头，被我的第一师用巷战赶出，曾打了一次硬战，其余都是零星接触，所以不能过于虚报损耗。八年来没给补充子弹，使的都是张北时发下的旧品。第八师师长扎青扎布年青逞勇好胜，由于不听我的话，结果叫鄂友三的人，把他击毙于大青山里边。

起初我不知道八路军和傅作义的军队不是一家人，后来看到

作风和战术不同，加之我的第三师安恩达团在丰镇以及改编为“治安警备队”的第二集团朱恩武部调到察东都吃了八路军的亏，丁其昌在一九四二年左近告我，伪蒙境内警察的枪已被八路军缴去一万八千多枝；特别是日军亲自出动扫荡八路军，也是被打得狼狈不堪，还在察南的山岳地区，由张家口出去的中将司令官与少将旅团长也被击毙。“华北”方面的朋友也秘密告我，那里的山区和农村已被八路军控制，我才开始重视起活跃在我的前后左右，这一支小米加步枪的革命军队。我再三指示各个师长，千万不要招惹八路军，同时八路军在沦陷区打击主要敌人，对于“蒙古军”按照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争取，所以双方在伪蒙地区，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冲突。

我并不甘心投敌，真把日本帝国主义当成亲生的老子；也不是效忠德王，想将他扶佐成蒙古的大皇帝。最初是因为我由一个大兵，逐步升级熬成了旅长，可以说费尽千辛万苦，不愿把两千多骑兵失散，才在热河抗战失败之后，跑到林西被崔兴武拉得下了水。到了察北依靠日本人扩充成千军万马，更舍不得把这笔政治资本扔掉，老想摘去遗臭万年的汉奸帽子，立功赎罪打回老家，希望在热河坐一任主席，给老百姓做些好事，再到北平去做寓公，以安度晚年。我在伪蒙时代，因为看不惯火车上日本人打骂中国人，每次由归绥到张家口，都是冒险乘坐日本的旧式飞机。日伪报纸上称我为“李守信大将”或“李总司令”，尤其把我的照片登出，我并不认为这是光彩，反而浑身发冷发麻。不过我除了打算过拥护吴佩孚而外，概没有和其它人乱拉关系。“军统”华北区长马汉三受戴笠的指示前来勾我，归绥天主堂的中国神甫白祥和归绥“青帮”头子刘长荣、替傅作义做我的工作，以及我的野战医院院长郑建安的哥哥郑立安，想让我和张砺生联络，我都没有上钩入套，用回避的办法拒绝。因为这些都是远水救不了近渴，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眼下能在日本卵翼下存留，尽量借此养精蓄锐，到了日本完蛋后，临时再找婆家也能赶趟。只要拿上一颗猪

头，不愁找不见庙门，掌握着两万多支枪，投谁也会收容。

在日本投降的前一、二年，我就看出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未来的中国，将出现共产党和蒋介石互争雄长的局面。由于当时看不出究竟谁胜谁败，我决定了一个隔山观虎斗的办法，计划日本失败以后，由“蒙古军”裹胁上伪警察，甚至日本撤不走的军队，都向热河集中，和伪满的“兴安军”以及其它汉奸部队联合起来，结成一个第三方面的阵容，仍打上民族旗号保持局外中立，到了双方胜负分晓的时候，再表明自己的态度。

德王如何操纵“蒙古军”

德王认为“蒙古军”是为伪蒙政权服务的工具，并把“蒙古军”当成他的“王家”军队。“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后，虽然他不兼任“蒙古军”的总司令，但是仍以伪政府主席的身份，过问“蒙古军”的各种事务。归纳起来他是用安插文人、培养新人、笼络旧人和排除汉人的四种手段，企图把我的兵权完全夺去，由他来操纵一切。关于这些方面，都得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支持，所以我战胜不了他们的联合进攻，终于节节败退，在乌古廷的参谋长被撤职以前，很长时期我成了有职无权的光杆司令。日本“驻蒙军”军部，并不是真正支持德王，而是利用他和我的矛盾，故意挑拨离间，好把“蒙古军”由他们抓起来，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德王的好多想法，也都完全落了空。

首先，德王本身就是一个封建王公里边的文人。他爬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了一时的风云人物，不是用枪杆子打起来的，而是由蒙古人里边的部分念书人给捧起来的。他是打着“团结蒙古各阶层共赴国难”的招牌和喊出“民族复兴”与“民族自治”的口号，才产生了百灵庙的“蒙政会”，以及自此而演变成了伪蒙政权。德王的家乡锡林郭勒盟及其附近的察哈尔部人材不多，尤其锡盟的王公贵族子弟，很少有人读书。一般牧民被王公贵族折磨成牛马，过着非常落后而悲惨的游牧生活。以后“蒙古军”从锡盟征了一千多名新兵，从中连一个班长都挑选不出来。至于德王的亲信——补音达赖和卓特巴扎布，虽然一个曾任过苏尼特右旗“乌滂守备队”的队官，一个曾任过察哈尔部十二旗群的保安长官，但是都没有战斗经验，谈不到能带兵打仗。因而德王无论搞什么名堂，全得仰仗“东蒙”方面的人，特别是那些官僚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在“蒙古军”安插的文人，多是从日本士

官学校，张作霖的东北讲武堂和蒋介石南京中央军校以及他的“乌滂守备队”干训班毕业出来的“东蒙”学生。

德王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就聘请绥远土默特旗的黄埔军校出身的云继先和朱实夫等人为教官，并从“东蒙”和绥远土默特旗招收蒙古青年学生，以“乌滂守备队”干部训练班的名义给自己培养军事人材。以后担任“蒙古军”第六师师长和“蒙古军”军官学校校长的乌云飞，便是“乌滂守备队”干训班的学生。他在百灵庙成立起“蒙政会”，把“乌滂守备队”改为“蒙政会”的保安总队，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的“东蒙”人韩凤林担任保安处长兼保安总队长，下面的干部除了“乌滂守备队”干训班的学生，还有蒋介石给派来的南京中央军校的蒙古学生。韩凤林死后，由热河汤玉麟那里跑到百灵庙的土默特右旗东北讲武堂毕业的宝贵廷代理了保安总队长。“蒙政会”察绥分治时候，南京中央军校的学生也分成两派。绥远土默特旗的学生，都跟上云继先和朱实夫等到了归绥。“东蒙”的学生张启祥和姚长清等，都跟上德王跑到嘉卜寺。在这以前，一九三五年冬天，我给德王成立起一个警卫团，德王派乌云飞在嘉卜寺整训。因为“蒙政会”的保安总队被云继先等拉走一半，一半虽由宝道新（曾任锡盟盟长索王的驻张家口代表）率领仍驻防于百灵庙，但“蒙政会”已宣告结束，拥护德王的人全撤至嘉卜寺，遂让宝贵廷担任了这个警卫团的团长。据说德王在百灵庙期间，秘密去过几次伪满，跟那里的四个“兴安省”省长和“兴安军”总司令巴特玛拉布坦等蒙古反动上层，建立了一个所谓“铁血同盟”政团。乌古廷就是以“兴安西省”（昭乌达盟）代理警备司令官的身份，和这一反动组织的政治关系，以及他大兄哥吴鹤龄的推荐，由伪满来到伪蒙担任“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的。此外，如扎青扎布、包海明和珣门达来等，也都是伪满兴安省官员给德王支援的所谓军事人材，被德王安插到“蒙古军”里边的文人。

“蒙古军”正如伪蒙政府一样，后来都被“东蒙”的知识分

子所把持。除了第七师是察哈尔部的团体和一、二、三，三个“汉师”改为“治安警备队”外，从总司令部到五师、六师、（把四师合并在内）和九师（把八师合并在内），校级以上的军官多是住过汉族学校或日本学校的喀喇沁部与科尔沁部文人，只是连排长里边有“小队”和马贼出身的武夫。这些“东蒙”的知识分子，在摆架子和说大话方面，比起“察蒙”和“绥蒙”的土包子王公总管当然要高出一筹；谈到攻城掠地和那些王公总管同样不学无术，没有一个具备军人的胆识，够上军人的资格。因为他们都是官僚地主或贵族家庭的纨绔子弟，到军官学校受训是为了镀金。不论日本人、蒋介石、张作霖均对他们特别优待，没有经过怎样的操练，便把文凭弄到手中。出来做事又赶上蒙古人“吃香”的机会，多半未下过连队便以政治关系而连升三级，成了中级军官与高级将领，因此，平日很会装腔作势，一打仗就丢人现眼。我最瞧不起他们，德王却把他们当成中流砥柱。

别人的历史我不太清楚，拿“蒙古军”先后两个参谋长乌古廷和宝贵廷来说，一个是我的磕头兄弟，一个是我的小舅子，他们两个人的出身，我可以说完全明白。乌古廷的父亲在外蒙当过小官。宝贵廷是没落的贵族，先给我充当文书上士。他两个在东北讲武堂同期毕业，一出学校便被汤玉麟聘为少校副官。一九三三年热河沦陷后，汤玉麟退到察北众叛亲离，乌古廷到多伦找我；宝贵廷去百灵庙投奔德王，都是在“此地无银两，红土也为贵”的情况下，飞黄腾达起来的。由于我在林西有两千多蒙古兵留守，派乌古廷前去照料，不料他把这些人拐给巴特玛拉布坦，才担任了伪满“兴安西省”的代理警备司令官。由于韩凤林被蒋介石派人暗杀，引起德王对黄埔和中央军校出身的蒙古人怀疑。宝贵廷以东北讲武堂毕业和汤玉麟旧部这两张“虎牌”，代理了“蒙政会”的保安总队长。他们两个人加入军队，都没有当过尉官，并且从一九三三年春到一九三六年夏，三年光景，也未打过仗，便一跃而升为中将参谋长和少将师长。至于德王安插

在“蒙古军”的其他蒙古文人，越发等而次之，尽是些“头重脚轻根底浅”，“咀尖皮厚腹中空”的货色。以致把队伍搞成乱七八糟，大都给日本人和蒋介石充当了特务。

我在察北的时候，就看到这一些蒙古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总司令部各处除了副官处负责交际联络由张启祥担任处长而外，其余都由我从张连同和崔兴武手下接过来的“毅军”和“东北军”的汉族老幕僚担任处长。从张北往绥远开拔以前，感到我在嘉卜寺的“蒙古军政府”时期有点过于跋扈，既然称为“蒙古军”，不能不培养蒙古干部，并且为了表示真诚和德王合作，和团结属于我的四、五、六，三个“蒙师”，便放宽了尺度，不再采取关门政策。例如第六师师长宝音乌勒吉原系活佛，听见打仗害怕牺牲而辞了职，德王给我推荐了五、六个蒙古青年军官，让我选拔一个去带领第六师，我便挑用“乌滂守备队”干训班培养出来的乌云飞。我挑乌云飞的原因，是由于他虽系干训班出身，但在给德王训练警卫团时很有一套办法，并且因为自己的牌子不亮，不像中央军校或东北讲武堂毕业的那样趾高气扬，处理事情相当踏实，稳重。德王看不出这些优点，被我发现加以重用，在开赴商都为第二师尹宝山解围时，队伍指挥得很好。我在提升乌云飞的同时，还把德王从百灵庙和多伦带过来的不少“东蒙”学生，也吸收到总司令部各处，担任科长一类的职务。如以后因给马汉三架设电台被枪决了的武钧玉，他先跟包悦卿在百灵庙工作，在多伦时参加了第八师，到张北以后担任了总司令部参谋处的情报科科长。

我在归绥就职“蒙古军”总司令后，决定和德王平分秋色。一、二、三三个“汉师”归我，七、八、九三个“蒙师”归他；总司令部和四、五、六三个“蒙师”里边，蒙汉干部参半。这样我一开方便之门，德王的代理人乌古廷，一股劲地往里安插人，连普通学校毕业的“东蒙”学生也当了军官。先是四、五、六师的兵被抽回伪满，官尽让他们当了。后来一、二、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总司令部里边的汉人也所剩无几了。这些“东蒙”来的知识分

子大都亲日捧德,和我投敌与参加伪蒙政权一样,并不是为了复兴蒙古民族,纯粹是搞政治投机。尤其“东蒙”的这帮文人,从小差不多都过着由蒙古奴才或汉族佃户供养的富裕生活,并且在“奉军”统治的那种骄奢淫逸的环境中长大,出了学校更是一帆风顺,因而不知天高地厚。他们少年得志,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所以得陇望蜀,完全为自己升官发财,钻营奔走,并不是给德王忠心耿耿地服务。

早在一九三五年春,德王派宝贵廷到多伦跟我联络时,就由多伦坐上飞机偷到长春,瞒过德王跟日本人搭上关系。一九三六年夏天,德王派他回热河搬兵,临走以前德王曾许过他把人带来,让他担任德所兼的第二军长。他打上我的旗号,很快就集合起六千多人,自恃非常有功,因而由警卫团长升为第四师长。但仍不满足,非叫德王把第二军军长让给他不可。德只不过说了一句话,怎能把他和我并列到一起呢?因而宝贵廷老羞成怒,曾受最高顾问田中玖鼓动,想在嘉卜寺发动政变,刺杀德王。宝贵廷到了绥远,他的第四师先在包头黄河以南的大树湾驻防,没有多久便和马汉三搭上关系,包庇一个姓刘的军统特务,在大树湾架设电台,并且把马的大批特工人员,都由他把守的渡口,放进伪蒙各地。后来他的兵被抽回热河,我和德王又给他补了一千多人。但由于他克扣兵饷和指挥不了战斗,逃跑伤亡了大半,不得不跟第六师合并,他跑回总司令部担任了教育部的部长。由于他善于逢迎欺哄最高顾问小仓,争取得到日本人的更进一步的信任,在乌古廷被撤职之后,又由教育部长升任了参谋长。

至于乌古廷这个人,也是在亲日和捧德的姿态之下,图谋发展自己,并且和他的大兄哥吴鹤龄,想望实际掌握伪蒙的军政大权,已经树立起派系。此外,他把他的本家乌力吉敖喜尔任命为参谋处长,以后征得我的同意,又把乌力吉敖喜尔提升为第九师的师长,就是打算通过乌力吉敖喜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秘密进行联络,准备日本失败之后,领上“蒙古军”投靠外蒙,和蒋介石讨价还价,使自己立于永不失败之地位。他在“蒙古军”参谋长任内,

除了叫他老六乌臻瑞倒贩烟土，并把师长们召到家中聚赌抽头，还接收师长和团长们的礼物。由于上行下效，军官都纵兵殃民，幕僚人员全领日本人或蒋介石的津贴，甚至担任双份儿特务。德王“蒙师”的军纪，比我的“汉师”还坏。“汉师”的军官虽多出身于胡匪，还遵守绿林中的各种规矩，“蒙师”的军官连“盗亦有道”的道理都不懂，一味无法无天地蛮干胡闹。谈到打仗，真是不堪一击。所以“五原战役”时，跑到后套大大丢人现眼。日本投降时，完全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解决。后来宝贵廷带着“十路军”能在解放军的围攻中，替傅作义和董其武守归绥，因为“十路军”是由“汉师”的第一师和第二师编成，这两次战斗很少有蒙古人参加。

德王对于上述情况，并不是熟视无睹的。无奈“察蒙”连这些料都没有，只好用“东蒙”的文人。他很注意培养新人。“乌滂守备队”虽讹有三、五百人，就附设了干部训练班，聘黄埔军校出身的云继先等给他训练学生。到了归绥以后，他知道“东蒙”的文人很不可靠，便向日本人提出要求，给“蒙古军”成立军官学校。日本人本来不打算壮大“蒙古军”，可是为了应付德王，需要把蒙古的青少年，经过日本教官亲手训练，给他们灌输武士道的精神，培养为极端的亲日分子，所以不只同意给“蒙古军”成立军官学校，并且还给“蒙古军”成立了“蒙古军幼年子弟学校”、“蒙古军人后援会”和“蒙古军病院”等机构，显示很重视“蒙古军”的样子。除幼年子弟学校设在德王的西苏尼特旗，其余机构都设在归绥。“蒙古军人后援会”还附属有恤兵院、新村、牧场和小学等组织，以安插日本的退役军人和蒙古人里边的亲日派。

我因为没有长治久安的打算，对于成立军官学校，以及搞其它名堂，很不感兴趣。故叫德王的人前去主持。军官学校先由脑门达赉担任校长，因为日本人和德王都想抓这个教育机关，后来脑门达赉和乌云飞对调工作。乌担任校长不久，由于里边是日本教官主权，他很受压迫。结果被挤到伪政府的参议府。最后把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的包海明，从第九师调回担任校长，一直到日本

投降。“蒙古军”军官学校于一九四三年毕业了第一期学生，完全中了日本人的思想毒素，分配到各师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大都给日本顾问教官充当了特务。“蒙古军”已经腐烂成千疮百孔，即使注入新的血液，也无济于事，德王在这一方面又宣告失败。

德王于一九三八年夏，还仿照蒋介石在庐山设立训练班的形式，把六个“蒙师”的师长和一部分团长，调到西苏尼特旗王府集训，听他宣讲复兴蒙古民族的大道理，并让他们体验当年成吉思汗远征欧亚大陆时的那种军营生活。我知道他舍不得花钱，建议他要给军官们吃好，因为他的王府条件很差，尽给人吃膻腥的干肉。师长们养尊处优惯了，团长们也完全腐化，恐怕他们受不了那种艰苦生活，会对集训发生反感。果然没有出我所料，前去集训的人回来都怨气冲天，说德王不通人情，把他们折磨得够呛，几乎饿坏、憋死，全向我摇头咧咀。德王的想法非常天真又愚腐，不作调查研究。他认不清楚宝贵廷一直在耍他。伊恒额是朝我而来，达密凌苏隆老奸巨滑，扎青扎布跟他素无瓜葛，包海明极端亲日，除了乌云飞而外，他的那一套谬论，对于这些人都格格不入。他恐怕引起日本人的更大怀疑，所以只办了一期即行作罢。不作我们从这一件事上，可以看出德王为操纵“蒙古军”，确是想尽各种方法，煞费了苦心的。

关于德王笼络旧人，是和排挤汉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笼络旧人系一种手段，排挤汉人才是他的目的。凡是在察北参加了伪蒙政权的文官武将，德王均以老部下视之；对于我手下的汉族军官，也说是他的“有功之臣”他用明升暗降的办法，把我第一师的两个师长刘继广和丁其昌调为文官，第二师的两个师长尹宝山和陈景春被撤和辞职以后，亦被他聘到伪蒙政府充任参议，以示不忘旧人。另外有一个曾给崔兴武和我担任过驻热河承德办事处处长的李树声，因为“蒙古军”进驻到归绥，李在热河无事可办，便跑到归绥找我另谋其他工作。德王知道此人很有才干，并且通过李能笼络我的部下，他怕我安插在“蒙古军”里边，以总

参议一类的名义代替乌古廷，于是在李来到归绥没有几天，便被德王捷足先登聘为伪蒙政府的参议，并介绍李树声和马汉三认识。伪蒙政府改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由归绥迁移到张家口以后，德王又任李树声为张家口特别市市长，最后提升为“大同省”省长。所有这些都说明德王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把我的人材排除出去，而将我的台子拆卸，他好完全主宰“蒙古军”这支武装力量。

德王看到我的三个“蒙师”的兵被伪满方面要走，三个“汉师”改编了“治安警备队”，总司令部各处和炮兵大队仍由我的人把持，他的代理人乌古廷依然有职无权，于“五原战役”后，建议日本“驻蒙军”军部，在总司令部八大处之上，又设了参谋、教育和总务三个部。并强调部长由蒙古人担任，决定让南京中央军校出身的姚长清代理参谋部部长，调第四师师长宝贵廷为教育部部长，提升炮兵大队长郭勒明色为总务部长。我的几个汉族处长，便在总司令部中无法存留，参谋处处长郭光举被我举荐到“治安警备队”担任了第一集团长；军需处处长崔景岚和军械处处长纪树勋都被德王调走，一个继李树声任了张家口特别市市长，一个派到“蒙疆银行”总行，管理了金库。我在总司令部的人，只剩下军医兽医一类蒙古人代替不了的官佐。

“蒙古军”的炮兵大队，相当于傅作义的三个炮兵团。我对于该大队的四五十门野炮、山炮，可以说爱如生命。最初由丁其昌任炮兵大队大队长。丁其昌继刘继广担任了第一师师长，我又派郭勒明色接了丁的职务，不叫倾向德王的人掌握。郭勒明色是我在多伦时代收留下的一个察哈尔部蒙古人。他在卓特巴扎布到百灵庙担任“蒙政会”委员的时候，就带着二百多骑兵，参加了我的“察东警备军”，故不属于德王的派系。提升郭勒明色担任总务部长，是德王想叫乌古廷掌握炮兵大队。他们说郭勒明色是外行，指挥不了炮兵。我便推荐第五师副师长、前总司令部副官长张启祥，接替了郭勒明色的炮兵大队长。因为张启祥既是喀

喇沁部的蒙古人，又是南京中央军校炮科出身，张启祥虽是我的朋友张子荣的儿子，但他也被德王给拉到“军统”里边，日本投降时不听我的调动，跟上宝贵廷投降了傅作义。

德王认为“蒙古军”不论“蒙师”和“汉师”，都是他自己的军队，不仅不叫我染指“蒙师”，连“汉师”也要叫我完全放弃。办法是除了抽调我的武将，给他充任文官，还给我的师长和团长另找政治前途。那就是把他们介绍给马汉三，跟“军统”搭上关系，使我陷于孤立，他好进行操纵。这无异是向我的部下说：

“你们不要跟李守信了，他没有出路，我再领上你们去投奔蒋介石。”关于此事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另以专题叙述。这里只是说明蒋介石在“七七”事变爆发不久，曾派黎明和我接过几次头，截至日本投降，再未打发人跟我直接联络，是由于德王包办了我的一切，蒋介石把我撇在一边，也正因为如此，以致我在日本投降前夕迷失了方向，未能在绥远由我领导“蒙古军”，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强夺抗战胜利的果实。当时我还认为是我的坏事，现在看来却变成好事，如果我真要把“蒙古军”完全拿起来，犯的罪恶就更加深重了！

日本人不希望由我或是德王，将“蒙古军”完全拿起；蒋介石对于“蒙古军”也不愿意掌握在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手中。德王自从武钧玉的电台暴露后，再不敢跟蒋介石联系，而马汉三派的人，和“蒙古军”的师长们仍没有断绝关系。在日本投降以前，蒋介石给德王也没有指示，因而他听到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慌忙从下堡跑到上堡，问我：“咱们怎么办呀？”我叫“蒙古军”都往张家口集中，让他派乌力吉敖喜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接头。我从张家口向归绥打长途电话，不但宝贵廷和留在绥包的三个“汉师”师长和炮兵大队长张启祥不听我的话，连驻在怀来的宋鹏九部也指挥不动。“蒙古军”在最后不仅把到了手的好多武器物资，在张家口完全扔掉，国民党的“十路军”借尸还魂，亦没有办到。

日寇控制“蒙古军”的方法

“蒙古军”不是我一手缔造而成的。它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充当董事，德王也搭了股份，我作经理凑成的。我这个经理是非常难当的。所以“蒙古军”前后分崩离析，弄得德王和我两败俱伤，主要是日寇对“蒙古军”抓得很紧，不许我放手去做，又助长德王的人处处掣我的肘，形成两个派系互相攻讦猜忌，不能团结一致，才把部队搞成一团糟的样子。

日本控制“蒙疆”占领区，始终是一个师团的兵力。酒井机械化师团攻陷绥包后，返回公主岭，调来厚宫师团驻防。师团部和一个旅团驻在大同，另两个旅团分驻在张家口和归绥。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以后，这个师团才离开察绥和晋北。因为他们掌握了铁路交通，并且有汽车载运步兵作战，面上有伪警察署给充任触角，点上有特务给收集情报，所以调动非常灵活，比骑兵还要快速，有没有“蒙古军”配合，亦能对付绥远的抗战部队。绥远抗战期间的三次较大战役，“归绥战役”就没让“蒙古军”参加；“包头战役”是日军结束的战斗；“五原战役”是日军把后套攻陷，让“蒙古军”前去驻防的。由于日军撤走，“蒙古军”和王英的“绥西联军”才被傅作义打了个落花流水。“蒙古军”进入绥远之后，实际成了伪蒙政权的摆设，不过这种摆设不同于磁器花瓶，有变成定时炸弹的危险。所以日寇对“蒙古军”控制很严。针对我的弱点和“蒙古军”的弱点，除用偷梁换柱和剥皮抽筋做法，把“蒙师”弄成空壳，将“汉师”拨走，还用种种方法，使我和官兵被控制就范。

我在察北任“察东警备军”司令官和任“蒙古军”副总司令时，队伍受长春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指挥，我到归绥任了“蒙古军”总司令以后，队伍归张家口的日本“驻蒙军”军部节

制；我的最高顾问多数由就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兼任，从团到师都有日本顾问和教官，总司令部还有一个顾问部。顾问本来是一个供我咨询和管理他们日本人的机构，最初他们只掌握着通讯联络的电台和交通工具以及特种武器。例如在：“察东警备军”时期，是由日本人组织的“特设队”驾驶汽车、战车和使用重机枪及大炮；到了将重武器交给“蒙古军”操纵时，二百多辆汽车和两架飞机还是由日本人充任司机，总司令部和各师联络的电台与电话总机仍由日本人把持。按照规定，顾问部不能经管经费和决定人事，可以从旁监督建议。无奈我为了买好日本人，想叫他们“吃上嘴短和拿上手软”好对付，在“察东警备军”时期，就把经费交给他们处理。到了“蒙古军”时期，我有意让德王和日本人发生矛盾，除了我的三个“汉师”和三个“蒙师”，其他三个“蒙师”的人事，我就不加过问。因为日本人得寸进尺，使我在“蒙古军”中的地位一落千丈。顾问部最后连人事也完全操纵了，成了“蒙古军”的最高权力机关。谁表示亲日，给他们提供情报，谁就官能坐稳，有钱可花；谁不靠拢日本人，谁就不能升官发财。因而后来军官们都看日本顾问的头脸，就不大听我和德王的话了。

日本人为了拢络我给我戴高帽子，有几个顾问称我为“大帅”，我对此很感羞愧。由于我担任“蒙古军”总司令以后，既不能与张作霖跟汤玉麟这些人相比，也不能象我的老长官张连同、崔兴武那样为所欲为，权力反而不如任“察东警备军”司令官那个时期。在察北的时候，“关东军”司令部还派政治参谋跟我商谈作战的部署，让我坐上飞机偷看过傅作义在归绥的城防工事，参与过王英进犯红格尔图的戎机。到了归绥之后，一直是由日军担任主力部队，他们需要“蒙古军”配合的时候，才由最高顾问告我，其它都对我保密，概未叫我出席过“驻蒙军”军部的军事会议。日本军对傅作义进行的三次较大战役，“归绥战役”我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如何结束的；“包头战役”只知前半段；“五原战役”也只知后半段。“蒙古军”在嘉卜寺的“蒙古军

政府”组成时，日本人是想叫德王和我带上雉鸡尾巴唱傀儡戏；到了“七七”事变以后，他们亲自上场表演了全武行。德王虽然仍扮演着一个“反王”（反动头目），可我在“蒙疆”大舞台上却由元帅变成了偏将，把雉鸡尾巴被拔掉了。因而给我派来的最高顾问，在进入归绥的前阶段，也由特务机关长一类的要角兼任，以后又降为退役军人一类的帮角。这些家伙们的政治水平很低，往往把日本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和日本“驻蒙军”军部对“蒙古军”的看法违背，完全板起主人的面孔，想叫我俯首贴耳地由他们摆布。我是吃软不吃硬，因此和他们干了起来，日本“驻蒙军”军部又让归绥特务机关长兼任，狡猾的小仓一直担任了我的最高顾问。

“蒙古军”最初的顾问，由嘉卜寺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兼任，并且兼着“蒙古军政府”的最高顾问。田中玖是日寇中的一个政客，曾任过通辽和赤峰的特务机关长。我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时，就是先跟他接的头，所以和我友情很笃，对德王非常讨厌，曾在嘉卜寺鼓动宝贵廷等，想把德王刺杀。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关东军”把他撤掉了，没有叫他跟上队伍前来绥远，而在北平开办了制造海洛因的工厂。我担任了“蒙古军”总司令以后的最高顾问，先是高场损藏，继而是三毛一，都不把我当总司令看待，连顾问部的小顾问也对我没有礼貌了，曾在归绥的一次宴会上，受过盘井顾问的公开侮辱。盘井是我在一九三二年冬天，在通辽附近抗战时期打死的伪满“蒙古自治军”最高顾问松井清助的远房兄弟。这天他假装酒醉，当着我的几个师长和日本人，横眉瞪眼地问我：“松井是谁打死的？”我也厉声答道：“是我！”他又问：“你知道不知道他是我的本家哥哥？我要为他复仇！”我说：“你那时如果在场，我连你也敢打死；你现在来到我这里，想死也很容易。”他听见我的话很硬，再没敢吱声。我的师长们把我拉到一边，别的顾问把此事报告了张家口的“驻蒙军”军部。经过日本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酒井隆和日本“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的研究，怕把我逼上梁山，很快把盘井调到张家口

“驻蒙军”军部，由当时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兼任了我的最高顾问。

日寇派驻各地的特务机关长，大都是文武全才的“中国通”，非常阴险诡诈，不像一般顾问那样头脑简单。如改称兴亚院“驻蒙疆联络部”长官的前张家口特务机关长酒井隆，是现役中将阶级，他实际上是“蒙疆”的总督，连“驻蒙军”司令官和伪蒙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也受他的指挥。归绥的特务机关小仓是现役少将阶级，他的前任桑原大佐调到五原开辟绥西占领区而阵亡，派小仓到归绥是让他来担任统治绥远沦陷区的钦差。在这以前，我很看不起高场和三毛一这些顾问，我有事跟桑原请示商量。到了张家口以后，除了见“驻蒙军”司令官，还必定去拜会酒井隆。我知道他们是伪蒙的真正主宰者。像大同的厚宫师团长，就不过问伪蒙的政治。因为“蒙古军”的实力，最初是掌握在我的手中，以后虽把“蒙师”抽空并把“汉师”改编，但我仍能影响“蒙古军”和“治安警备队”，所以酒井隆、桑原和小仓，在我身上下过好多功夫。根据我是一个蒙古人，又是兵痞和胡匪出身这些特点，一方面用民族的大帽子把我扣住，让亲日和倾向德王的两派蒙古人往部队中渗透，不使“蒙古军”成为“汉蒙古”的团体，让我一手抓起，另一方面在升官和发财这方面，给我很高的位置与很多的方便。

在嘉卜寺的“蒙古军政府”时代，由德王任总裁兼“蒙古军”总司令。我对德王当蒙古大皇帝也能投赞成票，但很不高兴让我担任“蒙古军”的副总司令。因此，曾和张学良联络，并在张北打算归附蒋介石。这两件事可能被日本特务机关察觉，或是他们判断出我如当不上“蒙古军”的总司令，会走到别的道路，所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一成立，便叫德王把总司令让给我担任，也没给我派副总司令。“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只有一个副主席，原先是德王以此而兼政务院院长。一九三八年云王一死，德王任了主席，便把副主席叫我担任。“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由“蒙古”、“察南”和“晋北”三个伪政权组成，德王任了主

席，由“察南”的于品卿和“晋北”的夏恭任副主席，夏恭离开应由“晋北”方面产生副主席，但这个副主席却给了我。我是主张军政分治，愿意专负军事上的责任，宁可不当伪政府的副主席，也不想叫德王的人参加“蒙古军”。可是酒井隆和桑原他们，都向我表示“蒙疆是德王和你的”。外边不明真相的人，也以为德、李是一家。所以有好多事情，我没有话说，只好哑吧吃黄连——苦在心里，无法把德王的势力从部队中清除出去，结果把总司令部和炮兵大队被乌古廷和宝贵廷先后掌握。

日寇知道德王好高骛远，我贪图货利，张家口和归绥的特务机关对我跟商人来往和倒卖烟土，一开始就不限制，并且很给我留面子。一九三八年冬天，往走抽四、五、七师的六千多兵时，我已在归绥和北平大做烟土和黄金投机倒把生意。那时我要是态度强硬一点，他们也不敢强制执行。因我没有政治远见，对抗战胜利怀疑动摇，以为离开“蒙疆”就失去发财的机会，看见蒋介石从武汉被赶到重庆，就更“乐不思蜀”了。日本见我无能为力，便叫兵们放下武器，像羊一样集中到归绥，大冬天装到敞棚货车里边，我跑到车站发一顿牢骚，说他们把人按牲口看待，才用客车运回热河遣散。我本来计划让他们整个回家过完春节，第二年再零星招集回来，殊不知队伍解散容易，再集合就非常困难了。加之，伊恒额和李鸣远非常灰心丧气，把师长和副师长辞掉，被德王聘为伪蒙政府的参议，我连将领也没有了。这样日本未发一枪，将我的三个最坚强的“蒙师”消灭。“蒙古军”一进城就腐化起来，到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以后已处于瘫痪状态。主要是我比部下先腐化堕落，扔不下归绥和北平的财产，失去当年敢带上二百人在赤峰高粱杆子店解决汲金纯的勇气。

“蒙古军”不论“蒙师”与“汉师”，由于士兵多系胡匪和马贼出身，久经战斗锻炼，真干起来非常能打。尤其在“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以前我还带着二、三百没列入“蒙古军”编制的马贼和胡匪，把他们安插在各地的“俱乐部”里边，在赌

场中吃“好汉股子”。这些人更是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徒。他们里边有一个海福龙，带了二、三十个人跑到大青山上拉起了“杆子”，因为“蒙古军”不肯穷追痛剿，归绥的日军亲自出去“扫荡”损失了一百多人，也没有把海福龙解决。以后海福龙参加了傅作义的游杂部队，成了鄂友三的打手。小仓最高顾问想叫我写信招抚，我没有照办。因为海福龙越活跃，越能证明“蒙古军”很不好惹。驻防凉城的第三师董正德团，有一个日本教官在筵会上酒醉行凶，公开辱骂中国人，被该团一个连长掏枪当场打死。由于闯下这么大的乱子，全团人都上了蛮汉山。我接到报告后，写信叫董正德暂不要西走（指投奔抗战部队），然后和小仓去张家口见“驻蒙军”司令官冈部，请示如何处理。当时归绥总司令部的小顾问们和张家口“驻蒙军”军部的小参谋们，都主张把日军开出去扫荡。军部接受了我和小仓的意见，保证不叫那个连长偿命，由我给董正德写信叫回凉城，以后再没有追究。由此证明，日本人也是欺软怕硬，真给他们耍硬骨头，他们也没有办法。以后我所以由他们摆布，并非我的官蠢兵蠢，而是我先成了蠢种。竟被日本人这种故示宽大的手段，使我和我的部下产生了“感恩图报”的错误想法，更容易把国家、民族的观念忘得一干二净了。德王庇护着马汉三（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电台，被归绥日本特务机关破获，经管这部电台的武钧玉是我的总司令部参谋处报情科长，被打得遍体鳞伤，把一切都招供了，除我而外把德王以及“蒙师”和“汉师”的不少师长、团长都牵连在内。因为马汉三通过德王给“蒙古军”团长和科长以上的军官差不多都发了委任状。日本人处理这个案件时，只把武钧玉一人枪决，对于其他跟马汉三有勾搭的人，搞了一个假装不知。这样使我部下许多人反而觉得很对不起日本人，把柄又被日本人抓在手中，越发不敢与不好意思轻举妄动了。所以后来“蒙古军”的军官和日本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认贼做父”，“化敌为友”和平共处起来。

日寇在拉拢我的同时，对我的部下也分别收买了。他们种植

鸦片，贩运鸦片，走私以及包庇走私，日本人均不干涉、限制，虽驻守八年很少换防，就是为让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安家落户，发财致富，削弱对日的反心。“蒙古军”进入绥远后，连级以上的军官差不多都娶了姨太太，班长也几乎完全有了老婆。师长和团长们在归绥、包头和张家口，甚至北平买了院子，有的还垫出资本同当地的商人合伙开买卖字号。一九三九年“五原战役”前，调任丁其昌为伪治安部长，把三个“汉师”改编为“治安警备队”，一九四〇年“五原战役”以后，国民党和伪蒙双方都吃了苦头，“蒙疆”前线遂形成了各不相犯的局部停战状态。德王勾通蒋介石的电台被日军破获后，日本人在归绥、包头和张家口杀了好多“抗日反蒙”分子。日寇就是在此种情况下，顺利地把我的三个“汉师”从“蒙古军”中拨出去，而把我弄成了光杆司令。“治安察备队”名义上归丁其昌指挥，师长们为了苟且偷生，乖乖地接受了改编命令。

归绥特务机关长小仓，兼任“蒙古军”总司令部最高顾问时间最长，从一九四〇年春到一九四五年秋，将近六年光景。他的态度相当和蔼，表面上对我彬彬有礼，遇到我跟德王有了争执，他还站在我的方面说话。我和德王二次到东京访问时，坂垣陆相送了我两匹马，给德王五百支枪，我的马由轮船上运来，德王的枪被小仓扣住始终没有给他。小仓对我说：“这枪不给他。等给您把卫队连扩充成警卫团时，装备咱们司令部的兵。”显然，这是他在干挑拨离间的能事。实际上他是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要把我弄成胶皮娃娃团弄。小仓在我身边布置有四、五个特务，充任我的翻译、司机、勤务兵和传达。我在归绥的时候，曾把一个乳名叫桃子的暗娼纳为外室。连这个女人也都受蒙古宪兵的威胁，向特务机关提供过有关我的情报。“蒙古军”总司令部各处和直属部队中，起初很少蒙古人，以后逐渐多了起来，最后把汉人排挤得所剩无几。这些蒙古人大都亲日和倾向德王，尽做我的特务工作。我这个“蒙古军”总司令，一直被包围在特务的网中，一举一动，一言一

行，都很难瞒过小仓的耳目。我没有和师长们直接联络的电台，打电话也得通过日本人或通过蒙特操纵的总机，我和我的部下只能用挤眼扭咀示意打招呼或到厕所里说私话，日本人把我看管得很严。从一九三七年冬天把总司令部设在归绥，我很少走出这个城圈，到什么地方也有日本人或特务跟着，不给我露一点空隙。因此，使我和部下一天比一天疏远，养尊处优，已无从前那种绿林气概了。我的师长团长们，也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大都学会吸鸦片烟，骨瘦如柴，也没有十几年前那种生龙活虎的气概了。

德王自从他庇护的电台暴露后，被日本人抓住小辫子，再不敢装腔作势了。尽管我已成了行尸走肉，但日本人知道我在暗中仍掌握着“治安警备队”和扎青扎布的第八师与张启祥的炮兵大队，怕到了必要时，中国人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所以日本人把“蒙古军”总司令部，一直设在归绥，而不随伪蒙政府迁往张家口，意在不叫我和伪蒙政府的那一帮蒙古文人接近，怕我给他们壮胆，怕他们由我出主意闹事，日本人不能分别掌握各个击破。一九四四年冬天，他们（日军）打通广西和越南占领区的交通时，将华北的日军大部抽走，大同的厚宫师团也去了不少的人，后方非常空虚。这是伪军反正的很好机会。可我看不出这个形势来，而日本人却心怀鬼胎。冈村宁次趁此调我到北平开会，到了北京和张岚峰、孙殿英、庞炳勋、吴化文等一见面，众人才恍然大悟。等到他们把攻陷桂林、南宁、柳州的队伍调回，方叫我们各返原防。乌古廷担任“蒙古军”的参谋长多年，对“蒙古军”也能发生影响作用，并且他和吴鹤龄大兄哥两个，已经形成与德王和我鼎足而立的一个派系。吴鹤龄和蒋介石有深厚的关系。乌古廷有投向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倾向。所以日本人在一九四五年初，把伪蒙军政府的政务院院长吴鹤龄挤下台以后，到春节前又下令将乌古廷的“蒙古军”参谋长撤掉，叫蒙特宝贵廷担任了参谋长，并把我调到张家口软禁起来，无法照料归绥的部队，以致到日本投降时，首尾不能相顾，师长们像切了头的蚱蜢一样乱飞，让蒙疆地区的两万多日本人从容退走

了。

一九四五年夏天到秋天我被软禁于张家口，是被“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与伪蒙政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用诡计控制着。日本人已估计到他们一旦从“蒙疆”撤退，“蒙古军”必定要起来拉他们的后腿。于是他们把乌古廷撤掉，又以“扩大蒙古军组织”为名而将我从归绥诳到张家口。他们这时除将“治安警备队”归还“蒙古军”建制，由三个集团扩充成六个师，并在四个“蒙师”外，还增加两个“汉师”，共凑十二个师。另外要把伪蒙所有的警察编为八个独立旅，也归“蒙古军”指挥。我就为扩编队伍钻在张家口无法脱身。我那时计划在“蒙疆”地区招集五万人，可是还缺少两万多支枪，还想每一个师成立一个炮兵团，又缺八百门大炮，日本人对我的要求，满口承应。他们在沈阳的南满车站上，堆起好多空箱子上写着“蒙古军”的字样哄我，并由伪蒙政府拨出十一万两烟土，叫我派人到包头换成皮毛药材，运到上海，到那里的兵工厂换取武器。这样，在搞装备问题上拖延时间，把我拴到张家口达两个月之久。到了八月初我听见广岛扔下原子弹，苏联已经对日宣战，感到远水救不了近渴，应该马上决定自己的行动。这时，根本博突然给了我一张秘密图纸，说是张家口建有防备苏联的地下工事，里边堆有装备日本三个师团的全部武器，叫我拿出来应用，我又如获至宝、欢喜若狂。这时天皇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传来突然傻眼了。由于我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部队也集中不到一起，最后只好把一切扔下。在苏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压境，铁路被八路军切断的情况下，和德王一起被日本兵车带到了北平。

随德王访问日本和伪满情况

一九三七年和一九四一年，德王怀着乞求日本帝国主义帮助建立“蒙古独立国”的目的，赴东京朝见裕仁天皇并告御状时，我以“副主席”、“总司令”的身分，随同前往。一九四二年，“满洲国”建国十周年时，日本关东军为了让德王给溥仪捧场，组织伪蒙疆政权访问团时，自然也少不了我这个“兵马大元帅”。现在就把这几次访问所见，回忆记录下来供作参考。

一、第一次访问日本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第一次访问日本，大概是在一九三九年的春夏之间^①。那时德王已继云王(云端旺楚克)担任了“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主席。他此次访问日本的主要目的，是不满足归绥的那个伪自治局面，想到东京向日本朝野呼吁，把察绥两省和山西雁门关北的十三县建立一个伪“蒙古国”，和溥仪的伪“满洲国”取得同等地位。因为这时汪精卫已经叛国，在我们访日前后也去了日本，正筹备组织代表统一中国的“国民政府”。北平的“临时政府”和南京的“维新政府”，都要合并到汪伪的“新中央”政权底下，故不允许伪蒙独立，所以德王的目的没有达到。从日本回来不久，只是把“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合并于当年九月一日在张家口组成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德王第一次访问日本前，张家口就有了“蒙疆联合委员会”。

^①注：此间，正处于日本统治强化时期。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伪满参加《防共协定》在长春签字。五月二十二日，德、意、日，军同盟在柏林正式签字。

德王是以该会总务委员长的名义，率领“蒙古”、“察南”和“晋北”三方面的首脑人前去访日的。访问团主要成员有“察南”的于品卿和“晋北”的夏恭，并由“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指挥和操纵一切。因以伪蒙的人为主，于只带着一个翻译，夏仅领着他的儿子。伪蒙方面除了德王和我，还有参议长吴鹤龄，总务部部长陶克陶和财务部部长吉尔嘎朗，德王还带着秘书陈国藩，我带着副官张启祥。日本方面有金井章二、关口保、中岛万藏和杉本等人，

我们由归绥到张家口，在张准备了四、五天行装。我和张启祥穿的是日式陆军大将和少将军服，于品卿、夏恭和吴鹤龄等是日式文官礼服，只有德王仍着长袍坎肩，头戴瓜皮小帽，脚踏蒙古靴子，脑后拖着发辫，系着“三打金丹”的丝穗。从张家口出发，在北平停留了三天，住在北京饭店，曾出席“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为我们举行的迎送宴会。第四天由北平飞到沈阳，略事休息，即乘火车过鸭绿江到了汉城。日本的朝鲜总督南次郎招待我们住到一座华丽的宾馆里边。在汉城停留的三天中，头一天休息，第二天先拜访南次郎，后拜访朝鲜的傀儡“国王”。南次郎的总督府是一幢大理石建筑，气势庄严堂皇。傀儡“国王”住的老式官殿，显得特别阴暗冷落。南次郎为我们举行了宴会，吃的是西餐。翌日傀儡“国王”为我们洗尘，吃的是朝鲜饭。朝鲜的宫廷里边，还保持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礼仪，每上一道菜，就奏一次鼓乐。晚上朝鲜的剧团，为我们表演了古典歌舞，女伶憧憬亡国前的自由生活，歌唱如同哭泣，使人听得心酸，我们很受感动。散戏后回到宾馆，都说蒙古人也快要哭了。

从朝鲜赴日本，乘坐的是纸花彩绸装饰的轮船。登陆后，有一个曾在“蒙疆”工作过的宪兵队长，把我们接到一家“料理店（妓院兼卖小吃的商店）请吃烤牛肉。休息约半点钟，始乘专车向东京进发。车上的服务人员，均是烫发的妙龄姑娘，给我们倒茶点烟，散发削皮的水果。沿途每站都有穿礼服的官员上车表示欢

迎，专车上挂有瞭望车，可以看到铁路两旁的人，全向这辆车鞠躬行礼。进入东京市区，专车换成电气车头，驶入一片摇动旗帜的人海里边，约有十大几里长，直至下了火车改乘汽车，到达帝国饭店的门口。我不知德王由日本那个高级官员陪同，和我同乘敞篷汽车前往宾馆的，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在赤峰担任过领事的中根，我们早就认识。中根会说中国话，并且是一个“蒙古通”。我问他：“两边摇旗的喊些什么？”他说：“今天东京有四、五十万市民，夹道欢迎你们，他们都高呼“蒙古万岁。”

帝国饭店虽只是三层楼房，但却非常富丽堂皇。有大客厅、中等客厅和小客厅。我们到达前，大客厅早坐满了日本的和外国的新闻记者，都挤到走道上用照像机拍德王的奇装怪服。我们被让进一个中等客厅。记者推出几个代表要求德王发表谈话。没等德王张嘴，金井章二便向他们说：德主席非常疲劳。现在是下午三点钟，等休息好，到晚上八点钟再跟大家谈。记者们的代表走后，金井问德王：“你打算谈什么？”德说：“我要向东京朝野呼吁，协助蒙古建国”。金井说：“此事由关东军和驻蒙军解决，不能在这里说。”德说：“你不叫我用嘴说，我也要书面呼吁。”金井说：“大家都先回各自的房间休息，等一会再研究。”我被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招待员，引进有卧室、浴室、厕所和小客厅的房间。刚在小客厅的沙发上坐下不久，金井章二从外边走了进来。他说：“德主席不听话，你可以代表他去和记者们说，除了表示前来答谢天皇陛下，旁的咱们回张家口再谈。”我说：“这是天皇足下的东京城，有砖有瓦的地方，我不怕，现在就跟记者们去谈。”他听我话中有刺，怕我对记者冒野腔，忙阻止说：“吃饭以后再谈。”

吃过饭已经六点多钟，德王拿出一张吴鹤龄早拟好的书面谈话稿子。金井叫重新修政，德王不答应；中岛万藏跑进我的房间，让我劝告德王不要执拗，我说：“我不去劝，他不听我的。”中岛说：“他和你一致，听你的话。”我说：“他这次来是为了告御状，可是你们不让他说。他那种犟脾气，我怎能劝动？”中

岛说：“关于蒙古建国的事，回去由关东军和驻蒙军解决。”我说：“他因为那里不给解决，才要来这里说。”中岛说：“天皇陛下听关东军和驻蒙军的，关东军和驻蒙军不同意，你们在这里吵得翻了天，也对事情没有裨益。”我说：“你们到了东京——日本国都，还像在蒙疆时压制我们。我只能鼓动德王去说，怎能阻止他呼吁？”中岛万藏一看我的态度和德王相仿，便去回复金井章二。到了八点钟，记者们在大客厅中坐满，金井拿上德王的稿子，叫杉本给翻译，德王用手夺过，让吉尔嘎朗到大客厅中去念。金井没有办法，只好依照德王的意思。我听不懂日本话，不知吉尔嘎朗在麦克风前边胡嚼了些什么，我问吉：“你提了蒙古建国的事没有？”吉说：“我那里敢提？金井说如果照稿子直译，回去要砍我的脑袋。”第二天觐见裕仁时，是由陈国藩给德王担任翻译，他也怕砍脑袋，可能亦未敢替德王在天皇跟前告御状。

觐见裕仁时，用一辆黄色汽车，把我们从帝国饭店，接进日本皇宫。德王先带着陈国藩进去，谈了不到十分钟话，裕仁的侍从武官出来，又招手让我进去。裕仁坐在椅子上面，德王鸛立在左边，我按照中岛万藏预先教给的礼节，从左边的门走了进去，站在当中鞠了一躬，德王向裕仁介绍说：“这就是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大将”。裕仁从椅子上站起，我正步向前走了三步，和他握了握手，又退回三步行了一鞠躬礼，从右门走了出去。其余人是一同进去，听说裕仁只向他们欠了欠身子，德王最后辞出。裕仁也没把他送到门口。我问德王：“天皇跟你谈了些什么？是否容许蒙古建国？”他的神气非常沮丧，对我直摇摆脑袋，表示日本天皇并没有用金口玉言，封他为蒙古的皇帝或者是蒙古的总统。

德王访日和溥仪访日不同。裕仁对他不按国家的元首看待。我们觐见完毕，并没有为我们举行国宴，而是由平沼首相、坂垣陆相和米内海相等，分别给我们洗尘。我们先在东京拜访了好多贵族和参拜了神社，又到大阪等地参观。拜见那些贵族时，他们仅为我们大开仪门，众人朝着影壁行三鞠躬礼，在签名簿上签完名就走。

主人都不出来迎接，连茶水也没给准备。这样整整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东京的神社和北京的庙宇一般多，共参拜了一天半。因为下着小雨，我们都穿着雨衣和打着雨伞，到了每一神社，和尚让我们洗净手签字，朝着神位低头肃立致敬，还叫立在门口照像留念。张启祥由于受到东京日本贵族的慢待，并且对顶着雨参拜神社很不耐烦，每次照像他准出洋相：不是咬牙切齿，便是把头倒过，要么左右摇摆，像片洗了出来，气得中岛万藏直骂他：“八嘎牙鲁！”（日语：意为混蛋）。

由东京到大阪前，我们在东京近郊还参观了三个地方。一处是蒙古人在日本住过的几间破房。据说是忽必烈的军队登陆时，被俘的兵曾集中那里，以后释放和日本女人结婚，在日本繁衍下不少子孙，故日本人含有蒙古人的血液，日蒙是一家人。我问吴鹤龄有无此事，这个蒙古圣人说，他在中国的古书上，并没见过如此的记载，完全是日本人编造的。一处是距东京四、五十里地的渔村。我们到了那里，全村的大人小孩都打着五颜六色的纸旗，高呼：“蒙古万岁！”说是叫我们来这里看各种鱼类，实际上是叫我们看日本从城市到乡村，举国都在欢迎我们，表示日蒙亲善。一处是东京附近的博多工业区。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炼钢厂和纺织厂，以及举世闻名的博多领带厂。这一区域方圆四十多里，到处都是烟囱，他们把我们弄到此处，向我们夸耀日本轻重工业的成就。

记不得我们是在东京附近，还是在大阪附近，会见了包头附近五当召来此留学的三十个青年喇嘛。他们被日本人用鱼虾大米，喂养得都是红光满面。这三十个喇嘛除了受特务训练，以备回国后散布日蒙亲善的思想毒素外，还在留学期间给日本军官的寡妇种佛子。在这些寡妇的月经来临前后，把他们叫去睡觉。关于此事，我在归绥就听人们如此传说，为了证实是否如此，特把一个喇嘛叫到一旁盘问。他说：“我们于夜间坐汽车前去，天亮以前即送回，胡里糊涂的如同做梦，日本人不叫我们宣传。我们在这里吃得很好，又玩弄女人，比在五当召好得多，所以谁也不想家。”

到大阪参观，主要是叫我们看日本的富强和战备力量。故在这一个地方，就消耗了五天时间。先看了他们的金矿和金厂生产的金砖、金条，以及造币厂、制造勋章和纪念章的工厂。接着又叫我们看海军的兵舰，空军的各种飞机模型与滑翔机，以及制造野炮的工厂。另外还看了盲哑学校和残废军人收容所。瞎子哑吧都能打字，少腿没胳膊的人也不吃闲饭。最后参观他们的刺枪、劈刀、摔跤和骑兵跳越障碍等许多技术表演。其中有一个日本老头子，一下子就摔倒三个到大阪表演摔跤的蒙古选手。所有这些，都是叫我们认识日本不仅有大量的金砖、金条、金币，而且有大量的飞机、野炮、兵舰，连盲哑残废的人亦都有活干，能给国家服务生产。至于他们的国民，一个老头便可摔倒三个蒙古青年，使我们失去民族自尊心，死心塌地地臣服于日本。这无异也是警告德王：你想独立建国，凭你们的人力、物力，配吗？我虽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半文盲，也懂得日本用意所在。因此我对众人说：这不是让咱们来游山逛景和看稀奇玩艺儿，是摆出东西教训咱们。众人哑口无言，都点头称是。

日本人为更进一步教训我们，当我们到大阪参观完毕，特别在我们的访问日程上安排了三天时间，让我们去看他们的战胜山。这座山在海岸上边，有二、三里的围墙已倒塌不堪是用石头垒起的。围墙外面的好多突出的大石头上，尽刻着“元寇登陆处”的字样。讲解员用汉语和我们说，当年日本人就是在此处，击退忽必烈军队的进攻。那二、三里长的围墙，系女人、小孩用手垒起。带有火炮的元朝兵，从牛皮筏子上下来，全在这个海滩上被持着刀茅的日本人歼灭捕捉。后续部队由于不敢再登陆，都乘着牛皮筏子退到对面二十里的那座岛上，因为海上风浪很大，他们回不去中国，好几万军队找不到吃喝，全数在岛上活活饿死。所以那一座困死元军的海岛，日本人给起名为蒙古山。讲解员说得绘声绘色，好像煞有介事，让我们翌日坐船，再到那座蒙古山上去参观。

当天回到旅馆吃完晚饭，陪我们参观的中根，问我有什么感想？我向他说：“感想很多。此处为何叫我们参观三天？”他说：“这地方古迹多，一两天看不完。”我说：“这有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不是坏意。”我说：“我们远涉重洋前来贵国，是为了加强日蒙亲善。可是你们，可是你们……”他说：“你好像心里很不痛快，有满腹牢骚，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你有话可以和我说一说。”我说：“我不愿再在这里看了，因为有问题，不只是我。凡是蒙古人，都不想去看蒙古山。”他说：“是什么原因？”我说：“你们在石头上刻着什么字？”他说：“哎呀！是不是因为上边刻着元寇？”我说：“今天叫我们看元寇，明天也叫我们看元寇，后天还叫我们看元寇，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们原来联想到这上面，我们没有注意到。你提的很对，我们实在抱歉。”我说：“你们举国欢迎我们，使我们对你们产生好感，却叫我们到此处看元寇，这能团结一致吗？如果德王对此提出抗议，你们就不好摆弄。”他无言对答，直向我道歉，又扯了一些闲话，走出我的房间。

第二天，我们又到海滩参观时，他们连夜把石头上的字全都铲掉了。德王没有看出，中根和我挤眉弄眼地笑。我先和中根说：拿“元寇”两字刺激我们。日蒙无法亲善。我又走到德王跟前和德王说：“你看这些石头上面，原来刻过字没有？”德说：“好像是刚铲去。”我说：“他们为什么要铲去？”德说：“底下是什么字？”我说：“亏你连这都没看出？”德说：“究竟刻的是什么？”我说：“是‘元寇登陆处’五个字。你有什么感触？”德说：“那时是敌，现在是友。”我说：“他们连续叫我们看三天，太不礼貌了。昨天我回来向中根提出，他们才连夜铲去。”德说：“他们只叫咱们再看一天，就是叫咱们看字已铲去，明天要另换地方，那个小岛不让去了。他们已经认了错，再要理论就不合适了。”德王以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自居，过去对此非常爱吹毛求疵。他这回却等闲视之，就是参观了许多地方，受到日本国力的威慑，无形中

腰杆子矮了半截，故没敢借此发作他的一贯执拗脾气。

到各处参观完毕，我们在日本最后的日程，是去北海道南边，距东京二百多里的地方作短期休养。日本人在别处教训完我们，又在此处“乖哄”我们。这一个所在，是日本的风景区。高山顶上有一小湖，四周尽是东京贵族和资本家的别墅，好多旅馆里边，都住着前来游览的外国人。我们从东京出发坐着专备的电车，每辆车上有两个漂亮姑娘伺候，从山下往山上盘旋时，又换了伺候的姑娘。进了招待的旅馆，先是举行小型宴会，然后是各自随便点饭，羊肉是由张家口用冷藏车运来的。德王因为不喜欢吃日本饭，要了好几斤手把羊肉。我嫌羊肉味膻不如猪肉好吃，由于出国以前把大烟戒掉，饭量大增，一顿就吃了八碗大米饭和两碗炖得稀烂的猪肉。把好多日本人都看得大睁了两眼，说蒙古人真能吃饭。我们投日的时候，都有各自的个人抱负，可是上了贼船之后，便身不由主。这次来到东京，本来是想告御状，但受金井章二的压制，也没有达到目的，所以都心情苦闷，感到前途茫茫，只好用努力加餐和及时行乐来安慰自己。

晚上仍是宴会。完毕，叫大家挑选妓女伴宿。好的全被金井和中岛挑去，剩下次的给了蒙古人和汉人。除了德王、我、吴鹤龄和夏恭而外，都把妓女领回各自房间。我是因为没有看中，吴鹤龄是假装正经，德王经中岛等日本人给说好话，妓女又跪在地下不走，先倒是勉强留下一个。到了临睡的时候，他解衣把一尊护身的铜佛放到枕畔，不料那个妓女将手巾等物和铜佛放到一起。他勃然大怒，便把那个姑娘轰走，将门砰地一声关住。第二天他和我说了夜里的经过，并念了一段“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的《四书》上的话。自此他又板起装腔作势的架式，坚决不让妓女跟他伴宿。日本人怕碰钉子，以后便再不理他。我出国以前怕被日本小瞧，连烟枪都未携带，配了好多戒烟药丸抗癌，曾下定过洁身自爱的决心。后来由于色情的引诱，并且产生了一种“你们登上中国大陆奸淫我们的妇女，我们来到扶桑三岛，

也要报复一下”的心情，接着就在这个风景区夜无虚度。夏恭是一个行将就墓的老头子，并且非常“酸文假醋”，特别是那一夜，他的儿子和日本妓女，为开房间睡觉，带走他小皮箱锁子的钥匙，取不出携带的烟枪，躺在“塔塔迷”（厚草垫子）上，瘾的打滚，经我给了他些戒烟药丸，方安然睡下。日本人不敢叫姑娘打搅他，怕把他的那一付老骨头扔到东京附近，所以才把他放过。至于吴鹤龄，坚持了四、五天以后，在快离开这个风景区时，也是每夜把妓女挑选到房间。

我们在这个风景区，住了一个星期。更换了好几个旅馆，但不更换会做中国饭的日本厨师。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坐着花船游湖，船上全有姑娘伺候，向我们暗送秋波。白天看中以后，夜晚可以指名挑选伴宿。中岛看出我头一夜所以没要日本妓女，是因为他们把好的挑走，以后便让我们先挑，他们日本人再挑，我们越发感到心满意足，对着山光水色和美人芳草，竟丧心病狂，产生了恋恋不舍，“乐不思蜀”的想法，特别是平日茹素的吴鹤龄，领略了日本的风情，加之他为了进一步表示媚日亲日，藉考察日本的政治，以转变日本人怀疑他替蒋介石左右德王的成见，以战败他的政敌陶克陶，便在这时决定留在日本不走，娶了日妇和学习日文日语，从而奠定他以后在伪蒙政权中的牢固地位。我们休养期间，还参观了一个现代化的磁窑，把名字签在纸上，用不了十分钟就烧出签名的茶具酒具。他们送给我们每人各一套，以做游历此处的纪念。这个风景区的旅馆都很讲究，全有小型舞台，他们特叫乡下的青年男女，为我们表演了好几次日本民间歌舞，显示日本的农民，也是多才多艺的。

因为我们在休养期间，玩弄了日本的妓女，回到东京之后，又给我们补了两课。就是让我们到剧场看了日本女伶的高级舞蹈，和一万多女学生的柔软体操，他们在指挥棒下，表演操练得和日本陆军出操一样熟练整齐。他们的用意是，叫我们转换对日本妇女的观感。在东京有一幢临街高楼，据说是很大的，阳台没有栏

杆，说日本人曾把各国的使节请到这里看他们的陆军操演，指挥官喊了一声“正步走”！排头的几个士兵因为没有听到立定和向后转的口令，便向街心跳了下去，各国使节忙起来制止。指挥官方下令停止前进。这个地方也让我们上去看了一看，我从窗口上往街心一瞭，行人只有一二尺高，由不得眼花缭乱，感到不寒而栗。日本人专挑选死命亡徒来表现他们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实际上一般的日本人，也是都很怕死的。侵华以后，因为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他们才显得所向无敌；要是遇到英勇抵抗，他们也像草鸡毛一样抖成一堆。

我们离开东京回国以前，裕仁给德王颁赠了二等宝瑞勋章，给我也颁了三等宝瑞勋章，其他人均有不同的赠品。颁赠时没有举行授勋仪式，就在平沼首相饯行的宴会上，由平沼的侍从官员一一递交给我们。坂垣陆相为我们饯行完毕，把德王和我留下谈话，未让金井章二参加，由德王的秘书陈国藩担任翻译。他主要劝告我们要听“关东军”和“驻蒙军”的话，跟金井章二和其他顾问加强团结。关于蒙古建国的事，说是天皇正在考虑研究，希望我们不要急躁，要耐心等待争取。临末，给了我们两个条子：一个上写的是五百枝步枪，让德王装备他的卫队；一个上写的是战马两匹，让我在阅兵时骑乘。让交给金井章二向陆军部洽领。我们回国时，坂垣代表天皇把德王和我送到机场，路旁仍有十几万人，摇着旗帜高呼“蒙古万岁”。德王和我当天由东京经大连飞到北平。休息了一夜，即乘火车回张家口。连来带去整整四十天。其余的人除了吴鹤龄留下，都是坐火车和轮船，从海道经过朝鲜，回张家口、大同与归绥。

二、德王第二次访问日本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一日^①，德王第二次访日。刚过春节不久，

^①注：此间，日本正积极利用汉奸力量。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日、满、华共同宣言》发表。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四日，日本阁议决定《日满华陆海空统一交通政策要纲》。

我们从张家口出发，这时“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已成立一年多。本来在伪“蒙疆”政府成立之后，即应前去东京答谢裕仁天皇。可是在这期间，发生了包头、五原战役和日本特务机关扣捕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以及中共所领导的绥蒙各界联合抗日救国会等政治事件，所以一直没有成行。这时，汪精卫也在南京“还都”将近一年，除了我代表伪蒙出席了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青岛会议，四月九日汪亲自到张家口访问德王，在我们二次访日的前半个多月，汪又派他的伪驻日大使褚民谊来张家口活动，想把伪蒙完全隶属于汪的新中央政权底下。我们预感到伪蒙非但不能独立建国，恐怕连高度自治的局面都无法继续维持下去。因此需要进一步向裕仁天皇表示忠诚，以打消张家口“驻蒙军”军部在日本朝野给我们散布的流言蜚语。我们就是怀着这些目的，二次离开张家口访问日本的。

这次去日本，比上次去的人少。除德王和我以及于品卿而外，夏恭已经病故，高级人员只去了吉尔嘎朗和补英达赖，剩下便是德王和我带的秘书、翻译、副官长如陈国藩、于宝衡、张启祥、郝贵堂。我忘记了伪蒙政府的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是否领我们前去，但我记得归绥特务机关长兼我的最高顾问小仓，是随着我们回国的，我曾到他的家里看过他的老婆和孩子。伪蒙政府的参事小岛石藏，也陪同我们前去。我们从张家口到达北平没有停留，就改乘夜车于天亮时到达沈阳，在餐车上吃过早饭，另挂上车头向大连进发。一出沈阳越往东南走，气候越显得温和湿润，一路尽是苍松翠柏，没有一点寒冬景象。我从前没有来过此一地带，不知渤海北岸这样美好，怪不得日俄两个帝国主义都想据为己有。而我们这一帮家伙，是给日寇充当全面侵华的爪牙，现在我又厚颜无耻地跟上德王，像随着从前的蒙古王爷到北京给满清皇帝朝拜那样，再次去觐见日本天皇。我想到此处，对着铁路两旁的祖国大好河山，无心再往下观赏，便躺在软椅上睡去。可是思绪翻腾，不能入梦，闭目忏悔了四、五个钟头，于中午把眼睛睁开，

车已在大连停下。上来好多日本人欢迎我们，把我们接到宾馆，吃过午饭略事休息，即叫我们参观大连的市容。我们在小雪地上，坐着汽车穿街过巷，整整转了三个多钟头，天快黑时才回宾馆。德王在街上买了好多大连制造的怀表和手表，当时我不知道他做什么用，后来他分送给伪蒙团长和科长以上的军政人员，说是“日本的大官们赠给”他们的。我因感到前途悲观，决定醉生梦死地鬼混下去。大连的威士忌酒很便宜，买了十几箱由邮局寄回归绥。其他人看完大连的市容，都交口称赞说：日本人治理得真办法，小胡同里都没污水灰尘，比张家口的怡安街和福寿街还要清洁美观，咱们真自叹弗如。

第二天由大连乘坐汽车，去游览旅顺口的军港。此处比大连还要雅静，街上鸦雀无声，一看树木围绕的楼房，使人想搬到里边常期休养。我由不得产生了失意以后在大连购买房屋，托日本人保护，来此作寓公以逃避人民惩罚的念头。因为旅顺虽好，但一有战争便是个火山口，不如住到大连，既安适又保险。我们在旅顺没有让到港口参观，只是在远处瞭了一瞭停泊的军舰，随行的日本讲解人员，也没向我们说明里边的情况。汽车从港口附近盘到一个小孤山上，叫我们看日俄大战时俄军留下的阵地，战沟和铁丝网都存在着，大炮也支在那里。讲解员给我们说：“日军是用人垫平这条深沟冲过去的。”夸耀日军当年作战的英勇。山下有三间小房，说俄国的将军曾在这三间小房中签字投降，纸笔仍摆在桌子上边，保持着那时的现场原状。吉尔嘎朗和我悄悄地说：这是日本人危胁咱们。连俄国人都被日本人战败，你们蒙古人还敢反吗？！我点头称是。

参观完旅顺当天回到大连。翌日搭海轮前往日本。到达东京时，不像上次那样热烈欢迎，街上只有四、五千人摇旗呐喊，在“蒙古万岁”声中，把我们迎接到帝国饭店。欢迎我们的官员，我都忘了他们的职别和名字，其中有一个称为鹿子牧的博士，他居住在内蒙东部区多年。据说是一个研究蒙古问题的专家，写过不少有关蒙古的书。因为我从多伦进犯张北，又由张北进犯张家口

与绥包时，他都以东京某一部门观察员的身份，去过多伦和张北。这次在东京他不仅欢迎我们，而且陪上我们到处参观，故我对他的印象最深。我们在东京给宫里递上名片，说裕仁因病不能接见。第二天即开始访问贵族和参拜各个神社。裕仁的弟弟北白川宫亲王殿下，因于一九四〇年九月四日，日本空军在张家口演习对苏作战时，由于飞机失事而摔死，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是因保卫“蒙疆”而殉国，所以我们特别前去拜望他的母亲，以示慰问之意。这个日本公主（日本皇族为维护皇统“万世一系”不和平民结婚。皇族间互相结亲，故称公主）不像其他贵族那样，给我们吃闭门羹，除接见我们外，还让他的儿媳、和孙子和两个姑娘跟我们见了面，并招待我们吃了一顿中国饭。她先把我们让进客厅，叫我们吃桌上摆好的鲜果，她端坐在沙发上，脚踏脚垫，安详地听德王对她的问候。德说：“天皇陛下的御弟、为保卫我们蒙古而壮烈牺牲，我特代表蒙疆的一千万民众，安慰您老人家，希望殿下的公子赶快长大，继续援助我们蒙古。”她说：“我的儿子代表天皇陛下前去援助蒙古复兴，这是应当的。他虽然不幸死了，但是死得很光荣。我们日本朝野上下都愿意替蒙古出力，连贵族也是以死相助。我看到你们，如同见了我的儿子一般，我今天非常高兴，希望你们都不要为他难过。”她说这一段话时，居然没有流泪，叫她的儿媳和姑娘，为我们端饭布菜酌酒。吃过饭把我们领到后边。拜了拜北白川宫的骨灰，然后忍着心中的悲痛，用微笑把我们送出府邸。我们回到帝国饭店，大家议论纷纷，拿上她和蒙古王爷的福晋们做比较，都很佩服这个公主的庄重风度。

第三天，我们去拜见近卫（近卫文磨）首相和东条英机陆相以及其他日本的高级官员。在上次访日时发现，伪蒙是由日本的陆军部操纵，因为东条非常凶狠，不像板垣那样和蔼，他说话咬牙切齿，烟阻上都有牙印。由于他作事斩钉截铁，日本人给他送了一个“快刀”的外号。德王对着这位凶神，没敢往出摆列难题，说了一些冠冕堂皇，阿谀恭维的话，就夹着尾巴辞退。

晚上东条为我们举行完宴会，陪着我们去看电影，放映的是伪军和苏蒙军在诺门汗作战纪录片，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骑兵于拂晓出动，被日军的飞机冲散，苏军的坦克过来，亦被日军的坦克打退。东条对德王和我说：现在日本的飞机，比前几年还要厉害。我们发明了一个人驾驶，携带一颗大炸弹的飞机，在海上往敌人兵舰的烟囱中俯冲。英美的兵船遇上这种飞机，一定会被打翻炸沉。驾驶此种有去无回的飞机人员，不光是平民，也有贵族子弟。明天你们到飞机场，就可以看到我们肉弹勇士驾驶的这种飞机。翌日，我们到东京附近的一个飞机场，看了此种飞机装炸弹的表演，装时飞机把肚子张开，由电动机把缸一样粗的炸弹弄了进去又关住，由一个人到机头上发动马达，即离地钻入云霄。为了说明他们大量制造此种飞机和炸弹，还叫我们到大阪参观了飞机厂和炸弹厂。据说一天之内，能制好几百架飞机和好几百颗炸弹。

我们在大阪参观期间，领我们前去的鹿子牧博士，要把我独自一人请到外边吃饭，我推辞不去。他说“我两次去你那里，你都盛宴欢迎。为什么你来到我们国里，不赏我的脸？”我察觉他可能要跟我谈一些真实问题。我说：“你有什么事，可以在这里谈。现在房间中没有外人，吃饭我嫌腻不愿去。”他说：“究竟我们日本在华的政治如何？你真心实意地跟我谈谈。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回国以后就摸不清那里的情况。”我说：“我是一个军人，对政治格格不入，你让我怎么谈，从何处谈起和谈谁？”他说：“在你们蒙疆工作的日本人，究竟是好是坏？”我说：“你写文章一定是说据李守信亲口所谈，我怕得罪人。”他说：“你放心好了，我绝不拿上你去做材料。”我见他的态度相当诚恳，很虚心地想研究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观感，并且我心里藏有受日本顾问压制的委屈，便借此向他把一件事提出。我说：“我给你提一件事，可以概括其它。蒙疆丰镇县公署有你们的一个参事官，他在宴会上假装酒醉，当着好多中国人，把生殖器掏了出来，说是下雨了，给每个人的身上，都淋了他的尿点子。你们是文明国家，为

什么他如此野蛮！？”鹿子牧一听直打咳声，连说：“糟透了！”我说：“中国人对你们的反感很大。你们好好注意吧。”因为他没有再询问其它，我怕言多语失，损伤了这个日本学者的尊严，也就未给他再反映其它的情况。

我们由大阪回到东京，本来还想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因为这时日本正在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国内的空气比我们上次来时紧张了许多。同时侵华三年多，死伤很大，人民都有反战厌战情绪。他们怕我们看出各界的忙碌景况，每个人愁眉苦脸的表情，不让我们四处乱跑，便以侵华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和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要到蒙疆视察为理由，让我们赶快回张家口筹备欢迎。我们在东京附近的一个机场搭机，吴鹤龄也同机归国，路经大连机场停了一阵，当天即在北平降落。西尾和坂垣是二十三日到张家口的。受到伪蒙政府隆重欢迎。

三、德王访问伪满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伪满“建国十周年”①大典举行完毕后，日本“关东军”为了让德王给溥仪捧场，德王也想借此机会前去联络伪满“兴安省”和“兴安军”的蒙奸，所以带着我和吴鹤龄、乌古廷、金永昌、丁其昌、吉尔嘎朗等伪蒙的蒙奸、汉奸以及伪蒙政府秘书长村谷彦治郎、总务厅参事中岛石藏和曾任西苏尼特旗特务机关长的突浦等日本人，由伪满驻伪蒙的代表李宜顺陪同，前去伪满进行访问，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长春（当时称新京）。我们从北平经天津出关后，路过奉天（沈阳）的时候，铁路两旁都有护路的乡团，向我们的专车举枪致敬，表示伪满的铁路交通在乡团保护下非常安全。进入吉林境内，即无乡团护路。据日本人说，此一地带治安非常稳定，胡匪很难活动破坏。到达长春的时候，因为他们的“建国大典”已经举行完毕，并且他们对伪蒙也不按一个“国家”来看待，故街市非常冷落，没有群众夹

①注：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伪满皇帝溥仪发布《建国十周年诏书》。

道欢呼的场面。只是伪国务大臣张景惠和治安部大臣于琛澂带着几个次长级的官员和四、五百各界代表，把我们从车站接到宾馆，

翌日上午十点多钟，我们一行到伪满的皇宫中去拜见溥仪。德王先走了进去，爬在地上给行了三跪九叩的封建大礼，谈了二十多分钟话，内容他没和我们说，被招待到别室休息。接着溥仪单独接见了我们。我们从宾馆临走前，众人曾争论过对溥仪应当怎样称呼：称“您”好像不太恭敬；称“陛下”又恐失掉蒙古民族的尊严。我以为都是日本卵翼下的傀儡，溥仪并不比我们高多少，当汉奸还分什么儿孙辈，所以主张称“您”。德王以为三十年以前我们都是他的臣民，既然访日时已经称了天皇“陛下”，称溥仪为“陛下”也不丢人。结果大家都采纳了德王的意见。我由于有过上述的动机，初入宫时，还不大拘束。可是轮到我一个人拜见时，不由得拘束起来。这是因为我是光绪十七年生的，在清朝当过二十多年百姓，认为宣统皇帝现在又成了康德皇帝，究竟和凡人不同，对他感到神秘，怪不得德王给他磕头。所以当他把我拉到他跟前的沙发上坐下，递给我一支香烟，我恐怕失礼就假装没有此种嗜好。

及至溥仪以目示意，把侍从的人撵退出去，我一看他是个穿着西装的中年人，和我很随便地谈话，并不是穿着龙袍的皇帝，我才减去了浑身的紧张。他首先问我：“地方太平不太平，队伍困难不困难？”我说：“地方很太平，队伍也不困难。”他接着问我：“你如果有困难，可以和我谈。”我说：“业已干了这件事，陛下也明白，我缺短什么，一股劲儿地向他们要，如果叫官兵挨饿受冻，我就越发对不起官兵们了。”最后他问我：“你认识张侍从武官吗？就是张海鹏。我听他和我说，他和你有关系。”我说：“我是他的门生，他的儿子张子明和我结拜。”他说：“那太好了！你现在当面提不出来，可以和他谈，他可以转告我。”说完，我向他鞠躬辞去，也被侍从领到待德王的那个别室里边。这时溥仪的御用褂（亲近侍卫）吉冈安直正陪着德王谈话，便向我打听溥仪跟我

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了他前半段，没有告诉他后半段。

除了德王和我而外，其它人都是一起见的溥仪。他们说了一些满蒙亲善的话以后，溥仪也把他们让到别室里边。接着在一个便殿上，招待我们午餐，由张景惠、张海鹏和吉冈等人作陪。为了表示亲近，没有致词和答词的套数。众人在长桌两边坐下，用吃西餐的办法吃中国菜，张景惠坐在德王的下首，不住向众人劝酒，这天溥仪和德王似乎非常高兴，所以吃得很香。张海鹏离我坐的也不太远，因为吉冈和其他日本人在座，他只向我点了点头，未敢和我表示亲近，我也不敢和他叙阔别之情，两个人好像过去没有认识那样冷淡。其他人对着溥仪，都不敢放肆，只是吃喝而不谈笑。这次宴会，很不热闹欢快。

下午我们去“关东军”司令部，拜见了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晚上梅津为我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伪满的群奸张景惠、于琛澂、张海鹏以及“兴安军”司令官巴特玛拉布坦等，吉冈和日本驻长春的其他高级官员也都应邀作陪，大客厅上挤了二百多人。宴会开始前，张海鹏的儿子张子明挨到我的跟前，我对他说：

“我们出门，日本宪兵跟着，对我们监视很严，故我不能前去拜望令尊，你回去代我致意。”他说：“家父也有此感，所以未到宾馆看你。皇上对你早有印象，托家父问你有什么要求。”我说：“今天上午觐见时，我已说了咱们的关系。现在我和德王唱那一台戏。以后如有机会，一定要报效皇上，现在彼此心里知道就行了。”我怕吉冈和其他日本人注意我们，向张子明使了一个眼色，他忙缩到来宾的人群里边。我来长春，竟不能和张海鹏直接会面，由此说明蒙奸和汉奸在日本人的控制下，行动被束缚到什么地步。

宴会开始前，梅津和德王分别致了欢迎词和答谢词。德王在答谢词中，谈到“从百灵庙自治运动到张家口建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均依关东军为后援，故有饮水思源至深感激”的话语；并表示伪蒙今后“愿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贡献所有力量，为东亚共荣和皇军

胜利而努力”。吃饭时，摆着西餐的桌面，按左文右武来排列。梅津坐在主位，我对着德王，我以下是巴特玛拉布坦和乌古廷，德王以下是张景惠和吉冈。巴看到我佩带着大将肩章和乌古廷佩带着中将肩章，感到非常的不高兴。以为我是胡匪出身和乌古廷都不是贵族，很不配跟他这个扎赉特旗王爷坐在一起。于是指着他自己大将肩章向我夸耀说：我是关东军给的，你们是驻蒙军给的。因为梅津虽听不懂中国话，可是张景惠和我坐在斜对面，我没好意思用“都他妈的巴子是汉奸，关东军给的并不高超，驻蒙军给的也不光彩”的话回敬巴特玛拉布坦，故向他斜视了一眼，即把头扭过。不料被乌古廷对面的吉冈发现，忙用汉语和我们说：你们和梅津大将的肩章一样，都是天皇陛下给的。巴听到受宠若惊，故意把胸脯挺起做了一个致敬姿势。我觉得蒙奸都是些吃里爬外的家伙，老尿不在一个夜壶里。就凭伪蒙和伪满的这几颗料，咋能把民族复兴起来，不过是打着蒙古的幌子，进行政治撞骗而已。我由于受到巴的污辱，这顿饭吃得很不痛快，无论端上那一道菜，如同嚼蜡一般乏味。散了宴会，我回到宾馆，神气还很不好。众人问我，我把经过告了他们，他们也非常气愤。

我们拜会溥仪和梅津完毕，即到哈尔滨和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去参观。到哈尔滨是溥仪与张景惠等陪我们前往。因此哈尔滨禁了街（即戒严）。入夜以后，马路上布满岗哨，不让行人通行，致使我们不能看哈尔滨的繁华市区和到白俄居住的地方玩乐。第二天他们领我们乘快艇游览松花江，参观伪满的江防舰队。伪满的海军为溥仪莅临和欢迎我们，鸣了礼炮二十一响。在快艇上用完午餐，即乘火车返回长春。休息了一两天，又乘火车经白城子去了王爷庙。博彦满都、巴特玛拉布坦和玛鸣周等前来欢迎我们，并在火车站外边检阅了“兴安军”的军乐队和仪仗队。那时成吉思汗庙还没修起，街市非常冷落。伪蒙和伪满的蒙奸聚到一起，只是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日本人叫大家畅谈有关彼此援助和共同为“大东亚共荣圈”和大东亚圣战做出贡献的事，可是都怕言多语

失，谁也只顾吃东西不说话。我憋不住了，站起来发言说：这里人才济济，我们那里缺少，是不是可以派出一些毕业学生，前去帮助我们建设蒙疆？可是与会的人全不吱声，连德王也没敢在这个场合上谈论加强蒙古团结的大道理，喝完酒即行散会。

我回到宾馆，晚上“兴安军”的副官长李友桐来看我，因为一九三三年我在林西投敌时，即跟他认识。他说：“我们都想脱离满州国，去蒙疆工作，由于这里很受压迫，不如那里比较自由。可是日本人在东西蒙之间树着一道墙，你在酒会上所谈的话，以后再不要提，我们也同有此感，就是不敢说。”

我们在王爷庙停留了两三天。一到晚上，不是德王由乌吉廷领上去找博彦满都和巴特玛拉布坦，便是博彦满都和巴特玛拉布坦来找德王和乌吉廷。我被他们视为汉蒙古，陶克陶和金永昌被他们认为是日本人的特务，故对我们三个人回避，不知他们商量了哪些事？可能对他们秘密建立的那个“铁血同盟”政治组织，做了更进一步的策划和部署，决定日本失败后他们如何一致行动。

从王爷庙回到长春，又去公主岭参观酒井机械化师团的陆空联合演习。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就是跟着这个师团进归绥和包头的。不到五年工夫，该师团增加了好几种新式武器，有可以跳越沟壕和冲倒房屋的重型坦克和一个转盘操纵的两门大炮，另外还有在张高峰跟苏军作战以后，新发明的滤水机。日本人为了在沙漠草原作战，早在一九三三年就有了快速的掘井机器，十几分钟即可从低洼地方把水吸出，曾在多伦作过表演。新发明的滤水机，可以除去盐质硷质、以及井里边投下的毒物。他们因跟苏军作战时，吃过水的亏，所以又发明了这种机器。酒井师团长向我们吹嘘说：皇军现在在沙漠草原行军作战，一切困难都可克服，武器的威力也大为增强。故诺门汗战役以后，苏军再不敢来碰，怕被皇军歼灭。我们这个师团所以很少外调，就是在此准备对付他们。我们对着酒井师团长当然也说了一些恭维奉承的话，表示日军

战斗力增强，是满蒙的保障。酒井没为我们举行宴会，只招待我们进行野餐，观看陆空演习完毕，当天即返回长春。

我离长春以前，伪满治安部的次长陈进修跑到宾馆叫我无论如何要到他家里吃饭。因为一九三三年，我代表崔兴武勾结日寇，即在长春跟他认识，并且是他领着我见张景惠的。伪满驻蒙代表蔡文到张家口时，他还给我捎过问候的信。我说：“我们出门由日本人开车，并且日本宪兵跟着保护，我怕彼此都不合适，因此不敢四处拜客”。他说：“我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对我不注意。”我无法再行推辞，便带着烟枪去到他的家中，以备旁人问起，好说是找僻静地方过瘾。在这以前，张景惠、于琛澂和蔡文等，都请过我单独去他们那里吃饭，均被我拒绝。我到了陈进修家中，不知谁把消息传出，都给陈进修打来电话，探问我去了没有，他们也要准备前来。我叫陈进修赶快顶住，就说我没有来此，以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

吃过饭，两个人抽烟的时候，他和我说：“我们如同被日本人装在罐子里一般，外边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你们靠近中国的边境，蒋介石究竟有没有办法？”我说：“他们找我，也是问这些。”他说：“众人对此都很关心，所以均想叫你掏耳朵。”我说：

“我和你们一样，消息也是非常闭塞，并且和他们没有来往，故不知重庆的情况。同时蒋介石有了办法，咱们这一伙人就要倒霉，所以我懒的打听，只好昏昏沉沉地鬼混下去。”因为我怕他做我的情报工作，所以不敢和他往这方面闲扯，并且和他打岔地说：“你们这里很太平，不像我们那里经常打仗。我很羡慕你们住着楼房，门前栽着花木。”他说：“我们这里非常恐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大祸临头。听说日本人对你们很宽，你们随时可以跳过黄河那边。”我说：“咱们只要一头磕到底，永远跟上他走，我想也没有多大危险，希望你不必担心害怕。”他因为从我的咀中套不出他想知道的事情，吸着我从归绥带去的烟土，竟吃醉了呕吐起来。我说：“你好好休息吧！我不能在这里呆得时间太久。”

说完，即行辞退，他把我送到楼房门口，那个给我担任警卫的日本宪兵，早站在院子里边。

五月初，我们结束了伪满的访问，我由张家口回了归绥。六月间伪满为了答谢德王，派于琛澂专使，率领伪“兴安省”省长博彦满都等，从长春来到张家口，作为回访。由于我没有去张家口，不知两方面的傀儡们表演了些什么节目。

我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会议”经过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厚和(今呼和浩特)特务机关长兼“蒙古军”最高顾问小仓通知我说：“有一个重要会议让你前去参加，现在就带上堀顾问和翻译，坐飞机先到张家口。”这时，因为日军的厚宫师团都从大同以东西调，正准备协助王英进犯后套。原厚和特务机关长桑原，也从厚和调到包头参与这次进犯，由我的最高顾问小仓兼了厚和特务机关长。我怀疑是他们把我弄到张家口软禁，怕“蒙古军”扯他们的后腿，所以我没问小仓叫我前去参加什么会议，便领着堀顾问和翻译郝贵堂到了机场。

到张家口后，我到伪蒙政府去见德王。他说：“汪精卫在青岛召集咱们开会，驻蒙军非叫前去参加不可。我因不能和王克敏、梁鸿志们并列在一起，所以叫你代表蒙疆前去。汪要问到我，就说我卧病无法起床。”说着，他给了我二指宽的一个纸条，上边写着：“前察、绥两省和山西里长城以北，为蒙古的高度自治区域，蒙古可以驻兵和安设官吏”等字样。他说：“你就照这个签字，别的都不要承认，我们以成吉思汗做纪年，他们不能管，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旗子，不挂他们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我问他：“再有别的事没有？”他说：“就是这事。”我即从伪蒙政府辞出，回我上堡的家中休息。

二十二日又坐上飞机，下午三点多钟到达青岛，被日本人招待到一个山坡的旅馆里住下。不大一会，板垣也到了这个旅馆，我即去见他。我说：“德主席有病，叫我替他前来”。他笑了一笑，说是：“我知道了。”接着说：“这是个日本旅馆，你住着恐怕不方便，不过这里非常安全，因为蒋介石已派不少兰衣社的人，秘密潜入青岛，要破坏这一次会议”。我说：“我带着翻

译”。并问他：“你和汪同来的吗”？他说：“我和汪一同乘兵舰来的。明天你们可以见面了。你见过汪没有？”我说：“从未见过。”他说：“你休息去吧，有事可以找我。”二更时候，堀顾问跑进来说：“明天中午汪要单独见你，并请你吃饭，板垣很犯愁，说这该怎么办？”我说：“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就叫板垣决定吧。”堀说：“板垣叫我问你，你看汪是什么意思？”我说：“汪一定要表示拉蒙古，我不表示态度，问起军事，跟他闲扯几句，问起政治，照德王嘱咐我的和他谈。对于日蒙关系，我说好不说坏。”堀顾问听我说完，到板垣的房间走了一遭，回来和我说：“板垣认为你判断得很对。你就照德主席指示的去跟他谈。”我对堀顾问说：“还有一件事，我明天见了汪，应该怎样称呼，他要称我李总司令，我叫他汪精卫太失礼；我要叫他汪主席，他不是我们蒙古的主席，你替我请示一下板垣。”堀顾问出去又回来说：“板垣让你随便叫吧！反正他不是你们的主席就是了。”

二十三日上午，汽车把我们接到山顶的一个大旅馆里边。沿途戒备森严，每隔几步就有一个日本宪兵站岗。大旅馆的客厅中，早坐下二十多个人，桌子上放着两张写好字的纸和两枝新笔。招待人员把我领到一个湖南人跟前，向我介绍：“这是周佛海先生。”我们握手寒暄毕，两个人走到桌子跟前，各拿起一张纸，我见上边写着他们的伪“中央政府”承认我们伪蒙古的高度自治权，我们的代表可以出席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相互间的关系细则，由他们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和我们的代表再行商议。意思和德王临走时给我的那个纸条上写的差不多，并且我知道一切均由日本人预先安排决定，他们也不敢捉弄我这个老蒙古。周佛海和我说：“你仔细看看。”我对他说：“没有什么差错。”便毫无顾虑地在每张纸上签了字，把一张放到我的皮包里边，其余人都拍起手掌，庆贺协议达成。

签完字，周佛海进了汪精卫住的房间。不大一会，周招手叫我，我走了进去，周向汪把我介绍完毕，即行退出。正在这时，

掘顾问把郝贵堂推入里边，拿着一个照像机，听我们谈论什么。汪问我：“这是谁？”我说：“我带的人。”汪把我让到靠近窗户的一个茶几跟前，我向郝贵堂狠狠地盯了一眼，郝退了出去。汪才说：“李总司令，你辛苦了。”我说：“汪主席，你也辛苦了。”他说：“彼此都一样，没有什么。”我说：“早没见面，久仰大名，你可以说是不避危险诋毁，一生为国家大事奋斗。”他说：“实在抱歉得很，我很愧对全国父老。你坐下，咱们好好谈一谈。”这时，我站在那里，他把我拉到沙发上问我：“你的防地安静不安静？”我说：“傅作义前年反攻厚和与去年袭击包头，都被我们蒙古军配合日军打退。”他又问我：“你的部队有无困难，你可以和我说，咱们研究一下，我好替你解决。”我说：“咱们亲日，不能叫兵们跟上受罪。没吃的向他们要，没钱花也向他们要，蒙古军补给很好，武器装备也不太差。”

汪精卫一听我不向他求援，便喝了几口清茶，突然和我说：“我打听一件事。听说你们那儿满洲人和蒙古人有摩擦。”我说：“满洲人是蒙古人的外甥，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我说：“蒙疆有多少满洲人，恐怕你不明白。”他说：“这个我不明白。”我说：“蒙疆的满洲人，都聚居在厚和的新城，现在剩下不到一千户，就产生了一个市长。目下，厚和市的市长李春秀便是满洲人。我们那里也照顾少数，讲究民族协和，因为汉满蒙回藏，都是中国人，没有摩擦那回事。”汪一听，再不吭声。接着他又问我有无困难。我说：“主席老问我有无困难，可见对我们蒙古非常关怀，我们的困难可以就地解决，不愿给主席多添麻烦。”他看了看我始终不向他张口，便转变了话题，扯了一阵问候德王起居饮食的闲话，即和我共进午餐。由周佛海、褚民谊和梅思平等作陪。饭毕他和众人即把我送出旅馆。

晚上，“新中央”、“临时”、“维新”与“蒙疆”四方面的汉奸头脑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联欢宴会。板垣也出席参加了，吃到十一点多始散。二十四日早晨，我向板垣汇报了和汪精

卫谈话的内容，我说：“他们今天要讨论他们三个政府合并的事，这和我们蒙疆无关，我想今天回去，不知你以为怎样？”他说：“没你的事了。你今天就走吧！”吃过早饭，汪派周佛海把我送到机场，我即由青岛起飞，当天飞回张家口，向德王交代完毕，翌日，仍乘那架飞机返回厚和防次。

汪精卫于这年三月在南京举行完“还都大典”。特在四月九日，跑来张家口访问德王，德装病不予接见，汪赖在宾馆不走。“驻蒙军”军部为了维持汪的面子，强烈要求德王必须接见。德没有办法，才勉强和他见了面。因为我没在座，不知他们商谈和决定了些什么事。只知以后德派伪蒙的政务院院长兼察哈尔盟盟长卓特巴札布和前“察南政厅”长官陈玉铭，代表伪蒙疆出任了汪的伪中央政治会议的委员。这样，虽然德王内心里一向反对与汪伪政权发生关系，但在日本人操纵下，还是产生了藕断丝连的关系。

冈村宁次召开的一次华北伪军首脑会议

一九四四年秋末冬初时^①，我在厚和市(今呼和浩特)突然接到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的一个紧急通知，叫我带上堀顾问，到北平出席一个重要会议。我带着堀顾问和翻译郝贵堂，乘飞机到张家口，停留了两天，转乘火车去了北平。“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和我们说，日本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召集“华北”的军队将领和“蒙古军”首领研究联防问题。德王听到这个消息，怕我和“华北”的伪军头子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开会，有失伪蒙“国格”，叫我暂勿前往，让“驻蒙军”军部给北平去电话：

“开会时许我坐首席，我才前往参加，如不许我坐首席，我即不去参加。”北平回了个可照办的电话，我们方由张家口启行。

会议在铁狮子胡同日本驻军司令部举行。因为“华北”的伪军头子在北平都有房院或办事处，出席会的人会前没有见面。开会时才知道有我和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以及解放后在某地用椅子抬出去枪决的那个姓张的(佚其名)代表了六个单位。庞炳勋的儿子给他担任随从秘书，被日本宪兵挡在会议室门口。我见他非常难堪，便把他让到首席上边，我认为都是些汉奸，还分什么高低大小，没听德王的那套说法，便挨着庞炳勋坐下。冈村首先指着我向他们说：“蒙古军李总司令来出席这次会议，是象征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大联合。”接着冈村问我们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拿出写好的单子，要求补充械弹和增拨经费。冈村很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研究以后再通知你们。”他见我不做声，便问我：“你有什么要求？”我说：“蒙古军的困难，由驻蒙军给完全解决。”最后冈村叫他的副官，递给每人一张伪“华北联合准备银

^①注：一九四四年秋冬之季，形势已经十分紧张。美B29轰炸机于七月、九月、十二月连续空袭日本、东北要地，东北、华北形势均呈现紧张状况。

行”十万元的支票，他说：“我没时间招待你们，你们拿上这去零花，一方面等待给你们解决问题，一方面趁此在北平玩个十天半月。大家在前方都备尝辛苦，可以好好去休息一下。”会议就这样结束，根本没提如何联防的事情。

第二天，为了显示“华北”和“蒙疆”的军事联合，又把我们召集到铁狮子胡同合照了一张相。摄影后，十几个伪报的新闻记者，将我们围在客厅里边，叫我们谈有关强化治安，保护民众一类的话。因为谁的防区内也不稳固，谁的队伍也不保护老百姓，所以都无话可说，空气陷入沉默。我便向庞、孙说：“得谈几句。”张岚峰说：“那你就谈吧！”于是我向记者们说：“我是个蒙古人，被长城隔在外地，离华北很远，消息阻塞，这里的地方治安不知道，民众的痛苦也不知道，我所谈的就是这些，完了。”记者听我不着边际的谈话，知道别人再谈不出什么，怕呆下去越发要冷场，便扫兴地纷纷辞去。不过翌日的各报上，还是登出日本人看见高兴，我们不敢否认，由他们编造出的一大篇冠冕堂皇的谈话。

打发走新闻记者，张岚峰叫我去他家里“串门”。我因对这次会议非常纳闷，也想让他给我掏一掏耳朵（透露点消息），同堀顾问回我什锦花园家中吃完午饭，把他撤下，我便去拜访张岚峰。张那时刚买下佟麟阁的一连四个大院的房产，油漆粉刷一新，正由佣人在每间房子中摆设家俱古董。他向我吹嘘说：“我有三十多万人，占有十几县地盘，四面被八路军围着，和蒋介石通着一个口子，给蒋供应物资，所以拣了不少的钱。何其巩要为他的大学捐款，我一下子给了他三十万。”我们正闲扯的时候，庞炳勋也来拜访张岚峰。寒暄毕，我便冒失地问庞：“将军鼎鼎大名，为啥也从那边过来，跟我们干这？”他说：“我没有什么，报上给我瞎宣传。我把队伍从那边带了过来，完全是上了孙老殿的当。”接着我迫不及待地问张岚峰：“冈村把咱们都叫来，究竟是搞啥？”张说：“日本人现在正准备打通广西到安南的道路，华北的日军大都调走，故把咱们全稳在北平，恐怕抄他们的后路。”我

问庞炳勋，他也是如此判断。庞因不像张那样得意，听我和张闲扯各自防区里的情况，不插咀，坐在一旁直打咳声。吃过饭后，我怕他们有事要谈，为回避起见，即向张庞两人告别。

孙殿英到了北平非常活跃，坐上汽车到处拜客。他拜见完我，我把他送出大门，看到他的和司机坐在一起的卫士，用手枪朝着我的门口，做出射击的姿势。我挖苦他说：“你真是鱼不失水。”因为他在热河为巴结汤玉麟，汤的姨太太死时，曾拿着一根哭丧棒站在灵前充当大孝子；后来汤玉麟从承德出走，把队伍从热河退到察北，孙翻脸无情，在狼尾巴山底下把汤部解决了好多。我因鄙视他的人格，所以这次没去他的办事处回拜，他让谭庆林给我捎话，说我老蒙古不懂礼节。孙为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遍访民国以来寓居北平的失意军阀，连穷困潦倒在东城一个破小院里的前宣化镇守使谭庆林，也被他找到。因为他拜了人，人们也去回拜他，所以他的办事处门口，停满了好多汽车。他就是以此来壮声势，表示他有很大的号召力，从而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希望日本对他加以重用。

我怕傅作义牵制日军进攻广西，乘大同厚宫师团大部开走的空隙，再从后套出来袭击包头或厚和。便向堀顾问说明此意，叫他转告冈村宁次允许我返回防地。由于他们把我弄到北平是做为陪衬，主要是软禁华北的伪军头子，故对我未加阻止，住了五、六天我即回到厚和。傅作义因为储备反共实力，舍不得为抗日而牺牲，遇到如此大好机会没有一点动作。堀顾问见冈村时，冈村表示他很愿意加强装备“蒙古军”，特许华北的兵工厂卖给“蒙古军”五千枝步枪。后来由堀顾问用伪“蒙疆银行”的钱洽购回厚和。这批华北造的枪质量太坏，装入子弹一打就炸枪筒，我叫连续试验了十几枝，没有一枝能用。日本快倒霉的时候，兵工厂也偷工减料起来。我的最高顾问小仓听见生了气，叫堀顾问全数给退回那个兵工厂。

白凤翔投敌经过

白凤翔、王英和我，是内蒙的三大匪首。在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后，日本人把白、王跟我收罗到了一起。当时我的伪“蒙古军”驻守包头以东平绥铁路西段，王英的伪“绥西联军”在乌拉山前担任我的左翼，白凤翔的伪“东亚同盟军”在乌拉山后担任我的右翼，以阻止后套的傅作义军队反攻绥包。归绥特务机关长兼我的最高顾问小仓，曾叫王英陪着白凤翔，由包头前来归绥到我的司令部中盘桓了四、五天。兹将我所认识的白凤翔忆述如下：

我和白凤翔在以前并不认识，只是彼此闻名。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我在张北准备进犯绥包的时候，他和马占山领着张学良的两三千骑兵，从西安附近经过陕北开到绥东，马的部队番号是“东北挺进军”，白的部队番号是“热河先遣军”。十月中旬，我到了绥包，白和马占山都退到黄河以南的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后来两个人意见不合，于一九三九年傅作义出任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五军从山西河曲开到五原一带以后，白也把队伍带进后套。因为白的部队纪律很坏，傅把他调出后套，在包头以西乌拉山后的安北与固阳之间的高台梁驻防，故而郁郁不得意。

白凤翔和我的第一师师长郭秀珠与第二师师长陈景春，都是热河围场县人。白出身胡匪，郭出身行伍，陈出身民团。由于白的“树小”没有多大“阴凉”，“西安事变”时又是他到清华池扣捕的蒋介石，张学良失去自由之后，他在国民党中央即没有了其他靠山。他不像马占山那样想瓦解我的军队，从我的伪“蒙古军”中往出拉热河的汉人。我为了表示热河人要互相关照，不禁止部下和白的人偷偷来往。郭秀珠经我许可，曾派人把白的母亲从天津接出，到归绥市郭秀珠的家中住了好几天，在陈景春第二师把

守的托克托县城黄河渡口过河，送往准格尔旗。

关于白凤翔投敌的准确日期，我已记不清了，大概在一九四〇年春天“五原战役”结束不久，和汪精卫到了南京之后。白是仿照马占山当年投日的办法，带着二十多个随从，从固阳跑到包头，和那里的日本特务机关直接谈判，达成协议的。白投日不几天，小仓和我说：“白凤翔已经从那边过来，他想让王英领上他来厚和见你，你们三个人好好加强联系。”我问小仓：“他见我是为了交朋友，还是有其他目的？”小仓说：“我还不清楚。看他跟你谈啥。”我说：“他除了亲日而外，有没有其他政治动机，我好把底摸清，以便跟他深谈。”小仓说：“他是反对蒋介石，拥护汪精卫。”我说：“他来绝不是协助蒙古复兴的，也不是来捧我的场。”小仓说：“虽然这样，你也要替我们表示热烈欢迎。让他就住在你的司令部里边。他喜好啥你就给他啥！花的钱由我给报销。”我知白凤翔在热河当胡匪时，“杆子”的名誉还不太臭，早就想结交这个人。小仓告给我白要来归绥看我的消息，便叫勤务兵打扫客室，准备接待这位驰名关东和热察绥三省的“白三阎王”。

小仓通知我以后的第二天，白凤翔由王英陪同从包头来到归绥。王英向我介绍说：“我跟三哥早在民国十六年就是联手伙计。那时汲金纯给郑泽生和我编了奉军的三十一军，他和荣三点都是三十一军的师长。今天又跟大哥认识，咱们三个人联合到一起，可要把傅作义赶出绥远去。”王英的话匣子打开没有完，使我和白凤翔都插不进咀。白的个子很高，沉默寡言，因为扎吗啡针的缘故，面色灰白，不像王英尽吸好鸦片而红光满脸。他边和我寒暄，边用眼睛盯王英。王虽是匪首，但他没有拉过“小杆”，由于出身于祝袴子弟，和德王一样懂不得看眼色行事。我一见白凤翔向我扭咀挤眼，知道他避讳王英，所以当天我没和白谈正题，三个人闲扯至深夜。睡觉的时候，我见他把外衣脱掉，贴身插着七支手枪，两支二十响德国造，五支勃朗宁，裹在干皮所包的瘦骨头上，显得非常吃力。我说：“来到我这里，你还怕什么？要

是不相信，可以留下一两支，瞧你有多受罪。”他不好意思地才解下一支德国造和两支勃朗宁，还带着四支枪睡下。向我苦笑地说：“我已背了好几十年，身上已磨出僵茧，全解下松里巴几的，反而睡不好觉。”

王英在归绥的朋友很多，日本人因为怕打搅白凤翔，不准王在我的司令部会客。第二天他即乘着我的汽车满街乱跑。这就给白凤翔和我腾出谈话的空隙，使我们能够畅所欲言。我说：“你是耍人的出身，我也不是在家里呆大的。耍人的有一句简单话，就是不出卖朋友！我把你母亲送过河去，证明我要跟你交往，你要是防备我，咱们什么也不能谈。”白说：“我在西安抓过蒋介石，怕他怀恨在心。这次过来是投靠汪精卫，我们早有密约，所以，包头的日本特务机关，把我的队伍编为东亚同盟军。我带到绥远的人很少。南边有好几万东北军，我到了南京就可以把这些人拉了过来。此次我来这儿见你，想叫焕章（郭秀珠的字）担任我的副总司令，让他替我照料固阳的队伍，我好到南边去发展。”我说：“不是咱俩自抬身价，你我都能绕圈，我和你拧到一起，日本人就不好摆弄。你要郭焕章，我不成问题；不过小仓他做不了主，得请示张家口甚至东京。”白说：“热河人在外边势孤力单，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的摊子。整个的东北军旧部，目前所剩无几，我抗东北军的旗，你抗蒙古人的旗，将来全面反攻开始，咱们要抗着这两面旗首先打回老家去，我知道你不是真心亲日，不瞒你说我亦是如此。”我见他对我这样坦率，便向他说：“日本人叫我试探你，咱们要说法一致，你见了小仓，只提往出调郭焕章，不提其他事。王英的咀不牢，你少跟他扯正经事。”白说：“我给你使眼色，怕你把紧要的话冒出来。”

我把白凤翔想往出调郭秀珠的事，告给了小仓。小仓说：“我们研究研究，叫他先回固阳防地整顿队伍。”白在归绥期间，我很想叫一个暗娼，每晚跟白伴宿，白说什么也不要。王英说：“三哥跟着一个仙女，这个仙女一到晚上就从天上下来。”我问白

凤翔，是不是王英胡扯。白说：“这个仙女跟了我好几十年，我的一切行动全靠她给打卦。”白可能是以此愚弄部下，并迷惑一般群众。究竟是否属实，我未曾看见过。不过王英和白凤翔两个人，都吹嘘说确有其事。

白凤翔在归绥住了四、五天，和王英相随先回了包头。王到了公庙子，白转赴固阳的黑窖洋堂。后来日本人不许他去南京见汪精卫，和我联合的事没有办成。他驻在乌拉山后约有二年多光景。因对前途悲观失望，加上他的勤务兵把真吗啡偷去给自己扎，而给白扎了渗水的假吗啡，以致身上中毒，因医药无法挽救而死。外界传说白被日本人暗害，完全是揣测。因为他从后套带去七、八百人，在固阳又收罗了七、八百人，虽然也编了三、四个师，但实力连王英的伪“绥西联军”都比不上去，起不了多么大的作用，对日寇没有严重危胁。况且白凤翔也是一面招牌，如果要暗害他的话，那么我和王英这两个败类，也不能幸免。

德王处死吴相文的侧闻

德王在伪蒙时代，很少用恐怖手段对待异己。可是有一次他却把一个叫吴相文的蒙族青年，从归绥弄到张家口又送往西苏尼特旗，交给他的儿子都嘎尔苏龙处死了。当时人们把这件事称为“蒙疆的一大冤案”。

我发现吴相文被扣往西苏尼特旗大约是在一九三九年年底到一九四〇年秋天这段时间。

那时，张家口有一个经常给德王看病的医生叫王汉卿，人们称他为“御大夫”。由于王奔走于伪蒙各权贵门庭，和我也非常熟惯。有一夜，王汉卿突然跑到我的家中，要吸食几口鸦片。他说：“德主席因福晋在西苏尼特得了重病，现在就叫我坐上他的汽车前去急诊。最倒霉的是还叫我附带送一个紧要犯人。除了那个开车的喇嘛和我，只有一个副官跟着看差。光靠那个年青的副官，恐怕路上发生意外，我抽足了大烟可以不打瞌睡。”我因了解德王概不扣人，感到事情奇怪，便问王：“是什么样的犯人？”他说：“我也弄不清楚，听说是从花园旅馆弄来的。德主席派人给他开付了房钱，叫到公馆便捆起来，给他嘴里塞了棉花，恐怕被日本人发觉，所以要带到西苏尼特旗叫小王爷和丁秘书(丁我愚)审问。据说是东边的一个蒙古人，名字叫吴相文。”王汉卿抽足鸦片就走。他们混过了大境门日本岗哨的盘查，神不知鬼不觉地开出了张家口。

隔了二十多天，我在张家口见德王的时候，我听他很气愤地说：“吴相文那个家伙，因看管不严，曾偷跑出王府，翻穿皮袄在羊群中藏了五天，吮食羊奶而没有饿死。后被羊倌发现，报告给王府，才又把他弄住。现在带上了两个‘木狗子’，一个带在

圪膝上边，一个带在脚腕上边，用铁钉卡死，上下血脉不通，四十天就把下半截完全烂掉了，叫狗口的再跑。”我说：“好狠的刑法。”他说：“没有此种刑法，怎么能镇压住那些捣蛋的奴才。这是祖先爷留下来的，可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又问他：

“吴相文究竟犯了何罪，你用这种狠刑？”他说：“狗日的尽干坏事。”

后来听说吴相文被关在土牢里边，连冻带饿，惊恐疼痛，没有用了四十天，便被折磨死了。

吴相文不是伪“蒙古军”的军官，是伪“巴彦塔拉盟”公署的科长、秘书一类角色。吴相文老婆因在“转人局”搭客，曾被吴把耳朵割掉。这个“转人局”是伪蒙政府里边一个要员的母亲（或是太太）开设的，专门给伪蒙军政官员师长、部长以上的人拉皮条，所以伪警察不敢干涉。当时，我未曾涉足此间，不知这个“转人局”设立在归绥哪条街巷。有一次，陶克陶向我说：“我在‘转人局’认识了一个太太，被他的丈夫当场抓住。我给人家跪下磕了一个头，才被放脱。”一个蒙古军军官也曾向我说：他的老婆到“转人局”搭客，他也要行凶。我还听到乌古廷常去“转人局”，我的副官长张启祥的老婆亦通过“转人局”胡搞。我恐怕由于争风吃醋，再发生其它丑剧，特别是这个“转人局”专给军政官员拉皮条，弄得秽声四闻，太不成体统。为此，我劝德王赶快取缔。他却说：“这有什么关系。”

据乌古廷对我说，德王所以要杀死吴相文，是害怕他揭发“铁血同盟”之事。他说，德和他以及东蒙的一些伪满重要官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究竟乌古廷说的是否属实，究竟有无“铁血同盟”这个组织以及为什么要建立这个组织，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和吴佩孚有关联的几件事

我最早在属于毅军系统的热河游击马队统领张连同（字协堂，湖南益阳人）部下当兵。两次直奉战争，张连同均在直军指挥下跟奉军作战。由于热河的地方部队一向反对奉军，我便跟着他们对直军的统帅吴佩孚也盲目崇拜起来。后来因为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把曹锟囚起，吴佩孚由海路退往武汉，张连同才领着我们归降了奉军。

一九二五年冬天，郭松龄在冀东倒戈，阚朝玺从承德出走，张连同由建平带领一个团去热河接任都统，留我在下洼一带给他收编胡匪。张到了承德附近，部队被国民军宋哲元部缴械，他亦被俘虏。宋把他交给代理都统谭庆林软禁于承德。我得讯以后，曾率领二百骑兵前去营救，因谭庆林调处，未跟国民军开火。谭还准我进城和张连同在行宫会面。当时，谭庆林曾赏过我三千银洋，我亦因谭优待张连同，向他跪下磕过一头。所以谭庆林对我更有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华北沦陷以后，谭庆林仍然健在，一度被日寇扣捕，经吴佩孚保出，由其孀居儿媳伺奉，住在北平东城一个破小院里，生活很不宽裕，吴佩孚时常接济他衣食。一九三九年，我到北平养病，住于东交民巷的一家旅馆里，延请中医治疗，被新闻记者发现我的行踪，在报纸上登出。谭庆林看到这一段消息，特来旅馆找我。我看他衣履破旧，先给了他五百元，叫他购换服装。他和我谈起日本人硬逼吴佩孚出山，齐燮元亦力拖吴下水，但除了以后担任伪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的大桥忠一吴还肯同他谈话以外，其他前去访问吴的日本人，吴均拒不接见。齐劝吴出任伪临时政府的总统，吴反劝齐和他一起到西山修行。

吴佩孚是否以此沽名钓誉，或是故意抬高身份，和日寇讨价还价，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因投敌出任伪“蒙古军”总司令，内心很感羞愧，听见谭庆林这样一说，越发仰慕吴的“高风亮节”。于是我向谭庆林说：“您可代我致意玉帅，他如有困难的地方，我很愿意在财力和人力上给他帮些小忙！”谭对我说：“很好，我可以代你转达。”

隔了一两天，谭庆林又来找我。谭说：“玉帅想叫你用绑票的办法把他接出北京。城里城外得五百人才行。因日本人碰了他的钉子，已经老羞成怒。他急于逃出虎口。”我听了以后，非常兴奋而焦急。兴奋的是我如果把吴捧出来抗战，一定在中国惊天动地，不仅洗刷了我叛国的污点，并且政治上亦有远大前途。焦虑的是此事须要慎密策划，不能轻举妄动，需要很好准备才行。

我遂对谭庆林说：“在城外呼应，我回去即能把人派来。进城里动手，必须好好选拔一些人才行。并且还得让他们呆个半月十天，熟悉一下北京的街道。我手下有好多不怕死的热河胡匪和东蒙的“马鞭子”。他们在山野很有种，进城就显得笨手笨脚，并且贼头贼脑，最容易被日本宪兵和北京的警察识破。”谭说：“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我跟玉帅从长计议。我们决定好以后，再打发人到绥远通知你。”我因急于办理此事，没等病好就回了归绥。正在叫我的卸了职的团长胡宝山给挑人的时候，报上便登出吴佩孚逝世的消息，以致此事作罢，当时引为终生憾事。

吴佩孚死后，我用十四万块银元把北平东城什锦花园的“卓王府”买下，东隔壁便是吴佩孚的公馆；西隔壁是阚朝玺的姐夫、在伪满担任次长的洪维国的住宅。吴的夫人因吴在生前和她谈过我，以后又成了邻居，便跟我的眷属来往得相当亲近，时常在一起打牌，并邀我去她家里吃过饭。关于吴的死，据她跟我谈：吴因急于脱离北平，加之肝火上升，由牙痛而淋巴腺肿胀，躺在楼下的竹榻上不能起床，但坚决不入医院，恐遭日本人的毒手。有一天，齐燮元和齐的一个少校军官，领来一个日本医生，上楼叫

吴的夫人签字，要给吴动手术。吴的夫人不签，他们却走到楼下给吴开刀，吴的夫人听见吴在楼底下呵呀了一声，从楼上跑下来一看，吴已因血管被横割破而断气。那个随齐而来的少校军官以后跑到西安胡宗南那里，吴的夫人除了痛恨齐燮元和日本人，并对此人的来历，也感到非常怀疑。

日本人投降以后，洪维国被军统特务扣捕，戴笠曾一度搬到洪的住宅居住。蒋介石有一次来到北平，名义上在“行辕”休息，实际是在附近布满了便衣特务的戴笠那里起居饮食。曾叫宋美龄到吴佩孚的公馆看望过吴的夫人，对吴的暴卒经过，询问甚详。吴的夫人因齐燮元已经扣捕解往南京，还曾请蒋通缉那个跑到胡宗南手下的少校军官。但等了好长时间没有一点下文。

吴佩孚身后非常萧条。夫人因肥胖没有生育，由族里过继了一个儿子，听说吸毒和扎吗啡针，很不成器，未跟吴的夫人在一起居住。军统特务在北平横行时，曾向吴的夫人进行敲诈。她怕他们前去搜查，说仅有一包玉器，想托我给保存，并且有吴遗下的重机枪二挺，驳壳枪三枝和十几枝步枪，亦想让我给变卖。我因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急于出关，故未顾上替她办理此事。旋我的队伍被解放军歼灭，我只身跑回北平，吴的夫人已将住它出售给别人。不知她保存的玉器和武器，做了如何的处理。

我和德王由张家口溃逃的狼狈相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前夕，我和德王正在张家口。由于日本封锁消息，对于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和美国向日本广岛扔下原子弹这两件大事，我和德王全不知道。迟至十四日，裕仁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十五日上午十时，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官根本博，才把真相通知给我们。①八月十日裕仁已经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抗战地区的各城市均响了胜利炮。傅作义派孙兰峰率领接收人员，十一日从陕坝出发，十二日到达王英司令部所在地的公庙子（在今乌拉特前旗境内），十三日进入包头的这几天，我们还昏头昏脑地在张家口举行会议，研究伪“蒙古军”的扩军问题，即：日本人许愿给“蒙古军”扩编为十二个师，另把“蒙疆”境内的警察编为八个独立旅，亦归“蒙古军”总司令部指挥，以应付蒙疆的紧急状态。究竟因何而紧急，日本人没有向我们说明，我们一听扩充队伍都很高兴，也没有注意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军部不仅对我们封锁消息，对他们的中、下级人员也欺骗隐瞒。不过他们的高级人员，都沉不住气了。八月初，他们不少人把家眷打发走了；十一日以后他们自己也往平津溜跑。伪蒙政府的蒙奸、汉奸，特别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中国特务和张家口的警官，睹此情景感到不妙，也纷纷开小差离开张家口。过去我的上堡蒙古营子的家里，每天晚上高朋满座，可是这几天来客一天比一天减少，门庭逐渐冷落下来。而我在这时还是想

注①：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开始进攻东北。八月十日，日本大本营命令：“在万不得已情况下，可以放弃”满洲。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发表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八月十八日伪满皇帝举行退位仪式。

升官发财。这时他们叫我兼任了伪蒙疆政府新设置的军政部部长，好象把“蒙疆”的枪杆子全交给我执掌。另外，在这不久以前，日本“驻蒙军”给我拨了十一万两烟土，叫我打发人去包头换成皮毛药材物资，运到天津套购黄金，再赴上海购买枪械弹药。我派秘书唐成良带了三千两前去包头，向达拉特旗的森盖林沁买了一部分药材，剩下的十万零七千两，还堆在我的家中没有处理。我只顾在这十万多两烟土上打小算盘，没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了。八月十日至十五日中间的一天，伪蒙疆政府举行最后一次正副主席和部长会议，讨论把警察改编为“蒙古军”的问题。由于伪蒙疆政府的小顾问们，这时也对时局摸不清楚，会前据民政部长丁其昌和我说，他们很反对日本“驻蒙军”军部给了我这么大的兵权。开会时，众人都出席了。会议上把“蒙古军”十二个师的师长的委任状通过后，接着伪蒙疆政府的最高顾问大桥忠一提出了把警察改编为军队的问题。这时我便怀疑起日本为什么如此“碗大汤宽”把警察也编给“蒙古军”扩大我的队伍？当然我高兴，但我又怕贪多嚼不烂，于是以军费没有着落为借口，表示负不起这项重任，想将他们一军，再要些烟土。由于大桥忠一没吐口，众人吵了一阵，未做出决议，即行宣布散会。德王的政治嗅觉比我还迟钝，会后和我说：“日本人把警察交出，你为什么不要？”我说：“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咱们得研究一下。”伪蒙疆政府的另一副主席于品卿和司法委员会会长官兼经济部长杜运宇以及陶克陶等人，就在会后的当晚，悄悄离开张家口躲往北平。他们听到风声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把他们留下无法走脱。这几天我如堕入五里雾中胡思乱想，但不往日本投降上面设想，因而十五日一听根本博向我们说出那个“噩耗”，真象晴天打了一个闷雷。

十五日吃过早饭，我接到日本“驻蒙军”军部的电话，叫我赶快前去开会，说是要紧事商谈。当我步入根本博的会客室的时候，德王已坐在那里，不大一会根本博走进来。他的头脸阴沉，劈头就说：“天皇昨晚下诏宣布投降，你们怎么办？”根本博见我和德王都

不吭声，他接着说：“你们要是跟上我们前去日本，我们可以保护你们。”我说：“你们保护我们，谁保护你们呢？”根本博被我问住，他又说：“蒙古军怎么办？”我说：“军队由你们的顾问掌握，我又被你们弄到张家口，出了错我不负责任。”他随即叫大桥雄熊参谋给归绥的小仓顾问挂电话，让把军队交给我的参谋长宝贵廷。回电话说，小仓已不知去向，日本人慌成一团。根本博对大桥说：“叫堀顾问代理小仓，军队保护机关、侨民往张家口集中。关于‘蒙古军’的行动，听李总司令的电话指挥。”大桥走出去又回来，说是电话已经打通，根本博去他的办公室，取来一张图纸给我，他说：“这是张家口地下仓库的图纸，里边有装备三个师团的武器弹药，原来是准备防俄用的，现在交给‘蒙古军’。我们把人集合起来，即往北平撤退，你们把这些武器弄上，投谁也有出路。”根本博把事情安排完毕，德王还痴痴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不走。我对他说：“等啥？走吧！”德王被我提醒辞出。我俩竟不商量大事，而是都跑回家中，先去办理自己的善后。

我回家以后看了看手表，是十点多钟，于是就让秘书唐成良指挥众人打包行李，并到车站交涉车皮，尽快装上汽车，往北平疏散，转移家属财产。我赶忙给宝贵廷挂电话，询问厚和的情况，宝说：“日本人正准备装车逃走，咱们怎么办？”我说：“张家口有三个师团的东西都交给咱们了，在厚和切勿拣他们的洋捞，先把包头和厚和附近各县的人都集中到一起，叫他们在路上遇见谁也不要打，绕开道往厚和开拔，晚上听我的电话，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宝说：“中央的人已经过河到了托县。”我问：“是谁？”宝说：“王匡一。”我说：“赶快派车去接。”打完电话，我也卷起袖子和卫士、勤务兵、大师傅、老妈子们在一起拾掇财物。十万两烟土和其它箱笼，装满两辆大卡车，两辆小卧车上面也装满了细软东西。还有我在察北宝昌县买了一亩三十多里长的山沟，约有十万多亩土地，这年共收了二百五六十石地租，磨了一百麻袋白面，还整装着三百麻袋小麦，以及拆开箱子的七千两

烟土，都装不上卡车。每一麻袋粮食都是一百七八十斤，我的那些卫士和勤务兵，被我平日都惯成了少爷，他们都干不了扛麻袋的重活。我一看卡车上的皮箱，非常的耀眼，便把一百麻袋面粉，一个一个地从地上扛起，由他们众人舁上卡车，才将皮箱遮盖起来。剩下的三百袋小麦和七千两烟土，我索性解开七十条袋子，把麦子倒出一半，每袋塞入一块烟土板子，将倒出的麦子再装入麻袋缝好，准备第二批往车站运送。全家二十余人把东西打点停当，已经下午一点多钟。我的“蒙古军”总司令大将制服上，全挂满了灰尘。

草草吃完午饭，那能顾上午睡，因为日本“驻蒙军”恐怕影响张家口的人心，让日伪家属一律于夜间撤退。我此时无事，便琢磨起心事：苏联对日宣战，出乎我的意料。现在张家口北面虽然还听不见炮声，黑龙江那一方面一定已经打起来了。我和玛鸣周前一年所议定日本投降时，往外蒙边境集中伪蒙、伪满军队的计划已成泡影。当前我在张家口赤手空拳，除了几个卫士，没有一兵一卒。队伍大部留在厚和附近，小部驻在宣化一带。在察北和绥东的几个蒙古师，由德王和达密凌苏隆掌握，到了这个时候，不会跟我一致行动。为了光棍不吃眼前亏，我还得依靠日本人。因为他们把散布到平绥路上的一个厚官师团，都集中到张家口以后，仍有很大的力量，伪军很难扯他们的后腿。和他们把关系搞好，倒能接收不少东西；况且我的家属、财产弄往北平，亦脱离不了日军的保护。至于我的部队到了张家口，下一步该往何处走，那就是依然要脚踏两只船，跟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联络，和谁也不冲突，绝不防守张家口。打算将日军的地下仓库的武器起出，先上赤城、龙关一带的大山，站在高山顶上看二虎相斗，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不过最要紧的是，首先须把“蒙古军”集中起来，所以我一方面盘算，一方面叫卫士们给厚和挂电话，可是叫了好几次，都没有把线接通。

我正在愁思焦虑的时候，看门的人进来向我报告说，外边来了一个八路军的代表，拿着一封信等待答复。我叫看门的把信

要来，封皮写着：“日本驻军司令官、蒙古军司令官亲启”字样，信口没有封，里边的大意是叫我们准备投降，他们要派员进驻张家口接收一切。信是由陈毅将军署名，我对此记得非常深刻。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便向看门的人说：“你告诉他，就说我主不了事，可以把信送给日本驻军军部。”由于好奇心驱使，我溜到门房的窗前，偷看八路军是个什么样子。原来是化装成张家口市的一个青年。八路军的送信人走后，我也去了日本“驻蒙军”军部，向根本博报告了接到八路军来信的经过，请示对此应当如何对付。他说：“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现在我们已在张家口北面的坝上布防，掩护机关和侨民撤退。俄国人和外蒙军如果来到，我们就要抵抗；八路军要进张家口，也不允许。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八路军，他们不讲信义。”根本博和我说完，又把他的副官叫来说：“把咱们的那二百支比斯尼步枪，并装一大卡车汽油，送到李总司令公馆，拨给蒙古军用。”说完话我离开日本“驻蒙军”军部。在回家的路上，看见日本女侨民，都摆开拍卖东西的地摊子，男人都缠着臂章，代替了警察的职务，持着枪来回巡逻，秩序维持得还很好。

晚上，我把家眷财物，用四辆大小汽车，由唐成良带着四五个卫士，连人带车都打发上车站。即给厚和挂了电话，这次总算叫通了。宝贵廷向我报告：“日本军民全上了火车，连夜往张家口撤退。厚和至包头的铁路，已被八路军挑了，王匡一已接到了司令部，队伍也从外县撤了回来。”我说：“队伍集中起来后，不要指望坐火车，八路军对厚和以东的铁路也一定要破坏。并且装车费时。要从厚和经过集宁的黄旗海子，直线奔张家口，今晚保护上家眷和炮兵出发，明晚可赶回来。”我正要往下说的时候，电线即被切断，从此和厚和失掉联络。后来，听说他们开到旗下营后又折回厚和。我刚打完电话，德王和金永昌与丁其昌先后来找我。德王说：“我从电报局接到蒋委员长来电，叫咱们各守岗位，他决不咎既往。你看咱们

应该怎么办？”我说：“蒋固然要应付，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日军一退，咱们便在八路军包围之中。应该派人和八路军联络，双方互不侵犯，他们不打咱们，咱们可以把张家口让给他们。”德王问我：“叫谁去给联络？”我说：“乌勒吉敖喜尔。”金永昌说：“关于联络八路军的事，可得好好研究。”我说：“金永昌，你少插嘴。”金一听我呛他，便挟着尾巴溜走。丁其昌一看我们俩商量大事，也跟着躲了出去。德王又问我：“乌勒吉敖喜尔怎能和八路军拉上关系，我不清楚。”我说：“乌给外蒙掩护过电台，俄国、外蒙和八路军是一家人。”德说：“对！对！对！”说完即回去给乌勒吉敖喜尔打电话。乌的蒙古军第九师在百灵庙驻防，他本人在厚和住家。德王不知用什么办法把电话叫通，乌坐着日本人撤退机关、侨民的火车到了张家口，和德说完话又坐火车回了厚和。乌回到厚和向宝贵廷、包海明等说我暴露了他的身份，主张把绥远的“蒙古军”投归外蒙。宝贵廷和包海明等主张投归傅作义的十二战区，他们不便把我扔弃，并且分成两派。结果，宝贵廷因为大青山的八路军下来要进入厚和，就替傅作义守了厚和，抗拒了八路军。乌勒吉敖喜尔把他的蒙古军第九师和正黄旗达密凌苏隆的第七师合到一起，也未配合八路军接收厚和与集宁，全投靠了在乌兰察布盟的外蒙军队。以上这些事，当时我全不知道，是逃到北平之后人们告给我的。德王把乌勒吉敖喜尔叫来，没让和我见面。十六日他瞒着我抓补英达赖、王宗洛和陈国藩到察北欢迎苏蒙军队，他那时的目的就是要把我甩下，带着伪“蒙古军”去投降外蒙。

苏联虽然八月八日已经对日宣战，但是外蒙的军队集结到边境，等待观望了一个星期，听见日本天皇下诏投降，于十六日始南下，当即把西苏尼特旗王府占领，将德王的家属、财产完全弄往乌兰巴托。这天，德王接到西苏尼特旗的告急电话，召开了紧急会议（我没有在场），决定派补英达赖、王宗洛、陈国藩、宝道新等四位代表前去和苏蒙军谈判，要求允许他们接回德王家属、财产。补、王等四人于下午三时乘汽车出发。我等到晚上，还不

见宝贵廷把队伍带到张家口。这时我的家中仍有三百袋小麦和七千两烟土未曾运走，我期待队伍心急如火，绕着这些麻袋直转圈子。转到十七日天亮，也听不见队伍到来的音信。我知道出了岔子，便去寻找德王。坐了一辆人力车，竟胡里糊涂地走进伪蒙疆政府，里边鸦雀无声，已经没人前来上班。院中堆着日本“驻蒙军”军部拨给的三十万两烟土，叫丁其昌散发给所有的人员。丁不敢负这个责任，所以堆在当院没有处理，上边落满日本各机关焚烧文件的纸灰。十六日他们整整烧了一天文件，十七日早晨还未烧完，故纸灰从东山坡一带随风往下堡的街道上直飞。我一看伪蒙疆政府只剩下几个门岗，这才出来去德王公馆。那里的人很多，见我进去都不说话了。正在发怔的时候，来了两架苏联飞机，盘旋在张家口高空，不敢低飞，扔下一颗炸弹，炸死一个妇女，撒了一些传单，即向北飞去。德王打发人出去把传单拣回，上边骂他是卖国贼和蒙奸。他说：“这条路看来已经不行了。”因为他们都回避我，我没问他们传单上写些什么话，况且人家在背过我讨论事情，我呆下去很不合适，遂和众人招呼了一下辞去。回家挂电话向日本“驻蒙军”军部的大桥雄熊参谋和丁其昌打听外边的消息。

外蒙军队于十七日上午，由苏联的一个中将指挥，乘汽车到达张北以北的白城子和公会一带，派出两辆摩托车，到张北城外侦察。守城的日本军队开枪打坏一辆以后，旋即放弃张北，往南面的坝上撤退。日军退走不久，该地的伪县长和商务会会长，打着白旗出城欢迎苏蒙军队。苏蒙军硬说，那一辆摩托车，是伪县长指挥警察打的，故把伪县长和商务会会长就地枪毙。从西苏尼特旗连夜乘着快马前来给德王报信的家奴也说：“苏蒙军在半道上把德王的代表截住，将补英达赖和宝道新放脱，把陈国藩用飞机载往乌兰巴托，把王宗洛和到察北不知去干什么的吉尔嘎朗交给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带往阿巴嘎旗看管。”我睹此情况，开始感到走外蒙和八路军的路线都没有希望，认为还是投靠蒋介石

比较可以苟延残喘。这时崔兴武的侄儿崔玉昆给我担任副官，他不知听谁说张砺生已经进了张家口。我因和张的代表郑立安有过联系，忙叫崔去调查张住在哪里。崔玉昆出去跑了一趟回来，原来是人们胡扯。到了晚上我对宝贵廷已经绝望，于是产生了两个念头：一个是自己从张家口骑马转山头回厚和；一个是到北平坐飞机回厚和。可是对沿途及厚和的真实情况不明，又不敢前去冒险。所以这一夜仍是辗转反侧，终宵没有阖眼。

十八日白天，苏蒙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在北面的坝上展开炮战。同时八路军的接收部队，也从东、南、西三面围上。因为日本人是由军队护路撤退，他们边走、边修、边打，从厚和和大同撤下的列车，不断开进张家口车站。大同省省长李树声，感到我也没有办法，所以车过张家口时，他没有下车看我，就到宣化去找宣化省省长刘继广。伪“蒙古军”的堀顾问和兽医处长杨海轩，这天也从厚和到达。他们是十六日白天出走，一共走了两天两夜，下了车即相随着来找我。他们都说：宝贵廷变了心，要把队伍留下给傅作义守城。他们怕被八路军活捉，所以跟队伍脱离。劝我赶快离开张家口，往北平逃跑。我说：“我跟根本博司令官同进退，苏蒙军和八路军马上进不了张家口。”把堀顾问送走，将杨海轩留下。不大一会，丁其昌来跟我告别，说他要走了，扔不下我。我说：“你先走吧。我得跟上日本军军部一齐走。因为我们到了北京，还得依靠日本人保护。”丁其昌走了以后，我把那三百袋小麦，叫杨向日本“驻蒙军”军部要了一辆卡车，都搬到一家熟惯的粮店寄存起来，因为车站上的火车全是装人，怕被日本宪兵给扔了下来。打点完毕，天已昏黑。突然有驻防察北的“蒙古军”第五师的两个团长郭景春和郭新德跑来，他们说：“第五师已在阿巴嘎旗被苏蒙军解决，我们两个今天光身跑到张家口。德主席把他的卫队交给我们，叫我们在他走以后，维持张家口的秩序，等俄国、外蒙军或八路军进来办理交代。我们有人有车，您有带不走的東西，我们可以帮助您往车站上运，我们已替德主席

把车装好。”我说：“我的东西全走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你们留在张家口，不怕俄国人和共产党吗？”郭景春说：“我给外蒙送过电台，我不怕他们。”他们又和我扯了一些闲话。他们走后，我给大桥参谋打电话，询问白天坝上的战况，看张家口今晚有无危险。大桥说：“外蒙军很蠢，已被皇军用大炮顶住。因为西边的侨民还没有完全到达，明天仍要继续抵抗。张家口的城防非常巩固，您安心睡觉吧，多会退却我来电话告您。”我怎能睡着，又是一夜失眠，嘴干得生满了口疮。

十九日天一亮，来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低空盘旋。上边的驾驶员高喊“中国人闪开”，扔下一个空气油桶，射出一排示威性的机关枪子弹，把一辆火车头打穿了几个窟窿，即向东南方向飞去。空汽油桶里可能装着给德王和我的信，我没有派人去拣，因为我没有了部队，一切都是白搭。上午九点多钟，大桥来了电话，说是日军今天撤离，叫我准备马上上车，他们给“蒙疆”政府拨了三个车皮。这时我的几个卫士，都保护着家眷去了北平，身边只剩下一个名叫安慕卿的随从，其余全是大师傅和本地的听差。我给了他们每人一百两烟土，叫他们把我带不走的東西按股均分，赶快搬到各自的家中，尽速离开这里。此时我的副官崔玉昆也不知去向，新来了一个兽医处长杨海轩，算是尚有一官一兵。三个人全换上便衣，每人腰中插了好几支手枪，带了五六百发子弹，乘着日本“驻蒙军”军部给派来的汽车，由上堡到了火车站。因为下着连阴大雨，街上布满污水泥浆，天空是一付灰暗头脸，越发使人感到糟心异常。商店都关了门，老百姓很少来往。坝上炮声隆隆，日本兵在十字路口站岗。车站月台外边，排着五列车皮，中间夹着十几个冒烟的车头，长达四五华里，两边都有日本兵持枪警戒。这些车皮大都是敞车，里边尽坐着日本的妇孺，全被雨淋成落汤鸡，用帆布或雨衣盖着脑袋。因为流离失所，不知走向那里，加之饥渴冷冻，故患病死亡的很多，尸体顾不上火化，全昇到道旁的田野扔弃，日本人忍痛不哭泣，真是惨不忍睹。

给伪“蒙疆”政府拨的是三辆三等客车，两边的椅子当中和过道上，全堆满德王的金条银元和烟土，最少也有两千多箱。我坐的那辆车，叠了好几层箱子，人们头顶着车篷，爬在箱子上从过道上来往。德王比我后到，他的那些秘书们早已逃走，只带着给他开汽车的喇嘛和葛兰芳等三四个听差。他见我坐在车上，许是怕我知道他带了这么多的财产，到达北平以后要耍赖跟他伙分，所以把头脸放下，很生气地说：“你为什么不要车皮，坐在我的车上？”我说：“我一共是三个光杆，要车皮干啥？这又压不坏火车，况且不是叫你背我。”他听我呛他，没和我坐在一起。到一个拐角上，随从给他铺了一块毯子躺下。我亦把眼睛闭起，各怀起心事。这天上午，张家口到北平的铁路，还没有被八路军破坏，跑了一个多星期的于品卿，返回张家口，又要出来维持地方的秩序。他听说德王和我全部上车，跑进车厢寻找我们，板起人民代表的面孔，质问我们因何逃跑？他说：“你们守土有责，扔下老百姓谁管？”德王被于品卿问住，低头答不出话来。我对于说：“给他妈的巴子谁去守土？你能管了老百姓吗？”于知道我很野蛮，便再没说啥退了出去。接着伪张家口市市长崔景岚上来送我。因为他给我当过好多年军需处处长，我说：你为什么不把行李带来？这是最后的一趟车了。”他说：“我有责任，得办理交代。”我说：“你的官瘾还没有过足，政府的高级人员早都跑了，我和德王一走，一切就都轮上你了。”他嘴上虽说：“我回去安顿安顿。”可是表情仍对张家口恋恋不舍。他和我握手告别后，被于品卿勾引上又当他的张家口市市长去了。

崔景岚走后不多一会，我的二太太的父亲也跑了上来。在十五日夜我送他回家时，他们老两口还说不怕。可是他是一个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非常胆小，见我一走就沉不住气了，将老伴扔下让我领上他回去。这时车上的人越来越多，因德王和我坐在那里，都不敢高声说话，各找空隙坐下。车上倒很安静，容许我继续闭目沉思。我想到了北平以后，先化整为零疏散人口和

财产。北平的社会非常复杂，短时间内还显露不出。至于我今后怎么办呢？那只有再拉“杆子”，到绥远也好，回热河也好，如果国共合作起来惩治汉奸，和我同命运的人很多，我挑起来一干，不愁没有人跟我。如果国共从此分家，只要有人有枪谁也要我，更有活动空隙，可以左右逢源。我投敌十二年多，总算把命捞住了。虽然在察北扔下三十里长的一道山沟，四百匹马，五千只羊，在厚和和张家口扔下五十万伪币买下的两处房屋，可是北平还有十几处院子，除了运去整整十万两烟土，尚有换成美金两万元的财产，以及其他贵重衣料皮衣和不少值钱的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当蒙奸够本，而且有赚头。想到此处，心安了许多。于是万念顿消，便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

睡到黄昏时候，被安慕卿把我叫醒。睁开眼睛一看，仍躺在德王的洋钱箱子上边。安说：“日本军队从坝上退下来了，街上也有了枪声。”我从车窗向北一望，汽车象两条火龙一样，在后边的隆隆炮声中，朝张家口的市区蜿蜒滚下，最后都排到铁道两旁。到了这时，火车响起汽笛，才在汽车掩护下，缓缓向前开动。由于入夜之后，八路军把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路轨挑了，并且炸了好几座桥梁，所以火车边走边修，比牛车还慢，四五十里地，竟走了一夜，于二十日早晨，才爬到宣化车站。停车以后，先跑上国民党的一个军统特务找我，他说：“我是王野人，热河抗战时咱们在开鲁见过面。前天我从重庆坐飞机首先到达北平，听陶克陶说，你不在厚和，和德王都在张家口。蒋委员长把你和蒙古军已经改编为十路军，让你担任总司令，我特来给你送委。我昨夜就到达宣化，因铁路破坏，不能前去张家口，只好在这里等你。现在你来了，咱们研究研究怎么办？”我见了王野人和接到“十路军”总司令的委状，精神为之一振，将蒋介石撒出的钓我的鱼饵，看作是在汪洋大海中，弄到的一个救生圈。同车的人也都大睁起眼睛，不象在张家口车站停车时那样对我冷淡，均对我笑脸相迎，精神亦兴奋起来。接着伪宣化省长刘继广，大同省长李树声，“蒙古军”第

三师师长宋鹏九，都上车来迎接我和德王，并欢迎王野人。伪“蒙古军”的那个堀顾问，不知他怎知道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也从别的车上跑了过来，向我道喜祝贺。刘说：“日本军队在南口和八路军打上了，战斗结束，把路修好车才能开。先下车到城里去吃饭，好好休息休息。”堀顾问亦说：“咱们先去吃饭，开车时有人通知咱们。”德王听见蒋介石给了我“十路军”总司令，对他没有安排，心里很不高兴，不想下去吃饭，被刘继广上去拉了一把，才随着我们进了宣化城。

刘继广和李树声都是我在崔兴武东北军十七旅的旧同事，后来跟上我任了省长。开饭以前，我把他们和宋鹏九叫到一边，背着德王和王野人，四个人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让宋鹏九留下一团人，交给刘继广，收罗察东的警察；宋带上两团人，护送李树声回大同，收罗晋北各县的警察，弄起人都绕道往厚和集中。我到北平坐飞机回去。他们对我的指示，虽然嘴上没有表示不同意，但是脸上却有忧虑的表情。我说：“俄国人和外蒙军队要占张家口，八路军也在接收城镇，乡下全是真空，路上很好走，你们要鼓起当初拉杆子的勇气。”我那时能带上第三师向西开，但我不放心北平的财产，并且不愿西去冒险和受罪，故而执意去了北平。由于我本身腐化堕落，结果把蒙古军弄了个四分五裂。否则，宋鹏九的人不会在南口附近瓦解，宝贵廷的人也不会被傅作义吃掉。后来我光杆一人出关给蒋介石去组织“伪东北民众自卫军”时，才认识到那时在宣化是非常失策的。

我们计议完毕，便去吃饭。正吃的时候，又是十五日给我送信的那个人，走进刘继广的门房，给德王和我送来八路军陈毅司令员的一封信，叫我们派代表跟上此人前去谈判。德王和刘等听见八路军的人来到跟前，都为之一怔。我这时已被蒋介石勾上，不愿跟共产党走，便叫刘继广的勤务兵，把那人打发回去，说是“信看完了，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这是共产党再次争取指引我们，可是我们执迷不悟，认为蒋介石能保我们的大

烟土和洋钱箱子，还想跟上蒋介石借尸还魂，继续骑在蒙汉人民头上，兴风作浪和作威作福。一切反动派都是失败以后，仍要捣乱，捣乱失败以后再捣乱，直至最后死亡。我和德王两个人也不例外。

因为众人发现了八路军的人，都心惊胆战，慌忙把饭吃完，连茶都没喝，就匆匆离开刘继广的省公署，在宋鹏九的军队保护下回到车站。上车等了两个多钟头，中午十二点钟开车。由于也是边走边打边修，到了北平的西直门，已是二十一日上午一两点钟。北平亦被八路军围上，由日本兵担任防守。下车以后秩序大乱，我与王野人、杨海轩和老丈人等也被挤得互相找不见了。安慕卿好不容易跑出去给我找到一辆人力车。由于雨仍下着，街上水深过膝，道路非常难走，洋车夫在前边拉，安慕卿在后边推，穿街涉水走了好几里，才把我拉到什锦花园。德王到北平后，没住他在北平买下的房子里，带着东西都到了雍和宫下榻。我和德王就这样结束了蒙奸生涯。

附 录

李守信的晚年

刘映元

一九六四年，李守信在特赦以后，被安排到内蒙古文史研究馆担任馆员，住在呼和浩特市新城江南馆巷门牌五号小院。在党的统战政策照顾下，他过了数年清静舒逸的生活，度过了他自己觉得心满意足的晚年。

江南馆巷，原是清朝绥远城将军衙门浙江籍红笔师爷们住家的一条胡同。这些江南人的后代和土著满族人很讲究礼节，对李守信相当客气，并不以释放的战争罪犯看待。“文革”前，孩子们看见这个拄着拐仗出进的瘸腿老人，都称之为“李爷爷”。

李守信共有五个妻妾：大太太是原配的蒙古族夫人；二太太是陪嫁到土默特旗王爷府的满族人的姑娘；三太太是热河承德的一位妓女；四太太是唱过河北梆子的坤角儿；五太太是一位女学生。在他任“蒙古军”总司令时，已把五太太休弃；从北平到南京前又将三太太、四太太遣散。由大陆带到台湾的是大太太、二太太和大太太所生的两个儿子的家属。一九四九年初夏，蒋介石派他回大陆网罗从东北流窜到绥西的旧部，没有妻室随行，故被特赦之后，孑身一人住在江南馆巷的单独小院里。

这个小院座落在正巷路北一个南北死胡同里，是内蒙公安厅在李守信被特赦前专给修建起来的。小院占地约三百多平方米，系砖木结构。北堂房三间，当中一间摆有沙发、茶几等家俱，为会客厅；右边是卧室，临窗一盘土炕地下放着桌椅；左边是书斋，临窗有写字台，后边正面是一个大书橱，两旁各有一个小书架。院内没有东西厢房，南侧修有南房三间，当中一间堆积柴炭，东边是厨房，西边是厕所。当院空地可以种花植柳。夏秋季节，

打开朝东向阳的院门，院内一片娇红嫩绿，相当舒适幽美，十分雅静。

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住宅，在新城鼓楼北的元贞永街。我没去过，听说其格局和李守信的差不多。德的家属，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引渡回国后，先在原籍西苏尼特旗参加牧业劳动。德被特赦后，他的年岁较大的儿子们都给安排了工作。他的老伴带着一个小儿子来呼和浩特跟他一起生活。李守信没有亲属，领导上找了一个卖水的老汉，给他挑水，替他倾倒垃圾等。李守信的左胯麻木，蹲坐起立不方便，为此特在厕所里为他安置了一个当中有葫芦形窟窿的坐椅。国家对他们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过去我没有见过李守信。从照片上看，他年轻时可算是个彪形大汉。这时由于年老，又加腿瘸，显得身体佝偻，老态龙钟了。一经交谈，我便发现他对军事、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历史情况都有所了解，真可说是内蒙古近代史的一个“资料篓子”。他与人交谈，口齿锋利，对答如流。相比之下，我走访过的王英、邬青云（邬四儿）和苏义（苏美龙）那些绥远的土匪头目，就显得都是些“小家子气”的“拨布贼”，只有李守信堪称为“江洋大盗”。

李守信的腿因受潮湿瘸了。一九五〇年引渡回国之后，我公安部门请来劳改队和外边的名医，针灸了多半年都没有治愈。每谈到这事，他深感祖国的温暖，对自己以前所犯的罪恶，越发加深内心的愧疚。我问他：“你被捕以后有哪些顾虑？”他说：“我是‘拉杆子’出身的，一者自己从来不怕死，再者即使把我绞成肉泥，也解不了人民对我的仇恨。我最害怕的是把我解回厚和（呼和浩特）举行公审大会，背上亡命招子，路过大南街到美人桥刑场执行枪决，那才丢人现眼。”他说，为此，他心急如焚，以致满嘴牙齿都动摇了。每次牙病发作，心里责骂着自己：“你到了这步天地，还作怪什么，活该！活该！”他一狠心就自己用麻绳把病牙一个个都拔掉了，内蒙公安厅又给他镶上了一副假牙。

他没有想到人民政府把他特赦了！他搬进呼市新城区江南馆巷五号新居，感到喜出望外，很有兴致地订出重新生活的规划，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每天清早起来洒扫庭院，吃过早点乘公共汽车到文史馆上班。中午到新城西街“东风园”就餐。“东风园”主任见他拄着拐杖排在众人后边买饭的艰难，便给了他由服务员给端取饭菜的方便。

有一次，我在深秋的一天去访问他，见院子里堆着许多蜂窝煤和烧柴。他说：“这个时候的煤和柴都很干燥，我先叫挑水老汉买回，省得大冬天排队挨冻购买；现在我每天当作活动就把柴劈短，免得冬天劈柴冻手。”我说：“您很会生活，安排得很周到！”他说：“公安厅已经给我拉来一汽车大块炭。老烧大块炭，顶多能烧一、二年；用块炭打底烧蜂窝煤，就能维持三年五载。这里就是我的最后归宿。按我的健康情况判断，再活十年八年没问题。人民政府既然饶恕了我，我就得硬朗朗活下去，必须从长打算，安排好生活。”并说：“公家对我太够意思了。我不能给公家再添麻烦，自己能解决的尽量自己解决。文史研究馆也给每人发一吨块炭，我那一份让给老德（指德王）了。”

李守信原来是半文盲。不过他相当聪明，当官以后经过师爷们指点，能看懂公文和报纸。特赦后他对政治学习很认真，经常一下午坐在炕桌前学习《毛泽东选集》和其它文件。

至于漫漫长夜如何度过，他对我说：“我半生中干了许多缺德的事，心中老是忏悔。可是在红尘中越陷越深，总想能有个清静的地方。感谢人民政府给了我这样一个地方颐养天年，可以静坐思过，面壁反省。”他就是以这种精神状态向我提供文史资料的。每一题目拟出，他都要几经通宵回忆，然后打出腹稿，使我易于记录整理。我用“蒙疆大事记”对照他忆述的材料，时、地、人、事很少有差错。我们俩“配合”得很好。在一年多时间内，我就帮助他整理出二十几篇，近三十万字的历史资料。每整理出一篇，他都要我给念一、二遍，经他提出一些意见，我再作修改后，

才由他最后作定。

李守信曾收一个勤务兵——唐成良为义子。让师爷们教他读书识字，以后作了“蒙古军”的校级军官。还有一个王治平，是他太太的姐姐的儿子，他把这个外甥培养到大学毕业，并给娶妻立了家室。解放后，唐成良在北京参加了工作。王治平是学生出身，在北京新街口一所中学里当老师。这两个人得知李守信特赦，先是唐成良从北京跑来，带来先父遗留下的皮褥、皮衣以及手表、半导体收音机一类的东西，并给他留了几百元钱。王治平在暑假期间委托妻子来看他，一下就给带来十二套衬衣衬裤，让他每半月更换一次。王治平的妻子每次来总要把李守信的衣物和住宅内外清洗打扫干净才走。李守信在文史馆，平均每星期收到一个邮包，不是唐成良寄来挂面、糕点，就是王治平夫妻寄来苹果、小菜，经常得到亲属的安慰。

特赦时，政府给李守信在银行立了一个存折，存款有三千元，作为坐监时参加轻微劳动应得的补偿。有人劝他娶一个老伴，照料他日常起居。他说：“出身好的寡妇不肯找我；找我的别有意图。为什么不自由自在在地生活，要请个管家婆对我实行‘专政’呢！”

我原先打算把李守信掌握的伪蒙疆史料整理出以后，还想将原热河省各蒙旗的经济和社会史料以及他走私、贩运烟土、包租土地、倒卖黄金、贩卖皮毛、粮食等方面的史料整理出来。他表示很愿意让我帮助他写“拉杆子”、“刮野鬼”的经验、教训写成一本书《马贼战术》，供内蒙古军区领导参考。可惜对伪蒙疆的事还没整理写完，“文革”就开始了，政协的活动停止了，我也不敢再去找李守信了。“文革”期间我很担心李守信这个伪蒙疆的第二号战犯过不了这一“史无前例”的难关。有三年光景未获李守信的信息，心里非常惦念。有一天，在新城西街“东风园”附近，我碰见了老是笑嘻嘻的李守信。他告诉我：“文革”期间内蒙政协、文史馆和参事室的人员，每月工资依旧照发。虽然有

红卫兵进驻这三个机关，他还是安然度过来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李守信死在江南馆巷五号。病重期间，文史馆党组织给北京发去电报，把王治平叫来，为他送了终。“四人帮”垮台以后，我接到王治平的来信，说他姨夫已经逝世，死前没有痛苦，只是不思饮食而嗜睡。他神志清醒时，表示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党对他的宽恕。一天晚上，他睡在枕头上停止了呼吸，文史馆很好地料理了他的后事，遗体火化，骨灰由王治平带回家中保存，待台湾回归祖国后，同他的姨母一起安葬。我接到这封信后，心里经常想：李守信在枪林弹雨中闯荡了几十年，身上没有留下一块伤疤；他犯过种种滔天罪行，承蒙国家特赦，安度了幸福的晚年，最后寿终正寝，真可说是奇迹。实在为他庆幸。

（一九八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 - 李守信自述

作者 =

页数 = 3 5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